



地缘看世界

——中东

第七册

温骏轩 / 著

地缘看世界 中东卷

第七册

第二版

温骏轩 著

说明

此电子书仅用于分享交流，禁止用于商业途径，版权属著作人所有。

地缘看世界贴子：<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23829-1.shtml>

地缘看世界 地图整理：<https://pan.baidu.com/s/1dEYSK3f#list/path=%2F>

地缘看世界 文字整理：<https://pan.baidu.com/s/1pLzbCIR#list/path=%2F>

分色地形底图：<https://pan.baidu.com/s/1pKJ8JbX#list/path=%2F>

前言

大家可能认为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来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其实不是，我自幼喜欢读史，地缘方面的研究最初只是用来解读历史的一种方法。

小时候读史只是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长大以后也如一般人那样升华去体味史中人物的思想。不过看得越多，心中的迷惑就越多。中国历史的思路是“人本历史”，例如在历史中只能读到诸如孙刘联盟略施小计，便能以数万之众击溃数十万敌人的经典故事。但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长江那么长，曹操一定要从赤壁过江？从《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答案，从《三国志》当中我们也找不到结果。有的只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人定胜天的论调（不过三家归晋这一段收得甚急，避开了解释为什么人气最旺的蜀汉政权，却是第一个被北方政权灭掉的原因）。

中国从来不缺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只是讲述历史的史家们多是祖传的职业，自太史公以列传的形式将史书的模本固定为人物传记后，记录名人的行为和观察人际关系，就成了史家们分析历史的不二法门（他们甚至不屑于分析，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只习惯于根据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简单的划分黑白）。当年明月曾经说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历史人物的选择与放弃。这种角度已是一种突破，并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是这仍是站在历史重要人物角度来解析历史，仍不能够解开我心中的迷茫。

偶然间又看到了《窃明》的作者试图从军事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他用的是穿越小说的方式），亦是很有新意，但仍感觉这种方法偏战术性了。我需要一种能站在“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的方法。这种“人性”不是个别伟人的性格，而是人类或者说一个族群的性格，也可以说是“人民的性格”。直到我重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找到“人民历史”的感觉。“大历史”观必须将视线从具体人物和事件上移开，才能够从更深层次上感受历史的规律和必然。

于是我试着从“人性”（人类的性格）的角度，沿着古人的思路去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个人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既然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么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利害关系，就是周边的环境。这需要暂且抛开人定胜天的勇气，而直接去感受地缘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我曾经说过，现实的国际关系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无论是对地缘还是对历史

的研究，都不能只是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它要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即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这样研究才有意义。

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分析利害关系。为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展，找到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向（例如你可以从地缘的角度知道，中国目前将精力放在东南亚，会比放在墨西哥身上重要得多）。这就好像在图上找到可行的道路一样，至于路怎么修，修好以后用什么交通工具走，就要靠其他的专业人士配合了。

完全从客观环境角度，去解读人类历史是不够科学的；但这并不代表不要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有思想，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出经验反过来改变环境。因此也需要从人文的角度解读历史，地缘和人文并不互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产生是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的。前面说过有机会我会开个贴细说的，切入点应该是宗教。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能够作出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于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在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的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

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光是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这个帖子能一直写下去，初始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拿出来分享（一个人一旦有了些新的想法，却不能找到同道之人分享是很难受的，也无法再做提升）。你不能指望周围的人跟你有一样的爱好，好在网络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还是那句话，认同的捧个人场，不认同的砸个砖场也无妨。

温骏轩



北非撒哈拉沙漠



阿拉伯半岛上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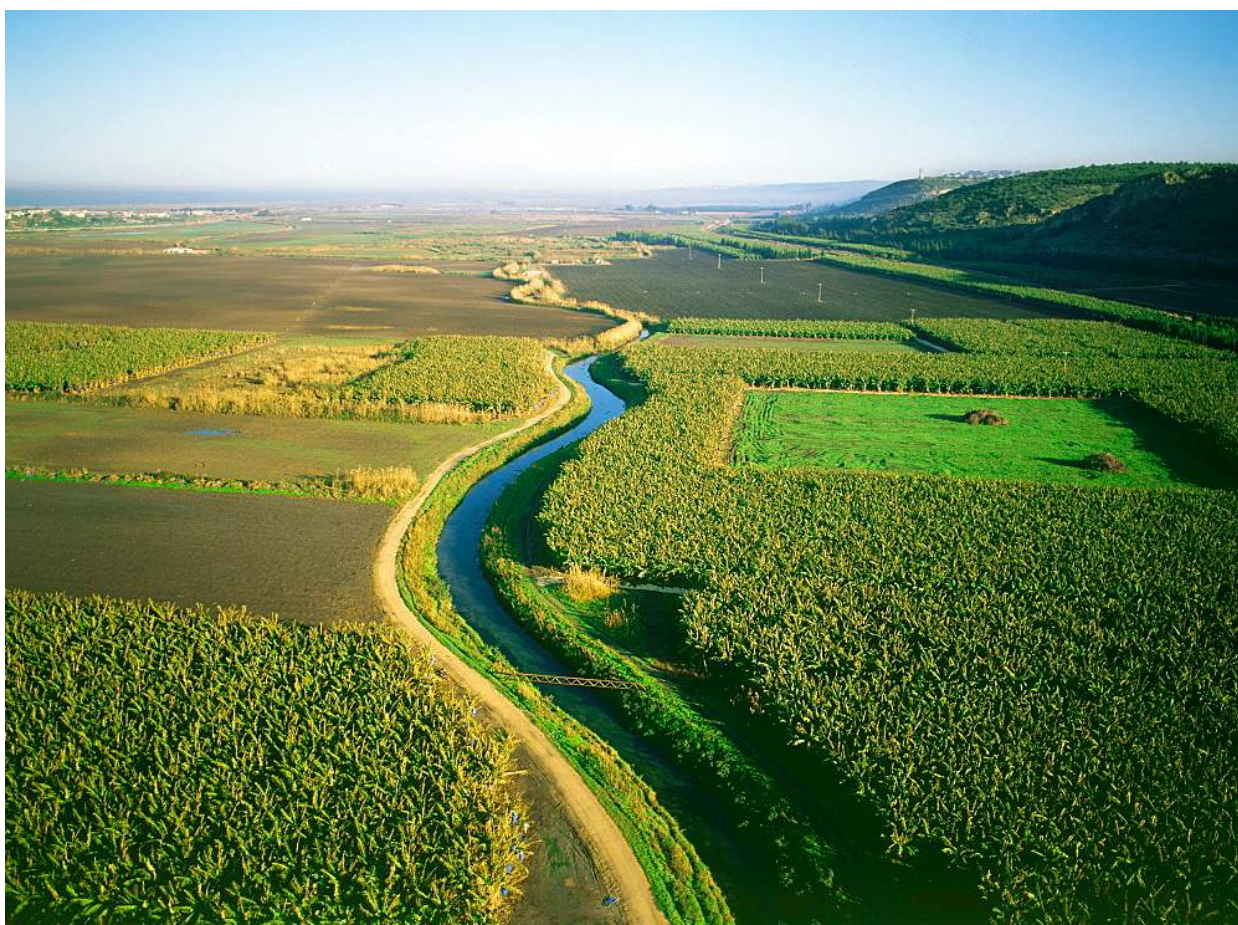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



波斯湾石油钻井平台



叙利亚阿萨德家族



以色列沙仑平原的农业



英国军队进入耶路撒冷（1917 年）



犹太复国主义游击队（1948 年）



一批犹太人登船回巴勒斯坦（1948 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 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 年）



幼发拉底河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的军事隔离区



黎巴嫩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领袖



耶路撒冷

目录

| | |
|----------------------------|----|
| 第一章 土耳其在其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 | 1 |
| 第一节 土耳其脱亚入欧的设想 | 1 |
| 第二节 土耳其试图向中亚扩张影响力 | 3 |
| 第三节 土耳其意图在阿拉伯世界发挥重要影响力 | 4 |
| 第四节 土耳其和其邻国共同面对的库尔德问题 | 6 |
| 第二章 北非东部地区地缘结构的解析 | 9 |
| 第一节 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在地理特征上的相似性 | 9 |
| 第二节 尼罗河流域在北非地区的重要地位 | 10 |
| 第三节 尼罗河结构特点对上下游交流的影响 | 11 |
| 第四节 阿拉伯人在萨赫勒占据优势地位 | 12 |
| 第五节 苏丹的分裂和萨赫勒地的关系 | 14 |
| 第六节 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化程度和种族冲突 | 15 |
| 第三章 北非中西部地区地缘结构的解析 | 17 |
| 第一节 阿拉伯人在北非扩张路线及其和柏柏人的关系 | 17 |
| 第二节 阿特拉斯山脉对西北非的重要地缘作用 | 19 |
| 第三节 利比亚国土人口承载能力的不足 | 20 |
| 第四节 利比亚的城市分布特点并对国内博弈的影响 | 22 |
| 第五节 利比亚利用地下水改善其地缘潜力 | 25 |
| 第四章 沙特阿拉伯的地缘结构 | 27 |
| 第一节 阿拉伯半岛的地形 | 27 |
| 第二节 沙特境内的宗教圣地及内部板块划分 | 28 |
| 第三节 汉志王国和内志王国的博弈 | 29 |
| 第四节 阿拉伯石油国未来发展面临的瓶颈 | 30 |
| 第五章 也门地理结构和其曾经的分裂格局 | 32 |
| 第一节 也门的地理环境特点 | 32 |
| 第二节 南也门和北也门分治的地缘背景 | 34 |
| 第三节 萨珊波斯控制也门对默罕默德创教的影响 | 36 |

| | |
|----------------------------------|-----------|
| 第四节 亚丁在历史上两次面临命运的改变····· | 38 |
| 第六章 外部势力对也门局势的介入和影响····· | 40 |
| 第一节 英国殖民亚丁及周边陆地地区····· | 40 |
| 第二节 大国对也门分治的战略和也门的统一····· | 42 |
| 第三节 基地组织利用也门南北矛盾对其渗透····· | 43 |
| 第四节 美国以印度洋上的查戈斯群岛为军事基地····· | 45 |
| 第五节 美国希望租用也门索科特拉岛作为军事基地····· | 47 |
| 第六节 美国渗透非洲之角····· | 48 |
| 第七章 两河流域的地理结构····· | 50 |
| 第一节 两河流域上游的的高原地带····· | 50 |
| 第二节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中下游补给上的差异····· | 52 |
| 第三节 两河流域的三级阶梯结构····· | 55 |
| 第八章 伊拉克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结构····· | 58 |
| 第一节 伊拉克各民族和教派分布情况····· | 58 |
| 第二节 早期伊斯兰教内部权力之争导致什叶派的产生····· | 59 |
| 第三节 什叶派的成为少数派的原因····· | 60 |
| 第四节 什叶派在两河下游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 | 61 |
| 第五节 伊拉克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劣势····· | 62 |
| 第六节 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 64 |
| 第七节 伊拉克退出美国在中东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 65 |
| 第九章 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的地缘矛盾····· | 67 |
| 第一节 伊朗宗教势力发动革命上台并和西方反目····· | 67 |
| 第二节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合流成阿拉伯河····· | 68 |
| 第三节 卡伦河和阿拉伯河合流对伊朗的影响····· | 69 |
| 第四节 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的划界····· | 72 |
| 第五节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影响····· | 73 |
| 第十章 波斯湾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 76 |
| 第一节 波斯湾地区石油分布的规律····· | 76 |
| 第二节 波斯湾地区各国的石油储量····· | 77 |
| 第三节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受大国干涉而失败····· | 79 |
| 第四节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意图及其获取利益的方式····· | 80 |

| | |
|--------------------------------------|------------|
| 第五节 伊拉克萨达姆倒台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博弈····· | 82 |
| 第六节 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布比延岛两侧水道的地缘矛盾····· | 84 |
| 第七节 伊朗利用什叶派身份向外扩张势力范围····· | 86 |
| 第八节 伊朗在阿拉伯地区借宗教扩张势力时面临的局势····· | 89 |
| 第九节 伊朗试图使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为其什叶派联盟····· | 90 |
| 第十一章 叙利亚的政治结构及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 | 94 |
| 第一节 叙利亚阿萨德家族上台的历史大背景····· | 94 |
| 第二节 法国曾经的殖民统治使叙利亚阿拉维派得以掌握军队····· | 95 |
| 第三节 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权力分配的安排····· | 96 |
| 第四节 新月沃地在中东的地缘枢纽地位····· | 98 |
| 第五节 叙利亚在新月沃地中的重要地位····· | 100 |
| 第六节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缘竞争关系····· | 101 |
| 第七节 叙利亚将黎巴嫩视为其地缘利益区····· | 103 |
| 第八节 叙利亚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不现实性····· | 104 |
| 第十二章 伊朗在波斯湾和里海的战略意图····· | 107 |
| 第一节 伊朗对巴林的领土扩张企图····· | 107 |
| 第二节 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对巴林十叶派夺权的态度····· | 108 |
| 第三节 里海周边国家对里海水域的划界····· | 110 |
| 第四节 伊朗在波斯湾能拥有主权的水域面积····· | 112 |
| 第五节 波斯湾与其他中东海区的地缘价值对比····· | 113 |
| 第六节 伊朗在波斯湾的战略目标····· | 115 |
| 第十三章 西亚裂谷地带的地理结构····· | 117 |
| 第一节 西亚裂谷带和东非大裂谷的关系····· | 117 |
| 第二节 西亚裂谷带的水资源条件····· | 119 |
| 第三节 迦南之地内部结构的多样性····· | 120 |
| 第四节 死海盐度的特点和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122 |
| 第五节 英法的殖民对约旦河谷形成现状边界的影响····· | 124 |
| 第十四章 一战后英国对阿拉伯政治格局的影响····· | 126 |
| 第一节 哈希姆家族在内志和汉志的竞争中落败····· | 126 |
| 第二节 哈希姆家族在英国支持下的起义和建国····· | 127 |
| 第三节 英国将外约旦分出给哈希姆家族委任统治····· | 128 |

| | |
|-----------------------------------|------------|
| 第四节 英国对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作出的不同承诺····· | 129 |
| 第五节 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作为苏伊士运河的缓冲····· | 131 |
| 第十五章 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渊源关系····· | 133 |
| 第一节 犹太教诞生的历史背景····· | 133 |
| 第二节 耶稣基督将犹太教义在罗马帝国内传播····· | 134 |
| 第三节 基督徒处理新宗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方式····· | 135 |
| 第四节 耶稣在基督教中的宗教定位····· | 137 |
| 第五节 基督教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 138 |
| 第十六章 犹太人重返迦南之地····· | 140 |
| 第一节 犹太复国主义成为现实的时代背景····· | 140 |
| 第二节 犹太人通过购买土地方式回到迦南定居····· | 141 |
| 第三节 迦南之地的高地分布····· | 142 |
| 第三节 犹太人优先渗透巴勒斯坦沿海平原····· | 143 |
| 第四节 迦南之地的沿海平原地带····· | 144 |
| 第五节 尼罗河泥沙对非利士平原海岸的影响····· | 146 |
| 第六节 巴勒斯坦地区的特拉维夫和海法港口····· | 147 |
| 第十七章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业开发····· | 149 |
| 第一节 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的分界线····· | 149 |
| 第二节 非利士平原对于埃及进入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意义····· | 150 |
| 第三节 古埃及人将非利士人布局至非利士平原····· | 151 |
| 第四节 犹太人改造荒漠地和渗透以斯德仑谷地····· | 152 |
| 第五节 犹太人渗透至加利利湖地区····· | 154 |
| 第六节 犹太人对胡拉盆地中的湿地进行改造····· | 155 |
| 第七节 犹太人一战中站队英国后看到的复国希望····· | 156 |
| 第八节 地中海气候特点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 | 157 |
| 第十八章 英国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调解····· | 159 |
| 第一节 英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所持态度····· | 159 |
| 第二节 英国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和解····· | 160 |
| 第三节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爆发冲突的根源····· | 161 |
| 第四节 英国为平衡阿犹关系牺牲哈希姆家族利益····· | 162 |
| 第五节 犹太人以建立准军事组织应对英国的平衡之术····· | 163 |

| | |
|-------------------------------------|------------|
| 第六节 犹太人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者帮助其复国····· | 164 |
| 第十九章 犹太人在美国和苏联支持下完成建国····· | 166 |
| 第一节 英国在二战不能给予犹太人复国希望的原因····· | 166 |
| 第二节 二战后美俄的崛起为犹太人复国提供了新的契机····· | 167 |
| 第三节 美国价值观的评价及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 | 168 |
| 第四节 俄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考量····· | 170 |
| 第五节 在美苏支持下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方案····· | 171 |
| 第二十章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后的领土分割状况····· | 173 |
| 第一节 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各自分得的领土部分····· | 173 |
| 第二节 阿拉伯人失去内盖夫荒漠对其亚非交流的影响····· | 174 |
| 第三节 以色列将内盖夫荒漠纳入其领土的缘由····· | 175 |
| 第四节 巴以分治方案让巴以两国形成复杂的地缘关系····· | 177 |
| 第五节 雅法和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 178 |
|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民族独立之战····· | 180 |
| 第一节 阿拉伯各国家参战的意图和目标····· | 180 |
| 第二节 色列和约旦在亚喀巴湾的海岸线····· | 181 |
| 第三节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战前的准备情况····· | 182 |
| 第四节 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 183 |
| 第五节 以色列战后对巴勒斯坦部分领土的占领····· | 185 |
| 第六节 巴勒斯坦能保住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原因····· | 186 |
| 第七节 沙特家族信仰的宗教教派的特点····· | 187 |
| 第八节 哈希姆家族将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合并····· | 188 |
|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中东战争之海权之战····· | 180 |
| 第一节 埃及在尼罗河建造阿斯旺大坝····· | 180 |
| 第二节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 | 191 |
| 第三节 埃及禁止以色列利用苏伊士运河····· | 193 |
| 第四节 埃及在亚喀巴湾封锁以色列的出海通道····· | 194 |
| 第五节 以色列和英法联军出兵侵入埃及····· | 195 |
| 第六节 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没有支持英国和法国····· | 197 |
| 第七节 埃及向以色列妥协允许其通过蒂朗海峡····· | 198 |
| 第二十三章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之争····· | 200 |

| | | |
|--------------|--------------------------------|------------|
| 第一节 | 以色列通过国家输水工程调配水资源····· | 200 |
| 第二节 | 以色列从加利利湖调水对约旦河谷的影响····· | 201 |
| 第三节 | 约旦和以色列争夺耶尔穆克河水资源····· | 203 |
| 第四节 | 约旦河下游和死海的补水问题····· | 205 |
| 第五节 | 阿拉伯人在约旦河上游修建大坝反制以色列····· | 206 |
| 第二十四章 |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整合问题····· | 208 |
| 第一节 | 埃及凭借地缘实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 208 |
| 第二节 | 埃及主导建立阿拉伯统一国家面临的困难····· | 209 |
| 第三节 | 阿拉伯世界统一失败后以国家结盟方式合作····· | 210 |
| 第四节 | 以色列面对阿拉伯国家结盟的反制行为····· | 212 |
| 第二十五章 | 英法在西亚裂谷带的势力分界线····· | 214 |
| 第一节 | 英法两国以海岸线为准则分割西亚裂谷带····· | 214 |
| 第二节 | 戈兰高地划入叙利亚的地缘背景····· | 215 |
| 第三节 | 英法在戈兰高地和其以西约旦河谷的划界····· | 217 |
| 第四节 | 英法对加利利湖水域的划分····· | 219 |
| 第二十六章 |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水资源之战····· | 221 |
| 第一节 | 埃及建设跨红海大桥的设想····· | 221 |
| 第二节 | 以色列要求埃及将西奈半岛非军事化后退出····· | 222 |
| 第三节 | 埃及建设兼具供水与交通功能的隧道连接西奈半岛····· | 224 |
| 第四节 | 以色列击败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 | 225 |
| 第五节 | 巴勒斯坦难民与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 | 226 |
| 第六节 | 以色列控制耶尔穆克河下游地区····· | 228 |
| 第七节 | 以色列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 | 229 |
| 第八节 | 土地换和平原则的提出····· | 230 |
| 第九节 | 叙利亚在加利利湖的出湖权问题····· | 231 |
| 第二十七章 | 阿拉伯国家在河流水资源面临的不利局面····· | 234 |
| 第一节 | 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建水坝····· | 234 |
| 第二节 | 安托利亚高原相对阿拉伯半岛的地缘优势····· | 235 |
| 第三节 | 土耳其在两河水资源上分配上的重要角色····· | 237 |
| 第四节 | 土耳其在中东国家的售水计划····· | 238 |
| 第五节 | 埃及水资源受到尼罗河上游国家的牵制····· | 240 |

| | |
|--------------------------------------|------------|
| 第六节 以色列说服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建立水利工程····· | 241 |
| 第二十八章 西亚裂谷带北部的地缘格局····· | 243 |
| 第一节 黎巴嫩的地理结构····· | 243 |
| 第二节 黎巴嫩的独立对叙利亚地缘结构的影响····· | 245 |
| 第三节 安条克在古典时期的重要地缘地位····· | 246 |
| 第四节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安条克的政治归属问题····· | 247 |
| 第五节 法国二战为拉拢土耳其让安条克并入其领土····· | 249 |
| 第六节 安条克脱离叙利亚对其发展的影响····· | 251 |
| 第七节 土耳其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 | 252 |
| 第八节 叙利亚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冲突····· | 254 |
| 第二十九章 阿拉伯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的准备工作····· | 256 |
| 第一节 埃及和以色列维持持续有限战争状态····· | 256 |
| 第二节 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停战状态的不满····· | 257 |
| 第三节 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影响西方对战争态度····· | 259 |
| 第四节 影响历次中东战争快速结束的因素····· | 260 |
| 第五节 埃及逼迫苏联和欧洲持有利于己的战争态度····· | 261 |
| 第六节 阿拉伯人选择赎罪日和斋月节发起进攻····· | 262 |
| 第七节 以色列对战争来临的误判····· | 264 |
| 第三十章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石油之战····· | 267 |
| 第一节 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 | 267 |
| 第二节 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战略意义····· | 268 |
| 第三节 美苏在战争中对以埃双方的大力军援····· | 269 |
| 第四节 埃及战后和以色列的和解····· | 270 |
| 第五节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交战····· | 271 |
| 第六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及在地缘政治格局上的影响····· | 273 |
| 第七节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达成的停战线····· | 274 |
| 第三十一章 黎巴嫩国内复杂的宗教教派结构····· | 276 |
| 第一节 黎巴嫩复杂的教派结构形成的地缘背景····· | 276 |
| 第二节 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与欧洲基督教的接触历史····· | 277 |
| 第三节 法国将黎马嫩从大叙利亚分离出来并让马龙派主政····· | 279 |
| 第四节 黎马嫩各教派人口比例变化使权力分配失衡····· | 280 |

| | | |
|--------------|--------------------------------|------------|
| 第五节 | 约旦对以色列和解对其境内巴勒斯坦难民的影响····· | 282 |
| 第六节 | 巴解组织被约旦赶出后进入黎巴嫩····· | 283 |
| 第三十二章 | 德鲁兹派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特殊作用····· | 285 |
| 第一节 | 德鲁兹派的产生过程和其异类的身份····· | 285 |
| 第二节 | 德鲁兹派忠于所在国的奇特教义····· | 286 |
| 第三节 | 以色列重视德鲁兹人并让其加入以军队····· | 287 |
| 第四节 | 以色列争取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派居民人心····· | 288 |
| 第三十三章 | 黎巴嫩爆发内战并形成的地缘格局····· | 291 |
| 第一节 | 巴勒斯坦人进入黎巴嫩后引发黎巴嫩内战····· | 291 |
| 第二节 | 黎巴嫩马龙派政府请求外部力量干预局势····· | 292 |
| 第三节 | 黎巴嫩各教派对邀请叙利亚军队入境的不同权衡····· | 293 |
| 第四节 | 黎巴嫩各教派分布范围的变迁····· | 294 |
| 第五节 | 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 295 |
| 第六节 | 叙利亚利用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牵制以色列····· | 297 |
| 第七节 | 黎巴嫩穆斯林教派和巴解组织的互相利用····· | 298 |
| 第三十四章 |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加利利山脉之战····· | 301 |
| 第一节 | 以色列最初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对策····· | 301 |
| 第二节 |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山区清剿巴勒斯坦武装····· | 302 |
| 第三节 | 以色列撤军后黎巴嫩局势重新恢复回之前状态····· | 303 |
| 第四节 | 以色列对黎巴嫩入侵时需关注的外部干涉势力····· | 304 |
| 第五节 | 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第五次中东战争····· | 305 |
| 第六节 | 以色列迫使巴解组织退出黎巴嫩····· | 307 |
| 第七节 | 以色列军队退出贝鲁特后驻军黎巴嫩南部····· | 308 |
| 第三十五章 | 以色列驻军黎巴嫩南部引发的影响····· | 310 |
| 第一节 | 黎巴嫩南部什叶派借反以色列建立武装力量····· | 310 |
| 第二节 | 以色列军队的入驻对黎巴嫩地缘格局的影响····· | 311 |
| 第三节 | 美国和法国调解以叙撤军黎巴嫩的失败····· | 313 |
| 第四节 | 黎巴嫩各教派的和解及以色列的单边撤军····· | 314 |
| 第五节 | 以色列撤军后的黎巴嫩南部权力真空问题····· | 315 |
| 第六节 | 黎巴嫩真主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份额····· | 316 |
| 第七节 | 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以扩大在中东政治影响力····· | 318 |

| | |
|---------------------------------|-----|
| 第三十六章 巴勒斯坦对以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派别 | 320 |
| 第一节 伊朗支持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以扩大其影响力 | 320 |
| 第二节 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 321 |
| 第三节 法塔赫在巴解组织的主流地位 | 322 |
| 第四节 哈马斯的出现并对以色列和巴解内部的影响 | 323 |
| 第五节 哈马斯和法塔赫各据东西部领土形成分裂格局 | 324 |
| 第三十七章 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意义 | 326 |
| 第一节 犹太王国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并营建圣殿 | 326 |
| 第二节 犹太人历史上沦为巴比伦之囚 | 327 |
| 第三节 耶稣传教对犹太人和罗马人关系造成的影响 | 328 |
| 第四节 犹太人武装反抗罗马失败后被清除出迦南 | 329 |
| 第三十八章 伊斯兰教的创立传播及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 331 |
| 第一节 穆罕默德创教后在麦地那与麦加贵族的斗争 | 331 |
| 第二节 穆罕默德将伊斯兰教设计成普世宗教 | 332 |
| 第三节 耶路撒冷被预设与伊斯兰教产生联系 | 333 |
| 第四节 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 334 |
| 第三十九章 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矛盾 | 336 |
| 第一节 阿克萨清真寺的修建及其结构 | 336 |
| 第二节 阿克萨清真寺的存在对以色列重修圣殿的影响 | 338 |
| 第三节 犹太人不放弃在阿克萨清真寺区域重建圣殿的想法 | 339 |
| 第四节 以色列以考古挖掘为名蚕食阿克萨清真寺 | 341 |

第一章 土耳其在其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

第一节 土耳其脱亚入欧的设想

说起土耳其，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重要的帝国。往上数的话，更可以和我们中国人扯上关系。因为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土耳其都是以突厥的直接继承者来追溯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这个东西，讲究的是个继承，旁人怎么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一文化体的人认不认。从这点来看，突厥系的那些国家、民族（以持突厥语为文化特征），对土耳其来扛大旗大都还是认可的。至于说有半岛国家，往上追了多少万年，愣要扯上关系，只能说是扯蛋了，大可一笑置之。

现在的土耳其，绝大部分国土就是在伸入地中海的小亚细亚半岛。这也是地中海四大半岛中，唯一一个隶属亚洲的突出部。另外三个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前南斯拉夫国家等），统称南欧三大半岛。这样特殊的位置，也使得小亚细亚半岛在欧亚的博弈中，不得不扮演特殊的角色。在历史上，每当欧洲文明试图向亚洲扩张时，小亚细亚半岛就会先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如马其顿帝国）；而当亚洲文明反过来向南欧渗透时，也同样会把小亚细亚作为桥头堡（如波斯帝国）。

在一战结束之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代表亚洲的穆斯林和欧洲的基督徒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博弈。在大部分时候，还是占据了优势的。而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欧洲，最终不仅战胜了这个最后的穆斯林帝国，也成为了世界的主人。而衰弱的土耳其，则丧失了他们在欧亚的边缘区，仅能保有小亚细亚半岛和海峡对面的伊斯坦布尔那一小块欧洲土地。千万不要小看这块“欧洲土地”，正是有了这点欧洲血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土耳其人，决心步日本人后尘“脱亚入欧”，彻底和落后文明的亚洲划清界线。

相比日本，土耳其想变成“欧洲”还是有地缘上的优势的。除了刚才所说的，人家的确有块“欧洲土地”以外，人种上的差别也要小得多。毕竟从大的分类上来说，也算是“白种人”了（在漫长的帝国时代，的确也混杂了不少南欧基因）。不过对于欧洲人来说，地理、人种只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宗教”。在这一点上，土耳其就遇到结构性问题了，因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文化冲突，可以说是很难调和的。要想让一方改宗另一方，更是难上加难。相比之下，东亚这些对宗教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国家，反倒障碍要小。就像韩国人在依附中央之国时，也会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而现在，更可以自豪的声称，自己的基

教徒已经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了。虽然他们改造过的一些教派，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

让土耳其改宗是不可能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欧洲人，让宗教世俗化。即让宗教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影响政治。应该说，土耳其人这一点做得是很成功的（在穆斯林世界里）。而成功的源头，就在于土耳其改革的总设计师——“国父”凯末尔的出身。军人出身的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要想保证土耳其的政治不被宗教所控制，基础就是要保证军队的世俗化，然后用“军人监国”，以保证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

就这一点来说，土耳其人还是做到了。以至于在 8 年前，当带有宗教保守色彩的政党执政后，土耳其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曾经制定了详细的军事政变计划，以防止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虽然最终政变没有实施，但其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土耳其的政局。当年参与政变的高级将领，目前也在被政府秋后算帐，以至于今年 7 月底，土耳其的三军将领集体辞职，以此表明“军人监国”的决心。

土耳其这种去宗教化的决心，欧洲人也是看在眼里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也乐得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对手，倒向自己。特别是土耳其军队的世俗化，更是使之在“脱亚入欧”的要素中，率先得到认可。因此在“北约”这个由欧、美组成的军事联盟中，也有了土耳其的一席之地。至于受文化因素影响更大的“欧盟”，土耳其人要想进去，就困难得多了。毕竟让那些基督教国家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成为自己的一员，还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

如果土耳其人有一天真的能加入欧盟，那么它也就算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进程了。真到了那一天，我倒建议地理教材可以把小细亚半岛划入欧洲算了。毕竟这个突出部在地理上本来就是一个中间地带，划过去也不存在飞地的问题。包括土耳其东北角的，从苏联独立出来的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也同样是这种情况。让这些已经视自己为欧洲人的国家，留在亚洲这个地缘概念中，只能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不必要的矛盾。相比之下，如果东亚有哪些国家，也希望成为欧美人的话，就不光把皮肤洗白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办法影响地球的板块运动，让自己的岛飘过去，那还是面对现实，把融合重点放在东亚大陆上比较好。

虽然土耳其目前还不能算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从长远来看，这个愿望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缘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你要让欧洲人觉得你对整个欧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只会拖累那些欧盟国家的话，即使是根正苗红的欧洲国家，人家也不收。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提振自己的经济，让老嫌贫爱富的欧洲人愿意认这门亲戚以外，土耳其人

更要利用自己的特别身份，来为欧洲开拓地缘利益区。唯有如此，才能将劣势转换为优势，从而打动欧洲的政治家。这个身份，就是“穆斯林”，而可供土耳其递投名状的区域，就是土耳其东部那些北至中亚五国，南到北非的伊斯兰国家。

曾经有人跟我说，土耳其现在的处境，像不像“双头鹰”。我说在100多年前，可以这样说，现在嘛，“蝙蝠”的比喻更适合它。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时政，来看看土耳其是怎样扮演它的“蝙蝠”角色的。

第二节 土耳其试图向中亚扩张影响力

在穆斯林世界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并不仅仅是为了向欧洲递投名状，更是为了做强自己的势力。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自己有了实力，才有可能在社团里站稳脚跟。历史给土耳其人的第一次机会，就是苏联分裂。虽然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最终还是由俄罗斯继承了，但中亚这块突厥之地，总算给了外部势力以机会。土耳其人的兴奋之情，我们在大中亚部分已经解读过了。为了重温突厥帝国的旧梦，土耳其人积极向中亚国家施加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向中亚国家提供打字机等设备，以期用土耳其改良过的拉丁字母取代俄文字母，用“书同文”的方式渗透中亚（这也是字母文字的悲哀，容易学，也容易变）。

在大中亚部分，我们也说过，盯着中亚这块腹地的，还有伊朗。不同于它的突厥和阿拉伯邻居，波斯封闭的地缘结构，虽然保证了它文明和国家的独立性，却没有更多的天然同盟，以供其扩张。中亚战略空间的出现，也成为了伊朗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战略机会。单纯比较地理优势，土耳其方面要处于劣势。因为它和中亚国家之间，还隔着高加索三国。

而这三个国家中，除了最东面的阿塞拜疆是穆斯林国家以外，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是基督教国家。特别是亚美尼亚，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这些土耳其人眼中的“异教徒”曾经遭受过土耳其人的种族清洗。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污点，也成为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重大障碍（屠杀让亚美尼亚人损失了150万人口）。另一个不利之处，就是俄国人依然对高加索地区虎视眈眈，不会愿意看到穆斯林的势力在此坐大，哪怕是批着世俗化的外衣（让俄国人头痛不已的车臣，就在格鲁吉亚的东北面）。

鉴于高加索地区的复杂结构，土耳其人很难在控制该地区后，再将势力范围向中亚做有效延伸。而伊朗虽然有地理优势，与中亚国家直接对接。但一则文化上，相比土耳其没有优势，除了最小的塔吉克斯坦与之有共同的族源以外，其他四国都是突厥系的族群。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在地缘上的孤独，是大家都

看在眼里的。找这样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做大哥，显然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因此在和有欧洲作后盾，文化又同源的土耳其竞争当中，土耳其算是胜出了。但这种胜出，只是相对于伊朗而言。因为苏联解体，固然不可避免的会弱化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力（相比从前），但与中亚五国中的三国直接接壤的中国，却迅速西进，填补了空间。为了应对西方的渗透，俄国人也不得不认同和中国来共同维护这片地缘利益区。而技术上的方案，就是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合组织”。

最近这个组织，又被赋予了经贸合作方面的使命。不管上合组织又会被加载什么样的功能，它地缘上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就是为中、俄两国，稳定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缓冲区。所以你不会看到，东南亚或者白俄罗斯这种中、俄两国的后院，成为这个组织的接收对象。既然土耳其向中亚扩张势力范围的梦想，由于中、俄共治局面的出现，而基本破灭。那么土耳其再想做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就需要再想办法了。

这当然不表示土耳其人不会再试图对中亚施加影响力了，只不过在中、俄两个大国的虎视眈眈下，战略上不足以满足“大突厥”的梦想罢了。如果单从地理位置来看，伊朗高原其实是小亚细亚半岛最为自然的陆地渗透方向。问题在于伊朗高原本身封闭性的地理结构，以及在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位置，让它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当中，一直能够保有独立的，以“波斯”为标签的族群、文化。即使是在阿拉伯人的鼎盛时期，凭借 3.0 版的一神教（1.0 犹太教，2.0 基督教），将北至中亚，南至北非的游牧区，都纳入了帝国的管辖范围，波斯人也固执的选择了少数派的“什叶派”，以彰显自己的地缘独立性。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比自己长，地缘结构又有良好防御性的板块，帝国时代的土耳其人虽然能够在战争中，将波斯人在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边缘区切割出来，却始终无法控制伊朗高原的腹地。在最鼎盛时期都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的土耳其，更不会幻想把国土面积甚至超出自己一倍多的伊朗，融合成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了（人口倒是差不多，都是 7 千多万）。

第三节 土耳其意图在阿拉伯世界发挥重要影响力

既然在中亚的渗透不如意，伊朗又没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小弟，那么土耳其再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就只能向南，看看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阿拉伯人那里有没有机会了。说起来，在亚、非这片伊斯兰化的土地上，内部大致可以划成阿拉伯、突厥、波斯三大族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土耳其人在阿拉伯世界并无优势，所能倚仗的，也就是它的穆斯林身份了。

如果单从地缘扩张的角度来看，渗透入阿拉伯世界的难度，反倒不像封闭性良好的波斯那么大。无论是在欧洲人主导的罗马时代，还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奥斯曼帝国时代，都曾经将阿拉伯半岛、北非的沿地中海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单从这些先例来看，土耳其人向南渗透的想法，也并非空中楼阁。至于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结构有什么弱点，让它容易成为强大帝国的势力范围，我们后面会分析的。

土耳其如果想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作为，所要打出的就不是“大突厥”这张文化牌了，而是穆斯林代言人的定位。这里所说的“代言”，一方面指的是利用自己“蝙蝠”的身份和西方国家沟通；另一方面也需要表现出，为那些穆斯林兄弟出头的“义气”。唯有如此，土耳其才能彰显在欧美和阿拉伯世界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还 hold 住中东的时候，土耳其包括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机会独立显示他们的作用（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亚非大陆这点事跟远隔大洋的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而现在，不管后世把 911 作为历史分割点，还是把 2008 年经济危机、阿富汗战争，或者黑人总统的上台作为美国盛极必衰的分水岭。美国在控制这个世界的问题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却是事实。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地球那么大，美国的海洋纵深、腹地优势再强，也是独木难支。如果美国觉得经营中东这块战略要点有困难，而不得出让出部分空间的话，它首先想到的，只会是欧洲。至于印度，美国人虽然不吝赞美之辞，从战略上却不希望这个在印度洋上有天然地缘优势的国家，有机会染指中东。

从地缘结构上来说，北非是欧洲的天然地缘利益区。正如这次法国人在利比亚上窜下跳的表现一样。试图以独立欧洲的面目，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欧洲人，希望通过消灭卡扎菲政权，来整合他们的地中海邻居。问题是，从地缘关系和实力上来看，欧洲人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特别是在殖民时代，他们已经成功的实践过了。

只是鉴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千年恩怨，以及宗教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意大利人来做这件事，都存在事倍功半的情况。就好像这次利比亚的战事一样，反对派既希望得到欧洲人的支援，又不希望他们介入得过深，引起民意的反弹。搞到最后就是个折中的方案，你在空中帮忙就行了，地面上暗中给武器、资金也行，但就是不能有一兵一卒，出现在利比亚的土地上（偷着去的不算）。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人的穆斯林身份，就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了显示自己愿意为阿拉伯兄弟出头的决心，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人，甚至不惜在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问题上和法、英唱反调，并主动愿意帮助保障卡扎菲的

安全。在这次地缘博弈中，对土耳其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立场，而是显示自己的存在。让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看到土耳其能在调和双方的矛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想在阿拉伯世界中赢得威望，仅靠在利比亚事件中的周旋是不够的。土耳其人必须在战略上找到一个切入点，能够直接触及阿拉伯人的神经。而这个切入点，或者说靶子，就是阿拉伯人的第一大敌人“以色列”。

土耳其人试图在阿以问题上发挥作用，也不是自今天才开始。在一年多前，土耳其人就让他们“民间活动家”们，以人道援助巴勒斯坦的名义，试探性的介入阿以问题了。如果成功了，那么土耳其人就可以通过这件事，扩大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如果被以色列人阻止了，也同样达到了效果，甚至会更好。对于土耳其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能不能得到援助，而是竖立起自己敢为兄弟出头，单挑犹太人的威望。让土耳其人窃喜的是，犹太人强硬的态度让去年的“加沙救援船事件”，演变成一场小型军事冲突。8名土耳其人的死亡，无疑让土耳其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去上位带头大哥的位置，站在犹太人的对面。

这场表面为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人出头，实则做大自己影响力的大戏，在这几日达到了高潮。土耳其在国际调查走完程序后，正式驱逐了以色列大使，将两国关系降入了冰点。如果单从陆地来看，土耳其人并无法直接面对以色列（中间隔着叙利亚、黎巴嫩）。这势必会削弱这场大戏的精彩程度，毕竟要是能让阿拉伯人看到土耳其人直接威胁以色列本土，这杆大旗就更容易竖起来了。虽然说陆路走不通，但地中海国家的身份，让土耳其人有机会从海路站到以色列人的对面。海洋的这种开放性，也是造就古典时期的那些环形地中海帝国的地理基础，前提是你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你可以从一个点，不经由其他国家，到达另一个沿海地区）。

为此，土耳其人昨天（2011年9月6号）在政治和军事上表态，要加强在地中海东部的军事存在。认清土耳其人的真实意图，相信大家了解事态的走向，有所帮助。至于土耳其人有没有可能成功，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结构又如何，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第四节 土耳其和其邻国共同面对的库尔德问题

土耳其人要想介入阿拉伯世界，甚至挑起穆斯林的大旗，能够在以色列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是最关键的。而从地缘的角度看，土耳其的地中海国家的身份，同样让他们有机会通过海路将影响力辐射到北非，就像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当然，如果土耳其想这样做的话，法、意等欧洲国家估计会不开心。但土耳其的宗教优势是事实存在的，如果条件成熟，即使没机会在北非收入小弟，

也可以在北非事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在与其隔海相望，变数更大的东部地区（利比亚、埃及）。

凭借海路向北非渗透影响力，只能算是远期战略。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一个国家最容易施加影响的地区总是自己的邻国。与土耳其和那些突厥兄弟之间由于隔着高加索、里海，施加影响时总有些力不从心不同。土耳其和它表亲阿拉伯，在地理上倒是相接的。从地理的角度看，小亚细亚半岛与阿拉伯半岛相连；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土耳其有两个阿拉伯邻国：叙利亚、伊拉克。

邻居之间的关系总是微妙的，搞得好的话，大家可以亲如兄弟，互帮互助；搞不好的话，就是远交近攻，反目成仇。关键看怎么去利用影响两国关系的各项因素。就像现在的东亚，你可以把某个邻国作为产业上的竞争对手，也可以成为同一产业链上的一环。就土耳其和它的叙利亚、伊拉克的地缘关系来说，他们倒是有个现成的，并且可能是永恒的问题，让三者之间不得不时时刻刻的关注到对方。这个问题就是“库尔德”。



库尔德人分布地缘位置示意图

库尔德对于我们来说，算得上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它熟悉，是因为这个名词会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从我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而说它陌生，又是因为库尔德不是一个国家，大家对它的印象，大多只停留在它在中东是一个跨国的少数民族，好像在谋求独立。整天不是被这个国家打，就是被那个国家炸。至于说这个民族究竟是怎么分布的，又是否真的有机会以国家的形势出

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却很少有人去分析。

其实库尔德人，在欧亚非相接的这片穆斯林世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族群了。算起人口来，排在阿拉伯、突厥、波斯三大族群之后（约 2500 万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曾经以“库尔德斯坦”的政治标签，出现在地区政治舞台上。问题在于，上述三大族群在历史上都曾经以帝国的形式成为地区霸主。也都成功的占据了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波斯高原作为自己的核心区。而库尔德人，却在竞争中落败，没有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缘板块。只能在三大族群，或说三大板块的边缘求得生存之地。库尔德斯坦的这种边缘地位，也使得它没能在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为自己谋得一个独立国家的法律地位。

要想理解库尔德人的这种窘境，我们可以参看下《库尔德人分布区地缘位置示意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库尔德人的分布区主要跨越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个国家。相应的，在地理形态上，库尔德人生存之地，也正好挤在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之间。即使库尔德人能够得到某一类大国的支持，谋求独立，也势必会受到这四个国家和三大族群的共同压力。

更何况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一个大国如果想介入中东的话，会有可能拉一派打一派；但不会有人，愿意冒着得罪所有人的危险来帮你。除非你对它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当年的苏联，为了在战略上得到印度洋出海口的可能，愿意扶植分布区横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独立一样。只是库尔德人的分布区，显然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在库尔德人的分布区中，有将近一半区域和人口，是在土耳其境内。当年为了和波斯帝国博弈，奥斯曼帝国让库尔德人在帝国管辖下，成立了自治性质的“库尔德斯坦”，以充当东扩的前进基地，并对核心区起到缓冲作用。而这个库尔德人曾经获得的政治标签，也成为了其独立的政治方向。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库尔德人应该都没有独立的机会。虽然他们分布在伊拉克境内的部分，借着伊拉克战争之机，谋求到了自治的地位。但这也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好政治待遇了。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固然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有了这个由头。也能帮助它在邻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为必须考虑的对象。至于是用越境打击这种强硬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还是用合作的方式，消除共同的隐患，就看具体需要了。可供参考的是，中国正在利用同样让他们头疼的“东突问题”，去合纵土耳其人在中亚的“突厥”兄弟们。

第二章 北非东部地区地缘结构的解析

第一节 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在地理特征上的相似性

土耳其人想在阿拉伯世界扯旗，只是它自己的主观愿望，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阿拉伯人自己的意愿。如果土耳其只是想影响并控制像叙利亚那种体量的国家，机会还是挺大的。问题是土耳其人面对的，是一个带有邦联特征的“阿拉伯联盟”。这是一个横跨北非——阿拉伯半岛，种族、文化上同出一脉，地理关系上联系紧密的地缘板块。和土耳其人一样，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帝国的荣耀。即使是在现在的国际架构下，分成了22个独立“法人”。2亿多阿拉伯人中，也总是不断有“强人”出现，试图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以对抗异教徒的入侵。像拉登这种，以极端主义形式出现人物，只是在正常的地缘博弈中，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种表达诉求的方式，更多是一种无奈，战略上基本没有机会。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想内部整合的话，还是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谁具备“带头大哥”的潜质。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阿拉伯世界可以分为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两大部分。二者之间的分割线，就是那条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河——苏伊士运河。其实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更像是一个板块。不信大家可以在地图上看看，如果加上阿拉伯半岛这个角，非洲的轮廓线是不是会更加完整。不过地理上被划到哪个洲也无所谓了，反正现实生活中，大家更重视的是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就像同样被划到亚洲的土耳其人，绝不会认为他们和东南亚的关系，会比和欧洲的关系更重要。

说阿拉伯半岛更像是北非的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凭直观印象，也不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现在都是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是这两个板块的地理特征的确有很多共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共性也决定了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以及他们那些在种族上同源的“闪”系亲属（柏柏尔人、犹太人都是这个族系的），最终渗透成功的区域，是在西线的北非，而不是东线的伊朗高原。既然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由于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切割，成为了两个板块，那么我们还是分块对他们的地缘结构作个解读。如果按照文化扩张的顺序，我们应该先解读阿拉伯半岛的，不过最近利比亚的事天天在新闻里转，所以还是先说北非吧。反正阿拉伯半岛是永恒的话题，留在后面压轴好了。

第二节 尼罗河流域在北非地区的重要地位

每个在地图上审视北非的人，第一感觉应该都是大。看上去这块地方的体量，比整个西欧还要大。再结合历史上，北非曾经和欧洲隔着地中海，PK 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一块潜力很大的区域。甚至有可能作为世界一极，成为地缘博弈的主角。不过当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地图，在北非的腹地纵贯东西的打上五个大字“撒哈拉沙漠”。也就是说整个北非的腹地，基本都是被这种不适人居的干旱之地所覆盖。这种“绣花枕头一包草”的地理结构，和澳大利亚、西伯利亚有些类似。除了让那些只看行政地图的狂热扩张主义者兴奋一下外，在历史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多少改观。

与那些华而不实的极限之地一样，人类如果要在北非大规模生存，所能倚仗的只能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或者说，其中的某一区域的小环境可以达到文明生存的要求。从北非这种干旱的情况来看，决定其地缘中心的第一要素，当仁不让的就是“水”了，也就是说，哪里有水，哪里才会有人类生存。哪里水多，哪里就会是地缘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北非文明只能大规模存在于两个区域。一个就是东部边缘的“尼罗河流域”；另一个则是西北边缘的“阿特拉斯山脉”。

说到尼罗河，相信略微了解世界的人，对它都不陌生。5000 多年前，这条定期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地的河流，就孕育出了伟大的埃及文明。尽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埃及人”和建筑金字塔的埃及人，之间并没有文明的继承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尼罗河继续为它两岸的阿拉伯人提供生命之水。而阿拉伯人为了更彻底的榨取这条母亲河的潜力，在上世纪 50 年代，在尼罗河的中游（埃及、苏丹交界处）构筑了拦河大坝（阿斯旺大坝），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纳赛尔湖”。这项工程对尼罗河两岸的生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和三峡工程一样，利弊也仍在争论之中。而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原先土地最为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地区（开罗以南），由于不再有洪水定期泛滥，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没有上游带下来的肥沃土壤补充肥力了）。

不管尼罗河大坝的兴建，会不会让埃及的农业重心发生转移。尼罗河的存在，都让埃及拥有了北非最好的农业条件，并为之承载了约 8000 万的人口。在地缘竞争当中，人口数量并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但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的土地不能承载和竞争对手同级的人口，那么你的实力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人口数量算是首屈一指了，比排在第二级的伊拉克、阿尔及利亚（都是 3500 万的级别）高出一倍还多；和穆斯林世界

的另外两个竞争者土耳其、伊朗，也处在同一级别（二者都是 7000 多万）。

第三节 尼罗河结构特点对上下游交流的影响

埃及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尼罗河润泽的国度，因为这条河流实在太长了。长到可以从地中海上溯到赤道，纵贯半个非洲。按照河流取名的一般规律，它的下游名称总是能够成为整个水系的地理学名称的；而另一个规律就是，每条河流的上游总是有两条以上的源流。这两个规律，对于尼罗河也不例外，它上游的两条主要河流，分别被命名为“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青、白两条尼罗河，在一个叫作“喀土穆”的城市汇集成尼罗河干流。只是这个城市，却并非是埃及城市，而是另一个在前段时间很热门的国家——“苏丹”的首都。

如果依照东亚的经验，处在高地，有上游优势的地区，往往在军事征服上更强势；而农业条件更好，地势更加平坦的下游地区，则在人口和文明的发展上，要更有优势。积累到了一定时候，反过来又对上游地区形成了战略优势。这些都可以从埃及的文明史和现在的人口数量得到验证（分裂之后仍比埃及大上许多的苏丹，人口大约只是前者的 1/3）。但两者之间的博弈，让没有让尼罗河上

下游地区，最终像中国一样，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条世界级的大河，在喀土穆以北，直到埃及境内的“阿斯旺”，之间的河床存在许多断层，而河流在经过这些断层时，就形成了“瀑布”。

如果把建阿斯旺大坝（阿斯旺是尼罗河第一瀑布所在地）围堰“纳赛尔湖”而消失的两大瀑布算在内，喀土穆——阿斯旺之间一共有六处瀑布（再往南走，实际上还有瀑布）。这些瀑布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了上下游的交流。要知道，河流的



尼罗河流域地缘结构图

一项很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借由水上交通工具进行物流。如果不能借助水力的话，那么无论是在速度，还是运量上都会有质的差别。事实上瀑布只是影响文明交流的一个因素，这些高低落差的地势，并不会只存在于河道上，或者说这些河道之所以会是这种递断裂式的结构，只是受周边地势的影响罢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你想从陆地上顺畅沟通尼罗河的上下游地区，地理环境也是非常不理想的。

有鉴于此，古埃及文明所直接覆盖的尼罗河流域，其实只是在瀑布群的北面，那些可以由借由尼罗河顺畅沟通的区域（也就是现在的阿斯旺大坝之北）。至于大坝以南的中游地区，历史上则由另一个叫作“努比亚”的地缘标签所覆盖（阿斯旺到喀土穆之间的区域）。熟悉埃及历史的朋友应该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埃及人主宰北非大陆时，努比亚人即作为雇佣军和沟通黑非洲的商人，出现在埃及文明史上，也曾经组建过王国，和埃及进行过长时间的博弈。

不管尼罗河中游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条件有多复杂，阿拉伯人成为埃及的主人也有上千年了。在这上千年之中，本身就是游牧、商业属性的他们，还是很有机会向南渗透的，尤其是就文明程度而言，更接近文明中心的阿拉伯人，明显要比那些土著黑人部落要更高级。这种渗透，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效的。最起码阿拉伯人的进展要比古埃及人的进展要大许多。在扩张这个问题上，机动性更强的游牧民族，总是比守土有责的农耕民族要来得强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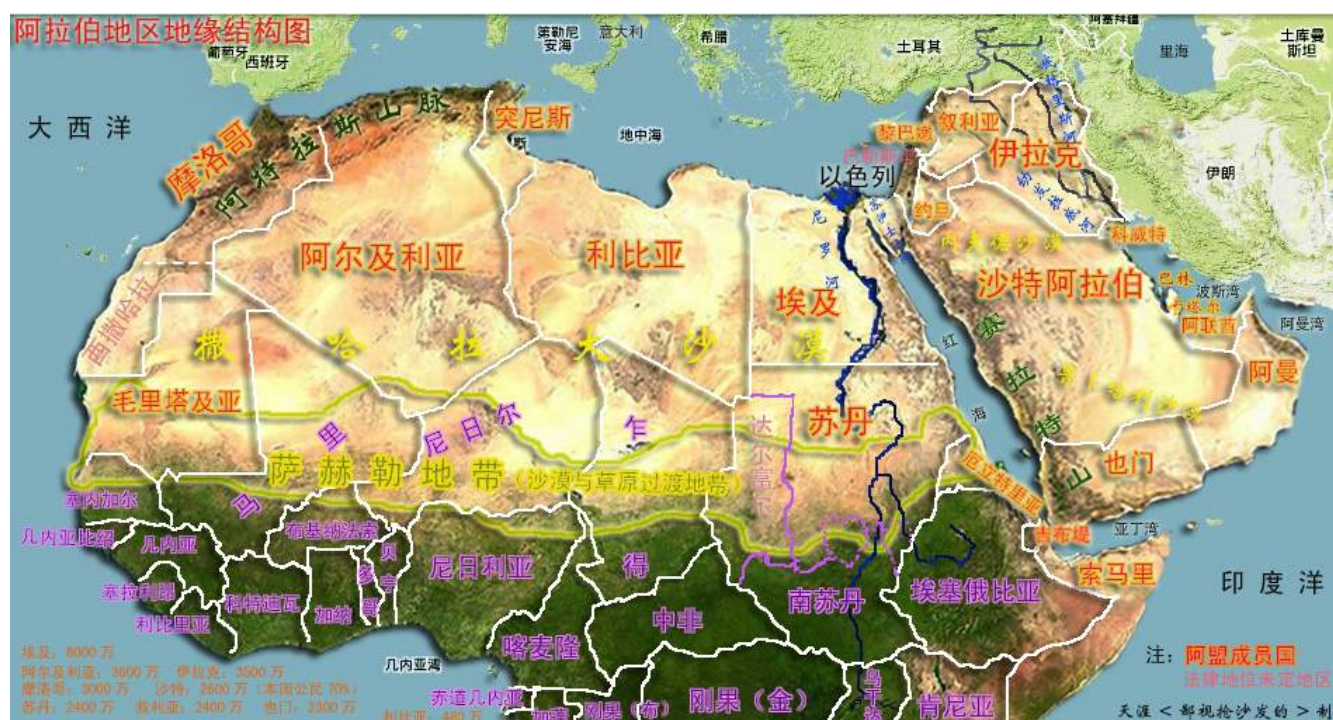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有适合他们生存的地缘环境，再强大也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当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并沿尼罗河一线南下，控制了古代埃及、努比亚之后，他们很快就遇到了瓶颈。这个瓶颈就是“环境”，因为阿拉伯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即将到达一个和他们熟悉的干旱环境完全相反的区域。而在这些湿润的草原上，那些黑人土著们要比他们适应得多。

第四节 阿拉伯人在萨赫勒占据优势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要对非洲的大环境做个解读。在我的印象中，非洲一直是个矛盾之地。一方面是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里经常播放的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成千上万的动物在其间奔跑；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来源于那些二战片，那些取材于北非战场的电影，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漫漫黄沙和那长相奇特的独峰驼。按照一般规律，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可能是瞬间转化的，其间必然存在一个渐变的缓冲带。而这个介于撒哈拉大沙漠与草原地带之间的过渡区，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理标签，叫作“萨赫勒（sahel）”。

“萨赫勒”一词在阿拉伯语中，就是“沙漠之边”的意思。我在《阿拉伯

世界地缘结构图》中标出了这条横贯非洲的过渡地带，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下，它都跨越了哪些国家。如果从大的博弈来看，阿拉伯人在萨赫勒的竞争，会更有优势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层级，相比那些黑人部落要更高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因为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而言，无非是不管非洲还是地球的其他角落，环境整体是在恶化当中。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也在不断的南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更适应干旱气候，生存手段也更多样化的阿拉伯人，战略上的优势就很明显了（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商业作补充）。



阿拉伯地区地缘结构图

虽然阿拉伯人（包括同种族的柏柏尔系民族，区别我们会在后面分析）在过渡区“萨赫勒”地带占有优势。但过了这个过渡地带，对于降水量多的热带草原、森林地带，阿拉伯人就不太适应了。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奇怪，毕竟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那些野生动物的天堂，总比沙漠边缘要更吸引人。其实这也很正常，比如在我们看来，青藏高原的生存条件肯定比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要差得多，但历史上，地理上更接近于南亚的西藏政权，却没有试图向南扩张过。相反，在他们有限几次扩张中，北部那些相对落差较小的第二阶梯（如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反倒成为了渗透目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拉伯人也是一样的，即使有个体或者部族，迁移到了和他们原始生存环境不同的区域，时间一长也都会被当地的地缘环境所同化。就像现在南洋群岛有不少穆斯林自认是当年阿拉伯商人的后代。而在阿拉伯人和我们这些旁人看来，他们之间除了宗教以外，在种族、民族属性上也没什么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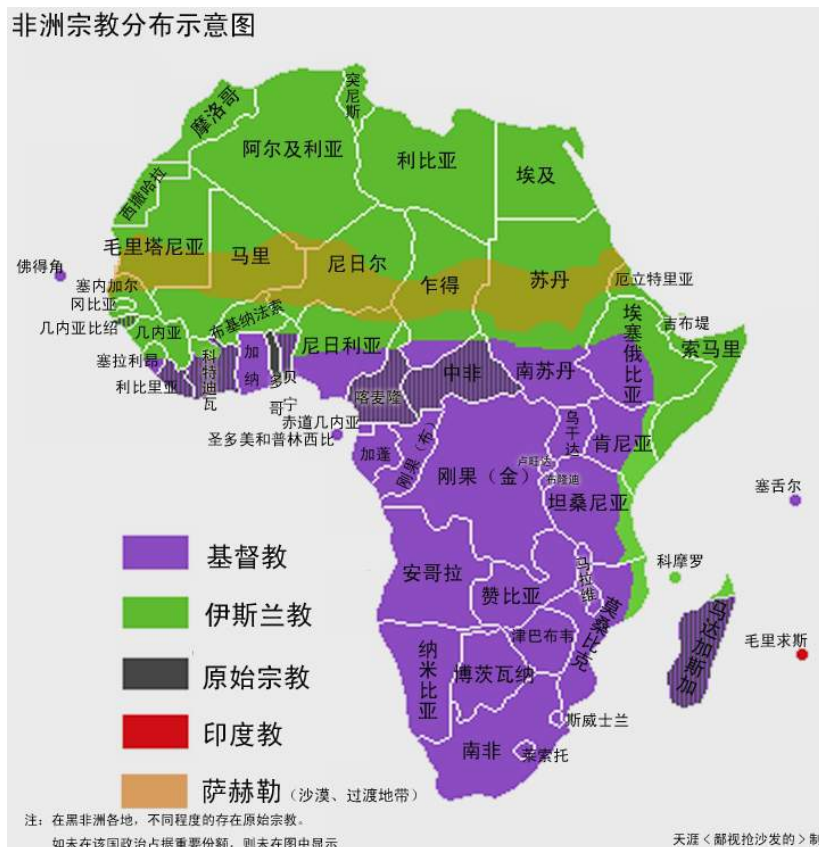
第五节 苏丹的分裂和萨赫勒地的关系

在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部族的博弈当中，苏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这个因为石油资源而被中国重点经营的“阿拉伯”国家，有段时间曾经是国际政治的焦点。而这个焦点的产生，就是因为分裂之前的苏丹是一个典型的跨越三大地带的国家（沙漠、萨赫勒、草原）。之所以我们称之为“阿拉伯”国家，并因此而被“阿盟”所吸收，是因为阿拉伯人在尼罗河一线的渗透非常成功，控制了这条线上以喀土穆为中心的“萨赫勒”地带。当一部分生活在草原气候中的黑人部族被划入这个国家时，即使他们在人口数量上略占优势，也不可能政治上反制文明程度更高的阿拉伯人的。

我们在图上观察南、北苏丹的分界线，会发现它几乎和“萨赫勒地带——草原地带”的自然分割线重合。也就是说，苏丹的分裂，最终还是回到了地缘博弈的原点上。阿拉伯人得到了他们能够适应的干旱地带，并且凭借尼罗河下游所储备的优势人力资源，以及更高等级的文明占据了过渡地带。而黑人士著们，则得以从政治上将他们世代生存的热带草原地带独立出来。这种结果，从根本上来讲，是在弥补当年欧洲人所犯下的错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非洲那些横平竖直的国境线之所以能够画出，并非取决于当地的地缘结构，而是当年

那些殖民国家的博弈结果。比起那些经过上千年才博弈出来的地缘格局，这种由外界因素而很快决定出来的结果，当然不能指望它有多么合理了。

顺便说下达尔富尔地区。在苏丹问题中，这个位于苏丹西部的区域，甚至比“南苏丹”还要更出名，甚至有些人会将之与南苏丹问题混为一谈。其实从地理条件上看，达尔富尔也是一个单独的板块。如果把达尔富尔剥离出苏丹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南、北苏丹的地



非洲宗教分布图

理范围，其实都在尼罗河流域。只不过阿拉伯人和黑人土著们，在萨赫勒地带的南边缘，大致依照地理环境作出了分割（还有小块争议区有待解决）。而达尔富尔地区，却并非是属于尼罗河流域，而是一块独立的高地，地理学名称是“达尔富尔高原”。

如果从气候环境上来看，整个达尔富尔高原也是处在萨赫勒地带之中。换句话说，战略上也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强势渗透区。只是相比尼罗河流域，阿拉伯人已经完美的渗透到了萨赫勒地带的边缘，而达尔富尔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简单点说，达尔富尔现在的状况，正处在“现进行时”，即阿拉伯文明的渗透还未能完全成功。

第六节 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化程度和种族冲突

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成功覆盖一个地区，一般有三个标准，即种族、文化、语言。如果被渗透地区的族群在这三项指标上都与渗透者趋同的话，那么渗透就是成功的。而如果只符合其中一、两项标准，那么只能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个标准我们也可以放在中央之国内部的民族融合之上。大家可以试着分析一下，那些热点地区，在这三项指标上的合格度是多少，又有哪项指标是最有可能先做到的，以及应该提升到战略的高度。鉴于问题比较敏感，我就不展开了。

在达尔富尔阿拉伯化的三项指标中，语言应该算是最成功的。整个地区无论是何种部族，基本都可以通用阿拉伯语（土著部落还会有自己的语言）。这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相比那些黑人部族，阿拉伯人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实力都要更为强势。而在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文明渗透中，语言往往也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因为如果你想接受先进文化影响的话，掌握和对方直接沟通的语言是最基本的。就像现在的中国，虽然在种族和基本文化上未被西方文明所渗透，但却在主动学习他们当中最成功的语言——英语。阿拉伯文化在达尔富尔，乃至整个非洲的渗透，也是遵循这个规律（包括西方国家在非洲能留下的最明显印记也是语言）。

第二项比较成功的指标就是文化了。从阿拉伯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化基本可以等同于伊斯兰教了。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阿拉伯和黑非洲过渡区中，都会存在很多在语言和宗教上已经阿拉伯化，但在人种上还是纯粹黑色人种的部落。而那些既能维持种族特点，又能在文化上保持独立的土著部落，其所覆盖的区域会在阿拉伯文化的渗透之下，无可逆转的南移了。直到完全退入他们能够占据优势的，明显分为雨季、旱季两季的绿色地带。

目前达尔富尔的情况就是这样，既有纯粹的阿拉伯人部落，也有阿拉伯化的黑人部落（语言和宗教同化），还有完全保有原始宗教或者转信基督教的黑人部落。他们的分布顺序，大致也是依据阿拉伯化的程度，由北向南渐变。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达尔富尔之所以纷争不断，还是因为土地和水资源之争。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撒哈拉沙漠以及干旱气候整体是在南移。这也迫使那些游牧于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不得不向南迁移（不要以为阿拉伯人真的生活在沙漠腹地，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做生意才穿越那些不毛之地的）。这势必与那些定居在南部降水量相对较多地区的土著部落发生冲突。当然，即使这些游牧部族的内部也一样会有冲突的，毕竟在整个达尔富尔地区有几百个部落。

如果仅仅是生存之争，固然还是可能带来流血，但却未必会上升到国际关注的高度。问题是在达尔富尔的冲突各方中，由于肤色比之文化更容易识别。冲突各方也逐渐回归到原始的阿拉伯与黑非洲的博弈状态。也就是说，一场生存之战最终演变成为了种族之争。而自从希特勒在现在社会的框架下，将种族冲突提升到一个令人恐怖的高度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类似冲突就非常敏感了。因此往往以避免种族屠杀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名义，介入一国的国内政治，也成为了不二的借口。当然，不是所有有此类种族冲突的地区，大国都有兴趣介入的，除非你有特别的价值在。不幸的是，达尔富尔的地下居然有石油，并且被一个西方世界眼中的异类——“中国”占了先机。在这种情况下，想不成为国际热点都不行了。

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而是按照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的博弈历史来看，阿拉伯人最终取得这场胜利，占据整个达尔富尔地区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是它地下的那些油，已经注定吸引来那些“关注”的目光了。所以尽管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组织，能够从阿拉伯人控制的苏丹政府中得到战略支持。但最终的博弈结果，却不得不受到国际因素的干扰。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达尔富尔和南苏丹合并是没有可能的，毕竟这是一个单独的板块。各方面指标和完全土著化的南苏丹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阿拉伯人占据了优势，单独分裂出来的可能性也很小。但它注定会成为苏丹内部的一个不稳定板块，并长期考验政治家们的智慧。

像苏丹这种情况，只是北非和黑非洲之间博弈的典型案列。事实上在整个非洲，围绕着萨赫勒这一缓冲带，伊斯兰文明和非洲土著文明之间的冲突，一直都在上演着。只不过相比于苏丹所在的尼罗河一线（东线），其他地区，特别是西线的冲突主角，严格来说也不能算是阿拉伯人。在那一地区和黑非洲的博弈中，有一个和阿拉伯人种族相近，宗教上也伊斯兰化了民族——柏柏尔人，更多时候成为了北非游牧民族的代表，参与了这场竞争。

第三章 北非中西部地区地缘结构的解析

第一节 阿拉伯人在北非扩张路线及其和柏柏人的关系

由于撒哈拉大沙漠的存在，阿拉伯人看似在北非占据了大片土地，但其实扩张的轨迹，主要还是沿着两条线在推进。一条就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北——南走向的尼罗河一线；另一条则是“沿海线”，也就是沿地中海南岸向西推进，一直到大西洋。事实上基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不光是阿拉伯人，包括更早一些向北非扩张的罗马人，以及晚一些控制北非的奥斯曼帝国，在北非所控制的土地，主要也都是沿海那些据点，以及尼罗河下游地区。

所以历史学家在描绘那些帝国地图时，在北非所切割出来的帝国控制区，基本都是窄窄的一条。当然，如果有哪个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的专家，希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把撒哈拉腹地全数划入当年的帝国中，问题也不大。就像很多中国的专家喜欢把西伯利亚划入那些古典时期的强盛帝国版图一样。



东西罗马

虽然在古典时期，疆域的外围是不是包括那些不毛之地，并没有多少人会去计较。但在现在的国际框架，以及技术水平下，这些古人眼中的不毛之地还是有不少价值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下面会藏有什么能改变国运的资源。在划条边界就能保障国家权力的今天，你的疆域越大，潜在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基于阿拉伯人在干旱地带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岸、河流扩张的阿拉伯人，所建立的阿拉伯国家也得到了大部分的撒哈拉腹地。

其实阿拉伯人并非第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出发地向北非扩张的族群。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阿拉伯人能够进入帝国时代，并向四周扩张，是在他们以犹太教、基督教为基础，“进化”出伊斯兰教之后。而在此之前，北非那些

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地区，早就进行过多轮地缘博弈了。比如最早和罗马人隔地中海展开博弈的迦太基，其实就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腓尼基人（叙利亚一带），通过地中海在西北非设立的据点。这个因港而兴的城市国家，现在则被西北非三国中最东侧的“突尼斯”所继承了。只不过现在居于其上的民族和文化，已经以阿拉伯为标签了。

在腓尼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另一支游牧性质的族群，沿着陆路对北非进行过开拓，他们就是柏柏尔人。说实话，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就人种而言，他们系出同门；就宗教而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也早就将柏柏尔人拉入了穆斯林的阵营。至于说原始的生存方式，也都是以游牧、经商为主。这种情况下，柏柏尔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很大程度也可以认定为是阿拉伯的一部分了。当然，柏柏尔人毕竟先于阿拉伯人成功的进入了北非，并经营了数个世纪（可能更长）。所以在远离阿拉伯半岛的北非西部，他们还是在当地的地缘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阿拉伯帝国扩张至此，并渡过狭窄的海峡，控制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时，欧洲人所面对的也已经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而是由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并混入一些黑人血统的穆斯林了（欧洲人将之称为摩尔人）。

理解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参照现在的汉族和那些已经接受了汉文化的所谓“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的少数民族一样，在人口密集区，你已经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了。如果不是硬性要求在身份证上注明自己的“民族属性”，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相信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已经不会意识到自己和主体民族有什么区别了。相比之下，人口密度较低，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区，原始的民族属性感就会更加强烈些。柏柏尔人和阿拉伯文化的关系，也是遵循这种规律。能够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没有被完全同化的，基本都是那些被阿拉伯人挤压出沿海地带，在沙漠边缘游牧的部落。而这些柏柏尔的部落，很多时候也代表了阿拉伯化的北非和西线和黑人土著进行种族博弈。

虽说区别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不过还是可以说一下。如果从直观上来看，传统的柏柏尔人部族和阿拉伯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女性的地位了。和阿拉伯人严格限制女性的地位不同，更加“原始”的柏柏尔人中的女性，地位要高得多，并且不戴面纱。更加有意思的就是，有的部落是男人蒙面，并且相对于阿拉伯男人习惯的全白装束，柏柏尔人的衣着颜色，更丰富得多。所以我们在一些以北非为背景的电影里，如果看到一些部落战士很有神秘感的蒙着面纱在沙漠中穿行，那基本可以归入柏柏尔人的范畴了（不过导演可能也搞不清这其中的区别，只是觉得这样比较酷罢了）。

也许有一天，柏柏尔人会成为一个消失的民族，特别是他们和阿拉伯人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区别是那么的小。反而是在最容易同化的语言方面，那些沙漠中的柏柏尔部落还能保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有一天这个特征也消失了，那么北非也就算彻底的阿拉伯化了。

第二节 阿特拉斯山脉对西北非的重要地缘作用

不管阿拉伯人在北非控制了多少沙漠，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能够承载更多人口的区域。很不幸的是，在北非有这种地理单元的很少，即使有，面积也很小。除了尼罗河流域以外，就是非洲西北角沿大西洋——西地中海海岸线走向的“阿特拉斯山脉”了。对于我们这些拥有大片冲积平原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很少把山地当成地缘重心的，哪怕它是沿海地区（想想浙南、福建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地位）。

不过当你不得不在山地和沙漠中做出选择的话，山地往往就是香饽饽了。这是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山脉都能够保有更多的水资源。阿特拉斯山脉的水资源和植被状况，虽然不能和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东部沿海的青山绿水相提并论，但在应对原始的生活状态时，还是能够产生人口密集区的（生产方式越原始，对于水资源的单位需求量就越小）。像突尼斯境内的那段山脉，还发源出了几条水量颇大的河流。这些发源于阿特拉斯山脉上的河流，不仅滋养了山脉内部地区（特别是山地内的峡谷平原），更为沿海平原的人口密集区，提供了水源补给。

阿特拉斯山脉对于西北非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作用。就是在这—区域，将地中海和撒哈拉大沙漠隔离开。这样的话，不仅生活在山脉之中的居民可以少受干旱之苦，拥有一定的农业条件。那些山海之间的地区，更可以因此而享受舒适的海洋气候，并凭借商、农、渔之利，涵养更多的人口。有鉴于此，决定西北非三国人口潜力的因素，就不再是单纯的领土面积了，而是你在阿特拉斯山脉中能够占据多少份额，以及拥有多长的海岸线。单从行政版图上来看，西北非三国中处于中间位置的“阿尔及利亚”无疑是其中的巨无霸了（其领土面积5.2倍于摩洛哥，14.7倍于突尼斯）。不过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到阿特拉斯山脉，以及山脉与海洋之间的沿海平原上时，就会发现三国之间所占据的份额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其中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这两项指标上，差别不大。总面积较小的摩洛哥甚至还要高于阿尔及利亚，对应到人口之上，二者也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前者为3000万，后者为3600万）。相比之下，突尼斯所占据的山脉份额是最小

的。但它在海岸线上与另两个兄弟国家的差别要小得多，特别是相对它们在国土面积上的差别（阿尔及利亚海岸线 1800 公里，突尼斯 1300 公里）。千万不要小看了海岸线的作用，能够背山面海拥有良港的话，不仅能够带来商业机会，更可以在渔业上为你提供更多的机会。从这点上来看，海洋可以很大程度的弥补沿海地区农业用地不足的状况，为居民提供食物来源。并因此而让那些平原狭小的沿海地区，拥有高密度的人口。

也许有人问，既然北非只有阿特拉斯山脉和尼罗河这两片条状地带，可以保有大量人口，那么它们又怎么能够和欧洲对抗呢？这其实是要看所处历史时期的。因为欧洲文明最初是从南欧那几个半岛而起的。如果将欧洲地中海沿线的地缘潜力和包括阿拉伯半岛——北非在内的，由“闪”系民族控制的亚非地中海地区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地缘潜力是差不多的。问题是，当欧洲文明开始向腹地扩散时，天平就开始向北倾斜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北非之主的阿拉伯人会发现，相比于欧洲腹地那些各方面条件俱佳的地区，他们再想向南进一步的话，就只能面对一望无际的沙漠了。

唯一能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比那些黑人土著要更强，文明的层级也更高。因此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尽管阿拉伯人本身并没有渗透入非洲草原；但他们那极具同化力的宗教已经跨越撒哈拉大沙漠，以及过渡的萨赫勒地带，将北纬 7 度以北的黑人部落，大部分拉入“穆斯林兄弟”的行列中了（参照《非洲宗教分布图》）。只是当阿拉伯人回首再面对欧洲的时候，却再也没有平等博弈的地缘基础了。由此，阿拉伯人也注定了他们边缘化的结局。

第三节 利比亚国土人口承载能力的不足

尼罗河流域由于下游地区相对良好的地理条件，使阿拉伯人在北非东线与黑人土著的博弈当中，得以占据优势。而占有山、海优势的阿特拉斯山脉三国，在向南渗透上也同样做得不错。在《阿拉伯国家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东线阿拉伯人成功的把尼罗河中游的苏丹变身为阿拉伯国家一样，阿特拉斯山脉的阿拉伯——柏柏尔人，也同样在政治上控制了与之在方位上相对应的“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两国。后者已经是阿盟的正式成员了，前者则由于摩洛哥希望借此来拓展自己的直接领土，而一直未真正获得国家地位。不管西撒哈拉最终是以独立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地缘舞台上，还是国际社会认可以摩洛哥的占领，都不会影响阿拉伯人在北非西部的优势地位。

相比于东西两线的成功，我们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阿拉伯人在中线，特别是利比亚所对应的区域做的还不够好。在这一区域，有马里、尼日尔、乍得三

个深入撒哈拉腹地的国家。而阿拉伯人虽然成功的让上述三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变身为了穆斯林，但却未能将这三个国家彻底变成阿拉伯国家。所以我们图上看阿盟成员国的分布状况，明显可以看出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呈现一个类似电话状的，两头凸出的弧行分布。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利比亚的地理条件太差，没有核心板块涵养足够的人口。

单从国土面积来看，利比亚要比埃及大得多，但一比较人口，却只有埃及的 10% 不到，加上那些外来务工人员，也不过 600 万人。单从这点来看，利比亚甚至比不上它西部的摩洛哥，这个弹丸之地还有千万人口呢。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利比亚 90% 以上的土地，是属于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地带，全国没有一条真正的河流（全年不断流）。只有沿海岸线地带由于临近地中海，可以受到些海洋气候的湿润，而相对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正因为如此，利比亚超过 90% 的人口，是在靠近海岸的狭长地带中。



利比亚地缘结构图

如果利比亚沿海岸线，也能够有像阿特拉斯山脉那些的山地，分割沿海平

原和沙漠地带，并储备水源的话，相信它应该也可以像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那样，拥有 3000 万左右的人口。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中（包括土耳其和伊朗），这个数量级的人口，已经可以跻身第二方阵了。只是造物主似乎并不垂青这块土地，既没有在它的腹地拉出一条像尼罗河一样的大河，也未为利比亚的海岸线搭建出足够的山地屏障。这样一片在阿拉伯世界也算不毛之地的土地，地缘上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东线的尼罗河国家，与西线的阿特拉斯国家之间的缓冲。而为东西两大板块起连接作用的，又主要是利比亚的沿海地区。

这种地缘定位和内部脆弱的地缘结构，使得利比亚的问题变得并不复杂。无论是最初的腓尼基人、罗马人；还是二战中的英国人、德国人，在利比亚地区进行博弈时，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沿海地区就足够了。如果你控制了海岸线，也就等于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人口和主要交通线。那么你很快就可以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了。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当然，基于利比亚的海岸线没有大型山脉来隔离干旱的沙漠气候，因此利比亚沿海地区的“优势人口”，也并非呈线性均匀分布，而是过半集中在几个港口城市。这让利比亚问题又进一步的简单化了，几个城市的得失就足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第四节 利比亚的城市分布特点并对国内博弈的影响

说到利比亚的主要城市，相信大家这段时间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的黎波里、班加西、米苏拉塔，这三个名字应该是出镜率最高的了。只是很多人不一定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得失对利比亚战局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之前谈到，利比亚九成以上的居民，都集中在沿海一线，而上述三个城市也是利比亚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海港城市。

关于这三座城市的人口问题，由于没能引起卡扎菲同志的足够重视，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数据出现在媒体之上。一般认为，在战前作为首都的“的黎波里”，人口容量已经达到了 200 万；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则可能有 100 万左右；位于两城之间的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人口则在 65 万左右。简单相加，再除以利比亚约 600 万的总人口，就可以知道，这三个战略据点就已经占据了利比亚半数以上的人口。这些数字也许不够精确，更会随着战事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但对于我们来说，能够通过它们了解利比亚的人口分布重点也就够了。

其实真正适合生存的土地，并不需要太多。如果利比亚的沿海地带能够有充足的水源供给，它的人口数量最少也能够达到阿尔及利亚的水平（3600 万）。就像埃及的 8000 万人口，八成以上就是生活在尼罗河两岸一样，这些人口密集区在地图上也就是窄窄一条。仅一个大开罗地区，就有将近 2000 万人口。相比

之下利比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没有高大山脉庇护的海岸线，既无法保证充足的地表水供应；又很难为沿海平原抵挡南部干旱气候的侵袭。

当然，如果说利比亚的沿海平原，就没有一点山地做靠山，也是不对的。当我们把地形图放大些，就会发现，在利比亚那段“Z”字型的沿海地带上，东、西两段各有一条单独的高地。而利比亚东、西两个地缘中心：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也正是处在这两段高地的庇护之下。虽然这点丘陵带，相比于阿特拉斯山脉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简单在图上，拿它们对比下突尼斯境内的山地，就明白不是差着一个数量级了）。但对于希望享受地中海气候的利比亚人来说，却已经是难得的“靠山”了。



杰法拉平原示意图

在利比亚战事开启之时，卡扎菲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就被打上了东、西对抗的烙印。简单点说，就是卡扎菲政权将资源过于集中在西部的“的黎波里”周边，而刻意压制了班加西一线的发展。当然，基于利比亚的地理条件，所谓的东、

西对抗，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利比亚的国土上划条中线，然后泾渭分明的一分为二。这种博弈，更多的只是基本在东、西沿海地区的竞争上面。只要谁能够最后控制整条海岸线，就能够成为胜利者。至于那些沙漠腹地中依托小块绿洲而存在的城市。人口数量基本都是十万级的。估计卡扎菲和反对派，都不会认为失败后逃往这些城市，能够给自己带来反击的机会。

单纯的比较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地理条件，我们会发现的黎波里要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利比亚的西北角有一条弧形的高地——“撒哈拉高地”，和地中海一起圈出了一片半圆形的沿海平原。虽然这片高地的海拔也就是 600——900 米，却足以将这片叫作“杰法拉平原”的土地保护起来。使之能够在利比亚的沿海地区中，拥有的绿色纵深最多。其实利比亚所拥有的只是杰法拉平原的一半，平原的西部归属于突尼斯。正是因为这种行政分割，所以利比亚境内的这段“撒哈拉高地”，也被叫作“奈富塞山”（突尼斯境内叫“宰赫尔高地”）。我们在新闻里也可以看到，反对派正是在占据了“奈富塞山”的山顶之后，再进入黎波里的外围平原的。单从战术上来看，也许卡扎菲应该沿着这一圈高地布防，以保护的黎波里的外围安全。只是以双方的军事力量来说，展开这种全面对攻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也就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焦点城市了。

在当年腓尼基人占据突尼斯建立迦太基的时候，杰法拉平原也是他们的重要据点，并在后来的历史中，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自迦太基人之后，罗马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每一个试图在北非有所作为的政权，都曾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个战略据点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尼罗河下游和阿特拉斯山脉之间的交通枢纽。当然，如果你一定要阻隔两者之间交流的话，你可以在它们之间有很多战术选择。但在撒哈拉大沙漠的压迫之下，寻找到这样一片稳定而又有一定纵深的绿洲作基地，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鉴于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的黎波里和它所属的杰法拉平原，都是利比亚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所以即使是兴起于东部的反对派，在取得胜利之后也马上决定迁都至此。这样做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卡扎菲的势力重新占据这块利比亚的心脏地带。而很多国内的军事专家，看着地图还在幻想着卡扎菲虽然失去了海岸线上的重要城市，但却还可以到利比亚的腹地去组织“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只是他们忘记了一点，人民战争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有人民。不管是否真的支持你，一定比例的人口基数是需要的；二是要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存在。如果利比亚的地形是像阿富汗那样，那么即使是北约地面部队进入，卡扎菲也应该有机会继续周旋下去。

只是现在，即使是沿海地区有卡扎菲的支持者愿意随他到沙漠腹地去打游击，也没有足够的绿洲和能够躲避空袭的地区，供他们打“人民战争”。所以

相比于“专家们”当初的乐观态度，卡扎菲和他的亲信们，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从他们退出杰法拉平原的那一刻起，战术上再打回来的机会就很小了。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在欧洲人决定军事介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第五节 利比亚利用地下水改善其地缘潜力

看过利比亚的地理环境和人口数量，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利比亚虽然看着国土面积不小，但却是最没有条件争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国家。这一区域在地缘上的作用，更多的是充当西北非和埃及之间的缓冲区，并由于它的中间位置，而被战略家所看中罢了。所以，与其说卡扎菲的命运，是在北约决定动手清除这个异类分子之时决定的，不如说是在卡扎菲发动政变，试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时，就已经注定了。

应该说对于利比亚的先天不足，卡扎菲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在利比亚能够凭借石油资源而获得大笔天赐财富时，他还是有一些改善利比亚地缘结构的想法和做法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利比亚也好，北非也好，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没有水，阿拉伯人所占据的这片土地就不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角。这一点，在因为几乎没有地上水资源的利比亚尤为突出。即使是沿海的人口密集区，依靠的也主要是地下水。

相比于地上水的匮乏，利比亚的地下水资源却十分丰富。在它境内的撒哈拉沙漠下面岩层中，蕴藏着天然大水库。当然，以古典时期的人类来说，是无法全面利用这些埋藏于沙漠深处，早在沙漠形成之前就封存的“化石水”的（有的水，水龄甚至超过 100 万年）。人们最多能依靠自然渗透到沙漠、戈壁腹地，呈点状分布的一些绿洲。卡扎菲所做的，就是以预算 300 多亿美元，用来铺设地下管网。将沙漠之下的这些水资源，输送到沿海地区。理论上，有了这些地下水资源，利比亚就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地缘劣势，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项前无古人的疯狂计划，现在已经进行了大半，花掉了将近 300 亿美元。

在卡扎菲看来，这相当于为利比亚获得了一条地下尼罗河。用做大工程的人都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问题是将这些水从地下 500 多米的深处抽上来，再通过长达 3000 多公里的管道网输送到沿海地区，所需耗费的能量是很大的。特别是当它们浇在地面上，用来将半干旱的地区改造为农田时，性价比就更低了。如果没有石油收入支撑，工程的建造和维护都会有问题。即使不考虑环境和能源上的可持续性，相比于埃及人筑个坝就得到了超额的尼罗河水，利比亚人的这项伟大工程能坚持多久还是一个问号。

不管怎么说，一项工程总是有利有弊的。至于它的后果是好是坏，还需要

很长的时间来验证。在这一点上，从大禹时代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水利改造，并改善了自己地缘结构的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如果卡扎菲的这项“大人工河工程”能够持久的提升利比亚的竞争力。那么无论他现在有多么的失败，将来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中，也都能占据重要的位置。最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班加西人和反对派们，在喝着人工运河输送来的优质自来水时，还是无法全部抹去那位独裁者的影子的。

对于卡扎菲来说，铺设地下管网，抽取地下水资源，固然是一项改变利比亚命运的战略决定。但这并不妨碍，他为这项工程增加一些战术作用。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利比亚在战略上的劣势，除了缺水之外，缺乏可供防御的地形也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带，即使你想和塔利班那样和美国人进行周旋，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卡扎菲有没有看过《地道战》，但他的确为这项人工运河附设了“地下交通线”和防御功能。设计师在设计那直径达到4米的输水管时，所主要考虑的可不是水，而是车辆通行的标准。

虽然说，想靠地道战来赢得战争，或者躲藏起来，战略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想同样躲在地下的萨达姆，是什么样的下场）。但这无疑可以为卡扎菲争取到战术上的时间，让反对派和欧洲人不那么快找到他。至于他最后的命运，还要看是否能够利用这宝贵的时间，为自己谋求到一块避难之地安渡晚年了。

利比亚的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它那人工运河是否能够成功；也无论它的政治改造有多少“普世”，利比亚都不会是真正的地缘焦点。能够真正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影响，并为大国们所关注的，还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那些国家。而这些国家或者说板块，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中东”板块。至于说政治上的中东，都包含哪些国家。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哪些，谁又能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后面所要分析的内容。

第四章 沙特阿拉伯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阿拉伯半岛的地形

所谓近东、中东、远东的概念，是欧洲人以自己为中心测距，对亚洲部分地区的描述。像离欧洲最近的土耳其，就是近东的主要国家；而我们中国，则是远东的核心部分。不过这种划分方法，显然已经过时了。唯一还在使用的，就是“中东”这个概念。深究欧洲人最早定出“中东”这个概念时的范围，已经没有意义了。在现在的地缘环境下，它出现在政治生活中时，通常所包涵的是下面几大板块：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伊朗高原的“伊朗”、北非的“埃及”，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国家。而在这些都已经伊斯兰化了的地区当中，最为核心的板块就是阿拉伯半岛了。

说到阿拉伯半岛，相信在那么多年国际新闻的耳濡目染下，大家随便都能说出岛内的几个国家来。当我们把视线从国境线上移开，单看阿拉伯半岛地理结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地理结构，惊人的一致。如果不是东非大裂谷的北段，将阿拉伯半岛从非洲大陆撕裂出去，并且倒灌入海水，形成“红海”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理学家们会把阿拉伯半岛划成非洲的一部分。不过这种人为的划分，并不妨碍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地理环境上的一致性。那些从阿拉伯半岛西迁的“闪”族人，在游走完北非之后应该会发现，他们所在的这片新大陆，就是阿拉伯半岛的放大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阿拉伯半岛是北非大陆的缩小版。

我们之前总结北非大陆的基本地理结构时，所得出的结果就是，大部分地区被撒哈拉沙漠所覆盖。真正能够为强大文明所依托的，就是边缘地区的“一山一河”。山就是西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河就是尼罗河。阿拉伯半岛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整个半岛的腹地广布沙漠，人口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带。与北非有所不同的是，阿拉伯半岛内部的选择，其实还要更多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看阿拉伯半岛的基本地形。我们常说中国的地形呈现三级阶梯，阿拉伯半岛的情况也一样。西部沿红海边缘部分，是由一条叫作“塞拉特山脉”的山地所覆盖，这条山地带其实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条边了。如果和北非的内部结构相对应的話，我们可以将之对应为阿特拉斯山脉。从塞拉特山脉穿出，我们就进入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了。从海拔上来看，这片腹地是介于山脉和平原之间的高地，统称为阿拉伯高原。经过阿拉伯高原之后，半岛的地形就过渡到了东部沿海平原地带。著名的两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正是这片低

地的一部分。如果说阿拉伯半岛的哪个区域，能够和诞生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地区相媲美的话，那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姊妹河，所冲积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

在阿拉伯世界分析地形，和我们在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情况不太一样。在中央之国，我们更关注的是土地的平整度和山脉河流的走向。而对气候、降水等环境问题涉及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身处温带季风区的东亚大陆，尽管生活在内部的人，还是能够感受到各板块之间的气候差异。但整体都是四季分明，适合农业开发的土地（也就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因此地形地貌的影响，会更为显著。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对于高、低地就不那么敏感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水”才是第一要素。如果没有水，那些平原之地也会变成沙漠；而如果有水，山地之中也能够成为人口密集的核心区。这当中的典型，就是占据阿拉伯半岛大半壁江山的“沙特阿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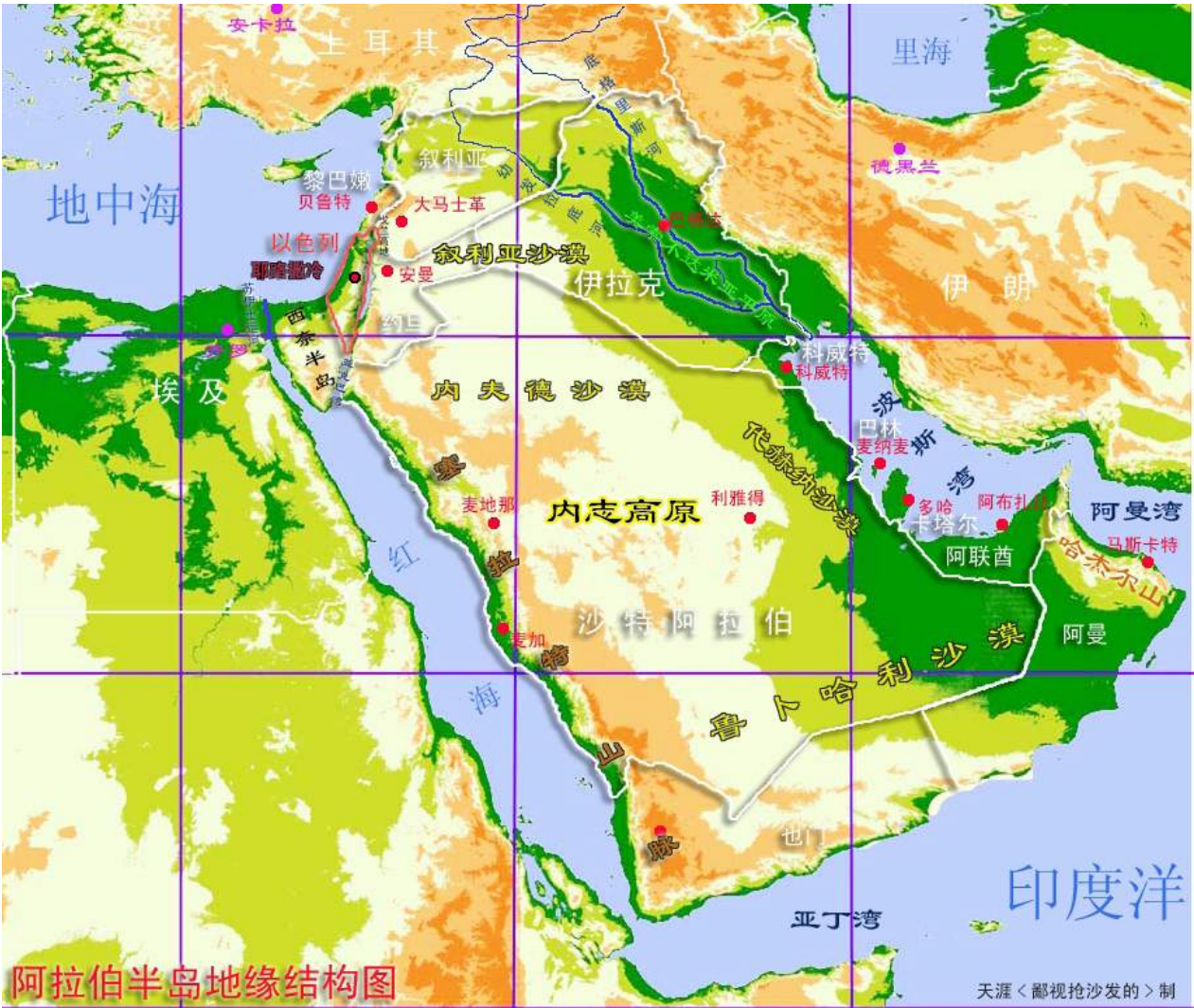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沙特境内的宗教圣地及内部板块划分

由于沙特的国土纵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两翼，因此阿拉伯半岛三级地形在沙特国内也是梯级分布的。尽管比拼实力，阿拉伯世界还很难说谁才是带头大哥。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沙特在阿拉伯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中的麦加和麦地那，都是在沙特境内（另一个是耶路撒冷）。学习过中学历史的人，相信对这两个城市都不陌生。

简单点说，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以商业、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阿拉伯人，地缘中心是在麦加，穆罕默德本人也正是出生于此。至于麦地那，则是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后，所选择的基地。正是以麦地那为基地，他打败了麦加的阿拉伯贵族们，并进而用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人。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穆斯林们为了让旧有的体系平稳过渡，也接受了麦加的地缘中心地位。只不过，麦加必须在伊斯兰文化之下和麦地那共同享有“圣城”的地位罢了。

在《阿拉伯半岛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麦加也好，麦地那也罢，都是位于塞拉特山区之中。如果相比于半岛腹地大部分沙漠化的阿拉伯高原，塞拉特山地当中的水源保有量，显然要高出许多。而麦加和麦地那所选择的地点，也都是山脉当中水源最为集中的绿洲。事实上现在沙特的情况也是这样，人口最为集中的大城市，大多在西部塞拉特山一线。而中部的居民，主要集中在三面由内夫德沙漠、代赫纳沙漠、鲁卜哈利沙漠环绕的“内志高原”之上。至于说最东部的沿波斯湾平原，反倒是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干旱之地。三大沙漠最东面的代赫纳沙漠，基本把沙特人在波斯湾的海岸线给封闭住了。如果不是波

斯湾的石油现在成为了沙特的命脉所在，估计这块“沙漠平原”对于沙特人来说就是块鸡肋了。



阿拉伯半岛地缘结构图

如果我们把内志高原和塞拉特山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沙特人口集中的这两块区域，相当于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旦”字。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公元 610 年），阿拉伯人的实际控制区也正是这两个地理单元。在阿拉伯世界里，对这两个地缘板块也有专有名词来标注的。内志高原被称之为“内志”，而塞拉特山地的主体则被称之为“汉志”。这两个地缘标签的直接来源，是 20 世纪初割据于上的两个阿拉伯王国：汉志王国和内志王国。经过长期博弈，最终统一汉志、内志地区的，是控制内志高原的“沙特”家族。所以这个嫡传的阿拉伯国家，也就叫作沙特阿拉伯了。

第三节 汉志王国和内志王国的博弈

内志和汉志之间的博弈结果，影响的因素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不

过说到底，这两大板块可以成为对手，还是因为大家的地缘实力处在同一数量级。因为汉志也好，内志也罢，在旁观者看来，地理环境上并没有太大差别。都是些水源稀少的干旱之地，大家所能依靠的，无非是些有点水（地上河或井泉）的小型绿洲。换句话说，大家的地缘实力是半斤对八两，谁吃了谁都属正常。只是说起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城在内的汉志王国，应该更有机会的。毕竟这种宗教影响力，应该能让塞拉特山区的地缘实力更上一个台阶的。问题是，被沙漠所环绕的内志王国，其实也能够从圣城的宗教影响力上得到好处的。

在穆罕默德时代，塞拉特山地之所以能够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缘重心，一方面是因为山地之中的条件，多少比腹地沙漠之中的高原要好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麦加和麦地那这些山中绿洲，能够扼守住进入沙漠腹地的商路。如果你想从富庶的尼罗河流域或者地中海沿线（以色列现在占据的区域），打通商路进入内志高原的话，沿塞拉特山脉南行到中部，再穿越山地进入内志高原。这样能让你在同等距离下，尽量少的行走在沙漠地带。只是当两大圣城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一条商路上的枢纽之后，在它东则的内志地区，反过来也成为了东部穆斯林（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以及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沿海地区）进入塞拉特山地朝觐和经商的必经之路了。

显然，内志高原上的那些绿洲同样也可以从中获得额外的利益。正是由于内志王国在阿拉伯人的内部 PK 中，战胜了汉志王国，所以内志王国的政治中心“利雅得”也成为了统一的“沙特王国”的政治中心。如果历史就这样走下去的话，也许为了更好的控制圣城和塞拉特山区，沙特王室有可能会将都城西迁。不过在波斯湾的石油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之后，这种想法就没有必要了。毕竟内志地区作为地理中心，可以成为宗教（文化）、经济两大地带（东部的塞拉特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平衡点，使国家结构更为稳定。至于包括利雅得在内的内志高原在环境上的先天不足，倒不是问题。反正有巨额的石油收入，足以能让沙特人挥金如土的在任何地点，打造他们的政治中心（想想阿联酋在迪拜的造城计划）。

第四节 阿拉伯石油国未来发展面临的瓶颈

对于阿拉伯世界发展的最大瓶颈——水，沙特也同样可以用油解决。和利比亚人用石油收入输送地下水有所不同的是，沙特人没找到那么大的地下水库，他们用更直接的办法，即将海水淡化。目前沙特每年的海水淡化量在各国中是最高的。这些可以说是用油换来的水，甚至让沙特成为了粮食出口国。阿拉伯人似乎很得意他们在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上，所找到的解决办法。随之

而来的，就是超高的人口出生率。有数据表明，沙特的育龄妇女平均能够养育 7.3 个孩子，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问题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巨额石油收入的基础之上。虽说将高成本的淡水，花在生存之上并不算错误。但在工业社会之后，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准，就已经不再是它的农业生产能力了。

如果有一天，波斯湾的石油资源枯竭，阿拉伯世界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高附加值的工业来换取地球上其他地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海水或者沙漠之下，获得淡水资源的方式就很难维系了。因为缺乏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而丧失了战略竞争力，是阿拉伯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虽然这与环境先天不够好有关，但也决不光是环境的问题。从阿拉伯人的文化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从商业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即利用巨额的石油财富和决定性的石油份额，来取得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样的话，即使有一天地下的资源不再，酋长们也有机会依靠金融产业所产生的利润，继续维持国家的运转。这种战略方向的布局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出现了迪拜这类建筑于沙漠之上的国际城市。

如果只是想依靠资本所产生的孳息维持酋长们挥金如土的生活，他们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毕竟石油带给他们的原始积累数额巨大。问题是当你想走捷径，试图靠这条最“高端”的产业来获取利润，并作为立国之本的话，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像在普通人看来，把钱投入到金融市场，似乎也比老老实实的做实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但如果你想自己开银行，在金融市场取得话语权，就不是有本钱就能做到的了。即使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成功，这种虚拟经济所蕴含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看看同样以金融立国的冰岛，在经济危机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就明白了。

石油资源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改善阿拉伯人（也只是部分产油国）的生存环境，但却无法实质性提升他们的地缘潜力，并使阿拉伯板块成为举足轻重的一类地缘板块。现在我们还是先老老实实的回到原点，去探究一下在最原始的地理条件下，阿拉伯半岛当中的哪部分会更有地缘潜力。而站在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一条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史发挥过关键作用，并在现在仍被世界瞩目的焦点地带——“新月沃地”，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第五章 也门地理结构和其曾经的分裂格局

第一节 也门的地理环境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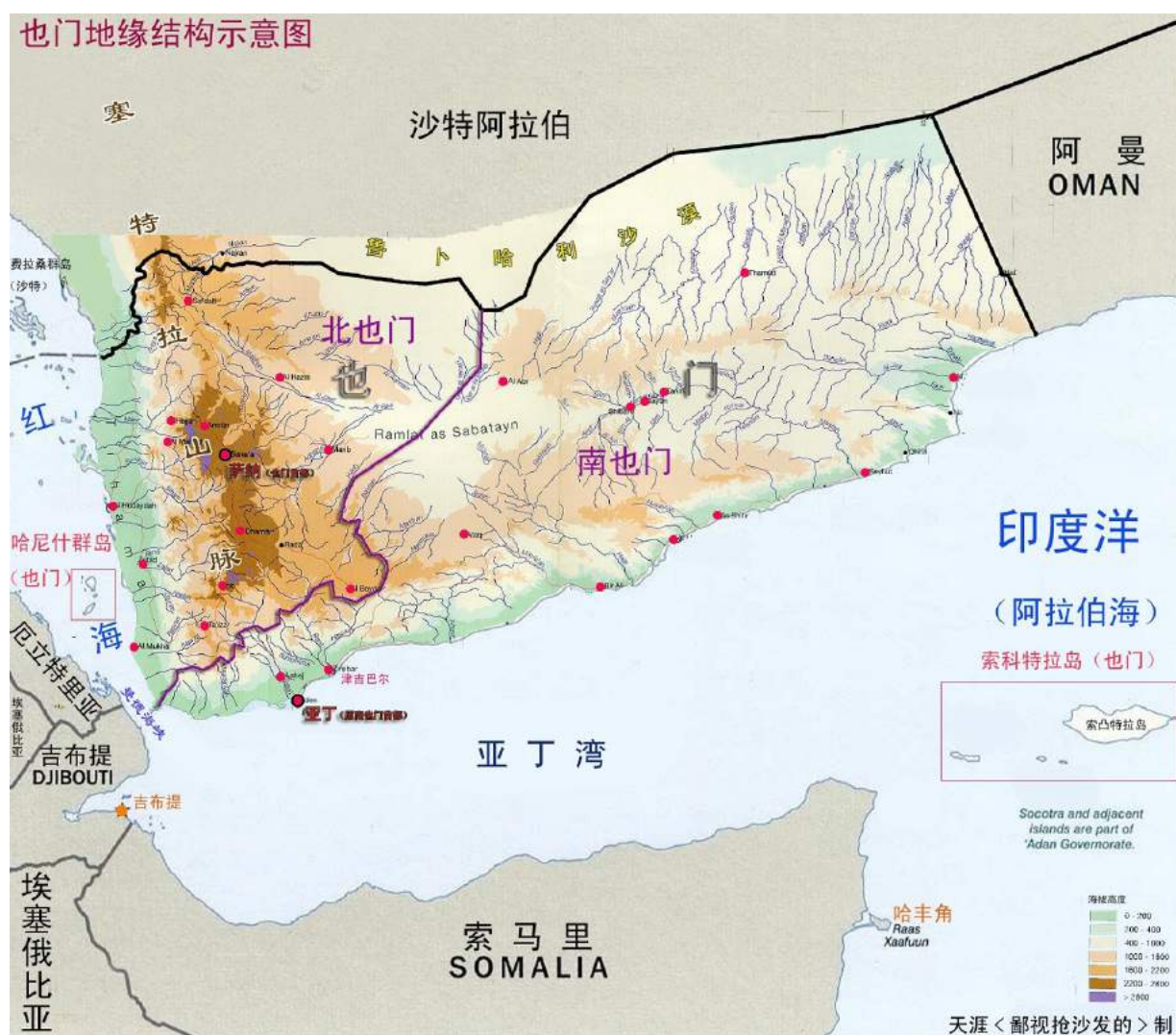
在分析“新月沃地”之前，还有一个板块应该先进入我们视野的，那就是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也就是靠近印度洋的那条边。在这个方向，阿拉伯人建立了也门和阿曼两个国家。很多人很奇怪，阿拉伯人究竟是按照什么原则，在阿拉伯半岛划出这些体量相差巨大的国家的，彼此之间，又是依据什么来确立国境线的。

事实上，要是按阿拉伯半岛内部的地缘结构来看，就算出现上百个国家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除了新月沃地是连成片的高密度人口聚落区外，其余的半岛土地上生存其上的阿拉伯人，基本都是依托一些呈点状分布的绿洲。在古典时期，生活在这些绿洲之上的部落，虽然拥有共同的种族、文化背景，但强烈的地理分割性，还是让大家自然分割成一个个，地缘上相对独立的部落群体。即使是在这些部落依据大的地缘规律，整合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内部各自为王的情况也依旧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类明确表明内部结构的国名。

至于说阿拉伯半岛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政区格局，那还是要“感谢”欧洲人。是他们在那次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为这个星球全面进入国家时代，做出了“卓越贡献”。当然，殖民者在瓜分世界时，也一定是遵循一定的地缘规律的，并不是单纯的拿标尺在图上按几何形状分割，就能瓜分世界的。只不过他们所遵循的地缘规律，和那片土地上依据环境所自然形成的地缘结构，并不一定吻合。也正是因此才为那些完全脱离殖民时代，大多在上世纪中叶形成的国家，埋下了动乱的根源。我们即将要分析到的也门，包括与之隔海相望的非洲之角——索马里地区，目前都还在消化这颗欧洲人种下的苦果。

从也门的地理形态来看，层次感在阿拉伯国家中算是比较丰富的。基本的地势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走势相同，即“西高东低”。这西部的高地，也就是从沙特阿拉伯境内向南延伸过来的“塞拉特山脉”。这条纵贯整个阿拉伯半岛西边缘的山地，在整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东西纵深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当它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进入也门境内后，却突然变宽了。并且开始沿阿拉伯半岛的南边缘向东延伸，并逐渐走低。这种走势，让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山地，整体呈现为一个“L”形。而也门所控制的区域，主体就是这个“L”型山地的角和下边。

塞拉特山脉的这种变化，也让其南部的山地，有机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相比于中北部那细长形的山地，西南角的这片山地，所拥有的纵深能够让它内部拥有更多被山地所保护，少受热带沙漠气候影响的绿洲。在这片高地之上的山谷盆地中，甚至会出现夏季温度不超过 30 度的凉爽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山体的高度和纵深也能为它获得较多的降雨，并涵养更多的水源。在地势最高的其首都“萨那”（海拔 2200 米），一年之中甚至有两个雨季。在那张《也门地缘结构示意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也门境内由高地向下，形成了很多河谷。



也门地缘结构示意图

也门这种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也让它能够保有更多的人口。相比于和它基本呈对应关系，境内却大都是沙漠化低地的阿曼来说（人口 300 万不到），也门那 2300 万的人口，算得上是巨无霸了。这人口数量，已经和面积远大于自己的沙特持平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获取石油利益最多的国家，沙特的人口数量是建立在巨额的石油收入之上而爆发的。而也门却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无法分享波斯湾的石油），成为目前阿拉伯兄弟当中最穷的一个国家。

当然，也不能说也门边上就没有一点石油，只是相比于波斯湾上的巨大储量，也门那点油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也门地区能够从内志、汉志地区切割出来的原始原因，是因为它的山地当中最初因为有相对丰富的水资源，而较早农业化了。也就是说，相比于内志、汉志地区的商业、游牧文化，也门这部分山地之中的部落，已经偏向倚重农业了（现在依然有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处在热带沙漠气候的包围之中，在也门山地之中已经生存了三千多年的阿拉伯人，所能够拥有的水资源也越来越少了。现在也门境内已经没有可以入海的河流了。那些只在雨季之中有水的河谷，并不能为也门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

相比邻居沙特，已经依靠海水淡化实现粮食自给（甚至还有出口），也门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他们置换农业用水。更多的，只能依靠抽取山中涵养千万年的地下用水，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越穷越生）。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更别说过上波斯湾酋长们，那样挥金如土的生活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设想，如果那些财大气粗的阿拉伯产油国，当初没有了巨额石油收入会怎么样，那么也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以沙特的环境看，可能还不如也门）。其实即使是石油资源最少的也门，也是在把石油产业当作支柱产业，用以维持国家的运转。

拥有阿拉伯半岛纵深最大的山地资源，固然是也门可以整合成一个现代意义国家的根本原因；但地处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也门也同样是一个海洋国家。尽管阿拉伯半岛的那些沿海平原，多数因为更易受到热带沙漠气候的侵袭，而沙漠化了（还不如山地之中，可以有屏障）。但既然临海，并且拥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也门也不可能不从海洋经济中，得到一点好处的。事实上也门的海岸线，的确也一直在也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就“作用”这两个字来说，有好也有坏。很不幸的是，国家化之后的也门地区，就因为它的海岸线而在上个世纪陷入分裂之中。而这种分裂所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仍未痊愈。

第二节 南也门和北也门分治的地缘背景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南北（东西）分治的国家。比如为我们所熟知的，有东、西德，南、北越，以及朝鲜半岛。而也门在上个世纪摆脱西方控制之后，也曾经建立过两个“也门”。和上述三国相似的是，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同样也成为了冷战博弈的战场。以至于南也门在苏联的“指导”之下，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随着苏联的崩溃，南、北也门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内乱之后，也完成了统一（1990年，北统南）。

虽然俄国人的介入，让南、北也门之争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就南、

北也门的分治而言，却是有着浓厚的地缘背景。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或者说是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的博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也门人选择了“社会主义”，更多的只是地缘独立的需要，并不在于这部分阿拉伯人就真的信仰共产主义。事实上，抛开意识形态不看，单从冷战博弈的双方：美、俄两国的地缘属性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陆权的代表俄国，和北也门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反之，南也门则更多的显示出海洋属性。为此，我们先来看看南、北也门究竟是怎么分割的，又是如何造就它们之间差异化的地缘属性的。

就也门的外轮廓来说，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长方形，一个将阿拉伯半岛西南角切割出来的长方形。而分割南、北也门的界线，则大致相当于从也门的西南角，拉出一条东北向的边境线。只不过这条边境线，并非指向相对应的东北角，而是指向北部中点偏西的方位。简单的中学几何知识，也足够以让我们在图上观察出南也门所控制的国土面积，要比北也门大将近一倍（北也门19.5万平方公里，南也门33.7万平方公里）。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就双方的人口数量和综合实力对比而言，南也门应该占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北也门之所以能在冷战之后，政治上统一南也门，并非是单纯的由于南也门失去了他们的政治靠山；而是的确北也门的地理条件更好，人口数量更多。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缺乏工业体系的“原始国家”，这种差异是决定性的。

在前面我们分析也门的基本地形时，就已经说到，也门国境内地理条件最好的就是靠近阿拉伯半岛西侧，在南部陡然走宽的“塞特拉山地”。这些能够涵养更多水源，少受沙漠气候影响的高地，才是也门的农业根基所在，并保有了也门75%左右的人口。至于南也门的境内，自西向东，地形已经开始逐渐走低。那些山地余脉，直至也门与阿曼的边境算是走完了。从大的格局来看，也门的国土核心，就是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这片山地。

只从山地的角度来看，地势较低的南也门虽然国土面积更大，在北、东两面，却更多的为沙漠所侵入，农牧业条件，较北方来说要差得多。如果南也门只是一块一无是处的边缘之地，那么就算它们的面积再大，也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可以和北也门分庭抗礼的“国家”。就像利比亚那“金角银边草包肚”的结构一样，你在沙漠腹地占据再多的区域，也只能是以边缘叛军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与利比亚腹地不同的是，南也门拥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尽管北也门在红海沿岸也拥有一条海岸线，但就长度而言，南也门占据的那条长边，显然要倍数于北方。不过能够让南也门在海洋方面占优的主要因素，却并非是它海岸线的长度。毕竟海岸线要想真的发挥作用，是和港口条件分不开的。如果区位和地理条件无法让你成为远洋者渴望的彼岸，那么你可能就只能从海里弄点海产品，而无法享受海洋商业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了。

从区位上来看，能够直面亚丁湾的南也门，在海上交通中的作用显然要大得多。当从东方的波斯、印度，乃至中国来的商船，希望进入红海与埃及交流，包括中转进入地中海，将商品输入欧洲的话（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须由阿拉伯人在路地中转一次，再入地中海（对岸一般是意大利人做欧洲的窗口）。他们首先会希望在亚丁湾找到一个良港作补给站，以让他们有力量进入红海。当然，你也可以拐过弯去，跨越分割亚丁湾——红海的“曼德海峡”之后，再寻找合适的地点作中继站。只不过从东方而来的商品，目的地并非只是红海、地中海一线，非洲东海岸也同样拥有广阔的市场。有鉴于此，亚丁湾沿岸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良港的话，那么作用也就不仅仅是一个补给之地，而更符合一个海上交通枢纽的地位了。

要想寻找一个天然海港并不容易，除了你的背后要有山地依靠，以使你没入海水中的大陆架，不至于与海平面的角度过小（不然船只就很难靠岸了）以外，能够有凸入海洋中的山体保护，使停靠的船舶免受风浪影响，以及有充足的水源补给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根本要素还是在于沿海山地的结构。如果能够依山靠海的话，那些无论港口的水深，还是淡水的涵养，都有机会解决。最终，在 2000 多年前那些海上冒险家的考察之下，靠近曼德海峡，与塞拉特山脉走势成一线的“亚丁”港，成为了连接欧亚非三块大陆的海上交通枢纽。

尽管“亚丁”城以及其他有机会成为港口的沿海地区，可以凭借海洋优势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并据此来聚集人口，加强实力。但从基本的补给（特别是粮食）来看，它们还是需要和背后的农业区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而反过来，那些生活在山地之中的农牧民，也可以因为这些港口城市的存在，而交换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双方有更多的机会在政治上达成妥协，并在政治统一的框架之下优势互补。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海洋经济如此重要的今天，单纯的港口要想立国也是很困难的。比如新加坡，虽然凭借地利优势活得有滋有味，但他的政治家们，却无时无刻不为脆弱的地缘结构感到担心，以至于希望回到马来西亚联邦中去（香港能够回归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如此，没有大陆的物资补给，是无法支撑现在的体量的）。

第三节 萨珊波斯控制也门对默罕默德创教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南也门地区的地缘价值，就在于它在亚丁湾的海岸线，尤其是那个已经开发了二千多年的亚丁港。不过这并不代表南也门地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事实上在西方人引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之前，阿拉伯半岛上更多的是处在部落状态，每个能占据一块绿洲的部落，

都有可能是一个“国家”。不过基于也门山地和沿海地区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从文化意义上来看，生活在也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还是拥有着共同的记忆的。从族群认同上来看，可以整体看成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亚板块。

既然南也门地区的核心价值在于“亚丁”的海洋枢纽地位，那么南也门乃至和它有依存关系的北部山地也就很有可能因为这一点，而引起外部大国的注意了。有人会问，为什么汉志和内志这两块在阿拉伯半岛地理条件最差的区域，反而成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兴盛之地。这其实是和阿拉伯人当时的边缘地位有关。在穆罕默德准备学习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做法，创立属于阿拉伯人的“一神教”时，他和他的民族并没有机会去染指“新月沃地”。如果这个时代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是来自欧洲的帝国，那么也许地理条件更好的也门地区会成为穆罕默德的选择，并诞生一座伊斯兰教的圣城。不过在穆罕默德所处的时代，波斯人又一次崛起（萨珊王朝），并在和来自欧洲的拜占庭帝国 PK 中占得了上风。基于波斯帝国的区位，他们所感兴趣的就不仅仅是靠近地中海一线的区域了，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同样是波斯人征服的方向。

在我们的印象中，阿拉伯民族似乎是一个既能游牧，又能航海的两栖民族。但其实这个后发的帝国和民族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多的是从波斯文明中学习和继承的。而正是由于波斯人对于海洋贸易的重视，让他们在由波斯湾南下，控制了阿拉伯半岛沿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岸线之后，还进一步控制了亚丁湾北岸的也门地区。吸引波斯人的，并不仅仅是亚丁港的海洋枢纽地位，北部山地优越的农业条件，也同样让波斯人感兴趣。毕竟在伊朗高原定居已久的波斯人，文化属性中的“农业”成份已经很高了。波斯人没有理由放弃这样一片有着相似地缘背景，并且有自给能力的土地。更何况帝国需要这片农业区来补给沿海的港口。

基于上述原因，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公元 610 年），留给阿拉伯人的自留地，其实就只剩下汉志和内志两块区域了。如果穆罕默德要矮子里拔高子，在这两片高地中找两个环境较好，又在阿拉伯人内部有区位优势的点作为地缘中心的话，也就是麦加和麦地那了。其实对于现在控制这两块阿拉伯人“祖地”的沙特人来说，他们应该感谢波斯湾沿岸的低地大都是沙漠地带。如果这一区域有一条山脉帮助阻隔沙漠气候，并涵养水源的话，那么在现代国家的序列中，应当有很大的机会分割出新的国家来。即使我们不能确定最终会是什么样的政治格局。但像沙特这样，既能够控制阿拉伯人祖地，又能把国土延伸到波斯湾的格局，是很难出现的（文化与财富兼得）。

在波斯人控制也门之时，它核心的塞拉特山地还是为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的“幸福之地”（“也门”二字在阿拉伯语中，就是“幸福之国”的意思）。只

不过随着环境的变化，现在已经没有大国对这片水资源锐减的土地，有太大兴趣了（地上河早就没了，地图上的河流大都只剩河床了。最悲观的看法是，也门的地下水资源只能撑到 2020 年）。很多人认为，人口越多，越年轻化就是发展潜力，有“人口红利”。不过如果你生在农业环境恶化，工业基础薄弱的也门，看着人口中仅 20 岁以下的人口就有将近 2/3，以及同样不少于这个比例的青壮失业率，就不会这样想了。

当一片入不敷出的土地已经不能承载它的人口时，最为紧张的绝对是它的邻居了。尤其是本为同根生，现在却富得流油的邻居。也许是为了安抚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的穷亲戚，沙特最终在 2000 年将在 1934 年边界战争中，占据的约 4 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交割给了也门。在沙特人看来，这片南部的沙漠之地，价值远比不上靠近波斯湾地下有油的东部沙漠。为了这样一块没有价值的土地，让也门那些热血青年把矛盾的焦点对准自己是不明智的举动。

第四节 亚丁在历史上两次面临命运的改变

既然也门人已经不指望北部的山地为他们带来发展的机会了，那么也门要想翻身的话，就只能看海洋了。最好的情况当然是红海和亚丁湾地区突然成为第二个波斯湾，那样也门人民也就可以像他的邻居们那样，数着石油美元过好日子了。只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也门的海岸线，特别是“亚丁”能够引起世人关注的，还只是它的区位优势。问题是，这种区位的重要程度究竟有多大，对也门的影响是否只是正面的？

首先就区位的重要程度而言，亚丁在历史上就经历过两次命运的改变。最先影响到“亚丁”地位的事件，是欧洲人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当欧洲人（最先是葡萄牙人）终于发现可以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并直接与南亚、东南亚、东亚沟通时，阿拉伯人整体的区位优势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其中，作为欧亚非大陆海上交通枢纽的“亚丁”，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最起码，它再也不能指望那些输往欧洲的货物，会经由亚丁湾——红海——地中海路线转入欧洲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沿非洲东海岸航行而来的欧洲人，也同样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非洲东海岸的贸易权。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需要亚丁港和亚丁湾的，也就只剩下红海沿线的阿拉伯人了。不过历史又一次的给了亚丁机会，让亚丁湾重新成为了海上交通的枢纽地区。因为绕经好望角的欧洲人发现，虽然他们可以就此绕过可恶的异教徒，直接和东方进行商业贸易，但几乎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航线，还是让商人们感到无奈。因此在欧洲人凭借工业革命将阿拉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甩开一个时代

以上的差距后，他们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规划世界的地缘结构了。

为地球划定新的行政版图固然是瓜分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单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能够打通地中海——红海之间那段狭窄的陆地连接点，那么欧亚之间的物流成本将会极大的降低。而欧洲人在亚洲的控制力也将得到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伊士运河诞生了（1869 年通航，由法国人主持挖掘）。

也门人有理由为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感到兴奋，因为这让他们的海岸线重新具有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但同样感到兴奋的是那些已经视全球为利益区的欧洲人。在欧洲人看来，海洋是他们控制世界的桥梁。挖掘苏伊士运河当然不是为了沿岸的阿拉伯人，或者当时还是埃及宗主的奥斯曼帝国得益。为了避免这些异教徒阻碍欧洲人控制世界，红海和亚丁湾沿线很快成为了欧洲国家角逐的舞台。而也门地区也正是在这场博弈当中被分割成了两大政治板块。

第六章 外部势力对也门局势的介入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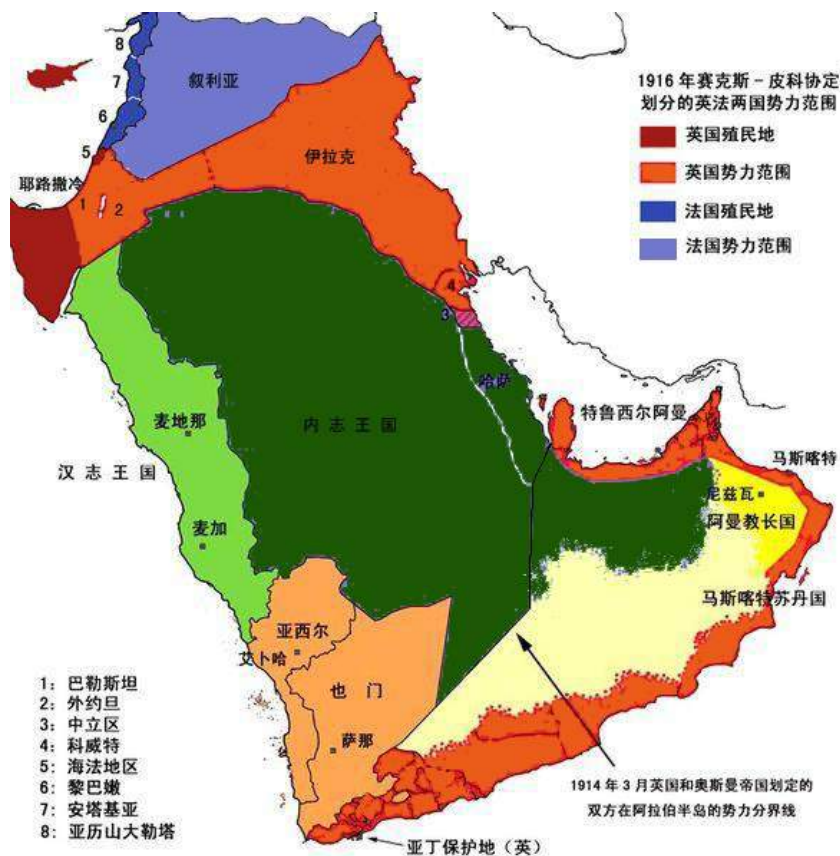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英国殖民亚丁及周边陆地地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美国经由一、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海洋的霸主之前，海洋的控制权主要是由英国人所掌握的。尽管法国人借由他们在地中海的地缘优势，在苏伊士运河的挖掘上占了先机，但在他们打通这条海洋通道之前，英国人就已经开始为控制全球的海洋进行布局了（其实法国人一开始也是英国的全球竞争者，失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中海和非洲的）。基于亚丁对于红海两岸地区仍具有一定辐射力，英国人也将其列入了海洋布局的计划当中。

在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英国人在苏伊士运河开发前二十年（1839年），就将亚丁港变为了自己的殖民地。正如他们费尽心机的从中国的皇帝那里得到香港一样，对于海洋帝国来说，港口是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支撑点。与在英国崛起之前控制海洋贸易权的，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不同。英国的政治家并不满足于在航线上单纯的占据港口，布设贸易点。而是试图以港口为起点，扩张出一块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殖民地来。在英国人看来，海洋利益的获得是需要有腹地支撑的。如果不能在陆地上获得足够的纵深，你的海洋地位是很难维持的。

英国人的这种战略性眼光，让他们在美国崛起之前，成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国家，并成为海洋的最强者。而这其中，它在欧洲以外所经营的那些殖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特别是海洋位置和陆地条件俱佳的南亚次大陆。不过这些远离英国本土的腹地，毕竟比不上能与自己连成一片的纵深。所以最终既有海洋优势，又有腹地纵深的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人经营殖民地的这种战略，在亚丁湾的控制上面，也同样得到了体现。在占据了亚丁港之后，英国开始以这个港口为基点，扩张在阿拉伯半岛的势力范围。

如果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亚丁以北人口密集的山地区，显然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也正是因为北也门地区是阿拉伯人的聚居区，英国人向北扩张的难度也会更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做任何决定之前，总是需要衡量一下成本的。如果是像尼罗河下游地区那样，地形简单，在北非战略地位又举足轻重的板块，相信英国人一定会下大本钱去谋求直接控制的（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而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这片山地，战略价值就没有这么大了，最起码英国人不认为那些贫瘠的山地（相比印度一类的地区），能够为帝国在其他区域的扩张提供额外的供给。就整个阿拉伯半岛而言，英国和其他帝国，所看中的主要也是



阿拉伯半岛殖民地图

对于英国来说，它们并不需要占据整个也门，或者以阿拉伯半岛为目标（除非他们对骆驼和帐篷特别感兴趣）。能够在亚丁湾沿线，控制一块纵深足够大的区域，以在战略上保护亚丁湾一线的海洋安全就足够了。

基于上述战略，英国最终和亚丁湾一线的阿拉伯酋长们达成了协议，将他们纳入了英国的保护之下。至于这其中用了哪些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人觉得，控制这些地广人稀，而又有漫长海岸线的地区，要比跑到塞拉特山脉腹地做同样的事情，费效比要高。对于上个世纪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当年殖民者所划定的势力线，是他们之间划定国境线的重要参考。就客观结果来说，现在有些国家也许要“感谢”之前的宗主国帮它们整合了割据的地缘结构，将之前一直无法完全控制的边缘地区，纳入了同一国家的范围之内。

虽然这种由外力促成的结合，直至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至少保证了你能够用内政的概念来消化这些问题（比如印度、缅甸）。而对于另一些地区来说，殖民帝国根据自己需要所做出的一些切割，就反过来让一些本来有条件处在同一政权之下的地区，分割成不同的国家了。像英国人为了控制亚丁湾，而在也门所做出的这种切割，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了。基于继续对亚丁湾地区实施影响力的原因，英国人在上世纪中叶，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允许昔日的殖民地独立时，它更希望南也门地区独立的成为一个国家。

区位价值。这一点直到波斯湾的石油出现，才有所改变。

既然对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亚丁港已经在控制之下，那么能够在亚丁周边控制一些缓冲区，以保障它的安全就足够了。相比于北部山地，亚丁以东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较差，阿拉伯人的控制力要差得多，人口数量也要少得多。相应的，无论英国是以武力还是收买的方式向东扩张势力范围，所要付出的成本也要低很多。

第二节 大国对也门分治的战略和也门的统一

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单从相对位置而言，分割后的也门应该更有理由叫作“东、西”也门。其实之所以会有南、北的认知，主要还是因为也门的核心区，无论海、陆，都在西部。去除掉东部那些地广人稀的干旱地区之后，单论萨那和亚丁，这两个陆、海地缘中心的位置，分割后的也门就是南、北关系了。诚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南、北也门基于历史原因不得不分成两个国家，但却因为地缘的原因而有统一的背景的话，那么南也门地区在实力上是无法和北也门对抗的。这也是英国不希望南、北也门统一的原因所在。

如果南、北也门统一的话，那么在地理结构上更为丰满的也门，势必会削弱英国在此的影响力；而假如让地缘重心在沿海的南也门地区独立，并试图对抗北也门的话，那么从英国这样的地区外大国获得支持就是必须的了。从大国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直接控制某一地区，分而治之总是最好的办法。而在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当中，扶植弱小的一方，通常最为有效的。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些布局，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太大的利益。这是因为二战以后的世界，发言权已经移交给了美、俄两个大国。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不再是英国的主要任务了。

在这种情况下，南也门地区也不出意料的摆脱了英国的直接控制。不过这并不代表南也门地区就很快能够与北也门地区完成统一。因为自成体系已久的南也门地区，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愿意在北方的领导之下分享权力。而如果南也门想继续保持独立的话，在试图脱离西方的控制之时，所能指望基本就只有俄国人了。基于和美国进行全球对抗的原因，俄国人也很有意在阿拉伯半岛扶植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管英国人或者俄国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介入南也门地区，对于南也门地区来说，没有外力的帮助，是无法和北也门对分庭抗礼的。而集中了大部分也门人口的北也门，也很自然的视自己为也门的核心区，并以统一南也门这块边缘地区为终极目标。这个愿望在苏联解体之后终于得到了实现，虽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的反复，并进行了数年的内战（1990——1994年），但整个也门地区还是以“北统南”的形式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为也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北也门领导人，就是最近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的热门人物，即也门总统“萨利赫”。

虽然也门正式统一也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但相比于100多年的南北分治，也门人完全实现内部融合，还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也门最近这些年的乱局

而言，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上看不到出路，却又面临巨大的人压力，是也门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其实这也是地球上很多地区爆发激烈冲突的主要原因。相比于那些已经穿上鞋，甚至有不只一双鞋的人，光着脚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欲望去破坏现有的体系。另外从政治结构上来看，也门自统一以来就置于一人的领导之下。政治体系缺乏良性循环，是导致今年矛盾集中暴发的直接原因。其实在阿拉伯世界，这种政治形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了。

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基于结构性的宗教矛盾，他们并没有把握在文化上改造这些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因此与其去面对一个内部陷于混乱，部落分割的地区，倒不如去影响或控制一位有能力控制内部矛盾的强力领导人。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特别是普通民众有意愿的话），能够让这些国家模仿土耳其的路子“世俗化”，并在政治体系上纳入西方的轨道，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之下，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强人政治模式，一直维持到了现在；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这一波自下而上的革命当中，虽然拥有强力领导人，却又最抗拒西方影响的利比亚，成为了西方试图从根本上改造阿拉伯世界价值观的试金石。

第三节 基层组织利用也门南北矛盾对其渗透

现在让我们回到也门的问题上来，在各种类型的博弈当中，一开始总是有很多的参与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参与者或主动，或被动的会因为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而形成屈指可数的利益集团。连接这些利益集团的纽带有很多种，你可以从社会结构上，自下而上的按照“阶级”的概念而进行归类（就像红色政权夺取政权那样）；也可以按照最容易识别的肤色、种族来结成天然的同盟（比如达尔富尔的博弈特点）；甚至可以用移民的时间，来划定内、外集团（就像台湾的蓝绿之争）。

至于像也门这种从地理分裂中刚走出来不久的国家，南、北也门的地缘概念是最容易被政治家们用来圈定自己利益范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出于对萨利赫独享权力的不满，在重建也门的政治结构，重新瓜分政治权力这一点上，也门的反对派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一旦这个共同的目标消失，也门的政治博弈又很有可能重新体现出南、北对抗的特点。

如果有充分的时间磨合，相信也门内部的南北之争，还是会逐渐淡化的。就像曾经导致美国内战的南北之争，现在也已经不是美国的主要矛盾所在了一样。只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英国人所留下的这份遗产，还需要也门人慢慢来消化。

既然这种地缘矛盾是现实存在的，那么就不可避免的为各种想从也门获取利益的集团所利用了。在“911”之后，就被美国人认定为主要敌对势力的“基地”组织，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也门内部的这种地缘矛盾，基地组织得以在也门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南部地区活动，并建立根据地。这种活动在今年5月份达到了高峰。在也门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一场“革命”的混乱之中时，基地组织攻取了位于亚丁东侧的“津吉巴尔”，并宣布建国。



也门政治结构

美国的海、空军进行战术上的攻击，困难并不大。补给的难度，也要远低于在阿富汗。而在阿富汗，美国人至今还在为如何在政治和军事上，维持开伯尔山口的补给线而头痛。

相比于南也门沿海地区，北也门的山地其实要更有利基地组织的发展。如果也门陷入部落割据的混乱局面，让基地组织乘势渗透入也门的核心地区，美国人再想实施定点清除一类的行动，就要困难得多了。相比之下，像利比亚那种地理结构，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基地组织，都没有什么游击战的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担心，美国并不希望也门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而陷入混乱之中。

美国的这种担心，也为“萨利赫”维持他在也门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国际空间。在这位也门的独裁者，还能够把基地组织的活动空间，压缩在南部地区，并在军事上给予打击的时候，美国并不愿意冒险打破这种平衡。即使是在2000年，美国海军的“科尔号”战舰，在亚丁湾受到基地组织袭击的情况下。事实上对于萨利赫来说，也很清楚基地组织的价值所在。

对于他来说，这更像是一场猫养老鼠的游戏。所要把握的，就是要显示对

实际上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南也门，特别是沿海一线，并不是基地组织活动的理想地区。和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相比，基地组织所能依托进行游击战的地形，要不利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也门地区漫长的海岸线，固然是这个板块的立身之本，却也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如果美国直接在此展开军事行动的话，

补给的难度，也要远低于

局势尚有控制力。既不能让基地组织真的影响到也门的国家完整（所以基地组织宣布建国以后，也门政府军很快便把津吉巴尔夺了回来）；又没有必要拼尽全力，去把基地组织赶出也门。无论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消除美国的担心，只要把这只老鼠的活动区域，限定在南部地区就行了。

第四节 美国以印度洋上的查戈斯群岛为军事基地

也门的乱局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政治上能够平衡过渡到另一个强人时代，并且听从美国的指挥，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好转之前，宗教极端组织都将会继续享受他们的“人口红利”。唯一让美国人感到欣慰的是，不管谁上台，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都会继续和他们在反恐问题上合作的。至于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比萨利赫强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事实上，如果当初英国人没有把直属的亚丁城和那些受其控制的南也门地区合并，组织国家形式的“南也门”的话，也许亚丁可以以英国直属地的身份，成为美军在亚丁湾乃至中东的基地所在。那样的话，无论对于遏制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发展，还是打击索马里海盗，都会有利得多。不过，虽然英国人在全面放弃海外殖民地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了不少有海洋价值的钉子（比如直布罗陀，塞浦路斯的直属基地），但在阿拉伯世界做这样的切割，还是很困难的。作为南也门地区最有价值的城市，如果亚丁仍在这些异教徒手上，相信也门现在的主要矛盾，也就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在民族国家独立的大背景之下，对于试图控制海洋的国家来说，最好的海外领地，是那些位置重要，但又与大陆分离，人口稀少的岛屿。即使你不能在控制之初，把岛上的居民迁走，控制起来的成本也要低得多。作为历史上最强大海洋国家的美国，就是这样做的。所以经常会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美国如此强大，却没有凭借实力，在海外扩张殖民地。但如果你去关注太平洋上那些小岛的归属时，就会发现诸如“关岛”这样，已经成为远离美国本土千里之外的海外国土了。至于像伊拉克这样人口密集的高危地带，再过 100 年也没有机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州。

由于美国在西方列强中崛起的时间较晚，因此它并没有机会在印度洋上，获得一个可作战略支撑点的海岛。不过作为印度洋曾经的主导者，英国人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块自留地的。这块自留地就是“查戈斯群岛”，目前美国也正是以其主岛“迪戈加西亚岛”，作为在印度洋和中东行动的战略基地。观察这块“英属印度洋领地”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正好位于印度洋的中心，和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南亚次大陆、南洋群岛，乃至澳大利亚的距离，都处在

同一数量级。

如果你希望在印度洋上有一个支点，并以此辐射整个印度洋地区的话，迪戈加西亚岛的位置是不错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可以安全的把物资储备在上面，为他们在印度洋的活动提供战略支撑。至于岛上的土著居民嘛，并不是问题。虽然这些当年被英国强行迁走的土人，最近这些年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回到故乡，并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即使这些所剩无几的原住民回来，也不会对美、英的军事安全造成什么威胁。要是英国人把思路转换一下，在查戈斯群岛走走夏威夷的路子也不错。不仅可以“变废为宝”的解决掉原住民回归的问题，还可以丰富一下美军将士的业余生活（这对美国人来说，可是很重要的）。



北印度洋主要岛屿示意图

虽然查戈斯群岛能够为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行动，提供战略支撑。但从战术角度来看，这个点无论距离哪片陆地都太过遥远了。美国人不能指望这片位于赤道以南的珊瑚岛，能够以战术基地的身份，为他们在中东打击基地组织，

或者索马里海岛提供帮助。因此，如果美国人希望在中东和亚丁湾，显示他们那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话，还需要另辟蹊径从那些穆斯林手中得到一个基地。

第五节 美国希望租用也门索科特拉岛作为军事基地

单从港口的位置和条件来看，要是也门人肯在亚丁划块地给美国人作基地，倒是挺符合美军的战术要求的。不过美国大兵可能不太喜欢被成群的阿拉伯人包围，特别是这些阿拉伯人因为贫穷，而更容易被基地组织所争取。如果有得选的话，位于亚丁湾东入口的“索科特拉岛”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美国人没有可能把岛上那 8 万多居民给迁走，但这个面积超过迪戈加西亚岛 130 余倍的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岛，足以让美国圈出一块让基地组织无法接近的安全之地来。当然，前提是也门政府愿意让美军在此落足。事实上，美国并不是第一个看上索科特拉岛的国家。当年葡萄牙人就曾经占据该岛，以向阿拉伯半岛南部渗透。后来英国人，也曾经先礼后兵（先用钱买，不行再武力占据）的占领该岛。如果不是苏联在 70 年代插手也门事务，并成为南也门的保护者，加上这个岛并不是无人岛。英国人也许会下大力气，把它纳入英属印度洋领地的范围里。

俄国人在“帮助”南也门地区脱离英国人的控制之后，也顺理成章的从也门人手中，得到了索科特拉岛的使用权，并将之变为苏联在中东的海军基地。当然，这一切也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过眼云烟了。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如果也想从也门人手中得到岛上的海军基地，还需要密切关注也门的政局。比较好的消息是，也门政府军最近在协助美军打击基地组织的问题上，似乎积极了不少。在一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大国们的态度总是很重要的。这一点，相信卡扎菲和利比亚的反对派（不好意思，现在已经升级为“执政当局”），应该是最有感受的。如果有一天，在博弈中获胜的一方，愿意把这个化外之岛租一部分给美国人，我们并不应当感到奇怪。

虽然也门人自己在行政上把索科特拉岛交给亚丁管理，但单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这个岛其实离索马里更近点。只是基于阿拉伯人的历史优势，才成为了也门的一部分。因此当也门人还在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据说索马里的海盗们也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已经在上面建立了燃油基地，以使得其活动范围进一步向印度洋纵深延伸。这对于美国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如果说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恩怨，更像是私仇，那么打击海盗这件事情，就带有公益性质了。有了这样一个道德制高点，也门的政治家们在交换利益时，对内也更有交待了。

说起来，索科特拉岛上的环境和阿拉伯半岛是不一样的，甚至和地球上其

他地区也都不一样。这块和大陆分离了上千万年的岛屿，上面保存了许多独特的物种，被称作“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地区”。如果当初南也门的宗主国是美国，而不是“日落西山”的英国。相信美国政府仅凭这个理由，也有机会说服美国“人民”给予岛上居民一定的公民权，以得到这块风水宝地。就像他们为了控制西太平洋，而想办法让关岛的居民享受美国人待遇一样。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在印度洋和中东的控制力就可以大大增强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还是不得不想办法从那些穆斯林国家手中租用军事基地。

第六节 美国渗透非洲之角

单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如果你想在一条海峡或者海湾得到支撑点的话，可以有两个方向上的选择。一是在两边的岸线上寻找机会，二是把目标锁定在海中的岛屿上。亚丁和索科特拉岛，所应对的就是其中的两种可能。如果美国人目前还搞不掂也门人的话，那么他们就需要把视线南移，看看对岸的非洲之角有没有机会了。

对于亚丁湾东、南的这片非洲土地，有一个专属的地缘名词“非洲之角”。而如果你想在非洲之角的海岸线上寻找机会的话，就一定会首先看到索马里。诚如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样，亚丁湾的海岸线绝大部分被这个混乱的国家所占据。在殖民时代，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曾经先后成为索马里的宗主国。当然，如果把殖民历史再往前推的话，控制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进入非洲之角的时间要早得多。虽然由于海洋的阻隔，阿拉伯人本身并没有像在北非那样覆盖全境，不过他们还是成功的让伊斯兰教成为了索马里的主要宗教。

美国人在索马里的努力，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如果不是由于“黑鹰坠落”事件引发了国内的民意干涉，美国应该已经在索马里扶植出一个“民选政府”，并以保卫世界和平的理由，得到一个位置不错的军事基地了。不过美国人没有成功的控制索马里，对于试图在印度洋搅局的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现实的意义，就是有理由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尝试一下“蓝水海军”的滋味。只是我们应该很难看到让一些人热血沸腾的警匪大战镜头，更不会看到中国审判海盗的情况出现。就像韩国人曾经做的那样，这并不代表中国海军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只是当你有更长远的政治规划时，贸然占在一个民族的对立面，并不是明智的。在索马里政局未定的时候，去谈论中国在索马里的利益还言之过早。目前所能够做的，就是在索马里打好民意基础。

基于索马里在亚丁湾和印度洋的战略位置，以及和美国的恩怨。这几日中国方面，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外援助（总值达 4.4 亿多人民币）用在了非洲

之角，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也门和索马里由于复杂的国内形势，让美国在亚丁湾寻找支撑点的计划受阻，但法国人却给美国留下了一个机会。正如英、法两国在欧洲互不相让的博弈关系一样，在海外利益的扩张方面，这两个冤家也总是如影随行。包括最近在干涉利比亚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当年，英国人在亚丁湾博弈上占得了上风，控制了包括南也门、索马里在内的亚丁湾地区。但法国人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在亚丁湾与红海相接的曼德海峡西侧，从索马里地区切割出了一个条件优越的港口“吉布提”（最初也叫“法属索马里”）。

相比于英国在红海——亚丁湾的主导地位，醉心于大陆（欧洲）事务的法国，在这一地区所获得的利益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你整合的殖民地越大，在国家化之后也越难控制。即使出于历史渊源，能够继续获得一些利益，所面临的问题和要付出的代价也更多。相比之下，像吉布提这种因港立国的城市国家，要容易控制得多。对于航线经济的依赖，使得吉布提人在独立之后，并不排斥法国人继续驻军当地。甚至在法国决定缩减海外驻军规模时，以影响当地经济和就业为名，提出抗议。面对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抗议，伟大的美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了。因此法国在吉布提让出的那部分空间，很快就让美军填补了。

吉布提这种以港养国的做法，也让其他试图渗透印度洋和亚丁湾的国家看到了希望。同样对打击海盗的公益事业感兴趣的日本，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吉布提建设海军基地的消息，也曾经让很多国内的军迷感到担心。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在吉布提人看来，日元是钱，人民币也是钱。在中国人还没有下定决心在海外布设军事基地之前，吉布提人民也一定有机会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义的。

非洲之角，目前也是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在解读完中东之后，这个和中东地缘关系紧密的板块也会有专节解读。相信到时候，大家就会清楚，为什么索马里和其他几个邻国会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

第七章 两河流域的地理结构

第一节 两河流域上游的高原地带

作为中东国家，沙特和也门虽然也时不时的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不过相信大家听到最多的还是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这几个热点国家。说起来这几个国家所在地区，还真是永恒的热点。可以说，自有人类文明以来，这片在阿拉伯半岛中环境最好的区域，就是世界的焦点，并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而它的地缘标签，就是我们即将解读的“新月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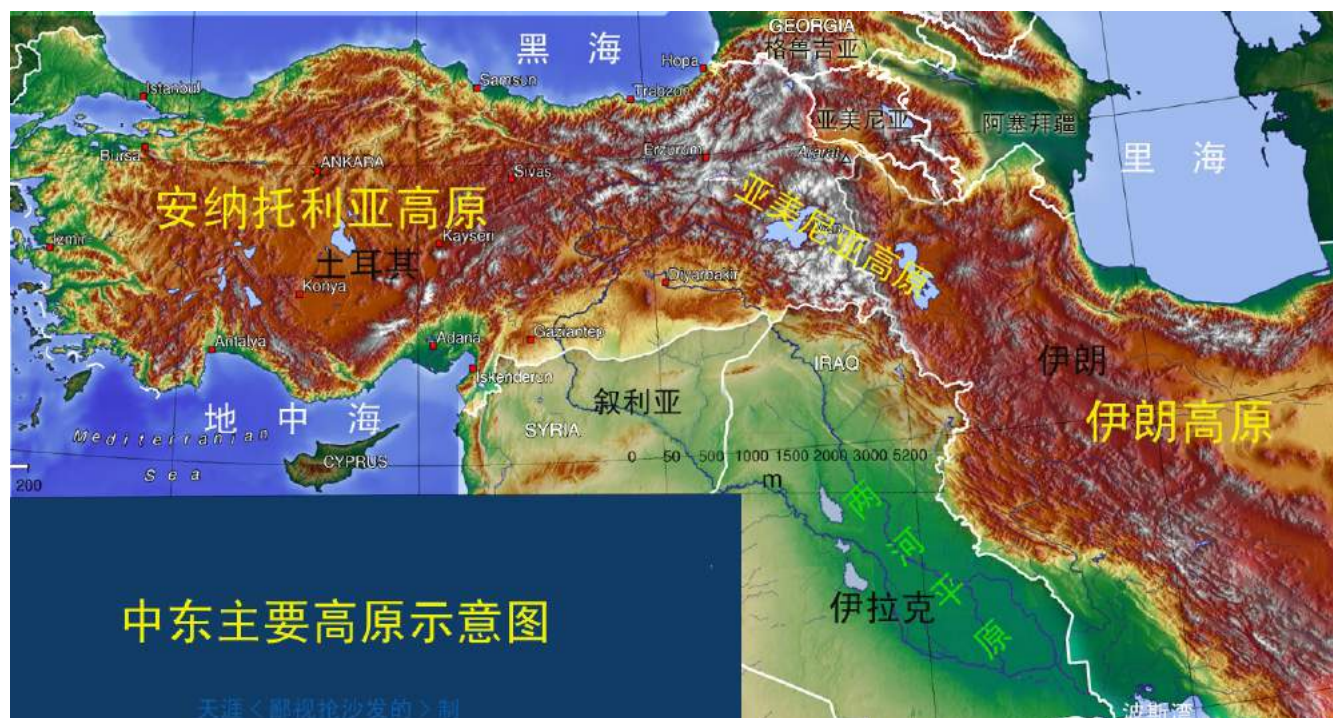
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条呈新月形的，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在整体呈热带沙漠气候的阿拉伯半岛周边地区，存在这样一条连片的农业种植区，显得弥足珍贵。而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整条新月沃地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东部的“两河流域”。依照现有的国家结构划分，地中海沿岸地区所涵盖的国家有三个半，即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尚未能真正建国的巴勒斯坦；至于两河流域的核心区“两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则由伊拉克所控制。

对于“两河”所指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信只要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所耳闻。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苏美尔、汉谟拉比、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历史名词都是诞生于这两条河畔。依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两河之地也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形成地。在探究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地缘结构时，我们会发现，之前在中央之国所积累的一些惯性思维会受到挑战。在解读中央之国时，平原面积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农业潜力，并直接影响它在古典时期板块排名。

而到了干旱少水的北非——阿拉伯半岛地区，我们就会发现，地势是否平坦已经不重要了，“水”才是决定人口数量和地缘潜力的首要指标。很多看起来是大平原的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沙漠所覆盖了；而很多被农业中国看成鸡肋的山地，却因为能够涵养更多的水资源，而成为了人口密集区。相比之下，两河流域的特点倒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因为它核心的区域，正是在下游的低海拔平原地区。也就是说，这片地势平坦的冲积平原，同样是因为它显著的农业属性，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的。

在分析沙特阿拉伯时，我们曾经说过，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地形结构，自西向东也是呈三级阶梯布局的。问题是，阿拉伯半岛西侧的塞拉特山脉由于海拔和位置的原因，从老天爷那里所截取雨水连供给山地内部都成问题，更别说是

中部高原和东侧的平原地区提供淡水补给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河文明的兴盛，其实和阿拉伯半岛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的。几千年来，为这片平原提供生命之水的，是阿拉伯半岛东北部那一系列的高原。



中东主要高原示意图

我们很容易在阿拉伯半岛的北、东部，看到那片由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洋的高原带。现在，这片高原带由土耳其和伊朗所占据。通常我们在总结土耳其的地理特点时，喜欢用小亚细亚半岛来概括；而伊朗，则几乎可以和波斯高原重叠。其实上如果我们把视线单纯放在海拔高度上时，小亚细亚半岛又基本上可以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划上等号。不过，如果你认为滋养两河平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发源于这两大高原，那就错了。因为在这两大高原之间，还有一个起过渡作用的高原带——“亚美尼亚高原”，而两河正是发源于这个结合部上。

通常我们很容易忽视掉“亚美尼亚高原”的存在。一是因为这块缓冲之地，目前大部分已经被土耳其和伊朗所占据，原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则被挤到了高原的东北角。从地理结构来看，所谓的亚美尼亚高原，实际上是由安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的边缘山脉碰撞汇集而成的。相应的，海拔也要更高些，所以也被称为“亚美尼亚山结”。这一点，倒是像是塔吉克人所占据的“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集结之处）。

如果亚美尼亚高原像帕米尔高原那样高，或者周边的邻居不那么强，那么这个地理单元，还是有机会基本对照一个国家的。可惜的是，安纳托利亚高原

上的突厥人和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注定会争夺这块缓冲之地。如果亚美尼亚人当初选择做穆斯林的话，也许突厥人或者波斯人会考虑扶植他们在这片高原上，以缓冲对手的压力。可惜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建立者（公元4世纪，比伊斯兰教创立还要早三百年），亚美尼亚人固执的在穆斯林的包围中恪守他们的信仰，因此悲剧性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而本可以由亚美尼亚人来充当的缓冲角色，也就交由同样信奉真主的“库尔德人”来充当了。

尽管最终在突厥、波斯、阿拉伯三大族群的包夹之下，库尔德人并没有如愿的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从族群生存的角度看，他们还是成功的覆盖了一块有一定纵深，在地理上勉强可以独立的地理单元，而这也是库尔德人一直认为自己有机会独立建国的地理基础。如果我们对照之前所上的《库尔德人分布区地缘位置示意图》，就会发现库尔德人的分布区和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理范围高度吻合。

要是按照这种地缘结构来看，这块高原更应该被叫作“库尔德高原”。不过要是哪个地理学家敢这样命名，土耳其和伊朗肯定会首先跳出来。在他们看来，人口数量已经被压缩到300多万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在上世纪初，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并不是这些异教徒所遭受的唯一苦难），即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实质威胁。相反，如果让已经在此生活了上千年，人口数量达到3000万的库尔德人，从地理学家那里得到暗示的话，相信会更增强他们的独立倾向，并且为期待中的“库尔德斯坦”划出准确的地理边界来。

基于亚美尼亚高原对于两河平原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没有理由放弃这片山地。特别是他们还想重复帝国的荣光，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两河平原，直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时候。既然水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就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为它们补水的支流，究竟是怎么样的走向，这些河流的走向，又对中东的地缘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节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中下游补给上的差异

无论在什么文献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是秤不离砣的粘在一起的。以至于“两河”之名的出现概率，甚至要高于它们的本名。的确，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条同样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的河流，流淌的路线实在太接近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在它们之中，界定出主次关系来。不过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会存在细微差别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来看看，这两条世界级名河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单从长度来看，相对位置偏南的幼发拉底河，要比北面的底格里斯河长。前者的上游源流，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交接处的东托罗斯山脉；而后者则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南边缘的东南托罗斯山脉。不过从流量来看，底格里斯河却要更大些，其流域之内，所滋养的人口和城市也要更多。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地理位置。我们知道，作为一条河流来说，决定它年流量大小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源头处的水量。一条能够在中下游地区持续补水的河流，其地缘潜力要远大于主要水量要依靠上游来水的河流（同样长度和发源地）。

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当然，尼罗河的成功，更多的在于比较优势。在北非这样广袤的干旱地区，如果想发展文明的话，除了尼罗河之外，你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只不过这条严重依附于一条河流的“带状文明带”，由于缺乏足够的纵深，抗打击能力是非

常弱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才很难看到，埃及成为扩张性的帝国。而如果一定要在北非——阿拉伯半岛这个板块中，为可能的帝国找到一个地缘核心的话，两河平原会是更好的选择。

两河平原相比于尼罗河下游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纵深更为丰满。事实上，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你周围有什么样的“邻居”，可能才是决定性因素。相比尼罗河下游不得不孤独的流淌在沙漠地带，能够紧临北部的高原带是两河流域最为重要的地理优势。单从水量补给这块来看，最起码北部的底格里斯河，在从亚美尼亚高原南麓下来之后，还能够从发源于亚美尼亚——伊朗高原一侧的众多河流处，得到补给。这种流域特点，使得底格里斯河流域整体上都成为适宜文明发展的“沃土”。这一点，我们在《新月沃地地缘位置示意图上》就可以看出。整个底格里斯河流域（包括支流的下游地区）都被划入了这片肥沃之地，其主要城市的分布也呈连续状态。

对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显得“底气”有点不足了。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的中游地区还能够从左岸接受来自亚美尼亚高原的支流补给，但到了下游的平原地带，幼发拉底河就只能指望西南部的阿拉伯高原了（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总称，核心为汉志高原）。问题是，阿拉伯高原的情况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除了中间海拔较高的汉志高原有些相对集中的绿洲之外，它的边缘地带早就已经沙漠化了。因此那些在远古时期曾经汇入幼发拉底河下游，并为两河平原的形成作出贡献的河流，现在都变成“季节河”了（也有叫干河，涸河的）。其中的大部分即使在“丰水”季节蓄积了一点可怜的水量，也在流到幼发拉底河之前就被蒸发了。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这种差别，让人不得不感叹，有一个好的靠山是多么的重要。也正是这点差别，我们才会发现，与底格里斯河全境都在新月沃地之中不同。幼发拉底河的中游高地，并不属于这片肥沃之地。阿拉伯高原的干旱沙漠气候，带给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缺少支流补给这一点。事实上纵横于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沙漠，已经越过幼发拉底河的中游，向底格里斯河逼近。如果不是下游可以和底格里斯河组网，共同经营出一片“叶”状的冲积平原的话。相信在沙漠的侵蚀之下，幼发拉底河所能够经营出的文明地带，也会和尼罗河下游一样，只能沿干流分布了。

分析两河之水来自何方的意义在于，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河中下游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叙利亚、伊拉克），到底是西南侧阿拉伯高原上的同族兄弟更重要，还是东北部高地之上的突厥人、波斯人更能捏住它们的命脉。在这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技术上通过水坝工程，控制下游水量。当然，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政治上会有一系列博弈，包括所谓国

际法的约束、外力的调解。问题并不在于上游国家会不会把控制水量当成武器，而在于它拥有这种不可逆转的地理优势。除非阿拉伯人有能力控制亚美尼亚高原和伊朗高原。在他们刚刚拥有伊斯兰教这件集权利器时，这个沙漠中走出的民族的确曾经做到过这点。不幸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水是生命资源”的道理，在干旱的阿拉伯地区，显得尤为重要。既然作为阿拉伯半岛人口最为密集的两河中下游地区，在水资源上不得不依附北部高原带。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下，瓜分这片高原带的土耳其和伊朗究竟在这方面又有多大潜在的发言权。他们二者有可能据此而直接施加影响的地区，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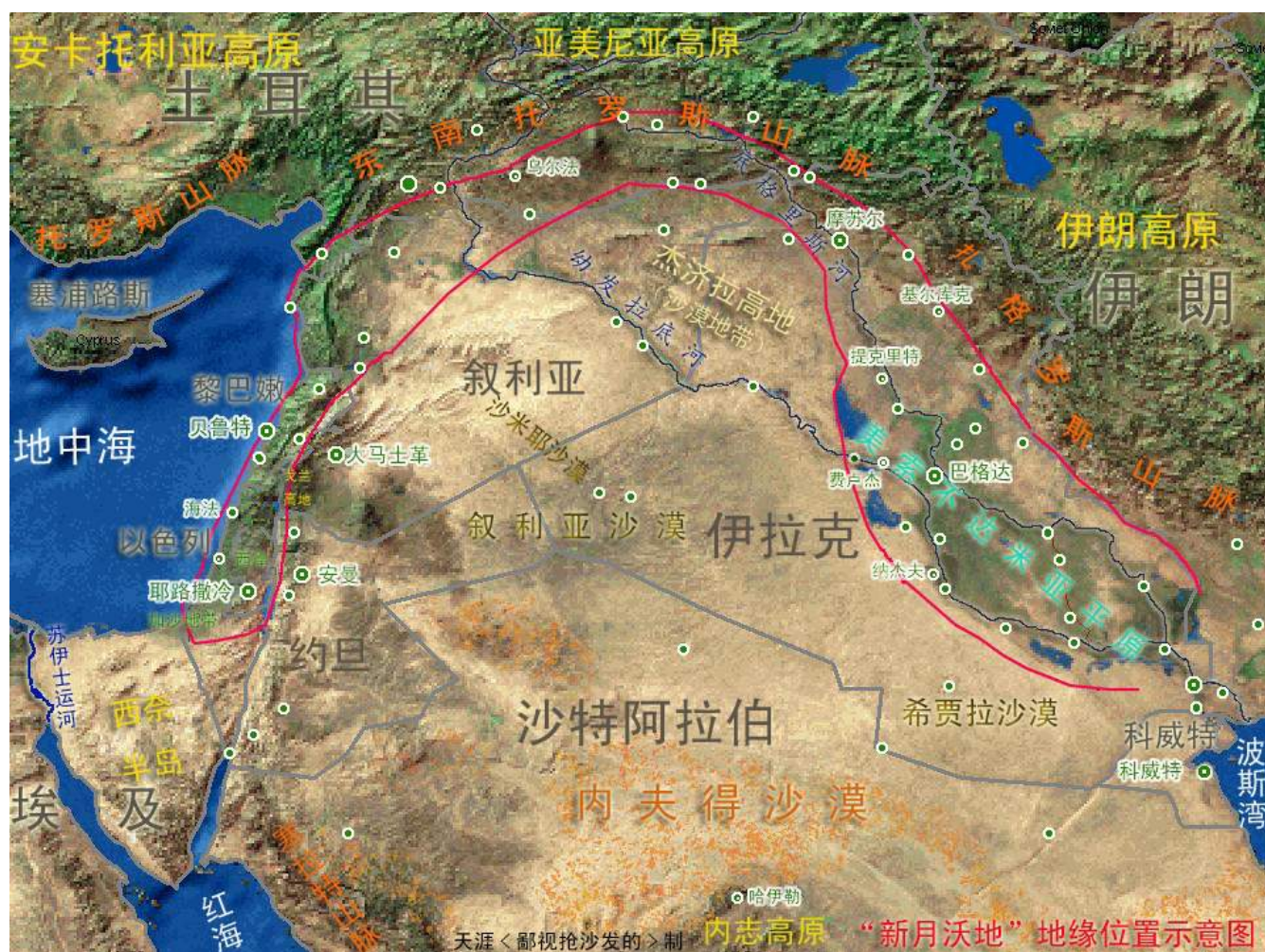
第三节 两河流域的三级阶梯结构

有一句话，叫作“海军是钱，陆军是命”。这句话的意思延伸出来就是说，海洋是为人类获取额外利益的地方，而陆地才是安身立命的场所。所以不管波斯湾有多少利益，伊拉克人更应该关心的不是海岸线，而是陆地上靠那两条母亲河所滋养的土地的状况（更何况伊拉克的油，大部分其实是在陆地上的）。现实也的确如此，在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后，伊拉克内部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拨开宗教和民主制度的迷雾，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地缘背景。

经常有人跟我说，这个世界是由“人”组成的，你的“地缘”观点，是片面的地理决定论，是本末倒置。其实“地缘”的概念里，包含的不仅仅是地理环境这些物理背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受这些客观环境影响所形成了种族、民族、文化（包括宗教）等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的要素，都是地缘解读的基础。这些地缘要素也不是不能改变，比如当年困守于东欧平原的俄国人，为了和欧洲人一样通过海洋获取利益，不断的为了出海口而努力。以至于现在，没有人会只把它当成一个大陆国家了。

问题是这种改变是需要过程的。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种改变的结果，并反过来成为一个参考要素。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更多的是通过地缘分析，分析出博弈各方的优势和不足。有能力作为这个族群和国家的代表，出现在决策层的话，不妨以此为基础制定战略和战术。即使在你有生之年不能看到成果，后世的评价也不会差。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要是像现在某些地方执政者那样，不管自身地缘条件如何，一味好大喜功的树起“国际大都市”的大旗来，就不止是事倍功半的问题了。

回到两河流域的问题上来。基于现在的世界已经被无缝切割为一个个国家。所以在解读时政之时，大家一般都习惯以“国家”为单位充当地缘博弈舞台上的主角了。按照这个思路，伊拉克这个热点国家首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从地理结构上来看，两河中下游地区大部分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最重要的下游“两河平原”，几乎全部归属于伊拉克。所以如果伊拉克像埃及人自认为尼罗河文明的继承者那样，认定自己的国家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也说得过去。虽然他们对此，未必有一些东亚国家那样感兴趣。



新月沃地地缘位置示意图

当我们把范围圈定在伊拉克境内时，我们首先来看看伊拉克的地理结构。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整个阿拉伯半岛是个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结构。但具体到两河流域情况来看，它的三级阶梯结构更应该是由北向南，由亚美尼亚高原，向波斯湾方向渐变的。也就是说，这个三级结构的第一级在亚美尼亚高原上，对应的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地区；第二级，是介于高原和下游平原之间的高地。绝大部分发源于高原的河流，在流到沿海地区扩张出冲积平原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渡区的。而两河流域中间这片高地的核心，跨越了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境，名叫“杰济拉高地”。如果不看海拔，单看它的土地状况，你也可

以叫它“杰济拉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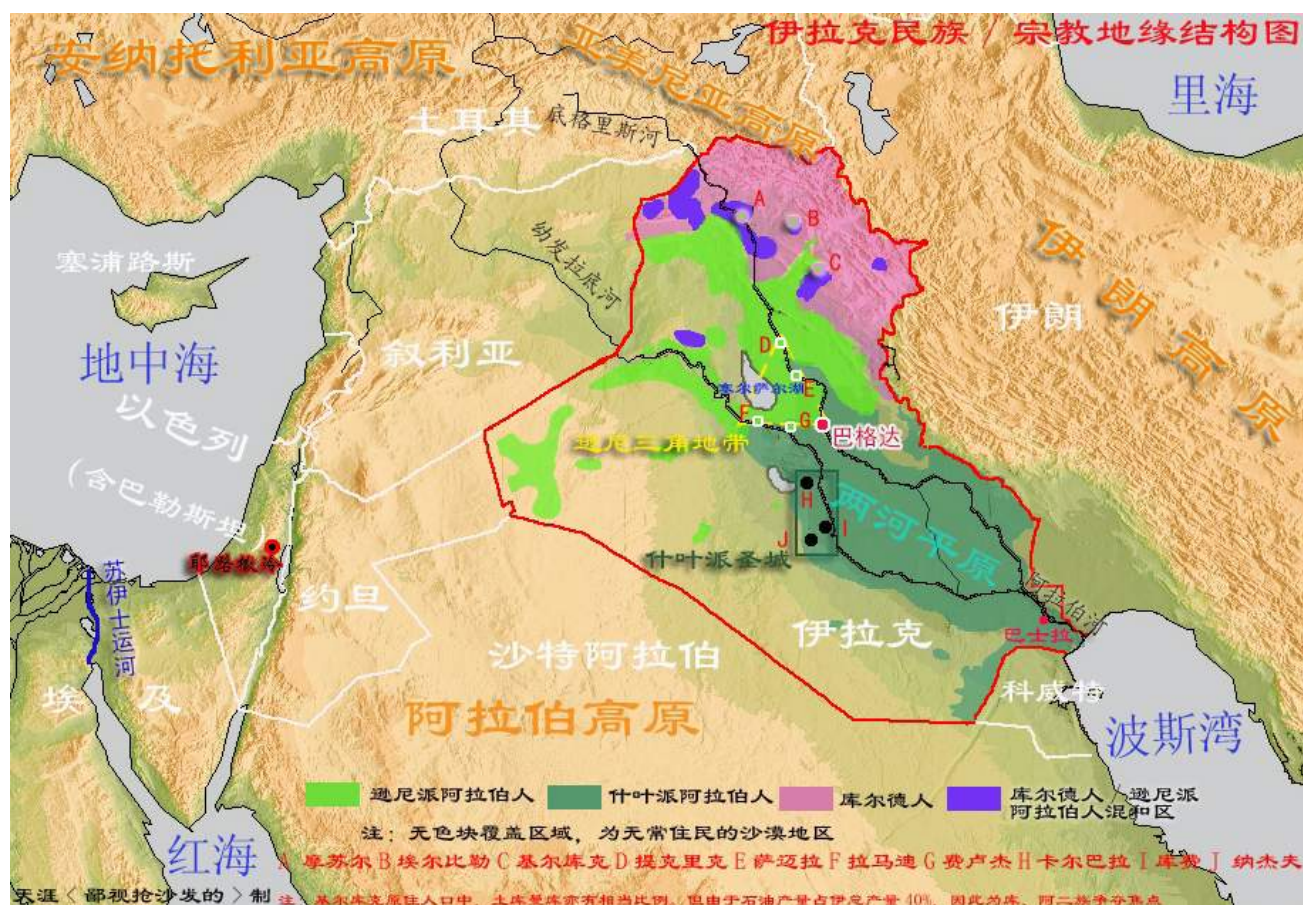
最后一级，也就是第三级，自然是我们的重点“两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我们观察两河的相邻关系，会发现它们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靠得很近。以至于其整体形象，呈一个侧卧的“8”字形。不过两河平原与中游高地的切割点，并不在巴格达，而是要更靠西北方向。在两河流淌到巴格达一带之前（城市是跨底格里斯河而建的），有部分河水会溢入一个巨大的盆地，并形成一个大型湖泊——塞尔萨尔湖。而这个位于“8”字形结构上夹角的大湖，则是中游高地与下游冲积平原的分割点。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来解读两河流域的地理结构，当然不是在跟大家上地理课。这些地缘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人”这个概念（这个“人”，不是指个人，而是族群、社会）体现出地缘价值来的。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伊拉克的族群结构和我们现在所分析的地理结构，有多深的联系了。

第八章 伊拉克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结构

第一节 伊拉克各民族和教派分布情况

如果要为伊拉克那三千多万人划定成分的话，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库尔德人（基本都是逊尼派）。这种划分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奇怪，因为标准并不统一。特别是把宗教作为划定族属的标准，让我们这些在无神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感到不可理解。但在有神论的国家，宗教信仰却是划分阵营的重要标准。就像我们当年看波黑内战一样，其中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概念了。而第三方“穆族”和另外二族的区别，就在于宗教信仰了。



伊拉克民族宗教地缘结构图

标准是一种还是两种都不重要了，无非是在相互身份认定时，会在民族和宗教两项之间变化罢了。一个库尔德人遇到一个阿拉伯人，他首先想到的会是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是教派。而一个阿拉伯人，遇到另一个阿拉伯人时，他更感兴趣的会是对方的教派。说起教派这东西来，别说我们这些教外之人，即使是身在其中的人，也很难搞清内部分多少派系。不过在求同存异的大框架之下，一般的宗教内部，第二级的主要教派数量，都是在二到三个。如广义的基督教，

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三种大类型。伊斯兰教也是如此，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两种主要类型。

从覆盖的区域来看，作为整个中东的边缘民族，绝大部分库尔德人不出意外的被排挤到了高地之上的亚美尼亚高原。在伊拉克所分割到的那部分亚美尼亚高原之上，也是库尔德人为主。至于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当然就是阿拉伯人的天下了。如果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对比来看，逊尼派无疑要强过什叶派许多（占了八成以上）。

要是以这个数据来参考的话，逊尼派阿拉伯人应该能够得到两河下游农业条件最好的平原地区。而整体呈弱势的什叶派，能够聚居的区域就只能是条件较差的中游高地了。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成功的占据了巴格达以南的下游平原，人口也因此占了三族总数的60%。至于逊尼派阿拉伯人，则主要分部在中游地区。

第二节 早期伊斯兰教内部权力之争导致什叶派的产生

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了解伊斯兰教这两大教派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去问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他一定会跟你说出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人名和宗教名词来，直到把我们的脑袋彻底搅成一堆浆糊。很显然，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讨论宗教问题。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它们分裂的背景，以及造成现在这种分布状况的最初原因就可以了。

其实当我们不把着眼点放在宗教本身，而是放在“人”上面时，就会发现，宗教派系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组织分裂，本质是一样的，所涉及的都是权力之争。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权力争斗。总是会有人对权力分配的状况，产生不满的。所以派系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在穆罕默德离世之后，他所创立的这个政教合一的组织，仍然还是依照原始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来推选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哈里发。分歧产生在第三代哈里发被刺杀之后，在竞争中获胜的一方叫作“穆阿维叶”，而落败的另一方，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注意，我没写错，这种情况在部落文化区域是很正常的），并不甘心失败，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权力之争而引发战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问题就在于穆阿维叶在获胜之后，决定把阿拉伯世界推进到王朝时代。也就是将哈里发一职，在自己的后代中世袭下去，并由此而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王朝“倭马亚王朝”。对中国历史熟悉的人，这一幕应该并不陌生。因为伟大的治水专家——禹，当年也是这样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维系权力核心的方法，几

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它缩小了继承人的范围，避免了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演变成一场纯粹实力对角。如果穆罕默德离世的时候，有时间留下遗嘱的话，也许他已经把哈里发诞生的范围，圈定在自己的血亲之中了。

阿拉伯世界这场最高权力之争，直接导致了什叶派的诞生（也叫“阿里派”）。由于阿里与穆罕默德存在复杂的亲缘关系，而在竞争中获胜的一方“穆阿维叶”和他的家族却是在穆罕默德攻克麦加之后，才加入穆斯林行列的（最初是穆罕默德的敌人）。阿里和他的后人显然在血统上更有优势。因此什叶派这方面，也充分利用了这点优势，在教义中明确提出，只有阿里的后人才能担任最高领袖。

虽然说血缘在维持权力核心稳定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限定在一个家族当中，就很难吸引那些同样渴望最高权力的政治家加入了。这也注定了什叶派会成为少数派（什叶派的意思就是少数派），并且影响到现在中东的地缘关系。

第三节 什叶派的成为少数派的原因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你想长期把政、教两权合一，并集中在一个家族手中，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做的难度之一，在于你很难在纷乱的历史过程中，将一个家族的血脉持续的保存下来。特别是这个家族拥有最高层面的权力时，会不可避免的成为众矢之的；另一个困难在于，最高权力总是让人馋涎欲滴，那些在竞争后拥有最大实力，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政治家，很少有不对最高权力动心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出世俗的权力，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精神领袖。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体系。如果历代天皇都坚持要自己执掌政权的话，那么将军们早就会耐不住性子，打破这个神话自己上位了。就什叶派的情况来看，坚持将阿里和他的后人作为最高宗教领袖，并同时掌握政治权力是这个派系存在的基础。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法找到真正的阿里传人来延续政教合一的传统。什叶派也认为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有权监视政权的管理者，甚至直接干预、接手最高政权（要是了解中世纪的罗马教庭是如何影响欧洲政治进程的，就不难明白这种关系了。现在的伊朗，也正是这种教权高于政权的体现）。

有鉴于此，什叶派的坚持自然不会受到那些政治家们的青睐了。对于他们来说，宗教是用来帮助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限定自己权力的枷锁。如果自己的权力随时会受到宗教势力挑战的话（最可怕的是，某一个宗教人士自称是阿里的后人，而号召什叶派民众推翻政权），那么后来那些穆斯林帝国的建立者们，更愿意选择对最高权力者出身要求更为宽松，并且认为伊斯兰教中并

不存在最高领袖的“逊尼派”教义（突厥系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同样可以得到哈里发的名号）。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很自然的也就影响了两派的覆盖范围。以至于逊尼派现在成为了正统派。

由于什叶派不受到执政的政治家们的青睐，所以作为天生的宗教少数派，他们往往更受到反对派政治家的青睐，并借助他们的力量上位。只是当反对派成为执政者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力受到宗教权力的挑战，可怜的什叶派信徒们，又重新成为了受压制对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四节 什叶派在两河下游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即什叶派为什么能够占据最为肥美的两河下游地区。这是因为，最初在第三任哈里发遇刺之后，阿里凭借与穆罕默德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最早的信徒，也是最有力的执行者），得到了第四代哈里发的位置（做了五年），而他在上任之后，所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迁都。

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最初之所以将塞拉特山作为地缘核心，是因为阿拉伯半岛上最有地缘潜力的“新月沃地”，当时还是欧洲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竞争的区域。阿拉伯人只能在二者都看不上眼的塞拉特山地和汉志高原发展。当阿拉伯人凭借伊斯兰教所集中和激发的强大力量，击败了上述两个竞争者之后，再想以地缘潜力有限的阿拉伯半岛西部地区为地缘核心，控制西到北非，东到波斯高原的庞大帝国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在阿里得到最高权力之后，选择了将地缘重心放到经济、文化都更为发达的两河平原，并迁都幼发拉底河右岸的“库费”。这项决定，很自然的让阿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在两河平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而阿里和他的继承者（以及重要的支持者），最终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库费、卡尔巴拉、纳杰夫三地死于对手之手，更让这几座城市成为了什叶派的圣地。而什叶派的信徒们也因此在两河流域寻找到了支点。

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解读什叶派的产生过程，并非是为了探讨宗教问题。诚如我一开始说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类社会总是会存在派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当年没有什叶派的出现，也会有其他理由出现内部分裂的。问题的根结在于，即使是到了现在，伊斯兰教对于世俗生活包括政权的影响，在穆斯林世界依然是十分强大的。所以如果不对目前伊斯兰教的主要教派的产生过程及特点，做个简单解读的话，我们在观察中东局势时，就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影响中东局势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实并非是因为它的教义有多大竞争力。事实上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由于过于强调宗教权力，什叶派本身并不受到执政者的青睐（也就是说宗教领袖，可以凌驾于世俗社会领导者之上）。如果不是波斯人加入了什叶派阵营的话，什叶派本身是没什么机会成为政治博弈主角的。波斯人之所以选择什叶派，是因为他们在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也沦为了中东的少数派。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对文化入侵者的接受度，和它本身的文明程度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文明程度较之更低的话，那么全盘接受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而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你就一定会想办法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的现实中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由于两河下游平原与阿拉伯半岛及两河中游地区之间存在着大片沙漠相隔，因此山水相连的伊朗高原和两河下游平原，其实更有机会结合成一个紧密联盟。也正是由于有了伊朗高原这个防御性很强的板块作为什叶派的后盾，作为什叶派发源地的两河下游平原，才有可能成为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根基之地。而从波斯人自身的利益来说，通过各种手段支持什叶派在两河下游平原的优势地位，也是他们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反渗透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 伊拉克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劣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伊拉克都是一个纠结的国家。按照我们平常的经验来看，一个人如果纠结的话，是因为他所面临的情况有些复杂。伊拉克也是如此，复杂的地缘结构，敏感的地缘位置，让这个国家看似存在很多机会，但无论如何选择却都存在掣肘。所以要了解伊拉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必要来总结一下，这个国家究竟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让它的命运如此变幻无常。

让我们先来看看优势面，谈到这方面，伊拉克人的确有很多向世人炫耀的本钱。讲历史的话，自苏美尔人率先在两河流域开创世界文明的曙光以来，伊拉克这片土地，就一直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当然，自认文明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可以对此嗤之以鼻，说现在的阿拉伯人和之前那些文明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不过这并不妨碍伊拉克人为能够生活在这片土地而自豪。更为重要的是，那两条大河仍然在奔涌，为伊拉克人维系着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农业区。这一点，在干旱少水的阿拉伯世界尤为重要。

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包括土耳其、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能够在冲积平原的体量上和两河平原相媲美的，也就只有尼罗河下游了（主要是尼罗河三角洲）。基于这个共同的优势，埃及和伊拉克都曾经是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的有力争夺

者。除此之外，唯一能够参与这样竞争的，似乎只有拥有阿拉伯人祖地、圣城的沙特阿拉伯了。虽然沙特人没有大片的冲积平原支持他们的农业基础。但从目前来看，沙特人在波斯湾一线的石油足以弥补这个劣势。以油换水的海水淡化技术，让沙特这个没有大块绿洲的国家，也能够承载到 2600 万的人口（目前伊拉克约 3500 万），从而在人口基数上具备基本的竞争力（在阿拉伯世界）。不过沙特人因为石油资源而获得的战略优势，虽然可以在埃及人面前骄傲一把。但在同样是波斯湾国家的伊拉克人面前，却没有太大比较优势。

也许是上天太垂青伊拉克了，相比埃及的有水少油；沙特的有油无水。既有水又有油，北面有点山（亚美尼亚高原），南边还靠点海（波斯湾）的伊拉克人，看似有足够的本钱来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位置。当年把中东政局搅得天翻地覆的萨达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本钱，才敢以整合阿拉伯世界为己任（萨达姆所组建的政治组织，就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中东横行了那么多年。不过萨达姆的下场和伊拉克的现状大家也都看到了。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局面，就不得不再说说伊拉克的地缘劣势了。

首先伊拉克的国内宗教、民族结构，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复杂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大家都是穆斯林，但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相信已经没有人认为天下穆斯林真的是一家了。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足以让企图影响、控制伊拉克的外部势力，找到切入点。其次，以伊拉克的地缘位置来说，即使没有石油引来大国博弈，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地区性强国，也注定不会让伊拉克安宁的。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控制了两河源头的土耳其人，有机会用水来制约伊拉克的崛起；而什叶派已经成功上位的伊朗，则更愿意利用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和两河下游平原上的什叶派阿拉伯人结成同盟。

当然，时下让伊拉克人遭受磨难的直接原因，还是它那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石油储量。能够掌握世界 10% 的石油资源，固然可以增强伊拉克上位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底气。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国眼中，你有油没有问题，但有油又不听话，就有罪了。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之下，虽然并不能说谁在政治上关注伊拉克就是想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一切还是要以商业规则为基础的）。但谁也不想自己的资源供给，被一个有霸权倾向的国家所控制。即使这个国家所图谋的只是地区霸权。对于大国们来说，谈判对手越弱，对自己的利益越有利。所以当萨达姆准备吞并另一个同样拥有世界 10% 左右石油资源的国家“科威特”，并借此来实现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时，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对于置身于地区之外的大国来说，伊拉克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本身，并不会对他们的决策有掣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想利用这些矛盾来

影响、控制伊拉克的话，每一派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反过来，这些今天的盟友，也很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这一点，土耳其人和伊朗人就做不到了。最起码土耳其人是绝不可能去拉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作盟友；伊朗人也不会把宝压在逊尼派身上。更为重要的是，两国与伊拉克的这些微妙关系，反过来又有可能被美国人所利用，达到左右平衡整个中东政局的目的。当我们从地缘的角度去全新解读萨达姆的命运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第六节 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说到萨达姆，相信最起码在国观上，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这位伊拉克“前总统”。如果阿拉伯世界，包括整个中东在内，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外力干扰的世界的话，那么萨达姆可能现在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问题是以伊拉克的地缘位置和它那丰富的石油储量，注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是不可能由自己来掌控的。正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的霸权仍然还是在美国手中。而对中东事务干涉最多的，也就是美国。就伊拉克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并不是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准备挟持更多的石油资源，以实现他“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时，才开始介入的。事实上，和N多反美战士一样，萨达姆当初也曾经是美国的亲密战友。

当一个国家试图政治介入一个地区时，有一个“少数派原则”一直被利用。即在大部分时候，你会倾向于支持这个区域中势力比较弱小的一方，以牵制力量更为强大的一方。这并不代表实施这项策略的政治家，人性有多少的高尚，愿意扶贫济危，而是为了让该区域达到平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反过来背离自己。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让美国人在中东选择盟友的话，孤独的波斯人会是最好的选择。经常有人问我，美国最想灭掉的是不是伊朗。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从政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确是非常想解决掉伊朗现在的政治体系；但如果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东的地缘利益来说，伊朗这个国家却是美国所需要的，也是很有可能结成亲密联盟的。

事实上，在伊朗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后，美国曾经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像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一样，伊朗在建国之后，也经历过君主制阶段。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君主制无疑是过去式的政治体制。但对于这片“封建思想”浓厚的土地来说，能够将权力集中使用的君主制，在国家建立阶段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在一个国家趋于稳定之后，君主们往往就要面对自下而上，要求分享权力的声音和压力了。能够搞得掂的，目前还能够维持（向下分权是一种方法；国家拥有高额的财富，并让国民享受到一定利益，也是缓

和下层政治需求的一种方式)；而搞不掂的，君主们就只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像伊拉克和伊朗，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为波斯人建立现代国家的王朝，叫作“巴列维王朝”(1925——1979)。在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陷入冷战格局的时候，伊朗人选择了站到美国一边。当时伊朗的政治和文化的西化程度，并不亚于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你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相比于现在黑色调的，宗教化的伊朗，你将会看到一个和当时西方生活方式无异的，完全开放的伊朗。这段曾经的世俗化生活，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伊朗现在的文化。虽然在现在的伊朗，女性仍然必须戴头巾才能上街，但最起码色男们有机会，看到波斯女人那精致的面容了。

对于冷战初期的美、苏来说，并不能对冷战本身有太多的计划。大家都是在尽量的争取更多的盟友，并且极力避免自己在某一地区出现真空。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之所以选择加入西方阵营，是因为对俄国人的恐惧。基于俄国人长久以来对印度洋的渴望，伊朗在北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地缘压力。而出于同样的地缘因素，美国人也曾经对中国加入自己的阵营寄予厚望。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和内部博弈的问题，选择和自己那危险的邻居结盟罢了。

第七节 伊拉克退出美国在中东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在那个时候，伊朗并非是美国在中东穆斯林世界争取到的唯一盟友。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美国曾经在中东一带组织起了一个在地缘结构上看似十分完美的联盟。在伊朗加入之前(1955年)，这个联盟包括本来就已经在脱亚入欧，又在地缘上与俄国人存在直接矛盾的土耳其；对印度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并和社会主义阵营打得火热，心存恐惧的巴基斯坦。至于伊拉克人，则是出于对埃及人的不满，才决定加入的。

之前我们说过了，在竞争阿拉伯世界领袖这个问题上，伊拉克和埃及是两个竞争对手。而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独立之后，能够通过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来提升自己实力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旗手。由于之前阿拉伯世界是属于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埃及在选择冷战阵营时，很自然的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结盟原则，选择了俄国人作靠山。而出于同样的理由，还是一个君主国家的伊拉克，则倒向了西方。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上中东、南亚之前的宗主国“英国”，构成这个军事联盟的主要成员。

这样一个地理上相连，地缘属性丰富(各种类型的穆斯林国家都有代表)类型的军事联盟，表面上应该可以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亲密战友。但实际上，这

种出于不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是这些国家并不像西方那样和俄国人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最先出现问题的是伊拉，相比竞争阿拉伯世界领导权这个理由，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矛盾要显得更为突出。而这样一个基本矛盾是非常容易被政治上的反对派所利用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矛盾也依旧没有得到缓和的迹象。就像利比亚的反对派一方面希望得到北约的支持，以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和西方走得太近了，会引起基本面的反弹。所以最终的妥协结果，就是希望北约提供空中打击（包括地下管道的支援），但要有地面部队踏进利比亚的国土。

至于这种既想吃鱼，又不想沾腥的做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看下去。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国内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了“共和国”（1958年7月）。失去了伊拉克的亲西方联盟，也不得不把总部迁到土耳其，并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站在和西方帝国主义对抗的“民族大义”立场上，伊拉克这些革命同志似乎应该选择和埃及人站在同一阵线上，以共同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与强盛。而埃及人也的确很看好这一点，在它联合了叙利亚，为阿拉伯世界量身定作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家组织之后（1958年1月），已经在国家框架内为伊拉克留下了位置。

在当时领导阿拉伯复兴的埃及人看来，尼罗河下游加上新月沃地所构成的这条“n”形地带，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富庶的土地。如果这上面的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包括赶走卡在中间的犹太人），就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核心，并拥有和外部势力对抗的资本。虽然埃及人信心满满，但我们也分析过了，拥有两河之利的伊拉克人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也有机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相比伊拉克，埃及所拥有的地缘优势主要有二，一是地理上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二是有苏伊士运河这条世界级影响力的航道。至于伊拉克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地下的石油同样也能让自己拥有影响世界的能力。

因此革命之后的伊拉克虽然撇清了和基督徒们的关系，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复兴事业的一份子，但却始终没有做大自己的想法。为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伊拉克的新兴政治家们并不介意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利用”西方。而最终促成这一切的，正是伊拉克的邻居“伊朗”。

第九章 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的地缘矛盾

第一节 伊朗宗教势力发动革命上台并和西方反目

在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中，基于原始的宗教仇恨都有可能爆发反对西方的革命，并建立反美、反西方的政权。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人也知道，将中东整体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是不现实的。他们更愿意利用这一地区的国家间种种地缘矛盾平衡各方的势力，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伊朗的政权愿意和西方结盟，那么会是美国在中东最为合适的代理人。这不仅是因为伊朗的地缘位置居于突厥、阿拉伯、南亚系穆斯林之间，更是因为伊朗在地缘上的孤独感，非常符合平衡地区实力的“少数派原则”。

如果让美国在中东选择一个盟友的话，当然，土耳其人也是一种选择，最起码他们已经决心脱亚入欧，彻底的倒向基督教世界了。但就地缘位置来看，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却显得有些边缘。即使是它一直渴望施加影响力的中亚突厥兄弟们，对它来说也是鞭长莫及（重要的是没有直接接壤）。更何况如果要在内部划分阵营的话，土耳其人要做的是欧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很难单独和土耳其人结盟。相比之下，和欧洲没有地理相接，而海岸线又在印度洋的伊朗，会更有机会成为美国的单线盟友。

前面我们也分析了，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在中东寻找盟友，他们都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宗教文化上的矛盾。这个矛盾足以在任何时候，让某个亲西方的穆斯林国家的反对派找到借口。在这一点上，革命成功并退出亲西方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伊拉克，并不是做得最极端的。很快，伊朗人就用一场宗教革命（1979年）结束了伊朗的君主制政体。这场革命所建立的伊朗政治体系，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尽管美国和西方世界从来就不认为这些穆斯林国家，是一个符合“普世”标准的国家。但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还是宁愿和那些在政权上实行君主制（包括类似独裁统治的所谓“总统”）的国家打交道。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家能够淡化宗教势力的影响，以更务实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但如果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那么意识形态问题就会随时阻碍政治家们，以利益为基本点做出务实的决定了。在这一点上，曾经认为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中国，同样有着深刻的教训。

伊朗的这场革命，就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类型，即宗教势力控制了最高权力。这场以宗教名义发起的革命，使得我们能够在时政新闻里，时常听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样的字眼（上一代，即领导革命的是“霍梅尼”）。

很多时候，这个“最高领袖”之间，还会镶上“宗教”或者“精神”二字。但其实最终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因为现在的伊，宗教权力是置于政权权力之上的。如果最高宗教领袖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兼任总统一职。事实上，即使是在阿拉伯世界，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也很难出现了。伊朗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它的宗教基本面是属于什叶派。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最大的区别包括形成背景，我们也分析过了。对于教权和政权的态，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什叶派总是作为天生的反对派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那认可教权在政权之上的教义，很难被政治家所接受。所以伊朗现在所搭建起来的政治体系，即使是在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来看，也属异类。包括境内拥有两大圣地的沙特阿拉伯，也不愿意利用自己在伊斯兰教中的特殊地位，来影响自己的政权组织结构，进而向外扩张影响力。问题是，不管怎么样，孤独的伊朗现在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以什叶派大本营的软实力，作为保护自己独立性和向外扩张影响力的武器。

不管波斯人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意味着它必须和西方进行完全的割裂了。而在冷战时期，如果你选择脱离了西方阵营，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投向俄国人的怀抱中。除非你的体量大到可以像印度那样，从双方获得好处；亦或像中国那样，两边都不靠。美国人可以不关心那些穆斯林们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但绝对无法容忍波斯高原这样重要的板块，被俄国人所控制。

基于地缘平衡的原则，美国人马上需要做的就是伊朗的邻居中，选择一个可以与之抗衡的国家作为扶植对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拉克又重新成为了美国人在中东的代理人。而具体扶植的政治家，就是后来拥有“大杀器”，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萨达姆。

第二节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合流成阿拉伯河

在伊拉克推翻君主制，决定和它的阿拉伯兄弟们捆在一起时，整个中东的焦点已经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一线了。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世界最肥沃的这个“n”形地带一分为二。从地理结构上，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梦想。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东端国家，伊拉克却要比它的阿拉伯兄弟们，承受更大的地缘压力。而当时作为西方盟友的伊朗，就是给伊拉克施压的主要国家。

两个相邻的国家总是会有更多的地缘矛盾。这种矛盾很多时候又体现在对边界的认定上，伊拉克和伊朗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地图放大的话，会发现经

过漫长的岁月后，在文明诞生之初还是两条平行河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注入波斯湾之前已经合二为一了。这当然不是说，两河原始的运行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冲积平原向波斯湾的延伸，让两河最终在新诞生的平原上合体成功了。从时间上看，这条由两河交汇而成的新河流，诞生于阿拉伯人成为两河平原的主人之前（估计在公元前后）。但自从阿拉伯人占据这块土地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

这么长的历史，足以让“阿拉伯河”成为这段河流的地理名称。也许有一天，波斯湾会完全淤积成两河平原的一部分。到时候，阿拉伯河的长度就足以盖过两河的风头，成为整个水系的代言人了。不过人类的活动显然会延缓这个进程。两河两岸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越来越“进步”的生活方式，使得能够流入阿拉伯河的河水已经很少了（只够两岸5公里纵深的土地使用，再远就沙漠化了）。相应的，能带入波斯湾的泥沙也比上古时期少得多了。虽然西北风倒是把不少沙土刮到海湾里去，不过这也无非是帮沙漠扩张面积罢了。另一个后果就是，缺少淡水补给的波斯湾，海水的盐度比印度洋要高。如果波斯湾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海湾，估计就又是一个死海了。

当然，所讨论的这些环境问题，估计暂时还不会得到政治家们的关注。对于他们来说，波斯湾那丰富的石油才是最值得关注的。而对于两伊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阿拉伯河的划界问题。正如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样，阿拉伯河下游约100公里是两伊的界河（全长约190公里）。

按照一般的原则，以界河中间的主航道为最终分割线，是确定国界的基本原则。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两伊战争的导火索。比较悲剧的是，谁能够占据上风，并非取决于双方的实力，而是由万里之外的美国人所主导的。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节 卡伦河和阿拉伯河合流对伊朗的影响

在由两河汇集而成的阿拉伯河即将注入波斯湾的时候，它接受了由伊朗高原上流下来的最后一条支流“卡伦河”。这条伊朗境内最长的河流，也是伊朗唯一可以通航的河流。它的下游流域，组成了伊朗境内波斯湾沿岸平原的核心区域。如果当年波斯人没有成功控制卡伦河的话，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分界线，就很有可能是伊朗南部高原的山脉了。

从地缘渗透的角度来看，卡伦河950公里的河道，有将近700公里是蜿蜒曲折于伊朗高原之上的。所以波斯人凭借其在两河中上游的地理优势，顺河而下控制卡伦河下游地区也属正常。如果单纯的就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的地缘

关系来说，波斯人其实是很有机会占据整个两河平原的。事实上波斯人在强盛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做到这点（巴格达这个名字，就是波斯语）。只不过两河平原本身太过重要，无论是在波斯人之后建立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还是后来的英国人，在试图控制阿拉伯半岛时，都会将重心放之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孤独的波斯人也就只能在保有高原核心区的基础上，多少从高原周边的平原地区中切割下一点与高原地理关系紧密的区域了。

单从地理关系而言，波斯人其实倒也可以和阿拉伯人划清界限的。因为虽然现在卡伦河已经成为了阿拉伯河最后的支流，但在波斯人踏上这块土地之时，卡伦河还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包括卡伦河流域和阿拉伯河入海口附近的土地，就是由卡伦河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就卡伦河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关系来说，有点类似于珠江三角洲，东江与已经合流了的西、北两江之间的关系。看似联系紧密，却又可以独立自成系统。分析卡伦河与阿拉伯河之间的渊源，当然不是在上地理课。我们的主题是“地缘”，只有这些地理因素对“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才会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地缘结构时，东江的独立性在行政格局上的最终表现，可能是诞生一个香港、深圳、东莞、惠州所组成的城市圈。而卡伦河和阿拉伯河之间的关系演变，影响的就是两个国家，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了。

在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成为阿拉伯人的宗主国时，他们并没有像阿拉伯帝国那样，有机会将伊朗高原纳入帝国的版图。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小亚细亚半岛的地理位置，让突厥人不得不把地缘重心放在西线，和欧洲人进行地缘博弈。当然，帝国时代的土耳其人和欧洲进行的将近 600 年的博弈（14 世纪至 20 世纪初），也给土耳其在中东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见证了欧洲整个崛起过程的突厥人，有机会从欧洲人那里吸收到更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来扩张他们在亚洲的版图，并将阿拉伯人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两河平原现在的行政格局基础，也是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人博弈之下形成的。在突厥人崛起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整个两河地区以及阿拉伯河两岸。而整体上处于劣势的波斯人，则保住了与高原关系紧密的卡伦河流域。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个平衡的结构。突厥人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那部分亚美尼亚高原，沿两河——阿拉伯河两岸，不出境的走到波斯湾；而波斯人也可以沿卡伦河两岸，布设伊朗高原与波斯湾之间的水陆通道。这种平衡，直到有一天波斯人突然发现，卡伦河成了阿拉伯河的支流。自己沿河出海的船只，不得不借道阿拉伯河才能进入波斯湾。

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卡伦河——阿拉伯河交汇处的东南侧，有几条与卡伦河相连，直入波斯湾的河床。这几条河道就是当年卡伦河在不同时期

的入海河道。由于卡伦河从伊朗高原上面冲刷下来的泥沙量较大，卡伦河在下游平原地区的运行轨迹，也有点像在华北平原上的黄河一样经常改道。当一条入海河道的河床淤高后，奔腾的洪水就会冲刷出另一条河道来（这其实就是一个造陆的过程了）。当然，这些河道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有可能同时存在，只是不同的时期轮流充当干流罢了。在卡伦河的这种变化当中，终于有一天它对接上了阿拉伯河，和阿拉伯河共用了一个出海口。而从水系的角度看，卡伦河也成为了阿拉伯河的一条支流。



两伊边境问题示意图

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合体的过程中，人类活动起到了加速作用。观察两河交汇之处，我们会看到在阿拉伯河的东侧，有一座伊朗城市叫作“霍拉姆沙赫尔”。大约是在一千年前，整个波斯高原和阿拉伯半岛是处在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当中（阶段是波斯化的“黑衣大食”时期），为了打通两河平原与波斯高原的水陆通道，阿拉伯人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接近相交的“霍拉姆沙赫尔”挖通了运河，正式将两大水系打通。这样的话，最起码从阿拉伯河中游核心城市“巴士拉”，一直到卡伦河下游核心城市“阿瓦士”之间，就可以通航了（阿瓦士以北的低海拔地区，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也有一定的通航条件）。这对于帝国控制波斯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只是一条连接通道罢了。

卡伦河的主要水流，还是固执的在阿拉伯河东侧，独立的流入大海。

虽然在最初的时候，连接卡伦河——阿拉伯河的运河只是航运的一个选项；但到了 19 世纪末，波斯人发现卡伦河原有的河道已经逐渐干涸，而他们如果再想航运出海的话，就不得不和阿拉伯人共用同一条河流——阿拉伯河了。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看，两河合体的日子总是会到来的。只不过最初这种基于地缘政治改变水系原貌的做法，无疑加速了这个进程。并最终仍然在地缘政治上，体现出了它的影响力。

第四节 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的划界

既然阿拉伯河对于伊朗人来说，有了现实的地缘意义，那么波斯人和当时控制两河流域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博弈也就再所难免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锋，波斯人终于在 1847 年，通过和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埃尔祖母条约》，获得了阿拉伯河的通行权；并合法的控制了卡伦河口以南的阿拉伯河东岸土地。而在随后的历史中，波斯人借着土耳其人疲于应对欧洲战事，以及伊拉克独立的机会，分别于 1913 年和 1937 年为自己在阿拉伯河东岸的港口城市：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争取到了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根据协议，这两个城市所对应的河道，国境线遵循主航道原则（否则伊朗的船就算靠了岸，也还是在邻国的国土上）。

上述突破，显然还是不能让波斯人满意。因为航道仍然在伊拉克人的手中，伊朗仍需付费才能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波斯湾的石油得到开发，伊朗需要由阿拉伯河的阿巴丹港运油出海的情况下。所以，只要卡伦河口以下的阿拉伯河不能以主航道为国境线，两伊之间就达不成地缘平衡，而战争也就很难避免了。现在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伊朗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卡伦河口以北，两伊的国境线是沿着阿拉伯河东岸而走的。也就是说，北段阿拉伯河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伊拉克；而在霍拉姆沙赫尔以南（包括城市对应的阿拉伯河）直至波斯湾，国境线则遵循的是“主航道原则”。

伊朗人获得这个突破的机遇是在 1975 年。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脱离“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阿拉伯兄弟一起对抗西方的伊拉克，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不得不处在和西方对抗的前沿。土耳其和伊朗两个“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则成为了美国、欧洲向伊拉克直接施压的棋子。对于当时的伊拉克来说，它必须应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在北部高原，一直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尽管从战略上来看，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不愿意看到库尔德人有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美国人一道，从战术上利用这个少数派给阿拉伯人

添乱；另一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了。为了这个三百年的梦想，伊朗人甚至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条争议河流命名为“阿尔万德河”了（就像越南和菲律宾，也热衷于在南海地区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样）。

当然，主权的争议论的不是口头上的功力。最终支撑伊朗通过 1975 年两伊《阿尔及尔协议》达到目的的，还是美国的支持。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南部放弃一条河道的部分控制权，和伊朗交好，总是好过北部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来。单从两伊现有的地缘关系来看，现在的划界方式无疑是最有利于地缘平衡的。但从历史来看，伊拉克方面无疑是觉得吃了亏的。不过很快，伊拉克人就找到了重新夺回阿拉伯河控制权的机会。因为伊朗爆发了革命（1979 年），推翻了君主制。更为重要的是，伊朗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被视为异教徒的美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和这些取得伊朗政权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继续保持同盟关系。相比之下，只是改变了政治体制，并没有让宗教势力上位的伊拉克，和美国重新达成谅解就容易得多了。

如果伊朗上台的不是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势力，也许美、伊关系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伊朗试图凭借它在宗教上的坚持，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旗帜。而伊朗最为重要的武器，就是它的地缘优势：一是足以影响国际油价的石油储备；二是因为岸线优势，而对波斯湾航线的控制力。在伊朗中断对西方石油供应，引发石油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需要在中东为伊朗寻找一个与伊朗有地缘矛盾，又有能力和意愿出头的国家。而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伊拉克身上。

第五节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影响

鉴于 4 年前不得不与伊朗签订“卖国条约”的教训，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美国左右中东的实力。既然伊朗能够凭借美国的支持，实现自己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那么同样，伊拉克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被推到了前台（1979 年），并成为美国亲密的战友。而伊朗则毫无悬念的成为了苏联的盟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看来，1980 年暴发的两伊战争，又是一场冷战中常见的代理人战争。但对于两伊来说，这其实是一场争夺中东旗手之位的战争。伊朗人强调的是自己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而伊拉克人，则从民族的角度寻求突破，把这场战争渲染为一场为阿拉伯人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民族之战。

发生在 80 年代的“两伊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比较陌生了。不过提起美国打的那场“海湾战争”，相信熟悉这段“历史”的，就是大多数了。

由于这两场战争都是在波斯湾地区发生的，所以“两伊战争”，也被称作“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者自然就是“第二次海湾战争”了。至于这两场战争之间是否有联系，我们后面就会分析到。关于两伊战争爆发的地缘背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双输”战争。伊拉克和伊朗两国，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不仅经济倒退，人员伤亡巨大，还各欠了几百亿的外债。

最为讽刺的是，尽量在战争的过程中，双方都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占据了对方的领土），并坚信自己会笑到最后，但八年战争结束后，两国的边界依旧和战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政治层面的了。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顶住了这场由“西方代理人”发起的，对其“革命”事业的攻击，保住了宗教革命的成果。更让伊朗的宗教领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是在政治孤立的状态下做到这一切的。我们前面说了，发生在冷战时期的两伊战争，也像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战争一样，有美、苏两国的介入。

不过就这样将之定义为代理人战争，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退出西方阵营的伊朗，本来应该很自然的紧靠苏联这棵大树的。只是由于双方长久以来的地缘矛盾，以及伊朗宗教革命的保守性质，波斯人并不信任俄国人。这种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考虑，既不向东，也不向西，保持孤立的态度，相信中国人并不陌生。正因为如此，俄国人在最初两年支持伊朗，却发现并不能获得预期的地缘利益后（与伊朗结盟，进而从陆路渗透中东），转而放弃表面的中立，重新支持伊拉克了。

伊朗最终没有失掉这场战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在人口、地理关系上的巨大优势。而伊拉克没有在伊朗那种被宗教狂热武装起来的“人海战术”面前反攻倒算，就要归结于国际大环境了。换句话说，伊朗所失去的，就是伊拉克所得到的。由于伊朗的孤立态度，伊拉克实际上非常难得的先后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外打着为“阿拉伯”和“逊尼派”而战旗帜的伊拉克，借此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并自认为可以挑起阿拉伯复兴的大旗了。

如果伊拉克的目的，仅仅是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性。毕竟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两伊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一个有带头大哥的地区，会比一盘散沙的局面更容易控制，前提是这个带头大哥能够受自己控制。可惜的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结构性矛盾，让这种控制变得十分不稳定。就萨达姆的抱负来说，他的终极梦想是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而这个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摆脱西方的控制。

也许有人会觉得，如果没有萨达姆的话，伊拉克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从

地缘基础来看，埃及和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综合条件最好的两个国家。在埃及尝试领导复兴阿拉伯世界失败后（怎么失败的，后面中东战争时会解读），伊拉克即使没有选择萨达姆，也会有其他政治家希望运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尝试一下做大的。比较埃及和伊拉克在地缘条件上的区别，我们会发现：埃及最大的地缘优势，在于它的境内有一条沟通两洋的“苏伊士运河”；而伊拉克最大的优势，则在于它的石油资源。如果能够控制尽量多的石油资源，那么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整个国际格局中，伊拉克和萨达姆都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为此，我们必须先来分析一下，占据这个星球 6 成左右的石油资源在波斯湾地区是如何分布的。

第十章 波斯湾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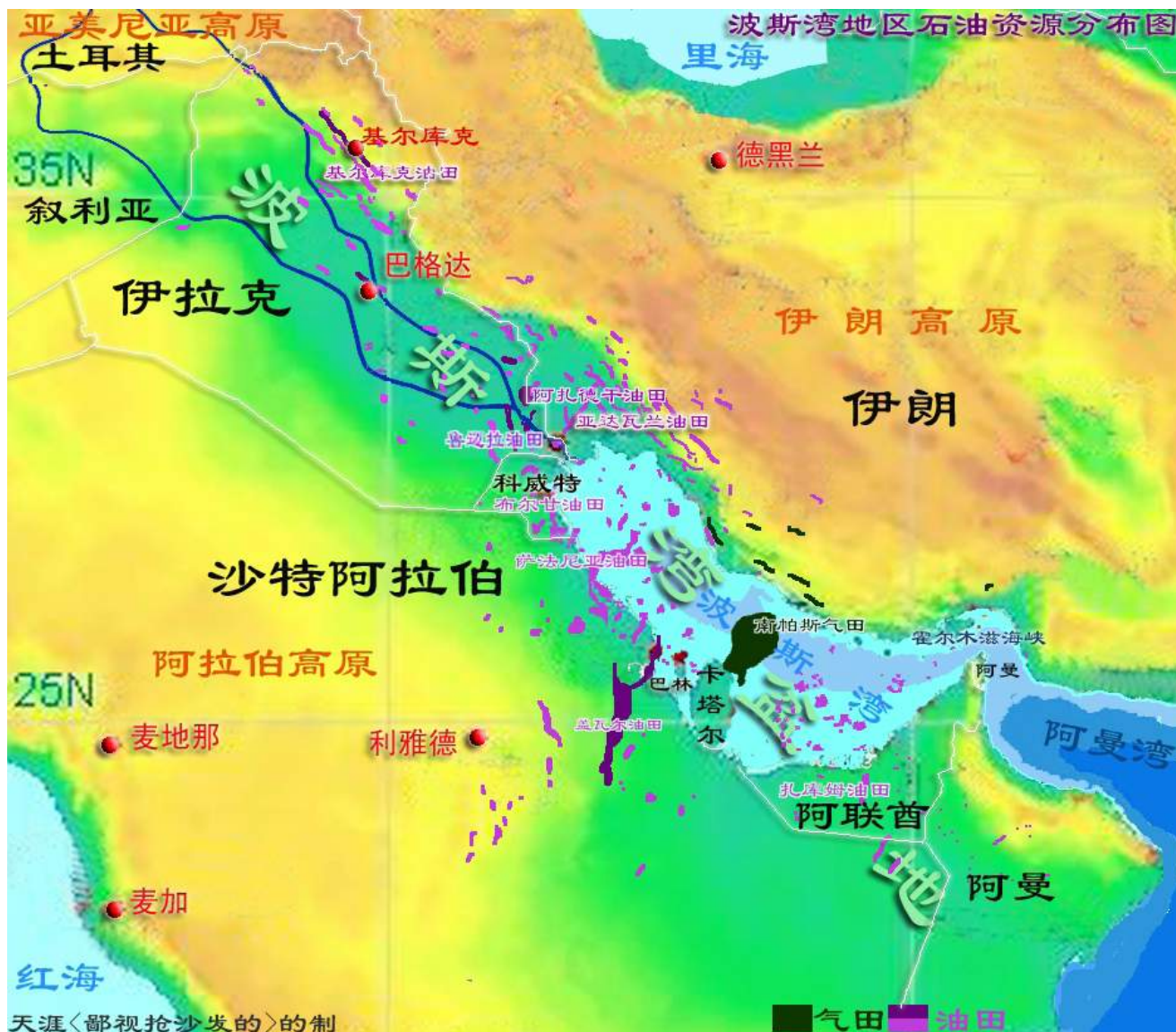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波斯湾地区石油分布的规律

波斯湾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区域，相信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这个仅仅靠一条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与外海沟通的海湾，周边一共分布着：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 8 个国家。其中除了孤独的波斯人之外，其他 7 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虽然是一以敌七，但伊朗在“波斯湾”所占据的份额，却可以和其他 7 个海湾国家平分秋色。凭借伊朗高原以及卡伦河流域的控制权，波斯人以阿拉伯河河口为界，完全控制了波斯湾的北部岸线。而在水域划分方面，与阿拉伯国家也基本采取的是中间线原则。

这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伊朗在波斯湾石油储量的瓜分上，似乎也应该有半数的份额，最起码也应该是最多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就现有的情况而言，海湾国家中可采储量最多的是“沙特阿拉伯”（2008 年数据，362 亿吨），而伊朗虽然在海湾国家中排名第二，储量却只有沙特的一半（181 亿吨）。更为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三个阿拉伯国家，石油储量也都在百亿吨以上。这使得拥有半个波斯湾的伊朗，实际份额只占到波斯湾地区总石油储量的 20% 左右。之所以会有这种“误差”产生，在于我们如何来理解“波斯湾”这个概念。

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指着是一个海水覆盖的海湾。但如果我们认为石油都是埋藏在这片浅海下面，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通常以石油资源为重要特征的地缘概念——“波斯湾”，并不仅仅包括那滩海水，更包含有部分陆地地区。对此，我们称之为“波斯湾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波斯湾地区”，所代指的是周边那八个国家。只是就其最根本和最有价值的属性来说，我们还需要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看究竟哪些区域，才是真正掌握黑金的“波斯湾地区”；沿岸诸国，又在其中各自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关于石油的来历，印象中小学“自然”就教过了。就我个人而言，那时的基本概念就是，石油是古代动物死后变的，而煤则是植物变的。不过老师也没说清楚（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时所理解的“动物”，就是陆上跑的。并因此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这些动物死的时候，都聚到一块了。当然，现在知道了，变身成石油的这些生物，是远古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和藻类。尽管现在关于石油生成的理论，还有非生物成油的理论。但最起码在波斯湾地区，海洋生物生成石油的理论，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解读油、气资源分布的规律。



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分布图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波斯湾，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海湾，但在远古时期，这片海湾的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当我们把视角拉高，从天空俯瞰波斯湾国家时就会发现，整个波斯湾和周围的低地，是被西面的阿拉伯高原，东、北面的“伊朗——亚美尼亚高原”包夹而成的一个盆地状结构，这个盆地的地理名称叫作“波斯湾盆地”。可以确定的是，在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形成之前，东到伊朗高原南缘的扎格罗斯山脉，西到内志高原的“波斯湾盆地”都是被海洋所覆盖。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远古海洋生物的尸体，才广泛沉积于盆地腹地，以及山地边缘，并成为今天波斯湾地区的财富之源。

第二节 波斯湾地区各国的石油储量

既然从地理条件来看，这片流淌黑金的土地，被圈定在“波斯湾盆地”之中，那么谁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最大的份额，谁就更有机会掌握更多的石油资源了。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坐拥“两河平原”的伊拉克和拥有阿拉伯半岛东部大片沙漠低地的沙特，无疑是最有可能胜出的。相比之下，在波斯湾岸线上拥有绝对优势的伊朗，在盆地腹地的占有率，相比上述两国就没有优势了。不过凭借卡伦河流域，以及半个波斯湾的占有率，伊朗在“波斯湾盆地”的占有率，还是能够位列三甲的。

依据现在的数据来看，沙特、伊朗、伊拉克三国，也是中东石油储备最多的三个国家。其中沙特一国已探明的石油储备，大致相当于后两者相加，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沙特境内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盖瓦尔油田”（也译作“加瓦尔油田”，一个油田的储量，就相当于三、四、五名的总和）。不过就这个差距来看，两伊似乎都不太满意。从占据波斯湾盆地的份额来看，80%以上国土都在其中的伊拉克，一直都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发掘出自己的石油潜力（总在打仗，耽误了），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认可；而伊朗的信心则在于，它除了可以指望国土南面的波斯湾地区以外，还可以寄希望于北面的里海地区。虽然关于里海是否能够成为第二个波斯湾，还存在争议。但这是一个顶级的产油区，已经没异议了。能够在南北接入两大石油重要产区，波斯人如果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在石油话语权上超越沙特，也并非不切实际的想法。

除掉沙特、伊拉克、伊朗，这三个波斯湾地区体量最大的国家之外。剩下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也都或多或少的分得了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谁在波斯湾盆地占的份额多，谁的机会就大。但整个波斯湾盆地，也并不是到处都有油的。即使是产油区之间，也有多少的区别。如果机缘巧合，你占住的地方，是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区域，那么即使国土面积不大，也有机会凭借石油资源赚得盆满钵满的。当然，对于小国来说，这种正好生在聚宝盆里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就像是中彩票。如果你是在谋求独立的过程中露了富，反而会增加自己独立的难度。就像现在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样，就算是为了北部高地边缘的那片产油区（基尔库克油田长期是伊拉克最大的油田），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也不让坐视他们独立出去的。

虽然彩票难中，但总归还是会有人中的。在南海石油被发现之前独立的文莱就是一例，文莱的苏丹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而另一个中彩票的典型，就是科威特王室了。尽管科威特只是在波斯湾西侧，切出了一小块国土。但这一小块国土的已探明石油储备，却长期和伊拉克差不多。在科威特国土南侧，有着位列世界十大油田第二位的“布尔甘油田”，这也是唯一能和沙特“盖瓦尔油田”比肩的超级油田（两者都是百亿吨级的油田）。这种小国拥有大财富的情况，显然很容易让周边的国家羡慕，甚至妒忌。而最终由羡慕、忌妒上升为“恨”的，就是伊拉克了。这是因为，在伊拉克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时，

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下辖的一个县。只是由于后来英国强力向中东及波斯湾地区渗透，从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切割出了这块登陆基点，才导致科威特最终以独立身份，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这种因为大国角逐进行人为分割的情况，在后殖民时代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之前分析的南北也门就是这种情况，而始作俑者仍然是那个日不落帝国。即使实力相差并没有那么悬殊的南、北也门，最终都能“走”到一起。那么萨达姆同样也有理由相信，作为“伊拉克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威特也应该带着它那惊人的石油储备（特别是相对它的体量来说），回到“伊拉克母亲”的怀抱中来。

第三节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受大国干涉而失败

之前我们说了一句中东的谚语：“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再对付我的兄弟。”如果说两伊战争这场是由阿拉伯兄弟，联手对付波斯人这个“堂兄弟”的战争，验证了前半句；那么这句谚语的后半句，也马上要应验了。而科威特这个伊拉克的“兄弟”之国，就是萨达姆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其实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伊拉克人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父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所谓历史依据，总是为现实利益服务的。伊拉克想动科威特，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为了控制科威特的石油。因为如果把科威特收了的话，伊拉克的石油储量马上就可以逼近沙特了。加上伊拉克优越的地理条件（相对沙特），萨达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也就指日可待了；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石油问题，单从地理关系来看，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存在，也是非常不爽的。当我们把地图放大，来观察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在波斯湾的海岸线时，就会发现被切割掉科威特之后的伊拉克，只有一个叫作“法奥半岛”的三角状半岛对接波斯湾了。而弹丸之地的科威特，却占据了伊拉克腹地所对应的绝大部分海岸线。这样的格局，相信试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的政治家都不会满意。

仅仅对比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实力，伊拉克拿下科威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使是在整个中东，以伊、科之间的地理关系和实力对比，那些不愿意伊拉克做大的地区大国，如伊朗、沙特，也很难阻挡这件事的发生。只是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仅仅是“地区问题”的问题。就算是一国的内政，也有“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制高点，来支撑着大国直接干涉的理由，更何况是一国吞并另一国这样的“大事”了。假如波斯湾地区并没有石油，伊拉克也许还有机会避开大国的直接干涉，完成它的统一大业的。毕竟波斯湾这个封闭的海湾，本身并没什么

航线价值和区位优势。当初英国人之所以处心积虑的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切割出科威特，并不是想着分化阿拉伯人，而是想进一步压缩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半岛的空间，以达到削弱这个欧洲头号敌人（当时）的目的。

当然，如果代替英国成为西方领导者的“美国”，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做大，从而领导阿拉伯人复兴，走上对抗西方的道路的话，它也一定会选择支持科威特这个少数派，以避免伊拉克打破地区平衡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的话，美国直接干涉的决心就不会那么大，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个“大杀器”的理由，来说服美国民意同意开战了。

这一点，后来在地缘位置更为重要的索马里就得到了印证。当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遇到挫折后，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办法“坏事变好事”，利用黑鹰坠地事件来煽动国内的战争热情（就像他们曾经在珍珠港事件后做的那样）。而是果断的回头，退出了这块是非之地。假如索马里有科威特那样多的石油的话，相信就是再掉十架黑鹰，美国人也舍不得退出来。海湾战争的结果和伊、科两国后来的情况，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直到今天，这场战争的收尾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第四节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意图及其获取利益的方式

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抢夺中东的石油，这种理解也对也不对。之所以说对，是因为“油”的争夺确实是美国打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你对美国政治家的道德水准特别有信心的话，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保护弱小的科威特不被邪恶的“伊拉克”所吞并。只是我个人对此没有信心罢了。说这种看法不对，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包括中国也是一样），所看中的并不是直接掠夺资源，而是油价的控制权。对于这些严重依赖石油资源的工业大国来说，如果任由这些石油输出国的政治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控制产量、价格，那么对于自己的经济无疑是巨大威胁的。

事实上，早在中东最开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输出地时，占据这块宝地的穆斯林们就已经想到用石油这项战略武器，来影响这个世界了。为此，早在1960年，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这四个中东石油储量排名前四的国家，就联合了南美的石油大户委内瑞拉，共同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欧佩克”。当然，这样做的最原始目的，还是为了让市场成为卖方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只不过，基于阿拉伯人在这个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他们更希望将这个垄断性的经济组织，变身为一个可以保护阿拉伯地缘利益的政治组织。为此，阿拉伯人甚至在欧佩克中单独套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

组织”核心圈，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中显示了自己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那一次对西方的石油禁运，造成国际油价飚升了两倍多，直接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

尽管以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对比来看，阿拉伯世界想战略翻盘的机会基本为零。但在西方看来，如果不能分化这些随时可能被宗教情绪所控制的穆斯林国家，那么他们将随时处在油价暴涨的威胁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人才会不惜血本的介入中东的地缘政治，试图让中东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达到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状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想主导整个中东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最起码，那个天生反骨的伊朗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不过就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来看，在成为科威特的保护者，清除掉野心勃勃的萨达姆之后，阿拉伯国家已经很难再形成合力对西方的石油安全发起攻击了。就像最近伊拉克就明确表示不再接受欧佩克的石油配额控制，并且在欧佩克准备再一次统一行动，限产调价时，公开持反对意见。要是说伊拉克这样做，没有美国的幕后操作，估计美国人自己都不信。

相比于伊拉克，科威特这种类型的国家其实是最好控制的。国小、多金，还有注重世俗利益的王室。更重要的是，有伊拉克这个“强敌”存在，科威特如果不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找棵大树的话，即使得到其他海湾国家的全力支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科威特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进入伊拉克的。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不希望伊拉克游离在自己的控制之外。比起科威特来，伊拉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所以让其国内达成均势是最为重要的。

经常在网上见到一些“热血”的朋友，按照二战及古典时期的思维，来讨论国家关系和战争，动辄将某一国变成殖民地或者一个行省（联邦的地位都不会给）。但实际上，这种直接改变国家版图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除非你能有把握让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都愿意归附于你。而你国内政治家（也包括民众意见）又认为这片土地有它独特的价值，上面的人亦不会成为国家的包袱。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尽管美国在伊拉克耗掉了巨大的军费，但如果有伊拉克人想投奔“自由、民主”的话，还是只能通过移民的途径了。

既然没有可能把类似伊拉克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的一部分，那么美国人就必须撤出军队，完成还政于伊拉克人的问题了。扶植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固然是一种选项，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无数经验告诉美国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美国人更希望能用他们最大的优势（最起码美国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为试图控制的国家打造一套可以在内部达成平衡的政治体系。问题是，在伊拉克这种族群、宗教关系复杂的国家，这种平衡的基础，就不仅仅是为伊拉克建立一套制度，并让其政治家接受游戏规则的问题了。原始的族群

之间的地缘平衡，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文化封闭的地区来说，一个政治家出身于哪个族群，会远比他的政治主张重要得多。

第五节 伊拉克萨达姆倒台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博弈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稳定伊拉克政局的关键所在。相比于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一直作为地区少数派，全方位受到压制的库尔德人，可谓是受益最大。基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少数派的定位。扩大这样一个族群的权力，并不存在让伊拉克重新陷入一家独大的境地。当然，库尔德人如果希望借此机会，在自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那还是不现实的。就算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无力控制库尔德地区的局势，它的土耳其邻居也不会坐视这种局面出现的。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伊拉克真的分裂出库尔德国家来，那么境内拥有最多库尔德人的土耳其，肯定会深受其害。

即使不考虑这种分裂倾向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影响，单从库尔德人所分布的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缘价值（两河的发源地）来看，土耳其也有理由将之定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了“水”这项中东最为宝贵的财富，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土耳其最低限度也可以对中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发挥重要的影响力。正因为库尔德问题的敏感，我们才会不断的在新闻中看到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消息。也会在前些日子的土耳其东部地震中，看到土耳其拒绝外部援助的消息。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土耳其人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被一个主权国家所接受的。但在伊拉克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什叶派阿拉伯人，更关心的是和库尔德人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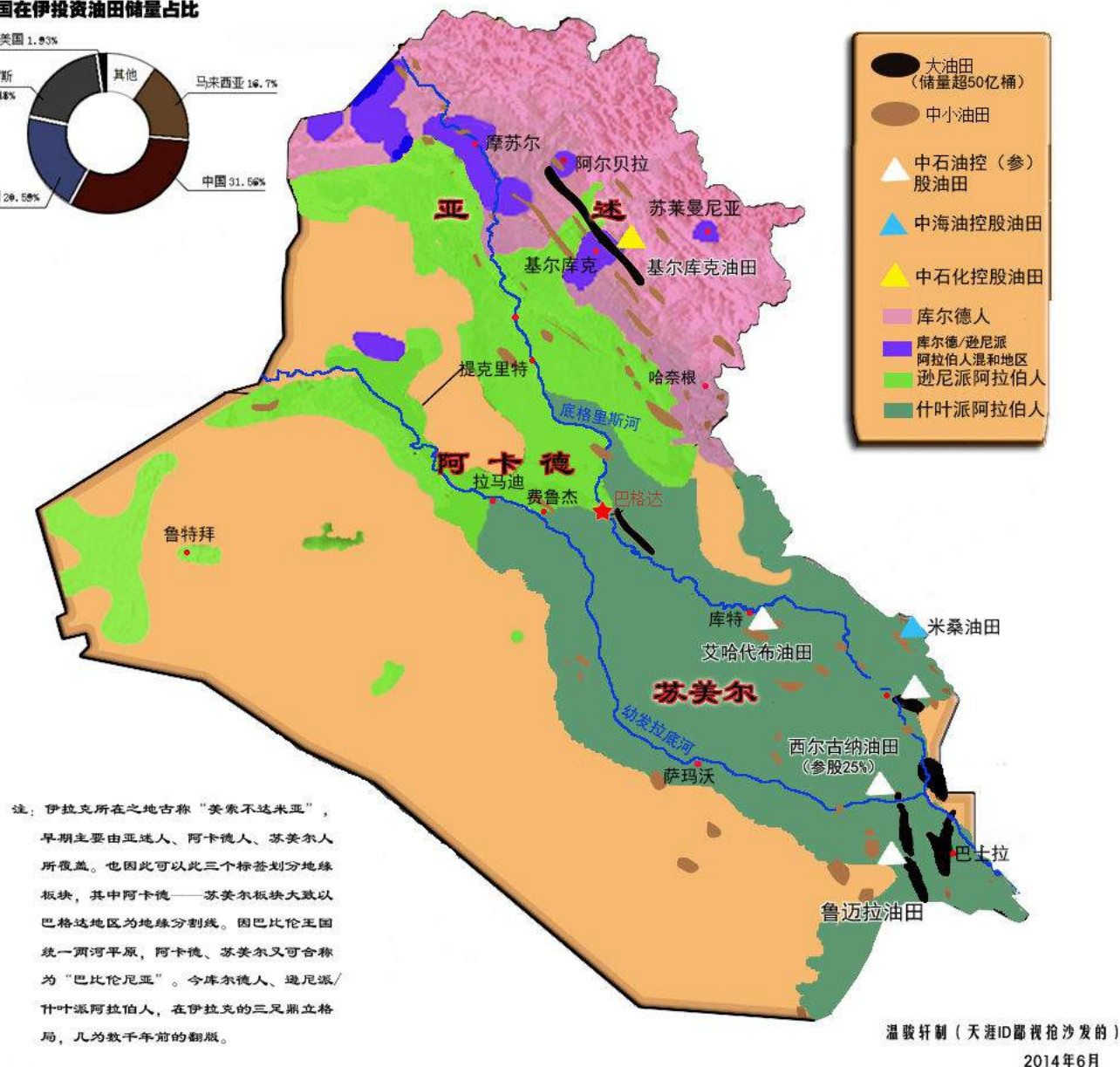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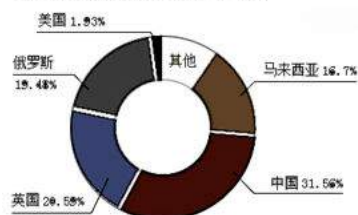
从竞争的角度看，土耳其人的存在，反倒能够抑制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坐大。这种内、外博弈交织的结构，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南部，高、低地交接的“基尔库克”地区，显得尤为明显。这个因为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库尔德地区交接处的城市，同样又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也是伊拉克最重要的石油产区。这种地缘位置，以及资源状况。想不成为博弈的焦点都很困难。为了控制这个重要的产油区，并压制库尔德人，当年萨达姆曾经用种族迁移的方式，来增加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当地的比例，将其从人口结构上剥离出库尔德地区。

只是库尔德人心里当然也十分清楚基尔库克的石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在博弈的天平开始多少倒向库尔德人时，重新夺回这块边缘重地的工作，

也成为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博弈的重点。至于具体手段，可以是政治，也可以是军事。换句话说，如果伊拉克内部有一天出现军事冲突时，基尔库克是最有可能出现在时政新闻中的地名（现在美国人还在，冲突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人体炸弹一类的恐怖事件上了）。像基尔库克这种地区结合部，最终归属了哪一方，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伊拉克地缘结构及中国石油投资分布图

各国在伊投资油田储量占比



伊拉克地缘结构及中国石油投资分布图

如果伊拉克能够实现民族和解的话，更有可能成为混居区。不过现在看，这还只是一个理想。除了内部实力的比拼，外部干预对于哪一个族群能够占据优势，也是很重要的（正如这一次库尔德人能够有机会自治，得益于美国的中东战略一样）。尽管基尔库克已经是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地区的最南部，土耳其

人的手伸得再长，也不大可能把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范围延伸到此。但对于把库尔德问题，视作国家核心利益的土耳其人来说，也并非没有机会对基尔库克发挥影响。事实上在萨达姆和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决心为基尔库克换血时，生活在基尔库克的最大族群还不是库尔德人，而是另一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土库曼人。

这个当年因突厥人向西扩张而留在路上的突厥部落（如果把小亚细半岛作为突厥人扩张终点的话），在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分布。因此也成为了土耳其人影响伊拉克内政的又一张牌。如果有机会把基尔库克变成“土库曼人”的城市；或者退一步，支撑其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的包夹中，成为第三方，被消弱的就不只是库尔德斯坦的地缘实力了，在处理与伊拉克的关系中，土耳其人也能有更多的话语权。

第六节 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布比延岛两侧水道的地缘矛盾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拉克应该还是会长时间在国际新闻中占据一席之地。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城市名也都会经常出现的。由于萨达姆的失败，伊拉克目前倒是不大可能作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出现在中东地缘政治舞台上。但这并不代表它会甘心做土耳其或者伊朗的腹地，毕竟伊拉克还是有很多优势，后面也有阿拉伯兄弟可以联合。从地缘的角度看，伊拉克在面对高地之上的土耳其、伊朗两国时，还是没有胜算。假如有一天强人再现，并希望有所突破的话，技术上还是会以科威特为突破口的。

经历过海湾战争以后，科威特的国家地位应该说是稳固了。也就是说，即使有一天，美国因为战略调整（或者说科威特的利用价值不足），不再罩着科威特，伊拉克也很难有机会再一次吞并科威特。但这并不代表，伊拉克就不会再和科威特发生摩擦了。毕竟作为两个相邻的国家来说，地缘矛盾总是现实存在的。就伊、科两国的地理关系来看，即使不考虑石油因素，科威特那种基本把伊拉克出海口封死的位置，也会让这种地缘矛盾长期存在下去。

仔细观察科威特的地理结构，以及它与伊拉克的地理关系。我们会发现，科威特的国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阿拉伯半岛切割出来，以科威特湾为核心的陆地；另一部分，则是在科威特湾北部，靠近伊、科边境的“布比延岛”（包括附属的其他小岛）。从形态上来看，围绕该岛及其附属小岛的两条水道——“塞比耶水道”、“阿卜杜拉水道”，在群岛的北部相交之后，还向陆地延伸了一段。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布比延岛很像是一个位于河口的沙洲，只不过造就它的河流目前已经干涸了。

以布比延岛的体量来看，当初为它带来泥沙的河流，体量应该不小的。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除了两河之外，阿拉伯半岛当初也许还有一条大河存在。不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造就布比延岛的河流，其实就是两河汇集而成的“阿拉伯河”。在之前分析两伊关系时，我们通过卡伦河河口的变迁，来解读了两伊边境之争的地理背景。以两伊边境矛盾产生的时段来看，似乎是卡伦河并入了阿拉伯河的海道，并致使伊朗向西扩张了主权要求。但单从河道变迁的情况来看，布比延岛所对应的水道，应该是阿拉伯河更长的出海河道。



伊拉克 – 科威特地缘关系图

而现在的阿拉伯河出海河道，最初很可能是从卡伦河那里夺过来的。分析这些原始的地理结构，似乎没有现实意义。就像我们可能永远弄不清楚，哪一条河道是黄河最初的出海河道一样。但却可以导出一些有趣的命题，即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一些河流的走向，让地理结构的变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上面所谈的命题，对于部分只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家来说，可能还有些遥远。不过就布比延岛及附属小岛来说，它那独立的地理状态，却还是增加了伊拉克人将其从科威特国土中切割出来的欲望。对于伊拉克来说，它能对接波斯湾的陆地——法奥半岛，其实是由阿拉伯河的新旧两条河道包夹而成。问

题在于，无论是北边两伊边境的阿拉伯河，还是南部伊、科边境的“阿卜杜拉水道”，伊拉克都不得不和邻居对分水道。

这种情况，极大的影响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权益。就现实的情况来看，伊拉克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已经不可能重新恢复对阿拉伯河的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如果伊拉克的出海权过于依赖阿拉伯河的话，将随时受到伊朗这个危险的邻居的威胁。有鉴于此，早在伊拉克革命之后（1958年），伊拉克就已经着手利用伊、科边境的水道，打造新的深水港——“乌姆盖萨尔”，以规避上述战略上的风险。这个位于阿卜杜拉——塞比耶水道交汇延伸段的港口城市，在两伊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波斯人攻占法奥半岛，并封锁阿拉伯河、阿卜杜拉水道之后，伊拉克人仍然可以通过布延岛西侧的“塞比耶水道”进入波斯湾，并沿着南侧阿拉伯国家的海岸线，沟通印度洋航线。

基于上述原因，伊拉克渴望在南线拥有独立出海水道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即使暂时不能做到，也会随时关注科威特在这两条水道上的动作。上个月，在中国承建的跨塞比耶水道而建的“布比延岛公路桥”合拢之后，伊拉克方面的反应就十分强烈，认为这会影响到伊拉克的出海权。当然，虽然中国方面只是出于赚辛苦钱的原因，并无意于用这项工程影响伊、科之间的地缘关系（你不做，也有人做的）。但从伊、科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出海权之争这颗定时炸弹，迟早会引爆的。这也算是伊、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吧。至于将来有没有大国会出手利用这点，就要看哪一时段的政治需要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科威特这种位置和历史的国家（相对于伊拉克），有没有出海权之争，都会一直笼罩在伊拉克的阴影之下的。当然，这种风险并非只存在于科威特，地球上很多位置敏感的小国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波斯湾的情况而言，也有另一个体量更小的国家——巴林，存在被某一个“强大”邻国盯上的风险。而这个邻居，就是与巴林隔波斯湾相望的“伊朗”。

第七节 伊朗利用什叶派身份向外扩张势力范围

说到巴林被伊朗盯上，我们就必须先分析下，伊朗目前地缘扩张的战略和方向了。伊朗的情况，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章节多次作过分析了。从战略上来看，波斯人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地缘位置。这种有很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枢纽位置，如果你定位准确，是很有机会左右逢源，成为各大国的座上客的；但如果定位不准确，也同样有可能成为孤独的四战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朗的处境都是后一种状况。只是在现在，伊朗似乎看到了机会来摆脱孤独的境地。

虽然伊朗的地缘位置有左右逢源的潜质。但现实的问题是，伊朗人最为重

视的却并非自己的地缘位置，而是它的意识形态——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身份。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宗教、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曾经在地缘博弈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并不可靠。就像阿拉伯人虽然成功的让波斯人成为了穆斯林，波斯人却仍然通过选择什叶派的身份，来显示自己在地缘上的独立性。



伊朗地缘战略示意图

就现在来看，用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来影响世界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但就伊朗和中东的现状来说，波斯人对于利用什叶派国家身份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当年在中亚五国刚刚获得独立时，伊朗就曾经派出大量的神职人员进入中亚，试图在这片先前由铁幕罩着的土地上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只是后来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在俄国人统治下世俗化了六、七十年的中亚，对同样用世俗化手段渗透的土耳其人更感兴趣。而波斯人在竞争中落败之后，也退而求其次，把扩张势力范围的重点锁定在了和其人种、语言上有共同点，地缘上又较为封闭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身上。

说起来，从原始的地缘属性来看，伊、阿、塔三国，倒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打造一个三位一体的“波斯联盟”，在技术上也不是没有机会。难点就在于，这三个国家是呈线状排列。位于联盟最西端的伊朗，在向东延伸势力范围时，并不是很给力（如果伊朗和阿富汗的位置互换一下，成功的机率会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还会受到其他大国的直接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已经

被美国重点盯上的情况下。如果波斯人可以和中国结成战略同盟，并经由阿富汗——塔吉克中继，打通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铁路、输油管道都是技术手段），会对伊朗向东北方向开拓腹地有莫大的帮助。而对于中国来说，战略上也是有利的。毕竟波斯同盟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中国。作为这个同盟利益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战略上也可以为自己打通一条影响中东的陆上通道。

假如有一天，上述战略合作能够成为现实，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伊朗的意识形态。因为伊朗目前的政体，以及什叶派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都会阻碍这种合作的可能。现在的伊朗总是认为目标国家如果像它一样实现宗教革命，才会真的和它同心同德。而伊朗也能够利用它什叶派大本营的身份，来扩大自己的控制力。虽然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宗教问题在交往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忽略，但务实的合作中随时有可能被宗教势力所干扰，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在伊朗组成“波斯同盟”的过程中（目前三国已经签订了不少协议，以推动一体化进程），宗教渗透更多的是作为战略目标，而不是战术手段。但在西南方向的阿拉伯半岛，波斯人什叶派的身份却可以发挥重要的战术作用。因为在阿拉伯半岛各国，各自都有一定比例的什叶派穆斯林。其中有部分国家什叶派的比例甚至已经达到半数以上。在“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大环境下，这些什叶派的基本群众都有很大的机会，崛起成为所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至于伊朗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什叶派兄弟们提供战略支持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现在的机会，其实是它最大的敌人——美国 and 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所提供的。我们说过以中东的情况，对于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而言，君主制所代表的强人政治，其实是最容易和西方合作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中东的这些君主们会尽力不让普通民众的宗教情绪，来影响到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逊尼派那种君权大于神权，淡化神职人员政治作用的务实做法，相对于什叶派神权至上的思维方式，要“进步”一些。事实上君主们压制神权，严厉对待神权思维严重的什叶派的做法，并非现在出于和西方合作的态度而调整的。我们在分析什叶派的渊源时也分析过了，政治家们注定不会喜欢自己的政权被神权所干预。相比于权力集中的君主制，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政党政治，却因为政治权力的平面化而容易被宗教势力所利用。

有鉴于此，伊朗的政治家们如果希望通过“宗教影响力”，来向阿拉伯半岛扩张国家影响力的话，在那些去“君主化”，施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会更有机会。至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被什叶派基本群众拥戴上去的政治家们，上台之后是否会压制神权，避免步伊朗宗教革命的后尘，那就是后话了。最起码宗教人士以外的伊朗政治家，也认为用“什叶派”这个身份认同，能够在被渗透国家找到天然的同盟。总的来说，如果不把宗教革命作为终极目标，只是利用身

份认同在渗透国寻找政治同盟的话，伊朗还是有机会在阿拉伯半岛扩张势力的。后面我们会分析到，叙利亚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八节 伊朗在阿拉伯地区借宗教扩张势力时面临的局势

以阿拉伯半岛的现状来说，目前有 11 个半国家（巴勒斯坦算半个）。其中沙特、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七个国家目前仍然是君主制。而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这四个半国家转而实行了政党政治。对于伊朗来说，这四个半国家恰好处在“新月沃地”之上，基于波斯高原与新月沃地的紧密地理关系。伊朗人在此扩张势力范围，会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当然，和在东线高地上扩张“波斯同盟”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伊朗这一次仍然在潜在同盟链条的终端，所直接面对的只有伊拉克。如果它想在整个新月沃地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搞掂伊拉克这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综合实力都占优的国家。

如果单纯的从宗教成份来看，作为什叶派的根基之地，伊拉克还是很有机会和伊朗结成同盟的。前提是，占伊拉克人口 60% 的什叶派能够取得伊拉克政权的主导权。问题是，无论是君主制还是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什叶派都是属于被压制的对象。在萨达姆和他之前的政治家看来，阿拉伯和国家认同才是第一位的，宗教派系之间的差别并不应该被凸显，甚至影响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希望通过宗教关系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有机会抛开国家、民族因素，和自己形成“兄弟”认同是很困难的。在那一时期，也是伊朗最为孤独的时候。

伊朗的战术机会出现在波斯湾战争之后。在消灭了萨达姆政权的同时，之前控制伊拉克政治的逊尼派，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被压制对象。而根据美国的“普世”原则，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也逐渐取得了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终于有机会利用宗教影响力，渗透入伊拉克这个宿敌的政治圈。并以此为契机，向新月沃地的纵深渗透。由此，一场让君主们恐惧万分的什叶派夺权运动拉开了序幕。一条在 2004 年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定义为“从伊朗到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也在阿拉伯半岛逐渐成型。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无疑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两个大本营。前者凭借境内的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以及占据阿拉伯半岛腹地（汉志、内志地区）的地缘优势，成为了逊尼派的盟主；而什叶派虽然不可能否定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最高宗教地位，未能以此来削弱沙特和逊尼派的影响力，但却可以在阿里和他的继承人、追随者受难的两河平原，认定三个新的圣城：卡尔巴拉、库费和纳杰夫，以此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群众。不过，基于波斯人长久以来在什叶派中的主力地位，仅仅让两河平原独享拥有“圣城”的地位，是不

能容忍的。特别是波斯人想以什叶派作为战略武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时。因此在波斯人的努力之下，伊朗北部的“马什哈德”，也取得了什叶派圣城的地位。

观察什叶、逊尼两大教派的分布状况（参见《中东什叶派分布图》），以及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我们会发现，所谓教派之争，其实还是地缘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势。或者说是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半岛腹地的阿拉伯人，在延续他们千年的碰撞。而争夺的焦点，就是中东的核心地带“新月沃地”。如果从民族的角度看，阿拉伯人显然是一个胜利者，毕竟在新月沃地之上，阿拉伯人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从现实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什叶派的穆斯林同样有以宗教分化阿拉伯人，让宗教意识压倒民族意识的机会。特别是在什叶派阿拉伯人长期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时候。

就伊朗宗教领袖们想法来说，将什叶派教义扩散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是作为战略目标来定立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伊朗目前的地缘扩张，被定义为“输出伊斯兰革命”。但从更关心国家、族群利益的政治家角度来看，凭借宗教认同来寻找盟友，更多的是一项战术手段。不过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伊朗在具体渗透手段上，优先扶植目标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力量，以先结成政治同盟。毕竟对于急于扩张宗教势力的教士们来说，也清楚政治权力在普及教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如果什叶派想在君主制国家成功掌握政治权力，那么他们除了进行彻底的革命，废除君主制，似乎别无他途。因为只要君主们掌握权力一天，就不会容忍国民们有以宗教名义质疑君权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伊朗自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事实上，伊拉克人在1958年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什叶派理论上也应该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圈的。不过当时的伊拉克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革命一样，带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复兴的意味在里面。在复兴“阿拉伯”这杆大旗之下，宗教矛盾并没有凸显。

问题出现在伊朗出现什叶派夺权的“伊斯兰革命”之后（1970年）。为了应对这个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眼中共同的“异类”，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人共同选择了逊尼派出身的萨达姆，作为伊拉克的最高领导人。而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被激发出宗教革命的热情时，逊尼派的身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进入核心政治圈的通行证了。

第九节 伊朗试图使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为其什叶派联盟

从政治形态上来看，结束君主制并不代表政治权力就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一般而言，其间总还是会有一个“新瓶装旧酒”的“强人政治”期存

在。越是在文化封闭的地区，强人政治的生存空间就越大，持续时间也就越长。萨达姆、卡扎菲、穆巴达克、萨利赫，这些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中东政治人物能够长期把持政权，和阿拉伯世界自我孤立的地缘状态是分不开的（谁让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呢）。

如果只看内部结构，哪一个族群（教派）的人口数量越多，也就拥有更多的政治发言权，从中产生政治强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是政治永远不只是内部博弈，外部的干预也同样重要。如果是大国，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会小很多。但如果是小国，又拥有让人眼红的财富（或者重要的战略地位），那想不受外部干扰和调整自己的政治结构，是非常困难的。而从外部干扰的原则来看，支持“少数派”，以达到分而治之状态的“少数派原则”，又是常见的政治手段。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交织下，萨达姆和逊尼派长期控制了伊拉克政权。而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拜美国的“民主”思想所赐，伊拉克的政治权力分配，也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状态。

凭借在人口上的优势，什叶派政党终于有机会上位，并得到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主政的党派和总理都是什叶派）。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愿意看到一场新的伊斯兰革命爆发。它能够容忍的，是什叶派仅仅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对于这种情况，伊朗的宗教领袖和伊拉克什叶派中的宗教情节浓厚者，应该还不太满意。毕竟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是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但就纯粹关注政治层面的伊朗政治家而言，应该已经能够满意了。毕竟伊拉克什叶派的上位，让伊朗在新月地带打造“什叶派政治联盟”的努力看到了希望。

伊拉克毕竟是什叶派兴起之地。接近 60% 的什叶派人口，也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家在“民主”体制下上位，变得不那么出乎意料。不过伊朗再想借“民主”的东风，在新月地带找到什叶派政治盟友，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就伊斯兰次一级教派的结构而言，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两个最大的教派。基于逊尼派的教义认可君主作为神的代言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逊尼派现在在穆斯林世界占据了最大份额。公开资料表明，这个份额达到了 85%。至于处在天生反对派地位，强化宗教影响力（对政治）的什叶派，则剩余的份额就只有 10%——15% 之间了。

当然，逊尼派和什叶派只是一个大归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大教派还分裂出许多二级、三级派别，内部也是纷争不断。不过基于“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的原则，在大矛盾面前，两派内部的兄弟之争，绝大部分时候还是能够调和的。如果不能调和，那么就有可能分裂出一个，不同于两派的新教派来。现实的例子就是阿曼，这个君主制国家 90% 国民所信奉的“艾巴

德派”就是一个例外。

阿曼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叶派的话题来。由于什叶派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所以它的扩散范围并不广。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比例基本都可忽略不计。当然，也正是由于什叶派不被政治家所待见，信徒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他欺也”原则，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和你的家族心底里信奉的是什叶派（标准就是只认可阿里和他后人的正统继承权），也可以对外界隐瞒身份，避免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伊朗能够成功的把宗教革命输出到阿拉伯世界，相信什叶派穆斯林的数量还会有上升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改变什叶派相对逊尼派的弱势地位。

好了，什叶派要想从逊尼派手中赢得多数派地位，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关心阿拉伯诸国中什叶派的比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更现实。当伊拉克成为什叶派复兴之地后，两伊的什叶派政治家们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投向叙利亚了。不过相比伊拉克高达 60% 的什叶派比例，叙利亚什叶派的比例要低得多，各种派系加起了也就约 20%。试图凭借这样低的比例来进行一场由什叶派主导的宗教革命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叶派出身的政治家，没有可能夺得叙利亚的最高权力。我们之前也说了，如果考虑到外部支持者的力量，少数派也有机会被刻意扶植上位。

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寻找什叶派盟友，当然不是简单的出于“少数派”原则了。不过相比于它的竞争者“土耳其”来说，伊朗本身并没有地缘优势（对叙利亚直接施加地缘影响）。简单的看地图，我们就能发现，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并不接壤，而是在中间隔着伊拉克。尽管看上去不是很远，但要想像土耳其对伊拉克那样，通过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协调水资源分配等手段影响伊拉克的政治决策，就没什么机会了（同样的事情，有必要的話，土耳其人也可以对叙利亚做）。

尽管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伊朗很难对叙利亚施加过多的影响，但对于伊朗的政治家来说，却自认为有机会和叙利亚的最高权力者结成联盟。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强人政治”圈的一员（明天就不敢保证了，毕竟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叙利亚）；二是叙利亚的最高领导人——阿萨德，出身于什叶派家庭。事实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名叫作“巴沙尔·阿萨德”，上台时间是在 2000 年。而他的前任“碰巧”也叫阿萨德，全名叫做“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间则是从 1970 年——2000 年。

并不需要动太多脑筋，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两个“阿萨德”总统的出身，决不是什么巧合。这其实就是一个“子承父业”，持续时间长达 41 年的“强人政治”体系。相信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中东政治强人会很羡慕老阿萨德，

能在非君主制的情况下，在死后把最高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我们所更关心的，是一个宗教少数派的家族，是如何在叙利亚长期把持最高权力的。

第十一章 叙利亚的政治结构及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叙利亚阿萨德家族上台的历史大背景

虽然一般认为，阿拉伯历史几乎算得上是一部宗教扩张史。但宗教毕竟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也不是意识认同的全部。在上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独立以及“主义”盛行的时候，阿拉伯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作为“第三世界”的成员卷了进去。在这种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宗教”这种在古典时期划分阵营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后，阿拉伯社会大致分裂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的维护君主制的国家；另一派则是寄希望于用符合潮流的国家制度，以及用政党制度包装起来的“民族主义”来实现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国家。虽然在具体的政体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认为，“阿拉伯”这个民族属性的认同感，要比宗教派系来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后者，更不愿意自己的革命事业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试图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国家，恰好都在阿拉伯世界那条肥沃的，由尼罗河下游+新月沃地所组成的“n”字型地带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都是其中的主力。事实上，这些国家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复兴阿拉伯文明，并非出于偶然。纵观历史，这条“n”字型的肥沃地带一直都是诸文明争夺的焦点，直到西方殖民者出现时依然如此。相比之下，以沙特为核心的阿拉伯腹地，受到外来文明直接渗透的机会就少得多了。

由于尼罗河流域和新月沃地并非完美对接，而是被地理分割在非、亚两洲。并且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新月沃地的东端插入了以色列这个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国家，因此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下，一度想结合在一起的埃、叙、伊三国不可避免的回到了现实之中，接受了现有的国家格局。其中叙、伊两国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在“革命”事业上也走得更近些。

叙、伊两国紧密的地缘关系，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别在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夺权成功（1963年）。大多数人听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个名字，估计都是因为萨达姆。事实上最初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非只是一个国家政党，而是一个带有“国际”性质的政党（类似于早期试图解放全人类的GCD）。当然，它所试图解放的范围，是限定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在于，像其他带有无国界性质的政党一样，当它们能够进入一国的政治体系，并夺取政权之后，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服务于国家

利益的工具了。

我们今天说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并非去探讨意识形态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所以简单分析它的背景，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长达四十余年的阿萨尔家族，正是在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借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崛起，而获得叙利亚最高权力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对于阿萨德家族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淡化掉他们什叶派的宗教背景，转而只需要“阿拉伯人”这个身份，就有机会进入核心权力圈了（想想竭力淡化掉民族主义的苏联，是如何“允许”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执掌政权的）。当然，毕竟阿拉伯世界还是有着很深的宗教情节。即使宗教问题，暂时不能成为左右政局走向的力量，但作为身份标识，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于社会认知当中。

第二节 法国曾经的殖民统治使叙利亚阿拉维派得以掌握军队

如果阿萨德家族的周边，没有形成一个以其所属宗教派别为基础的核心集团，要想在叙利亚执政那么多年，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还要“感谢”法国人。在当年西方殖民者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像叙利亚这样重要的地缘位置，自然也是无法幸免的。和亚丁湾、波斯湾地区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包括势力范围）不同的是，叙利亚是被法国人控制的。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英法这对欢喜冤家，长久以来如影随行的竞争状态；二是作为地中海国家的法国，在与英国竞争地中海国家，多少还是有些地缘优势的。这些地缘优势，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双方的海洋实力差距，并让法国得到阿拉伯半岛大部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部分，则被英国控制）。

法国的殖民历史为叙利亚带来了两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基于法国人自己一向认为，法国才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引领者。在他们自己把君主制丢入历史的垃圾堆后，也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中传导了同样的理念（英国人的控制区，就不会反对君主制了）。所以叙利亚在成为独立国家后，并没有经历君主制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政党政治阶段。也正因为如此，叙利亚人率先举起了阿拉伯复兴的大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是这种“先进”思想的产物）。这也对后来的叙利亚、伊拉克两国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笔历史遗产，就是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基于地缘平衡的“少数派原则”，法国人当初选择了在什叶派中寻找军事代理人。也就是说，叙利亚本身的军事力量，最初是被什叶派所掌握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什叶派”只是

一个大分类，像所有宗教一样，它的下面还分有很多支派。在叙利亚什叶派中主要掌握军事力量的，是一个叫做“阿拉维派”的支派。如果说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是属于少数派地位的话，那么“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又是属于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以后的叙、伊（朗）关系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局外人的法国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关注“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个长期受到逊尼派阿拉伯人压迫，又有一定人口数量的少数派（现在的比例，约占叙人口的12%），是最适合掌握叙利亚军队的。这样的话，通过垄断军事力量而放大实力的“阿拉维派”，就能够和人口占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达成平衡了。尽管独立之后的叙利亚，以民族复兴为名淡化了宗教派系的差别，但“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却延续了下来。由于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军事博弈，军队对于维护叙利亚“领土与主权完整”中的作用也愈发明显。这一切，最终都在叙利亚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得到了体现。

第三节 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权力分配的安排

前面说到，由于处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博弈的前沿，叙利亚军队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掌握军队的“阿拉维派”（什叶派支派）最终也掌握了政权。1970年通过党内“和平政变”，成为总统的老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之前就是国防部长。就军人通过政变的方式取得最高权力，在世界政治史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一个因国家安全而对军队高度依赖的国家，不爆发一两次军事政变的话，反倒是不正常的了。不过有句话叫作“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这句话套在夺权上位的军事将领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相比那些比比皆是的失败案例，依靠掌握军队而上位的阿萨德家族，应该算是个成功者。而成功的原因，则在于能够在叙利亚内部达成平衡。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大权独揽的领导者（特别是军人出身），往往会倾向于把权力分配给和自己血缘、地缘关系最近的人，简单点说，就是任人唯亲。按照这个规律，老阿萨德在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后，应该把这些权力逐级分配给同属于“阿拉维派”的“乡党”们，并以此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遴选出来的人和你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似乎也更为忠心；而坏处则在于，完全处于被忽视状态的其他群体，就会被整体推到反对派的阵营中去。

这种战略上的风险，也随时有可能被你的对手和外部干预者所利用，并成

为终结政权的定时炸弹。既然我们说老阿萨德是个成功者，那么他当然没有走独裁者的那条老路了。他在政治结构上的安排，既兼顾了各方力量的平衡，又维护了自己的核心力量。具体的来说，就是为叙利亚的权力分配制定了几个比例。政府部门的权力，按照各教派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配。按照这个原则，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逊尼派穆斯林，得到了 70% 强的公务员职位。基于政府部门是普通民众所最为关注，也是接触最多的权力机构。这种安排已经足以让各教派，尤其是逊尼派教众感到满意了。

虽然普通民众可能更关心政务系统的结构，但当代政治家们其实清楚，政治权力的斗争，其实主要是通过“党”这种组织的内外博弈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在没有君主的叙利亚尤为明显。因此在党的最高权力分配中，逊尼派和阿拉维派的比例形成了均势，即各占了一半。基于最高层党政合一的性质，最高国家领导层也同样遵循了这个比例。至于说阿萨德和阿维拉派借以发家的军权（包括情报等强力部门），则作为核心力量，依然是最后的防火墙，并掌握在阿维拉派手中。而这也是最近几个月叙利亚局势紧张，但小阿萨德总统却敢于强硬对待反对派的底气所在。

当然，派系无处不在，阿萨德派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支派。那些强力部门的权力，也在他们之间作出了互相牵制的分配。通过上述各项权力的安排，应该说叙利亚的政权结构已经尽力做到了平衡。并且让叙利亚的“既得利益阶层”，覆盖到了各个教派（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在这种结构之下，即使是有反对派出现并拉出教派矛盾，打着为多数派争取权力大旗的可能性也被降到了最低。这对处于少数派的阿萨德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为了平衡叙利亚国内各方力量，阿萨德当年还有更为“创新”的设计（对中国人来说，倒不会感到新鲜）。这个创新是基于阿萨德和阿拉伯复兴意识抬头所处的时代，且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美、苏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作为东、西两大阵营以外的国家，如果不想完全成为一方的追随者，是可以从两方中吸收长处，来用于自己国家的施政的。在这方面，非资非社的印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叙利亚的“创新”则在于（相对于叙利亚的基本政治架构走西方路线而言），他在政治权力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议会”的设计中，按照“阶级”成分设定了比例。这个比例要求议员中最少一半，来自工人、农民。

如果说之前的党、政权力划分，所考虑的是纵向切割叙利亚社会的“教派”利益的话；那么在议会中用阶级成分进行切割，就是在横向切割叙利亚社会，以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了。这种把权力在各个教派、阶层进行立体分配的巧妙设计，也使得阿萨德家族成为中东最为成功的“强人政治家族”。老阿萨德甚

至敢于用七年一次的“全民公决”，来向国内外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在连续四届当选，直至2000年离世之后，由议会修宪支持小阿萨德继任总统之位（宪法规定总统年龄必须在40岁以上，而小阿萨德当时才35岁）。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看看伊拉克的情况。作为和叙利亚地缘关系紧密，“革命”过程类似的伊拉克，阿萨德的这些经验不可能不对萨达姆造成影响。但萨达姆最终还是没有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采用叙利亚模式，而是让自己所属的逊尼派一家独大。究其根源，还是与伊拉克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毕竟隔壁有伊朗这个刚刚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由什叶派夺取政权的国家在。谁处在萨达姆的位子上，也很难把核心权力分配给这些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至于库尔德人要想平等的分得政治权力的话，除非他们肯接受成为阿拉伯的一部分（就像很多柏柏尔人那样），站在阿拉伯复兴的大旗之下。否则他们对伊拉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威胁，并不会小于那些随时有可能进行宗教革命的什叶派。

从上述情况来看，萨达姆当初那种“任人唯亲”的选择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不能平衡伊拉克内部教派、族群矛盾的情况总是现实存在的。后来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在美国的攻击之下如此之快的土崩瓦解，这也是重要的原因。虽然叙利亚、伊拉克两国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有着各自的选择。但作为阿拉伯世俗政权的代表，双方有一条共同的底限都是非常坚持的，那就是严格限制宗教势力的发展，尤其是不能让宗教力量直接影响政治。

如果极端宗教势力得以抬头，那么老阿萨德为叙利亚政权所设计的这些平衡措施，都是徒劳的；而萨达姆政权，也会遇到什叶派教长们的挑战。两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会不可避免的演变为原始的宗教派系搏杀。先不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一种社会退步。对于绝对少数派的叙利亚阿拉维派和相对少数派的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相对什叶派阿拉伯人）来说，都会是灭顶之灾。

第四节 新月沃地在中东的地缘枢纽地位

之所以专门分析了叙利亚的内部政治结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叙利亚是近来新闻的热点，相信有很多人了解这个国家有兴趣；二是因为叙利亚当局充分考虑到平衡与制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对于在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地区，保持国家稳定还是有借鉴作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在中东所处的“地缘枢纽”位置，足以让这个国家的内政影响到整个中东的地缘平衡。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多次提到“地缘枢纽”这个概念。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些被冠以“枢纽”之名的板块或者国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枢纽”？其实

这牵扯到一个范围的问题，就好像一个省的省会，绝大部分时候是这个省的“地缘枢纽”，但放大到整个地区、整个中国，就不可能每个省会都处在这个位置上了。像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非大陆，伊朗高原就是地缘枢纽；而在古典时期，欧洲的核心还在地中海沿线时，欧亚博弈的枢纽区就是小亚细亚半岛。

回到我们现在所分析的中东及阿拉伯地区来说，也存在不同层面的几个枢纽地区。如果光看阿拉伯世界的话，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相接处的埃及，无疑是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枢纽”。而如果范围是“中东的话”，那么整条新月沃地就属于中心地带了。至于叙利亚，则是新月沃地国家的地缘中心，称之为中东“地缘枢纽”并不为过。

要想理解叙利亚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还要回到“新月沃地”和“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概念上。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最初的中东概念，是欧洲人根据离自己的地理距离，为亚洲地区所划定的一个地理概念。不过现在说到“中东”，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非（如果算上土耳其那点欧洲领土的话），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半岛诸国的地缘政治概念了。相信这个概念的形成，是因为上述国家地理相接，历史、宗教、政治渊源较深。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关系，所以必须放在同一政治板块中来考虑（比如你针对其中某一国家拓展外交关系时，就必须考虑板块内其他国家的反应）。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仅是凭借直观感受，就能够为所关注的对象进行正确归类。当然，如果能够从中研究出规律，并以此来指导今后的战略、战术会更好。这也就是所谓“上升到理论高度”吧。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中东”这个概念形成的合理性。有人曾说到，看到新月沃地和周边板块的关系，突然感悟到“新月沃地”就是中东的“中原”，而周边几大板块就是决战中原的边缘板块。依照中央之国地缘博弈的经验，一旦某一个边缘板块征服了中原之地，那么它就很有机会接下来征服其他边缘板块，并成就帝国之身。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我们把“新月沃土”从阿拉伯半岛这个大板块中割裂出来，单独看作一个地理单元的话。就会发现在这条中东最肥沃的土地周边，按照地理分割的原则，分布着四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即：北面的小亚细亚半岛；东面的伊朗高原；南面的阿拉伯高原；以及西面以“尼罗河下游河谷、平原”为核心的板块。这四个地理单元“恰好”也对应着中东地区四个最重要的国家：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上述中东地区的“边缘板块”，除了尼罗河地区由于东西纵深太小（就是尼罗河两岸谷地加上河口的三角洲，核心区轮廓呈带柄

的“莲蓬”状），与新月沃地之间分割明显以外，其他三大板块都与新月沃地地理相接。这种地理结构，也对中东的历史及地缘格局造成了根本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历史上，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分别以伊朗高原、阿拉伯高原、小亚细亚半岛为基地，通过控制新月沃地，而成就帝国霸业。

而埃及人虽然拥有这个地球上最为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4500年前就开始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建筑，却始终只能偏安于尼罗河下游地区，无法渗透新月沃地，成就帝国之身（每每有帝国出现，却又总是被吞并的对象）。当然，埃及和新月沃地的地缘关系，也并非没有机会拉近。不过那一天到来之时，已经没有古埃及人什么事了。

纵观埃及的历史，真正成为中东板块的主角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是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在那个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年代，埃及人作为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带头大哥”，终于开始向新月沃地扩张。与叙利亚联合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主导）就是这种扩张的表现。按照计划，伊拉克这个新月沃地国家，随后也会纳入这个由埃及主导的新“阿拉伯帝国”的。问题在于以色列这个西方扶植的犹太国，占据了新月沃地的西端，阻断了埃及复兴阿拉伯的梦想。随之而来的几次中东战争，也就不避免了。

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能够支撑埃及东扩梦想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它那居于阿拉伯世界中心的“枢纽位置”；也不是尼罗河流域，那让其他阿拉伯兄弟羡慕的农业条件。真正让埃及乃至中东地缘平衡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苏伊士运河的开挖。这条位于新月沃地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重要运河，不仅在欧亚大陆海上交通的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埃及除了尼罗河流域之外，又因区位产生了一个新的地缘重心，并且拉近了埃及与新月沃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从基础的地缘条件来看，埃及已经拥有挑战中东霸主的实力和区位优势了。当然，这一切最终都被以色列这颗怎么拔也拔不掉的钉子给破坏了。

第五节 叙利亚在新月沃地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让我们回到叙利来的问题上来。与中央之国的“中原”之地是一马平川，轮廓相对饱满的地理单元有所不同。受环境限制，新月沃地是一条弧状的狭长地带。按其地理特点和位置，可以大致分为东、西两块。东半段就是以两河中、下游平原为主的“低地区”。目前这一区域主要归属于伊拉克管辖；而西半段的主体则是以沿地中海山地为主，并相间沿海平原和河谷低地。鉴于沿地中海山地是这一段新月沃地的地理支撑，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月沃地的“高地区”。在阿拉伯人控制整个新月沃地之后，“高地区在行政上主要归属于“叙利亚”

这个行政单元。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地区”，已经不完全归属于叙利亚了。其西段已经分裂出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这两个半国家。

关于叙利亚的分裂是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又对中东的地缘平衡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现实的情况是，不管叙利亚愿不愿意，它在地缘结构上，已经不再是和伊拉克对分“新月沃地”的国家了，而是一个位于新月沃地中间的中心国家。从这个结构和位置上来说，叙利亚可以说是新月沃地国家的枢纽，进而也就成为整个中东各方力量角逐中东的“地缘枢纽”。

既然我们从地缘结构上推导出叙利亚的位置那么重要，那么其他中东大国，包括试图染指中东的世界性大国，当然也会密切关注叙利亚的走向了。如果你不能和叙利亚合为一体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它结盟了。从中东四大边缘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以色列的存在，埃及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而与叙利亚紧密相连的土耳其和在民族、宗教上与叙利亚有更多共同语言的沙特，都应该有不小的机会。至于伊朗，单看地缘影响的话，外交努力指向与之紧密相连又拥有众多什叶派的伊拉克，会更有结盟的可能性。至于叙利亚，无论从民族、教派，还是地理位置上看，伊朗的胜算都不大。不过，基于自身情况的考虑，叙利亚却还是与伊朗结成了关系密切的联盟。

伊朗之所以能够与叙利亚政权结盟，什叶派政权这个共同的背景，应该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当然，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像我们之前说中东的地缘政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一样，伊、叙政权结盟，也同样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问题。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联盟的形成？

第六节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缘竞争关系

按照中东的地缘格局来看，占据四个边缘地带的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肯定是地区主导权的有力争夺者了。当然，既然大家都需要通过控制新月沃地来取得地区霸权，那么位于这块“中原”之地的国家，本身也不可能没有想法的。在这块四战之地中，拥有中东最稀缺的水资源；又掌握世界最需要的“油”资源的伊拉克，是自认为最有实力争霸中东的。

除掉伊拉克以外，叙利亚也自认为是中东大国。单从人口来说，同处新月沃地的叙、伊两国倒是相差不大（都在 2000——3000 万这个数量级）。只是相比伊拉克，叙利亚在石油资源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而叙利亚可以自持的，则是既可以通过地中海对接欧洲，又处在亚非交通线上的区位优势。这也是新月沃地西段的传统地缘优势。单从经济上来说，这种区位优势，也能够为之带来更多额外的商业利益。

既然新月沃地内部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分，那么它们之间也不免形成竞争。当年和阿里争夺哈里发位置，建立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的穆阿维叶，就是以叙利亚为基地（他是叙利亚总督），斗败了以两河平原为后盾的阿里派，并把都城建立在了大马士革（现在的叙利亚首都）；而倭马亚王朝之后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则把都城建在了两河平原之上的巴格达。新月沃地内部的这种东、西博弈，投射到现在的国家竞争上，就造就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竞争了。

当然，根据地区霸权 = “边缘地带 + 中原”之地控制权的理论，仅仅控制一半或者全部新月沃地，都无法跃升为地区领导者。只不过自从伊斯兰教创立以来，阿拉伯人就已经在新月沃地的争夺上占据了优势，并将其变成为“阿拉伯”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新月沃地国家如果能够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取得领导权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取得一块甚至两块边缘之地的支持，进而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这也是萨达姆当初抱死“阿拉伯复兴”这杆大旗的根本原因所在。

能不能让中东两大边缘国家——埃及和沙特，听命于自己，是萨达姆试图成为阿拉伯领袖时所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另一个难题，就是叙利亚并不愿意伊拉克凌驾于自己之上。基于双方紧密的地缘关系，在叙利亚率先树起“阿拉伯复兴”这杆大旗时，叙、伊两国的革命者们，是寄希望于新月沃地国家先组织一个阿拉伯国家（加上埃及，整个阿拉拉世界最肥沃的土地就联合在一起了），然后再吸收其他阿拉伯国家，最终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

问题在于萨达姆执政之后，伊拉克的国家主义显然压倒了民族主义。换句话说，萨达姆更希望以伊拉克来主导阿拉伯的民族复兴大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还怀揣着无国界的“民族复兴”梦想，都不得不从国家的角度，来审视与伊拉克的关系了。虽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新月沃地东、西两区的地缘竞争力来说，是各有千秋。双方都不能对对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但从国家竞争来说，叙利亚的地缘潜力却没有伊拉克强。这其中最主要的地缘背景，是叙利亚并没有得到全数的新月沃地西部的土地。

尽管早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时代，帝国就将地中海沿线的“新月沃地”整合为“叙利亚”（行省）。并且在之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叙利亚”这个地缘标签，所涵盖的范围也一直包括整条地中海沿岸地区。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控制的海岸线，却只占大约四分之一的比例。其余部分则分别被北部的土耳其，南部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所瓜分。之所以会造成目前这个局面，还是和叙利亚地区的区位有关。基于它的地缘重要性，无论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不仅是后来的英、法两国，也包括罗马帝国和十字军），还是来自北方的突厥人，都对叙利亚地区日前的国家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段历史太过复杂，我们并无可能在这里展开解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曾经的历史和地缘博弈，让叙利亚人一直怀有一个统一新月沃地西部的“大叙利亚”梦想。而就“大叙利亚”这个概念而言，它的最大范围可以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约旦。如果说叙利亚希望体现自己的地缘影响力，那么上述地区就是叙利亚为自己划定的地缘利益区了。

第七节 叙利亚将黎巴嫩视为其地缘利益区

“地缘利益区”这个概念，是我们经常提及的一个名词。基本上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或者说希望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会为自己划定一个“地缘利益区”（政治家们不一定用这个标签罢了）。而“大国”们在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并不一定说是全面控制，但必须在区内国家的对外事务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当然，划定地缘利益区，其实是“大国”根据所在区域的地缘结构，“一相情愿”的从自己角度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小国们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地缘位置，游走于各方力量当中。至于“大国”们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各凭本事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国”，是一个相对概念。既可以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可以是中、俄这种 A 级大国。这种在地球上排名顶级的大国，自然可以避免成为别人的地缘利益区。但对于一些“地区性大国”来说，他们在划定自己地缘利益区的同时，也很可能成为其他大国的“地缘利益区”。像当年越南将老挝、柬埔寨这两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地缘利益区，并积极向西扩张时，它自己连同整个中南半岛，也成为了中国的地缘利益区。叙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说被分割后的“叙利亚”，已经很难再具备争夺中东“霸主”的实力。但将地缘目标锁定在那些曾经隶属于“大叙利亚”概念中的国家，视为自己施加影响的地区，并由此来争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像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这三个国家，体量和实力都要比叙利亚小得多。

很多时候，网上一些血比较热的朋友，一提到“扩张”就会想到领土扩张，动辄讨论将某一国吞并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或者行省（这些土地上的“人”怎么处理，却往往不在考虑范畴）。只是在现在的国际框架下，这种开疆扩土的壮举，已经很难实现了。当然，这样并非是说，有一些“大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说在它们希望这样做的时候，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其他大国（包括更高层级的大国）的干涉。像之前伊拉克试图吞并科威特的想法，就被美国无情的打破了。和伊拉克一样，叙利亚也曾经有一个念念不忘，试图合而为一的国家，它就是黎巴嫩。

尽管我们说过，就历史概念来说，叙利亚可以视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所占据的土地为“大叙利亚”地区，并积极参与上述国家的事务。但就务实的领土诉求来说，大部分时候，由殖民帝国所划定的行政格局，是重要的参照标准。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再向上追溯一代。比如伊拉克就对于独立前，英、土两国达成协议，将科威特从伊拉克割裂出来，单独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最终获得独立国家地位十分不满意。对于萨达姆来说，他更愿意以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伊拉克划定的行政边界为依据，要求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虽然土耳其人其实也是殖民者）。如果参考因同样情况而分裂，最终又合而为一的也门的情况，萨达姆的想法应该也不算是幻想。假如科威特没有那么多石油的话，也许事也就成了。

相比伊拉克在两个宗主国历史之间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政边界，叙利亚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对黎巴嫩的要求更为合理。因为在最后的殖民时代，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合二为一，共同作为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而存在的。按照殖民地独立的惯例，最后处于同一殖民帝国控制下，又拥有共同地缘背景的殖民地，大部分时候是会独立为同一个国家的。如果说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当年因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没并入叙利亚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黎巴嫩没能成为叙利亚的一部分，叙利亚人无论如何都觉得不公平了。因此在叙利亚人的概念中，黎巴嫩更应该被称作“南叙利亚”。而在联合阿拉伯兄弟，拔除以色列这根眼中刺的过程中，黎巴嫩也长期被叙利亚军队所占领，成为叙、以博弈的前线。

黎巴嫩为什么会被法国人单独分割出来，它的地缘结构又有哪些特殊性。我们在中东部分的最后，会和以色列一起解读的。现实的情况是，叙利亚在经过长期努力后，只能面对黎巴嫩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现实了。因此，将之视为主权国家，通过各种干预手段，经营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会是叙利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由于现在的国家格局很难有大的变动，本来包括整个新月沃地西段的“大叙利亚”，在以国家形式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时，就成为新月沃地的中心国家了。基于新月沃地在中东地区的“中原”定位，叙利亚很自然的也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枢纽”国家了。

第八节 叙利亚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不现实性

对于不甘心只成为它国博弈战场的叙利亚来说，如果希望保有自己的大国梦的话，就必须在中东其他地区大国中，选择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了。从民族利益上来说，只要有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存在一天，叙利亚人都能够以阿拉伯人

的身份，从其他阿拉伯国家那里获得无国界的战略支持。但如果只从国家利益上来说，远交近攻（防）的原则会更实用。伊朗能够成为叙利亚的长期盟友，这个原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能够和叙利亚这个中东枢纽国家结盟，对实现它的中东霸主梦也是有莫大好处的。当然，从什叶派宗教领袖们的想法来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阿萨德家族的什叶派身份。

只不过我们前面也分析过阿萨德的执政之本就是在去宗教化的背景下，在各教派中平衡权力。如果抛弃了这一点，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的执政基础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叙利亚和伊朗政权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的还是基于相互支援的地缘利益，而非宗教情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阿萨德家族由于执政时间太长，出现瓶颈之时（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时间本身就在为强人们累积反对者），试图干涉叙利亚政局的外部势力，除了要考虑叙利亚敏感的地缘位置所带来的博弈复杂性以外。也要考虑这个致力于去宗教化的政权体系下台之后，原教旨的宗教主义者会不会借机反弹，甚至夺权。

因为这种风险并不仅仅存在于，伊朗所愿意看到并提供支持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身上。那些受世俗政权压制已久的逊尼派宗教狂热分子们，也同样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实际上，即使阿萨德家族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观念，也没有可能在叙利亚打造出一个符合伊朗要求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什叶派在叙利亚那只占 20% 左右的比例过低，即使加上因掌握军力而放大的实力，也不足以对逊尼派形成优势（更何况还有逊尼派国家和外部大国的干涉）。更因为就阿拉维派本身来说，其“怪异”的教义，也和伊朗的什叶派有很大区别。如果以阿拉维派为主将叙利亚变成宗教国家的话，也不会理所当然的接受伊朗宗教领袖们的领导。

对于没什么宗教禁忌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教派之间的差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一些无神论者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可能就成为两个教派划分的标准。不过阿拉维派不同于其它什叶派派系的基本特点，倒是很好理解。那就是这个教派除了像其他什叶派那样，尊崇拜阿里以外，还崇拜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这种保留有原始宗教痕迹的信仰，不仅被什叶派其他教派视为异端，也被整个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世界视为异类。

阿拉维派的这种特殊情况，其实是和新月沃地西段的地理结构和地缘位置有着莫大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沿“地中海山地”之中，存在着很多有别于主流教派的宗教少数派。各方势力在此的长期博弈，以及山地复杂的地理结构，让这一地区成为了宗教的博物馆（最复杂的是黎巴嫩）。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能够在此找到不少各自的变种。因此如果外部势力想在这一地区寻找盟友，大的宗教背景固然是可以作为划分阵营的基础，但如果

希望以宗教扩张为目的，就不太现实了。

以宗教武器引领国家、民族扩张，在古典时期是很常见的手段，阿拉伯人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实践者。但在现代社会中，再主打宗教武器，显然就不太合时宜了。在这方面伊朗可以说是一个坚持者。虽然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还是什叶派占少数的叙利亚，都不大可能步伊朗后尘进行宗教革命。但如果伊朗的宗教领袖们一定要找一个国家，来实践他们输出革命梦想的话，那么和伊朗隔海湾相望的“巴林”，算是机会最大的了。

第十二章 伊朗在波斯湾和里海的战略意图

第一节 伊朗对巴林的领土扩张企图

从包含领土企图的地缘扩张目标来看，科威特和黎巴嫩分别是伊拉克、叙利亚的现实目标。而如果伊朗也希望找个小子来练练手的话，那么与之隔波斯湾相望的巴林则是最佳的选择。与伊拉克、叙利亚两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主张科、黎两国应该是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伊朗如果希望对巴林提出主权要求的话，也同样可以找出类似曾经对巴林实施管辖权的历史来。

事实上，巴林并非唯一一个曾经被波斯人统治，现在又拥有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家。以伊朗高原在整个中东——中亚地区的位置和体量来看，波斯人的地缘优势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只是和周边板块PK，伊朗现在的边界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和伊朗高原的地理形态高度吻合，而是很可能把国土范围延伸入其他地理单元之中（现在在边缘地带，还是能保留一些突出部。如卡伦河流域）。

当然，把历史延伸得太长也没有意义，毕竟波斯人建立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时代，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最为现实的历史诉求是：如果你在殖民时代通过殖民者的“帮助”，曾经扩张了传统边界，那就在殖民时代寻求领土依据（比如越南以“法属印支联邦”为依据，谋求控制柬埔寨、老挝的时候）；反过来，如果你属于被殖民者压制、分割的对象（通常这类国家，都是地区大国，如泰国），那么你可以把历史再往前推一点，认定西方殖民者所作出的分割无效（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就是这种情况）。很不幸的是，伊朗的情况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注定波斯人如果想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的话，他们需要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依据。

事实上以波斯人在地区中的地缘位置和体量来说，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的强势介入，他们对于周边地区还是具有相当的地缘优势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伊朗历史得到验证。在伊朗高原同时成为俄国（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帝国）与英国（最强大的海洋帝国）的扩张目标之时（18世纪），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东部的阿富汗，大部分领土都还是波斯的控制区。

至于波斯湾南部明显隶属于阿拉伯板块的巴林群岛，波斯人也同样没有浪费他们在海湾的地缘优势。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波斯人并非从阿拉伯人手中，而是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巴林。鉴于巴林群岛在波斯湾的地理优势，它被那

些初期以争夺海洋贸易权为目标的欧洲人所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海港优势，又离大陆较近的岛屿，是贸易支撑点的最佳选择）。只不过波斯人在1602年把葡萄牙人赶走时，目的就很明显的是领土扩张了。

尽管对于曾经拥有帝国时代的国家来说（也包括幻想自己拥有帝国时代的某国），它们在领土方面总是能从历史当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只不过现实情况是，你必须结合自己以及目标国家的情况，来制定务实的计划。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如果想在领土扩张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巴林算是最务实的选择了。选择巴林，并非仅仅因为它那微小的体量，虽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国家越小，越好解决）。以现有的国际规则来看，一块土地的归属权，是一定要参考土地之上的民意的。而在这点上，伊朗方面倒是有很好的基础。

参考《中东什叶派》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在阿拉伯国家中，什叶派比例最高的并不是伊拉克，而是巴林。什叶派在巴林所占据高达75%的比例，足以让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感到兴奋。如果再结合巴林那微小的体量，以及与伊朗紧密相接的地理关系来看，这绝对是伊朗实践“输出革命”的A级实验田。由于波斯人曾经长期统治巴林群岛，和其他什叶派阿拉伯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中波斯裔也拥有相当的比例（约占什叶派总人口的30%），这让伊朗在宗教牌之外，又多了一张民族牌可以打。

虽然从巴林和伊朗的历史关系，以及宗教、民族结构来看，巴林应该是伊朗最想有所作为的国家。但从领土扩张的角度来看，伊朗要想真正像萨达姆对科威特那样付诸行动，还需要静待国际环境的变化。就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在1970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已经和英国人达成了协议，放弃对巴林的主权要求（次年巴林独立）。伊朗现在如果想对巴林有所企图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支持其境内的什叶派夺权，将之从逊尼派阿拉伯君主体系中割裂出来，纳入自己的“什叶派联盟”中。当然，无论伊朗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巴林的政治走向，都不妨碍伊朗政治家心目中，视巴林为“伊朗的第14个行省”（2009年伊朗外长的“巴林1970年前是伊朗第14个省”的言论，就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外交纠纷）。

第二节 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对巴林什叶派夺权的态度

单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隶属阿拉伯板块的巴林如果被伊朗控制了，势必打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地缘平衡。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半岛的君主们是决不容许巴林出现什叶派夺取政权的情况。在这次由突尼斯而起的阿拉伯革命浪潮中，巴林也成为了海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国家。借着这股“民主”西风，巴林的什叶派也试图改变目前政治权力归于逊尼派的局面。

虽然说从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来看，目前叙利亚似乎应该是中东最不稳定的国家。但同样以少数派出身统治多数派的叙利亚阿萨德家族，还能够通过淡化宗教影响，平衡权力分配机制来保持叙利亚的稳定；而巴林的逊尼派君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想过，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什叶派分配权力（什叶派在巴林国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处在边缘状态）。这种权力分配与人口结构严重不符的状态，也使得巴林才是阿拉伯半岛最有可能出现长期动乱的国家。其实什叶派在巴林的这种边缘地位，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并不是巴林所独有的。

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什叶派就一直是处在这样边缘化的地位。问题在于，什叶派在巴林的多数派地位，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没有伊朗在幕后推动和阿拉伯革命这根导火索，这种“以小制大”的局面，也随时存在爆发政治变革的风险。对于巴林的逊尼派君主政权来说，他们当然也很清楚政局不稳的关键因素在哪里。所以现在的巴林正在做一项改变巴林内部结构的事情——吸收逊尼派穆斯林入籍（这几年已经吸收了4万多人）。基于巴林那不足百万的人口（不包括外籍劳工），这项工作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收见成效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遥远。只是这种做法，虽然在战略上会有助于巴林维持目前的政体。但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无疑会更加激化国内矛盾。

纵观阿拉伯的这次连锁动乱，美国和欧洲的身影总是无处不在。不过与义正言辞的指责利比亚、叙利亚政权不同的是，巴林的这拨动乱却被西方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从西方竭力宣扬的“普世”价值来说，他们显然应该支持什叶派争取权力的“正义”之举；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巴林什叶派夺权却会严重损害西方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损害，并不仅仅在于巴林有可能成为“邪恶国家”伊朗的盟友，进而改变波斯湾的地缘平衡，更在于如果由巴林而起，在阿拉伯半岛君主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的话，很有可能会在君主制国家中造成连锁反应。

从现实的利益来说，美国人并不愿意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国改变政体。毕竟和这些大权独揽的君主家族更容易达成利益交换。如果把权力下放给普通民众的话，美国所要面临的局面就要复杂得多了。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产生的矛盾，让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对待巴林的问题上，处在一种尴尬地位。既然怎么管都有问题，倒不如假装无视，让阿拉伯人自己去解决。只不过基于巴林的地缘结构、位置，波斯人注定是不会作壁上观的。由此，巴林也成为了逊尼派阿拉伯君主们和什叶派伊朗宗教领袖们，进行博弈的焦点地区。

很难说有一天，伊朗会不会出于政治目的，以那些“历史依据”来提出对某一国的领土要求（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土地，也可能是制造筹码，交换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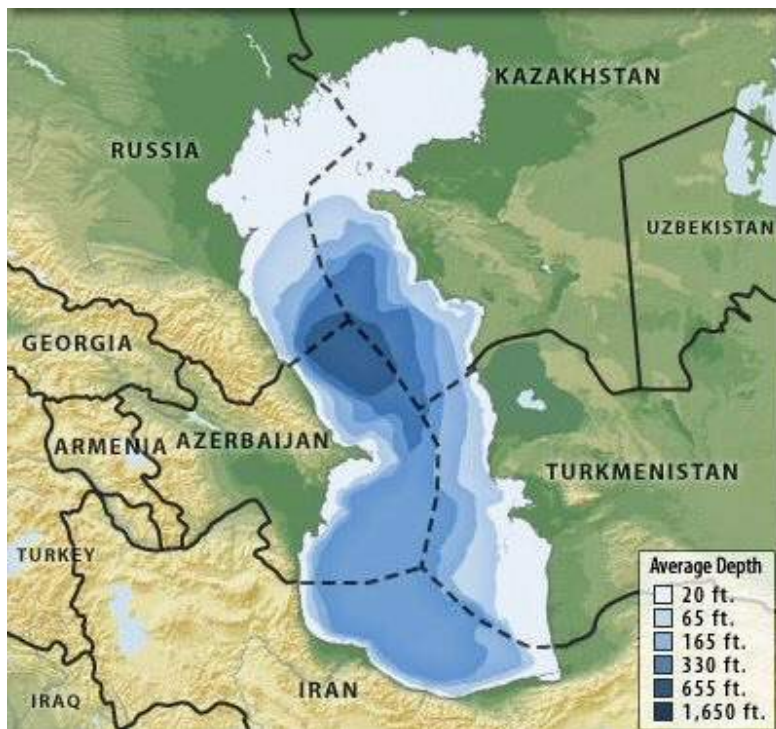
今年9月份的时候，伊朗国际部长在一个军方测绘软件的发布会上，曾经说过一段让中东问题观察家们颇为紧张的话：“伊朗的实际国土面积可能比先前测定的面积大14%”。在公开表达上述言论之后，伊朗方面并没有解释作出新测定结果的依据。结合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来看，或许可以将之解读为之前的测绘结果由于技术不够先进，存在技术上的误差。只是如此之大的比例，简单的归结于技术误差，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而由此引发邻国的不安，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目前中东、中亚的地缘政治局面来看，伊朗在这个时候如果提出对某一国的领土诉求，并不明智。这只会让它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相信这一点，伊朗的政治家也有清醒的认识。问题是，如果伊朗这次所公布的数据不是因为技术误差所至；那么这个举动，很有可能还是带有领土诉求，只是其战略指向的不是“陆地领土”，而是海洋领土。

第三节 里海周边国家对里海水域的划界

就伊朗的地理位置来说，能够紧邻里海和波斯湾这两个世界级的大油库，是它的地缘优势。由于这两片水域周边都存在着多个国家，博弈也就在所难免。最有可能被伊朗加入领土面积的，是里海的部分水域。对于这个名字中有“海”，但地理身份是“世界最大咸水湖”的水域来说，它的政治身份到底是“海”，还是“湖”却一直存在争议。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前，里海沿岸国家只有苏、伊两国时，双方倒并没有对里海的身份作过多解读，而是视其为两国共有的内湖。引发认知变化的直接原因，是苏联解体之后，里海边上从苏联当中分裂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三国。而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则是铁幕撕开后，西方石油公司得以进入里海进行大规模勘探，并认定里海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波斯湾。

老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放在地缘政治当中，也是如此。与之前里海边上只有苏、伊两国相比，现在五国（加上俄罗斯）环绕的地缘格局，注定会让里海成为博弈的焦点。所谓“湖”、“海”之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益。假如里海被定义为内陆海的话，那么周边国家在划分利益线时，就要按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这样三个层级来切割里海。问题的关键并在于切割的份额多少，虽然如果五国都同意按海洋属性来切割，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关键点在于，根据各国海岸线的位置，你有可能切割出来的区域，是否有更多的资源。鉴于现在里海油气勘探的结果表明，伊朗、土库曼斯坦的近海资源，远不如俄、哈、阿三国多。所以伊、土两国是“湖”派的坚定支持者，而另外三国则自己归属于“海”派了。



里海地图

算盘，其他三国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对于俄罗斯、哈萨克、阿塞拜疆来说，里海是湖是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对里海进行分割，把自己对应的那片海底资源划到自己名下。即使是定位为湖，这种切割也同样是可以进行的。前提是切割的方案能够在所有里海国家中，达成妥协。鉴于持切割态度的国家占多数，伊朗想以里海是湖为基础，再提出共同共有的想法，就很难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被迫展现出弹性，同意可以对里海进行切割。前提是，按照一人一份（每国 20%），而不是岸线对应的原则分割水域。鉴于伊朗所拥有的里海海岸线并不占优（没有 1/5），前一种方案能够让伊朗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就里海是湖是海的定位，伊朗方面是肯定不会让步的（那样切割就“有法可依”，而不是协商决定了）。

以里海沿岸国家的地缘实力来说，真正能够决定里海问题走向的，并不是伊朗，而是“瘦死骆驼比马大”的俄罗斯。单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俄国人还是认可以海洋属性切割里海的。毕竟这样的话，俄国人就可以不必从自己的碗里分出肉来给伊、土两国了。至于哈、阿两国，也同样计算出如果按照专属经济区原则来切割里海，自己能够获得超过 20% 份额的资源。不过这个世界上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眼前的经济利益，对于俄国这样有想法的世界级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里海如果以海洋身份进行切割的话，对于俄国人来说其实是存在很大地缘政治风险的。由于各国对自己的专属经济区，都享有独立的开发权。其他国家引入地区之外的石油公司，特别是西方石油公司进行开发，几乎是必然的。更

伊、土两国之所以坚持认定里海是湖，是因为如果对于界湖水面划分、权益归属，并没有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具体而又数字化的规定。换句话说，如果里海最终被界定为湖的话，水域权益的分配，切割与否，是由沿岸国家协商决定的。这让近海海底资源较少的伊、土两国，有机会利益均沾其他三国的近海资源。而“一国一票，共同共有”，则是伊朗的外交方向。

对于伊、土两国的这个小

为重要的是，这也为中亚的哈、土两国，绕过俄罗斯在里海海域和阿塞拜疆无缝对接，铺设横跨里海的油、气管道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中亚已经在二十年前脱离了俄国人的直接控制，但在俄国人心目中，中亚仍然是自己的地缘利益区。最大限度阻止美、欧渗透中亚，也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既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对于里海法律地位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转而倾向于认定里海是湖，其相关事务应由里海国家共同决定（特别是在今年9月，欧盟已经着手安排，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谈判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基于在排除西方势力介入里海事务上有共同的利益，相信伊、俄两国下一步在里海事务的处理上，会达成同盟。

关于里海地区的地缘博弈，本意是在今后有机会做个专题的。之所以提前做了一些解读，是因为里海所发生的一些状况，在未来有可能在波斯湾重演。至于这些状况究竟是什么，伊朗甚至巴林，又会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第四节 伊朗在波斯湾能拥有主权的水域面积

说到里海发生的一些状况有可能在波斯湾重演。已经有人想到，是不是伊朗有想法，把部分波斯湾也划成内水？我们不妨先做个简单的计算，里海的面积约38.6万平方公里。前面我们也说了，伊朗可能争取的最大份额是20%，折算下来也就是约7.7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伊朗即使决意把里海的面积算入领土面积的话，和它设定的22.5万平方公里的计算结果，也还差14.8万平方公里。如果伊朗真的认定自己能够多出14%，也就是2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又不是对邻国提出领土要求的话。那么在技术上，波斯湾是唯一有可能补上这个窟窿的区域。

关于国土面积的计算，各种资料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的说法认为领海、专属经济区等等，拥有不完全权力的区域也应计入国土面积。而就通常的理解来说，能够拥有完全主权，任何国家的人员、交通工具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陆地、水域，才是公众所认知的“国土”，相信伊朗方面也是这样认定的。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已经明确分割的界水（湖）以内的水域面积被计入国土面积是没有异议的。如果伊朗和周围邻国达成协议认定里海是“湖”，并进行分割的话，那么它不管得到多少，都可以划入国土面积。当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定国土的范围和面积，有时并不一定会等边境条约签订之后。作为一种外交谈判手段，在争端未解决之前，单方面明确的最大诉求，并在国内以某种方式固定（地图、立法等）下来，也是很常见的。就这种情况而言，作为中国人的

我们来说，想来也不会陌生。

和里海的身份有湖、海之争不同，波斯湾是没有办法争取到一个“湖”的身份的。但从地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来说，像波斯湾这种仅仅依靠一条狭窄通道连接外海的内海湾，被认定为一国拥有完全主权的“内水”，并行使完全主权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中国的渤海，其开放程度要远高于波斯湾，但即使是极力压缩其他国家领海、内水空间，以保障自己海洋通行权的美国，也不置疑中国对渤海的完全主权。当然，在政治实践中，这种被公认拥有完全主权的海湾，基本都是在在一国控制之下，外部力量没有充分的理由切入进去。

假如波斯湾沿岸地区像历史上诸多帝国时期那样，置于一个国家管辖之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对于波斯湾的完全主权，相信也不会有人质疑。至于是否在正式文件中，把这部分海洋面积算进“国土面积”，也就变得不重要了。就波斯湾目前的情况来看，沿岸国家相互之间所确定的分割原则，还是以公平原则进行切割的。你所能得到的份额和你的海岸线长度，以及所对应的国家有关。按照这个切割原则，拥有整个波斯湾北岸的伊朗，大致能够控制到半个波斯湾，也就是 12 万平方公里。只是海湾国家的这种分割，所指向的主要是波斯湾海底的大陆架。其目的是为了分割底土下面的油气资源，并非是一种从海底、海面到领空的立体主权切割。

关于海洋权力范围的划定，从来都是一笔糊涂帐，各国都在从所谓的国际法、国际惯例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主张权力，扩张控制范围。所以如果有一天，伊朗认为自己有权开采半个波斯湾的资源，同样也应该拥有“非请勿进”的主权，也并非天方夜谭。当然，如果伊朗如果真的要做到切割波斯湾的话，最起码要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达成一致意见，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一旦波斯湾被作为主权领土，分配给沿岸国家后。那么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伊朗和阿曼之外，其他国家再想把石油从海路运出去，就必须借道通过了。

其实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把波斯湾北部划成主权之地，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毕竟从经济上来说，大家能够对海底的资源划分，达成妥协就行了。伊朗的真正目的，在于保障自己南线的地缘安全。假如要为此战略目标设定一个政治方向的话，那就是“波斯湾的门罗主义”。

第五节 波斯湾与其他中东海区的地缘价值对比

每一个有想法的大国，都一定会在海洋方面有所想法的，只不过向海洋扩张的战略目标，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力（潜力），以及地缘位置制定罢了。南海之于中国，北印度洋之于印度，地中海之于法国，都是上述国家重点经营的“海

洋利益区”。套用门罗主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核心理念来说，不管经营海洋利益区的“大国”提不提出类似政治口号，其战略目标都是指向于此。

当然，这个世界是永远存在竞争的。即使你在自己确立的海洋利益区中，和沿岸国家对比占据绝对优势，也并不代表一定能够成为该海区的霸主。毕竟那些和你有竞争关系，或者出于地区平衡，不愿意你做大的国家，总是会想办法来搅局的。对于这些在该海区没有地缘优势的国家来说，一个多方牵扯的平衡局面，会比一家独大的格局，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你的对手实力。对于中东这个板块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板块。四个边缘陆区之间，梅花间竹般的相间着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黑海——里海，几个海区。这种格局使得每个边缘大国，都可以相邻两个海区，并通过对相邻海区施加地缘影响，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甚至国际影响力。

当然，你能够从海洋当中额外获取多大利益和地区影响力，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相邻海区的地缘价值。一个能直接影响到地球上其他国家利益的开放性海区，总是比只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封闭、半封闭性海区，要更有影响力。照此标准，红海的地缘价值，就要比黑海——里海要高；二、你在该海区沿岸国家中的比较优势。鱼塘里的鱼越多，意味着这个鱼塘越有价值。但紧邻鱼多的大鱼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比靠着小鱼塘的人，收获更多。这取决于该海区的地缘优势（重点包括岸线的长度、质量及海峡的控制力）、竞争对手的实力和数量。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整体优势，就远不如他们在黑海的话语权了。

最后就是相邻国家对该海区的依赖程度。假如该海区在你的邻居眼里，并不占据核心价值。他的主要利益在另一块海区的话。即使你在这片海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也很难从这种优势获得太多的地区话语权。俄国人固然可以通过主导里海，向伊朗施加地缘影响力，但想就此控制伊朗，渗透中东就不现实了。

从区位价值来看，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海区无疑应该是红海——亚丁湾一线。除非有一天空运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并取代海运成为大宗商品物流的主力渠道。否则借助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红海——亚丁湾一线的海上交通区位优势，是不会动摇的。相比红海的世界性区位优势，波斯湾的区位价值就低得多了。这样一个类似“死胡同”的内海湾，最大的区位价值就在于让沿岸国家有机会拥有更长的海岸线，或者直接晋升为“沿海国家”。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波斯湾盆地（波斯湾及沿岸低地）储藏了世界六成左右的石油资源，它的地缘价值已经阶段性的超越了红海海区，成为中东乃至世界博弈的焦点。

当然，如果我们再过百年回头看历史的话，会发现红海海区的区位优势要

稳固得多。因为有很大可能，在波斯湾的石油枯竭之后，人类还无法在空、天物流渠道上实现大突破。既然波斯湾因油而贵，一跃成为了最有价值的海区。那么谁能够在这个海区中占据主导地位，谁也就更能够在地区话语权的争夺中处于有利位置。说到波斯湾的地缘政治结构，伊朗无疑是最具地缘优势的。这并不仅仅取决于波斯人能够控制半数波斯湾的海岸线及海区，更在于他们能够站在霍尔木兹海峡边上。只不过在海峡的另一边，阿曼代表阿拉伯人控制了海峡的南岸（地理名称为“穆桑代姆半岛”）。假如波斯人当年能够像土耳其人控制伊斯坦布尔那样，控制穆桑代姆半岛的话，那么即使对面的阿拉伯人统一为同一个国家，波斯人在波斯湾也能够拥有最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第六节 伊朗在波斯湾的战略目标

在现有的情况下，期待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组成一个新的帝国，集中管理波斯湾是不现实的。波斯人如果希望在波斯湾实现“波斯湾的门罗主义”，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杜绝外部军事力量进驻波斯湾。事实上，在现在衍生出来的各种版本的海洋“门罗主义”中，禁绝区域以外国家的军事干预都是重点。比如当年苏联在经营里海时，就和伊朗达成协议，禁止外国军舰进入里海。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不允许西方国家，在里海沿岸布设军事基地。现在里海周边虽然已经分裂成5个国家，地缘形势更为复杂。但对于俄、伊两个有想法的国家来说，禁绝外部军事力量的进入原则并不会改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黑海，只不过由于黑海的地缘结构更为复杂（俄、欧、土三方博弈）。黑海国家在如何限制外国军舰进出的问题上，出现过多次反复。单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它的最高目标是一切军舰未经许可禁止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出黑海，以此来取得黑海的主导权。当然，这种想法是绝对得不到对面俄国人同意的。在俄国人看来，土耳其海峡由俄、土共管才是最佳方案。而区域以外的海洋国家，同样不愿意就此丧失对黑海沿岸国家的军事影响力。基于几方利益所达成的平衡，于是在1936年达成的《蒙特勒公约》，对军舰进出黑海进行了限制性规定：一、黑海国家平时有权自由通过海峡；二、非黑海国家派遣进入黑海的军舰类型、吨位和在黑海停留时间则受到限制；三、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四、如土耳其参战或受到战争威胁时，有权允许或禁止任何军舰通过海峡。

里海或者黑海模式，将来对于波斯湾国家都有借鉴作用。而伊朗从自身的地缘安全来看，肯定会是波斯湾限外（军）的积极推动者。至于海湾对面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立场就显得很微妙了。从现在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以沙特阿

拉伯为首的君主国们，由于已经与美国形成伙伴关系。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力量排除在海湾之外，并不符合酋长们的利益。说得再简单点，就是他们需要美国的军事介入，以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假如海湾国家之间达成正式协议，禁止一切外部军事力量进入的话，那么当年在萨达姆吞并科威特时，美国的军事介入就要困难得多了。最起码，那些阿拉伯君主们，就必须考虑直接借道给美军通过了。由此引发的政治、社会风险要远大于美军从海上发起攻击。而从伊拉克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当年美国人从海上直接对伊拉克发起攻击的记忆，想必还历历在目。尽管现在伊拉克的政权，是由美国扶植起来的。但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波斯湾有一天能够禁绝外部军事力量的进入，伊拉克同样能够在地缘安全上获得保障。

从地缘竞争的角度来看，以沙特为首的半岛君主国体系，会是伊朗地缘扩张的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巴林”。将巴林这个位于波斯湾腹地的国家，变成什叶派执政的国家，不仅能够让伊朗的“什叶派联盟”从新月沃地向波斯湾腹地延伸，更能够对波斯湾沿岸的君主国起到破坏作用。要知道，即使是逊尼派的旗手——沙特，境内也拥有 10% 的什叶派居民（并且集中在波斯湾沿岸低地）。而像科威特因为紧邻伊拉克，什叶派的比例更高达 30%，如果半岛君主体系从巴林被突破，很难说不对这些波斯湾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当我们理解了伊朗在波斯湾布局的意图所指之后，就应该清楚了，伊朗是否真的对波斯湾有主权方面的要求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伊朗获得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一种战术手段（而不是战略目标）。

就像波斯人目前在幕后帮助巴林的什叶派争取政治权力的行动一样（虽然伊朗官方极力否认）。至于沙特和他的君主国盟友们，目前还是会和跨海过来和“异教徒”们同舟共济的。在美国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便直接介入巴林事务时，沙特和阿联酋的军队成为了稳定巴林政局，镇压什叶派争取政治权力行动的保障。只不过西方和半岛君主体系在巴林支持现有强力政权的“维稳”指向，和在叙利亚、利比亚那种在政治、军事上支持“反对派”的做法一对比，显得是多么的“务实”。

变身为海峡了。不过不管红海的地缘价值有没有升值，它的地理属性都没有变化，是注入了海水的东非大裂谷。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内容的主角“西亚裂谷”。之所以为大裂谷的最北端，贴上“西亚”的标签，无非是因为在地理划分中，红海以东地区已经属于亚洲了。尽管在整个东非大裂谷当中，西亚裂谷的体量显得非常的小，但就是这样一小段裂谷带，却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以及宗教史中最为重要的区域。直到今天，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正如宗教可以细分出很多级别的教派一样，作为东非大裂谷次级单元的“西亚裂谷”，同样也可以再继续分解为两块：即南部的“大裂谷主体”部分；北部的“大裂谷北延山地”。而二者之间的分割点，则叫作“黑门山”（也有译“赫尔蒙山”的）。



西亚裂谷地理结构图

是更像一弯写意的新月了。怎么算其实无所谓了，大家知道我们一般所说的“新月沃地”指的是前者就行了。

如果说新月沃地的东段，大致可以用“两河中下游地区”这个地理单元来对应的话，那么西段的地理核心就是“西亚裂谷”了。正因为如此，“新月沃地”地理结构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西高东低”。就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

我们前面说了，所谓新月沃地是由“两河中下游地区”（准确的说，幼发拉底河中游由于被沙漠隔离，不包括在内），加上阿拉伯半岛沿地中海地区组成的，在这弯新月之外的半岛腹地，基本就是沙漠半沙漠的干旱地区，其间间或点缀一些绿洲了。也有一种说法，新月沃地还可以把埃及境内的尼罗河谷、三角洲包括进去。单从外形来看，包括这三个地理单元的“新月沃地”，倒

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加上巴勒斯坦这个半独立国家，都是依附于这条高地带生存的国家。而它们之间的行政划分、历史背景，也和西亚裂谷带内部的地理结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前面我们也说了，西亚裂谷带以“黑门山”为分割点，可以分割成南北两块。假如你手边没有精确的地形图，我们也可以在行政地图上，找到黑门山的大致位置——即叙、黎、以三国交界之处（假如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也算作以色列领土的话）。而作为中东焦点的巴、以两国，则是位于黑门山以南地区。

第二节 西亚裂谷带的水资源条件

地缘政治方面的解读，在我们了解清楚地理结构之后会全面展开的。现在让我们回到裂谷本身，先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特点。既然我们已经把西亚裂谷划分为南、北两块，那么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势必有着明显的差别。简单点说，黑门山以南是属于真正的裂谷带。可以由北至南再划分为约旦河谷、死海洼地、阿拉伯谷地、亚喀巴湾四个地理单元（如果把已经被海水侵入的“亚喀巴湾”视作红海的一部分，也可以认为是三个地理单元）。其最低点在著名的“死海”，最深处可达“—800米”；至于黑门山以北地区，我们称之为“大裂谷北延山地”。内部亦可划分为两块，即南部的贝卡谷地，以及北部的阿西河谷。

在历史上，整条西亚裂谷带，都是欧亚地缘博弈的焦点。如果你对宗教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无数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大“一神教”的圣迹。不过要说地缘重要性，也像它们的地理关系一样，南段是核心，北段则是延伸。就黑门山以南地区而言，在圣经中有一个专门的地缘标签进行概括，那就是“迦南”之地。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土地”。当然，土地本身是不可能产出奶与蜜了，所指的无非是当地农业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罢了。说到人类眼中的肥美之地，首要素就是需要有“水”了。能够有足够水资源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农业产区。

不过有水也并不代表农业潜力巨大，因为如果这些水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的话，还是无济于事。在我们的地理解读中，冲积平原之所以总是会成为重点，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类低地本身就是由河流自然作用而成的。这些平原不仅有高地流淌下来的河水补给，还能够凭借较低的成本，形成可受人类控制的灌溉网。如果像横断山脉那种地区，因为地形所限，河流边上没有形成安全的冲积平原；那些大部分散居于高地之上的居民，就很可能在降水减少时，眼睁睁的看着山脚下的河水奔涌而去了（作为人均水资源超全国平均值四倍的水资源大省——云南，去年遭受大面积旱情，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如果有足够水资源补给，低地无疑是有更优的农业条件，并聚集更高密度的人口。但这并不代表在地理特征中，低地是最重要的板块。事实上，假如没有高地孕育河源，并通过河道向低地输水的话，你所能看到的，并不会是沃野千里的良田。这一点，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大片低海拔的沙漠地带，就是明证。要不是靠着东、南非高原蓄积的巨量淡水（特别是埃塞俄比亚高原，这块突出东北非的高地），尼罗河也不可能有力量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一般这类河流，都会成为流不到海的内陆河），为北部非洲争取到一条绿色带。

既然水资源供给的决定权在高原，更有利于人类开发使用的地区是低地，而将两者串连起来的又是“河流”，那么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拥有农业条件优越的中下游地区，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下游地区的国家来说，只有在将上游高地并入国土之后，才算拥有完整、安全的地缘结构。当然，这种整合也可能是逆向的，即由高地民族反过来征服低地。在这种整合当中，谁搞掂谁并不重要，能够拥有完整水系的国家，会更有竞争力。我以前曾经说过，青藏高原是中央之国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边缘地区，也正基于这个原因。

因为不能控制上游高地，而不得不受到邻国掣肘的例子比比皆是（想想中南半岛）。而在阿拉伯地区，身处两河中下游地区的叙利亚、伊拉克应该最有感受。在高原上控制两河源头的土耳其人，已经不止一次将水源的“开关”作为影响两国政局的武器使用了。回到我们这节的主角“迦南”之地来，与两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供给，必须依靠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这条高原带不同。生活在西亚裂谷带上的族群，倒是不用在地缘结构的完整上，接受如此之大的外部压力。依靠拦截地中海吹来的水汽，裂谷两边的高地就能够为裂谷和沿海平原提供淡水。也就是说，尽管和其他地理单元比较，“西亚裂谷”的体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你仍然有机会在如此狭长的地带中，建立一个拥有完整地理结构的国家。

只是问题在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地缘博弈激烈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板块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内部地理结构的复杂程度。像西亚裂谷带这样小的地理单元，由于结构的复杂性，其内部地缘博弈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博弈。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博弈，亦同样在当代的地缘政治中延续，并影响到世界政局的稳定。

第三节 迦南之地内部结构的多样性

前面我们也说了，黑门山将西亚裂谷带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而南部的“迦

南”之地，又是处在核心位置。那我们就不妨来看看，上帝在二千多年前，指定给犹太人的这块“应许之地”（圣经中是这样说的），在地理结构上具不具备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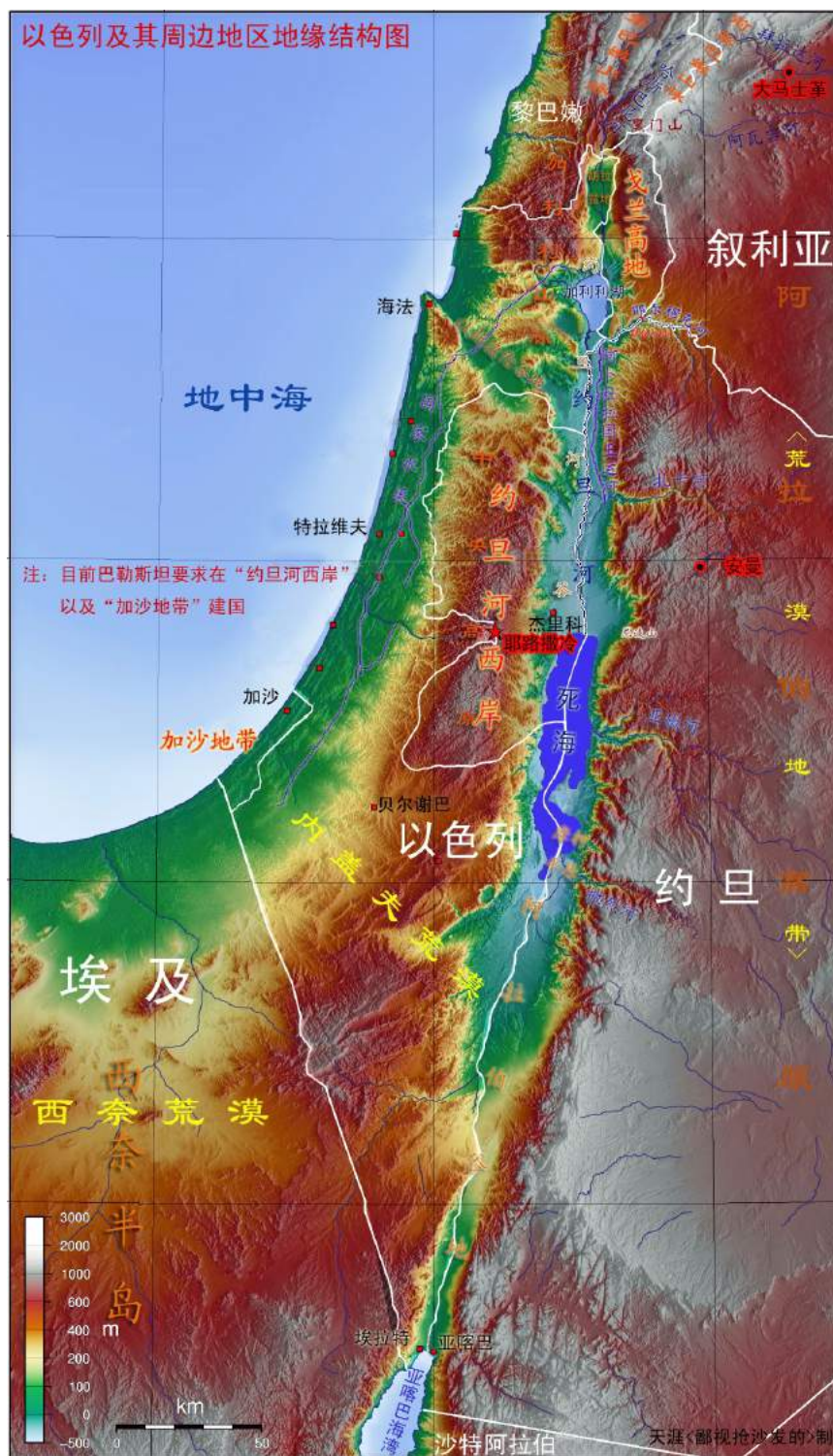
纵向解剖“迦南”之地，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两高两低”格局。“两高”指的就是裂谷两边的山地，两低则包括面向地中海的沿海平原，以及裂谷中的谷地。按照一般规律，裂谷西侧高地，应该会有多条平行的河流独流入海，供给沿海平原。只不过如果山地和沿海平原的纵深太小的话，我们很难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看到它的存在（有一天沿海平原延伸到足够的纵深，这些河流最终会汇集成一个水系的）；而在峡谷中间，两侧高地所收集的雨水，则会自然在峡谷之中汇集成一条河流，并沿河流两岸冲积出狭长的平原带。那么迦南之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据说当年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临终之前，曾经被上帝带到高山之上，把迦南之地全貌指给他看。目力所及之处，包括山、川、海、湖、沙漠、高原、草场、丘陵、雪峰、沼泽…，等各种的地势特征皆映入眼帘。传说固然有演义成分在里面，但客观事实却的确如此。在这片长约 250 公里，宽不足百公里的区域里，所包含的地理变化之丰富，在这个星球上应该也是非常罕见的。结合东非大裂谷为人类发源地的身份，迦南之地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人类的发展而言，“世界”这个概念是在不断扩大的。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把世界的范围，覆盖到整个星球表面了。而如果有一天，人类向外太空移民成功。我们的“世界”观就必须变得更加外延和立体了。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后代再解读地缘的话，估计就必须借助全息技术，以星际图作底图了。相反，时间越向前推移，人类所认识的“世界”也就越小。被条块分割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族群，都会依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地理结构，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而迦南之地的优势则在于，它的范围之小，足以让文明之始的某个部族覆盖全境；其地理结构之复杂，又能够更快的从多角度激发出成熟文明来。也正是在这种地理背景之下，迦南之地成为了世界上宗教、族群博弈最为复杂的区域。

既然说迦南之地内部结构足够多样，那么我们不妨将其展开，看看这个“微缩世界”到底奇特在哪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离不开水。各地区、民族也都有自己认定的“母亲河”。我们不妨来看看迦南之地的母亲河在哪里。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黑门山以南的“西亚裂谷”腹地，应该是最有机会出现一条“大河”的，放大地图后，我们很快便能找到这条中东名河——约旦河 (Jordan river)。

在犹太人心目中，约旦河不仅是母亲河，更是一条“圣河”（为什么这时



以色列及周边地区地缘图

半的路程，提前入“海”，这个海就是举世闻名的“死海”。

第四节 死海盐度的特点和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死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含盐量高，绝大部分生物都无法在水中生存，“死海”之名也正得自于此。不过这种高密度的特性，也为死海带来了另一个特质，即“死海不死”。意思就是说人到了里面，就会自然浮起来，怎么也淹不死。

我会想到“恒河”）。至于约旦河的发源地——黑门山，希伯莱文的本意就是“圣山”。不过作为犹太人血缘上的近亲，现在迦南之地的竞争者——阿拉伯人，对黑门山的感情倒是没那么深。对于这个游牧文明属性的民族来说，更为干旱的阿拉伯半岛西侧的“赛拉特山脉”，才是自己文化的发源之地。因此阿拉伯人对黑门山的称呼是“老人山”，取其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积雪，有若白头翁之意。

正常情况下，黑门山上的雪水在山下汇集成河之后，应该在峡谷之中接受来自两侧山地的支流补给，最终汇入大海。不过约旦河所处的这条峡谷，并非一般的峡谷，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而裂谷地形带给约旦河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可以缩短近一

至于死海这超高的含盐量，则主要“得益”于环境太热（被沙漠地带包围的死海，周边的热度可想而知）。在死海的进水量始终无法明显高过蒸发量的情况下，约旦河水并无法通过死海之后，再沿南面的阿拉伯谷地注入红海。在这种情况下，死海水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天空蒸发。问题在于水能够蒸发掉，但矿物质却只能留在湖底了。时间一长，死海的含盐量也就越来越高了。

死海的高蒸发量，除了气候原因以外，也和这片洼地的体量有关。假如这个坑不是那么大，那么深。约旦河水并不会大范围在此“晒太阳”，而是像尼罗河那样快速通过沙漠地带，在正常耗损掉一部分水份之后，仍有余量走完剩下的路程到达海洋。不过光有高蒸发量，还不能造就“死海”。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进水量一直小于蒸发量，那么这种咸水湖的命运最终都逃不脱变成干涸的盐碱地。而死海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其盐度达到一般海水的8——10倍左右时，进水量和蒸发量就趋于平衡了（在20世纪之前，进水量还稍微高于蒸发量一点。也就是说，圣经时代的死海水面还要比现在低一些）。这个浓度一方面能够杀死绝大部分生物，使之得名“死海”；又能够让死海看起来还是“海水”，不至于变成浓稠的盐卤水（那样人去下就成咸肉了），成就“死海不死”的美名。

有“死海”这个只进不出的大坑在前面堵着，死海南面的“阿拉伯谷地”当然就无法得到约旦河的润泽了。相比于约旦河能够终年得到黑门山上的雪水补给，阿拉伯谷地的淡水补给，就只能依靠两侧山地雨季承接的雨水了（可惜降水又很少）。这样汇集而成的河流——杰卜河，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季节河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西亚裂谷的地势并非北高南低，而是两头高，中间低。也就是说，阿拉伯河谷靠近死海的北端，是最低点。而靠近亚喀巴湾的南端，是最高点。在这种结构下，杰卜河虽然无限接近真正的海洋，但它的归宿仍然是北流入“死海”。

既然死海本身由于含盐量过高，而成为生命的禁区，那么我们也就很难指望它能够像淡水湖那样，把周边地区润泽为鱼米之乡了。在阿拉伯半岛，如果没有足够的淡水资源支撑，沙漠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死海四周，包括两侧山地朝向死海的坡面，沙漠化都非常严重（西侧比东侧更早沙漠化，原因后面会分析）。能够支撑死海沿岸地区经济的，除了旅游业以外，就是开发“海水”中丰富的矿物资源了。

这样看来，从人类生存和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西亚裂谷南段的死海洼地、阿拉伯谷地都没有太大价值了。那么死海以北有充足淡水补给的约旦河谷，应该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在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中，约旦河谷也的确被描绘为丰腴肥美的土地，并称之为“上帝的花园”。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约旦河谷，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的约旦河下游，已经变

身成为了一条污水横流的小河沟了。要想了解这点，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约旦河谷的内部结构。

第五节 英法的殖民对约旦河谷形成现状边界的影响

在约旦河从黑门山上奔流而下之后，死海并不是它掉入的唯一大坑。在注入死海之前，这条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河流，还经过了另一个大坑——加利利湖。这个面积和深度都低于死海的大坑（海拔 - 213 米），并没有像死海那样阻挡住约旦河的南下之路，而是成为了调解约旦河水流的中继站，河水在蓄满湖盆之后，由南端河口溢出继续南下（专业叫法是“吞吐湖”）。狭义的“约旦河谷”，指的也就是加利利海——死海之间的河谷平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愿意的话，加利利湖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水库。用它来调节约旦河下游的水量，可以让约旦河谷的水资源利用更加合理，使其生态、农业环境较之古典时期更为进步。

假如包括加利利湖在内的整条约旦河谷，都置于一个国家的管辖之下，相信上述设想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由于约旦河两岸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加利利湖以南的河谷地带，非但没有对淡水资源做出合理布局，反而被从上游、支流处不断截流，恶化了河谷的生态环境。而这其中，负责蓄积约旦河上游来水，能够控制约旦河水系流量一半以上的“加利利湖”，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说起加利利湖和约旦河下游的地理关系变迁，就必须先花较长篇幅来了“迦南之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了。简单的来说，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状态之所以大不如前，是因为它本身成为了一条政治分割线——巴勒斯坦地区和约旦的边界。请注意，我说的是“巴勒斯坦地区”，而不是“巴勒斯坦国”。就“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地缘标签来说，它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造就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仍然是那些曾经的欧洲殖民者。

我们分析过，以黑门山为界，整个西亚裂谷地带可以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是“新月沃地”的控制者。而在奥斯曼帝国日薄西山之后，这条中东的核心地带，自然也成为了欧洲国家的扩张区。参与西亚裂谷带竞争的，是来自欧洲的那对欢喜冤家——英国和法国。竞争的结果是法国人控制了黑门山以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人则控制了黑门山以南地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约旦（两河中下游的新月沃地，双方也是各占一半）。这个区域在当时，整体都被称之为“巴勒斯坦地区”。

事实上就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概念来说，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上可以

和古老的“迦南之地”划上等号。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地理环境发生质的变化之前，无论是三千年前的犹太人，还是 100 年前的欧洲人，在思考地缘板块的划分时，所面临的地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从地理结构的完整性上来看，圣经时代的“迦南之地”也好，殖民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也罢，都应该包括“两低两高”的地理特征。也就是说，裂谷内部的谷地、沿海平原，以及裂谷两侧山地都是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组成部分。当然，相对模糊的是裂谷带东则的高地边界。由于这条高地与阿拉伯高原相接，其地理边界并不明显。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河流的走向中，观察出它的分水岭来。理论上，裂谷东侧山地那些注入约旦河的支流流域，都应该是古迦南之地的延伸之地。不过英国人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向东走得更远，包括了大片阿拉伯高原上的沙漠之地（也就是现在约旦的东部地区）。

其实这种差异并不重要，在欧洲人有条件利用技术手段划界之前，无论是中东的阿拉伯人，还是东亚的中国人，都不会认为在干旱的无人区，划出明显的行政线有多少价值。我们经常能够在世界地图上看见那些横平竖直的行政边界，这种现状其实就是欧洲殖民者，用标尺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像美国的国界和州界，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在阿拉伯地区，这种划法也确有无奈之处，要想在那些广袤的沙漠地区，找出明显的地理分割线是十分困难，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在沙漠地带能够发现油、气资源之前，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对这种边界的划分大多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如果某一区域，并非是所谓的“无人区”，而是土著文明存在时（很不幸的是，北美印第安人被欧洲人无视了），欧洲人其实也还是愿意尊重基本的地理分割法，以分水岭或者河流，这类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作为行政划分依据的。具体到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成为一条界河的问题，就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一次分裂。

第十四章 一战后英国对阿拉伯政治格局的影响

第一节 哈希姆家族在内志和汉志的竞争中落败

说起“复国运动”，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的过程，通常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个民族能够在亡国 2500 多年，整体迁出故土 2000 年后“复国”成功，都是一个奇迹。不过在犹太人具体实施复国运动之前，在迦南之地已经生活了 1300 多年的阿拉伯人，已经率先掀起了阿拉伯民族独立的“复国运动”。阿拉伯人的这场民族独立运动，发生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就其主力领导者而言，有内志和汉志两个王国。具体到地缘板块来说，前者的核心区就是阿拉伯腹地的“内志高原”，后者的控制线，则在包含麦加、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在内的“赛拉特山脉”。这段不包括也门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西侧山地，也被称之为“汉志山”。

内志和汉志这两个阿拉伯文化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我们在沙特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内部火拼当中，统治内志高原的“沙特家族”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1924），并最终建立了包含汉志、内志地区在内的“沙特阿拉伯”。这场博弈的结果不仅影响了阿拉伯半岛最终的行政划分，还对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在竞争中落败的“汉志地区”的统治家族，是由穆罕默德后裔繁衍而成的“哈希姆家族”。在失去了对圣地的控制权之后，以圣裔自居，“根正苗红”的哈希姆族也不可避免的衰败了。在随后产生的海湾君主体系中，除了伊拉克之外，都是那些出身不那么高贵的阿拉伯贵族。只不过伊拉克的君主体系，在 1958 年就被革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推翻了。不能说其他海湾君主们推动了这个结果的发生，但从权力竞争的角度来看，“夺嫡”成功的沙特家族，是有很大理由希望看到自己宗教、民族领导权的最大竞争对手消失的。

其实从调和阿拉伯民族内部矛盾的角度来看，以哈希姆家族为首建立的君主体系，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正统的出身，不仅可以让治下的阿拉伯人更有向心力，同时也可以调节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什叶派看来，如果是穆圣和阿里之后来担当君主之位的话，是可以达到神权与政权的统一的。正是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流亡在外的伊拉克王族，以及其他哈希姆家族的成员，曾经试图在伊拉克恢复君主制，以稳定局势。最终没能成功，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得不到海湾君主，尤其是沙特家族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既然汉志王国在与内志王国的竞争中失败，那么是不是代表哈希姆王族就此退出了阿拉伯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呢？当然不是，因为哈希姆家族领导阿拉伯人起义，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之后（1916年），随后就开始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征程。和同时期崛起的内志王国将主要扩张目标对准汉志地区，试图通过夺取圣地来占据阿拉伯领导权的沙特家族不同。已经完成这一进程的哈希姆家族，很自然的把目标锁定在了阿拉伯半岛最肥沃的土地——新月沃地之上。伊拉克的君主体系（1920——1958）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另一个哈希姆王国——约旦，也正是在同一时刻从巴勒斯坦地区分离出来。

第二节 哈希姆家族在英国支持下的起义和建国

要想了解约旦是如何从巴勒斯坦地区分裂出来，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我们必须先交待一段历史。我们知道，在西方殖民者渗透阿拉伯半岛之前，奥斯曼帝国是中东穆斯林最后的帝国，并成为新月沃地及赛拉特山脉的主人。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得到麦加、麦地那两块圣地，坐实自己穆斯林政教领袖的地位，赛拉特山脉一线，一般是可以留给阿拉伯人作保留地的。不过后来随着欧洲人的不断东进，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宗主权，也受到了很大挑战。

为了重振帝国的雄风，在欧战（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加入同盟国，与德国结成盟友。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读一战的阵营组合背景，但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即从瓜分世界的角度来看，德国、土耳其都是属于被边缘化的国家。前者由于地处中欧，无论是海外扩张还是陆地扩张，都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则是因为欧洲国家强势扩张后，原有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蚕食，并且还会继续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德、土两国也就有了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法、俄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地缘动机了。

基于地缘位置和动机的原因，土耳其人的作战区域，基本是在它曾经的帝国版图内。而阿拉伯半岛，就是土耳其人的主力战场之一。对于英、法等协约国成员来说，他们的主战目标还是锁定在欧洲本土。因此在阿拉伯半岛的争夺中，英国人更愿意借助阿拉伯本土的力量，来削弱土耳其人。而这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历史机遇，毕竟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已经被“压迫”了四百年。现在有大国愿意帮助他们争取“独立”地位，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在英国人的支持之下，阿拉伯半岛在1916年爆发了“阿拉伯大起义”。而起义的领导者，就是汉志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汉志国王在起义之前是奥斯曼帝国任命的汉志总督）。

我们这些“外人”，仅凭资料就已经能够分析出“新月沃地”的重要性，

那些身处其间的阿拉伯人，当然更明白“得新月者，得中东”的道理。即使是仅仅出于统一阿拉伯半岛的目标，新月沃地也必须是第一收复的板块。应该说，有了英国的支持，以及哈希姆家族的影响力，阿拉伯人计划还是进展得很顺利的。除了汉志地区以外，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相继被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人解放了。鉴于英国人之前所作出的承诺（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哈希姆家族决定开始建国计划。其中汉志国王的三子“费萨尔”被任命为叙利亚国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而二子“阿卜杜拉”，则成为了伊拉克国王。

可能看过这段历史的人，会觉得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太不民主了。但其实从阿拉伯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由圣裔出身的哈希姆家族来执掌政权，并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反而会有很高的支持率（支持费萨尔做叙利亚国王的阿拉伯人有九成以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希姆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扫清其他竞争者之后，也将执掌半岛内的其他地缘板块。只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意外出现。

其实如果哈希姆家族能够认清形势的话，就不会觉得意外了。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战略目标决不是帮助阿拉伯人获得独立。对于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的英国人及其同盟者来说，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一颗棋子罢了。因此在哈希姆家族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还在谋划内部权力分配的问题时，欧洲人早在战争进行中时就已经开始在地图上，重新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了。这其中，作为新月沃地的中心地带，也被哈希姆家族视作重中之重的“大叙利亚地区”，被划给了法国人。

第三节 英国将外约旦分出给哈希姆家族委任统治

如果法国人的“革命”性不是那么强的话，他们也许会给“费萨尔”一个半独立的叙利亚君主地位，帮助他们控制叙利亚。可惜的是，法国人并不认为他们需要对英国人的承诺负责，更不认为英国人所坚持的君主制是先进制度的代表。因此费萨尔在叙利亚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结果对于试图统一阿拉伯半岛，复兴阿拉伯帝国的哈希姆家族来说，当然也是很难接受了。他们所作出的调整就是，由之前在起义当中出力最多的“费萨尔”出任伊拉克国王，而阿卜杜拉则着手组建军队，准备重新收复叙利亚。

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显然让英国人感到尴尬。一方面他们对阿拉伯人做出过独立建国的承诺，如果就此翻脸的话，势必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另一方面他们目前和法国人还是盟友，势力范围和直属殖民地的划分，早在1916年就已经协调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决定作出一个“重大牺牲”，即将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来成为受英国委托管理的“外约旦酋长

国（Transjordan）”（也就是现在约旦的前身），而正准备和法国人开战的“阿卜杜拉”，则受命成为了外约旦的君主。

很多人可能对英国人“允许”阿拉伯人在外约旦建国感到奇怪，认为这是在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殖民统治”来说，形式是有很多种的，并非真的把原住民赶尽杀绝，把自己的国民迁进去才算成功。当然，“殖民”二字从字面上来说，应该是刚才所说的意思。不过最起码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都被概括为广义的“殖民”扩张了。

从技术上来看，让英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进行那么大范围的移民“性质”的殖民扩张，也是不现实的（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倒是有可能）。因此就英国人本身来说，像北美大陆这种地理环境又好，原住民文明又近乎于没有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殖民”方向（澳州是用来放逐罪犯的）。至于其他为了获取资源，以及维护海上霸权的地区，更多的就要采取灵活的，间接控制的方式了。这些方式，根据授权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很多种。但就其本质而言，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夷制夷”，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

就位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阿拉伯半岛而言，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只是这片干旱之地，是没有英国人真正愿意移民的。所谓“新月沃地”，所不过是相对那些干旱的荒漠而言。绝对的环境，比之北美、西欧、东亚这些板块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因此英国在有机会从土耳其人手中取得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时，就已经在设想如何平衡当地的地缘结构，使之朝着更有利于英国利益的平衡发展了。

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只从结果倒推的话，总是可以有办法为决策者还原出“深谋远虑”的棋局的。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过程往往并没有那么完美，而是根据战术目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英国人在一战之后，对于阿拉伯半岛的控制也是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打赢这场战争，把土耳其人赶出阿拉伯半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并非只在阿拉伯人当中，找了哈希姆家族这一个代理人。建立内志王国的沙特家族，也同样成为了英国对抗土耳其人的棋子，而所得到的承诺也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第四节 英国对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作出的不同承诺

很明显，为了尽快的结束战争，英国人给阿拉伯人的两个利益集团画了两张饼，而这两张饼的大部分区域来是相互叠加的。根正苗红，并且盘踞圣地的哈希姆家族，胃口显然要更大一些。他们所期待的是统一包括整个新月沃地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而英国人也基本满足了哈希姆家族的要求，只是模糊的表明

“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暂时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查找这块暂时未作明确承诺的土地，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亚裂谷”的北段，或者说“裂谷北延山地”（包括黎巴黎及叙利亚沿海的“阿西河谷”）。

之所以会把这块先模糊掉，是因为法国人已经盯上了这段海岸线。作为英国的重要盟友，英国不可能完全忽视掉法国的利益。单从地理结构来说，法国人划走的这块土地，倒也能够自成体系。比之北美那种标尺划界法，技术上还是合理了不少。作出这项承诺和分割的人，想必大家也很熟悉，他就是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麦克马洪”（劳伦斯就是他派出去联络哈希姆家族的）。这位英国专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殖民地划界。

英、法之间达成的协议，对于立志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哈希姆家族来说，并不重要，也无从了解细节。麦克马洪的那种模糊表述，也并不代表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无权收回叙利亚。这些承诺能否兑现，在战争进行时，还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在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就必须头痛怎么答复阿拉伯人了。即使没有法国人的参与，英国也不可能让整个阿拉伯半岛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在英国人看来，那些重要的海岸线是属于必须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家族的机会就出现了。

相比于哈希姆家族，英国人当初给沙特家族画的饼就要小一些了。内志高原是这个非嫡系家族所要求的核心地区。对于这片半干旱的高原，英国人并没有丝毫兴趣（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也一样），如果让沙特家族以内志高原为核心，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以兑现许诺给所有阿拉伯人“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承诺的话，并不会有损英国的利益。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当沙特家族由内志高原而起，向哈希姆家族发起进攻时，英国人选择了所谓的“中立”（至于底下是不是中立，大家尽可以联想了）。在英国人看来，即使是因两大圣地而变得重要的赛拉特山脉，也并不是利益所在（也只有奥斯曼这种穆斯林帝国才会感兴趣）。着眼点在海上航线的英国人只要在亚丁湾切出一块海上补给地来（亚丁），就基本可以放弃阿拉伯半岛了。

综上所述，英国让沙特家族建立一个包括汉志、内志地区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肯定要比兑现给哈希姆家族的“大阿拉伯国家”来得划算了。只是这也并不表示哈希姆家族就失去价值了，毕竟以少数派打压多数派是为了平衡。如果少数派本身成为了多数派，那么同样会打破平衡，重新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劲敌。基于地缘平衡的需要，将划归英国势力范围的伊拉克、外约旦两个版块，交由哈希姆家族管理，就变得很有现实意义了。一方面有哈希姆家族这两个嫡系王国在那里，沙特家族就没有办法重新树起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大旗；另一方面，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哈希姆家族和他们的追随者。

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安排，对于平衡阿拉伯半岛的地缘结构是十分有利的。但对于哈希姆家族来说，却显然与他们当初的预期有很大落差。因为沙特家族不仅从他们手中夺取了汉志地区，还得到了真正的独立国家地位（英国人在1927年正式承认内志王国的独立地位）。而作为圣裔的他们，不仅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圣地，所建立的两个王国，也只是受英国人“委托统治”的半独立王国（真正独立，要到二战后全球民族独立时期了）。换句话说，曾经心比天高的哈希姆家族，现在只能生活在英国人的屋檐下了。

也许哈希姆家族当初不把统一整个阿拉伯半岛作为终极目标的话，英国人会考虑支持他们来吞并内志王国。要是那样的话，现在估计沙特哈拉伯就要改名“哈希姆王国”了。现在的话，他们只能接受英国的保护了。否则的话，英国人即使需要当地人来协助管理他们所获得的势力范围，也可以寻找其他选项。事实上，英国人的选择也并不限于阿拉伯人。在英国人认为阿拉伯半岛上最为重要的板块——巴勒斯坦，英国人就选择了另一个族群——犹太人作为代理人。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委托给哈希姆家族的，仅仅是约旦河以东的区域，而不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原因。

第五节 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作为苏伊士运河的缓冲

英国人之所以没有把整个巴勒斯坦交给哈希姆家族管理，是因为在为了赢得战争而画出的那些饼里面，除了阿拉伯人之外，犹太人也同样分得了一块。至于犹太人所希望得到的板块，我想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那就是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迦南之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要力争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根源上是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这条海上大动脉。对于根基在欧洲的海洋帝国来说，这条能够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运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海上枢纽，也是必须夺取的天王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由于苏伊士运河东侧的西奈半岛，亦属于埃及领土，控制了埃及，也就等于控制了运河本身。所以在英法等国开始渗透中东地区之时，埃及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第一渗透目标。

欧洲人对于埃及的渗透，并非始于英国人。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法国人，就已经清楚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中（特别是北美），已经无法对抗英国了。因此法国人开始考虑，把自己的重点放在自己拥有地缘优势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而苏伊士运河本身，也正是法国在渗透埃及成功后，主持开凿的（1869年通航）。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埃及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法国人是从奥斯曼人授命的“埃及总督”那里拿到授权的。而埃及

人包括其他奥斯曼帝国之内的阿拉伯人，之所以还愿意在名义上接受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更多的是出于宗教原因。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定要在阿拉伯民族之上加上一个宗主的话，同属穆斯林体系的突厥人，总是好过那些和他们缠斗了上千年的基督徒的。

不过以埃及和土耳其的地理关系来说，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其实已经无力控制这个地中海对岸的殖民地了。因此就实际情况来说，最起码在 1882 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之时起，突厥人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埃及的话语权了。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埃及就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而英国人完全从法律上割断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将埃及归入自己的殖民地（法律地位是英国的保护国），则是在 1914 年一战爆发之后。

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控制了埃及的英国，已经足以控制苏伊士运河了。但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东侧的西奈半岛，并不具备足够的防御纵深。因为一条法律上的国境线，只能保证你在和平时期的利益。而真正到了战争时期，战略纵深和地理屏障要比那些边界条约有用得多。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必须取得阿拉伯半岛，特别是和西奈半岛紧密对接的“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战争时期的以色列，都曾经从巴勒斯坦地区快速越过西奈半岛，向苏伊士运河防线发起进攻。

既然巴勒斯坦有如此重要的地缘作用，那么英国人就必须选择更加合适的代理人，来经营这片土地了。假如没有犹太人介入的话，这个代理人的选择范围，应该还是会局限在阿拉伯人当中的。但在英国人必须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考虑之时，他们发现，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已经不仅仅居住着阿拉伯人了。从坏处想，这表明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将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地缘结构，做更多的工作；而从好处想，如果平衡得当，英国人手上将有更多的牌来控制巴勒斯坦地区。至于犹太人是如何重新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了。

第十五章 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渊源关系

第一节 犹太教诞生的历史背景

相比于犹太教，我想大家对于基督教的熟悉程度肯定要高得多了。与犹太教只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相比，基督教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拥有一个现实世界中存在过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两教之间唯一的差别，只是要想解读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就必须从此入手罢了。

我们之前也说了，犹太教实际上是为犹太人自己而创立的一个宗教。这其实倒蛮像华夏民族的宗法社会，即我的意识形态只属于我的族人所有。如果其他民族试图接受这一“先进”文化的话，就必须先从血缘上与之发生关联。基于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的优势地位，历史上做过这种努力的边缘民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过地缘基础薄弱的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向心力了，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内足够强大。

从技术上看，耶稣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出于犹太人自己的现实需求。虽然我并没有就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历史，做一个系统陈述；但相信这方面的信息，大家已经有足够的渠道去接触了。简单点说，由于迦南之地始终处于地缘博弈的焦点，犹太人无论是在拥有“犹太教”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之前，还是之后，都无法不受干扰的经营那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当然，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还是让犹太人曾经在 3000 年前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王国。在这个首次建国过程中，诞生了两个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带有神秘色彩的君主：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父子关系）。不过处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在享受了三、四百年的王国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被征服历史。

来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巴比伦人；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马其顿人）；直至把地中海经营成内湖的，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人；都相继成为了迦南之地的宗主。鉴于介入迦南之地争夺的外来文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大，犹太人试图重新建立独立的犹太王国的愿望，也就变得十分渺茫了。这期间，犹太人也并非没有想过，通过武力重新从那些征服者手中夺回属于迦南之地的主导权。在公元前 168 年，也就是在马其顿人建立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曾经通过武力抗争复国成功。只是这个重生的犹太王国仅仅坚持了 80 年后，就被西方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重新征服。

历史进展到这个阶段，犹太人对于通过常规方式，重新建立属于自己国家，

其实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作为自我认定的“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能够寻找的另一条自我救赎的路径，就是试图依靠神的力量来解救自己。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神的意志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传达出来的。这个以犹太人救世主面目出现的“人”，在犹太圣经中的尊号为“弥赛亚”，在欧洲人的语言中，则被称作“基督”。而在基督教当中，这个救世主的称号被特授给了“耶稣”。

单从犹太教的教义来说，救世主的横空出世实属必然。毕竟在犹太圣经中，曾经明确预言过有一天“弥赛亚”会出现，带领犹太人复国成功，实现自我救赎。这也可以说是宗教设计者，为坚定信徒们的信念，而定制的兜底条款吧（你可以永远怀有希望）。既然有了这种明确的“指示”，那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有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份责任，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节 耶稣基督将犹太教义在罗马帝国内传播

曾经听说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基督徒排斥犹太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出卖给了罗马人。而紧接着这个说法的问题就是，耶稣本人是不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犹太人为什么要出卖他，而基督教又是如何绕过这个出身问题，继续他们对于犹太教的敌视呢？

假如我们现在抛开信仰问题，单从“人”的属性来看，耶稣的确是出身于犹太人。当然，从神性的角度看，耶稣基督并不属于任何民族，而是上帝之子（在理论上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自己去查，算不上特别。也是中国的君主们常用的方法）。如果耶稣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出世引领“犹太人”走上复兴的道路的话，犹太人应该还是很有可能，接受这个应时而出的救世主的。毕竟当时的犹太人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予精神上的指引。问题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信徒在布道之时，却对犹太教教义最本质的特点做出了调整。而这，却是让保守的犹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按照前面的分析，犹太教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其教义所适用的范围。也就是说，在犹太教的教义之下，只有犹太民族才是“神”所选定的民族，能够最终得到神的救赎。这种保守的做法，固然可以令犹太人在强敌如林的地缘环境中，始终依靠信仰保持自己族群的完整性，但同时，也扼杀了犹太教快速扩张的可能性。从技术上看，犹太人去偶像化的一神论，在技术上更具有普及性。而犹太圣经中所铺设的，从上帝创世纪、亚当夏娃的诞生、诺亚洪水……等一系列的关于人类诞生演化的“历史”体系，也能够信徒心目中，打造出一套完整的自我认知体系。换句话说，就是犹太教本身已经磨合得十分成熟了。

既然犹太人所打造的“一神教”体系，在布道上具有如此优势。那么将它

传播的范围，仅仅限定在犹太人当中，就显得有些“自私”了。而以救世主身份出现的耶稣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将让这些教义同样可以适用于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对于那些接受教义的信徒来说，则意味着原来只眷顾“犹太人”的万能的“神”，现在也成为了庇护自己的“神”了。

从关系上来说，耶稣基督最开始还是以犹太教的名义在布道的。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试图扩大犹太教的影响力。而一神教在教义上的那些优点，对那些外族人来说，也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现在的问题是，对犹太正统势力来说，并不认可这种将让自己的“神”去眷顾外人的做法。而对于迦南当时的宗主——罗马人来说，鉴于他们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在技术上让所有被征服民族，都记住罗马那些关系复杂的“神”，实在也有些强人所难。因此只要被征服民族安份守己，在行为上不触及罗马人的利益（当然，还需要为罗马人创造利益了），罗马人并不介意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具体到犹太人这里，就是犹太人得到了充分的自治权，并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鉴于地中海如此复杂的地缘格局，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帝国不得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他们无法形成，像中央之国这样大一统格局的根本原因。不过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被征服民族对他们的安全和利益不存在威胁。而从利益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绝对是核心利益，也关乎帝国安全。假如犹太人一直用他们那种内敛的方式在族内传播，即使他们的宗教本身相比罗马人的信仰更成体系，也更有普及性，罗马人也不会太过在意的。毕竟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犹太人只是体量很小的一个民族。只是现在的话，耶稣和他的信徒们将犹太人的宗教向外散布的做法，已经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扩张到帝国控制之下的其他民族了。更为致命的是，一神教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潜力，使得它比其他宗教具有更强大的扩散速度。

对于一个地区的控制者来说，分而治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前提是，他们没有办法联合起来。现在犹太教的这种转变，明显让罗马人感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出面阻止耶稣和他的信徒们，向外传播犹太教义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这种布道而感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罗马人，犹太人自己的危机感其实更为强烈。要知道，如果强大的罗马帝国，认为耶稣的这种布道行为是出于整个犹太民族的授意，那么从迦南之地抹去这个民族，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此，一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了。

第三节 基督徒处理新宗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方式

后来的基督徒们，有理由认为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出卖给罗马人。事实上

也的确是这样。只不过就耶稣的信徒们来说，他们需要在技术上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他们与犹太人，或者说犹太教的关系。首先犹太人的正统势力，已经在世人面前明确表明了耶稣的布道行为和他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再以犹太教的名义布道，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教义足够有吸引力，信徒们完全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这个凸显救世主存在的新宗教，就是“基督教”了。

真正的难点在于，这个新宗教不可能切断他们与犹太教义之间的关系。因为犹太人所建立的宗教体系，不仅代表着一神信仰，更代表着一套完整的“历史”。放弃它，固然可以模仿这套体系另起炉灶，但那样的话，耶稣和他的信徒们之前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了（你无法向那些还在秘密信仰基督和犹太教义的信众交待这种转变）。因此这些依旧信任耶稣是救世主的信徒们，只能在继承犹太教义的基础上，嫁接出一个新的宗教体系来。

将犹太教的教义完全继承下来，并在前面冠以“旧”字，称之为“旧约”；而将记录耶稣事迹、言行（也包括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信徒）的那些文字称之为“新约”。这就是基督教的创立者们，用来平衡这种关系的技术手段。当然具体到细节上面，就不是仅靠创立了一本新的宗教经典，以及为犹太人的圣经取一个新的名字那么简单了。摆在基督徒面前的，最起码有两个必须解决的定位问题：一是如何定位犹太人的宗教地位；二是如何在不影响一神教基本理念的情况下，凸显耶稣基督的宗教地位。

即使基督教已经准备全盘接受犹太教的教义，并以此为基础嫁接出一个全新的宗教来，那么犹太人的宗教定位问题，也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按照犹太教义，只有犹太民族才是上帝的特选民族，并可以通过与上帝的约定得到救赎。很显然，基督徒们是不可能接受这个观点的，否则耶稣的牺牲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当然，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我们也看不到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密码，其实就在基督教圣经上、下两部分的名称当中。

我们前面说了，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是全盘接收犹太圣经的内容，汇编而成的，名曰《旧约》；而完全属于“原创”的部分，则称之为《新约》。所谓解决之道，就在这一“旧”，一“新”二字当中。就是说，基督教认可上帝曾经选择了犹太人，作为神的子民，并与之立“约”。但现在上帝与地球上不分种族、民族的所有人，重新立“约”，为之提供救赎的途径。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解读方式，那么就是让犹太人先行信奉上帝，是属于“试运行”阶段。而在试运行成功之后，这些神、人相处之道，就可以“普世”到所有人类身上了。

不得不说，这种“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是一个很巧妙，也很自

然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在犹太人主动作出切割之后，不得以而作出的一个选择。假设犹太人在教义有扩散的趋势之后，不是因为地缘环境所迫，选择了保守的方式，也许现在就不存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别了。换句话说，日后全面渗透欧洲，并由此向全球扩散的就是加强版的“犹太教”，或说“犹太新教”了。只是那样的话，犹太人本身，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只在历史中存在的民族了（按照地缘融合的规律，如果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及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犹太人在基督教教义中定位问题的解决，也在宗教层面上为犹太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那些笃信基督的信徒心目中，犹太人并不具有他们自我认定的那种，超然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地位，而只是上帝的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品。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并无可能因为为基督教体系打基础的贡献而获得特权。反而因为犹太人不认可耶稣基督和新约的宗教地位，坚持维持他们上帝选民的身份，激发了对于他们的敌意。

第四节 耶稣在基督教中的宗教定位

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还会用很大篇幅来解读，犹太人在中东地缘环境下的历史。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基督教的问题上来，来看看耶稣的弟子们是如何解决耶稣宗教定位的问题。基于耶稣的存在本身就是切割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重要标志（犹太人就不承认救世主已经出现了）。因此这个新的宗教，很显然必须凸显“基督”的存在，才能在表面特征上与保守的犹太教彻底分离。

将“基督”之名置于教名当中，固然是一个好方法，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一神教的本质是禁绝偶像崇拜，并只认可一个“神”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赋予耶稣的那些神性，就会反过来影响基督教存在的基础了。当然，这个世界上“办法总比问题多”，问题总是会解决的。这个解决方法，就是经常被借用到其他领域的“三位一体”概念。

所谓“三位一体”，指的就是圣父（上帝）、圣子（基督）、圣灵（也有称“圣神”的，指的就是神性），其实是一体存在的。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其实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神”是由上述三部分共同组成的，只是通过三种外在形式存在于信徒的信仰之中罢了。这种解读方式，算是解决了“一神”崇拜的基础问题。但还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副产品。因为相比于无形存在的圣父、圣灵，耶稣的形象是具体的，并且是基督教的显性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偶像化”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被偶像化的还不止于耶稣本人，因为诞下圣子的圣母，也是真实

存在的。基于她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特殊中介地位，很自然的也被信徒们赋予神性及偶像化。虽然三位一体的架构可以从宗教本质上，巧妙的解读“一神”存在的问题。但这些被具体化的代表神性的形象，在基督教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时，这些异族形象的偶像，多少会让一些试图接受它的受众们感到些困惑。

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倒也算一件好事。最起码现在的我们，在教堂及其他基督教遗产里，可以通过因为信仰而保存下来的那些雕塑、画像，直观感受人类文明的进程（想想中国亦有多少文化遗产，是因为偶像崇拜而保留至今的）。相比之下，把“一神教”理念贯彻到极致的伊斯兰教，这方面就显得单薄多了（但从宗教的控制力来说，却是最强的）。

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能解读一下宗教问题。毕竟在影响地缘关系的诸多因素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尤其是在东亚以外的世界中。这次正好借着解读犹太人的机会，做一些技术性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将回到地图之上，去看看犹太人是如何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上帝许诺给他们的迦南之地的。

第五节 基督教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在结束宗教话题之前，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就耶稣基督开始向外族传教这件事情来说，我个人倒不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毕竟在那些笃信宗教救赎的信徒心目中，将神的恩泽传达给他人，是一件向善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不认为在殖民时代，那些狂热的传教士本身就一定肩负政治任务。不过这些纯粹的宗教行为，最终被世俗权力所利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那些传教士主观上即使是怀着仁爱之心在布道，但客观上却还是为政治家主导的地缘扩张作出了贡献。

说到基督教开始影响政治结构，这个“功劳”还是要记到罗马人头上。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力和在扩张上的潜力，并没有随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消失。反而由此而让基督的追随者们，有机会建立完善的宗教体系。有鉴于此，罗马的统治者最终也发现，与其用“堵”的方式来消灭这个生生不息的宗教，不如转而接受它，并使之成为稳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工具。毕竟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教”体系，在对内统一意识形态方面，比罗马人之前那不成熟的多神体系，要更有优势。

当然，维持一个帝国的运转，光靠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罗马帝国最终还是崩溃了。不过帝国当年的这种“识时务”的表现，也为帝国当年的政治中心，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最起码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为教宗所在地。假如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没有落入穆斯林

化的突厥人手中，并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话，那么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东正教”的最高宗座，也同样会生活在这座曾经的帝都之中。

对于希望了解宗教的朋友来说，也许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对一神教的发展、变迁，做一个解读。不过地缘解读的出发点，始终还是为现实世界服务的。就前面的解读来说，已经足以解释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那么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了。说起来，犹太人能够在西方世界显得那么特立独行，和基督教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毕竟基督教在教义上对于犹太教的继承，让所有笃信基督的人不得不认识这个民族，并将之区别出来。至于这种特别之处，是福还是祸，就不好说了。这就好像在东南亚的华裔一样，呆在泰国这种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对生存其间的华人固然是好事。只不过时间一久，泰国的华族本身也就消融于泰民族之中了（标志就是姓氏、中文，自我认知都几乎消失了）；反之在马来西亚这种对华裔区别对待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华夏文化倒是得以延续下来，并保持民族意识的独立。

很多人喜欢把犹太人和在海外打拼的华裔做对比（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裔），认为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这种对比也不无道理，一方面双方在民族文化遗产上都有过人之处。在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险恶的外部环境驱使下，习惯于以社团的方式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客居他地，无法稳定的依附土地而生，被迫将重心放在流通行业之上。尽管从整体的环境来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客居他地的华裔都处在劣势，但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行业时，却能够体现出局部优势。尤其是在土著民族对这一块不够重视之时。

当然，双方所能够体现出优势的地区，也和所处地区的地缘环境有关。从宗教和地理关系来看，犹太人显然容易向西方社会渗透；而从中国外迁出去的华人，则更加适应在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南亚生存。基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由大航海以后的基督徒所建立的。犹太人在西方商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也水涨船高的形成世界级的影响力了。由此，犹太人的复国之梦，也变得越来越真实了。

第十六章 犹太人重返迦南之地

第一节 犹太复国主义成为现实的时代背景

犹太人试图复国，也算是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了。而在这个梦想得以实现之前，鉴于这种因为没有“祖国”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太过强烈，犹太人在心理上对财富的渴望也比其他民族要迫切得多。毕竟，财富能够给犹太人更多的安全感。虽然这些财富的积累，有时候也会引火烧身。但如果犹太人不依靠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在民族内形成一个自闭、稳定的财富积累体系的话，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会比另一个流浪民族“吉普赛人”更强。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这个“世界”还处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博弈之中时，犹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机会回到迦南的。因为双方的博弈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将控制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迦南之地，作为宗教战争胜利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掩盖自己的复国愿望，游走于双方博弈的空隙之中，寻找商机、累积财富。

真正到来的机会，是在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后。新航线的开辟和工业化所取得的技术优势，让欧洲的基督徒们得以跳出原来的地缘圈，将整个世界变成欧洲人内部的地缘博弈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小小的耶路撒冷和迦南之地，已经不再是欧洲政治家们所关注的重心了。欧洲殖民者们瓜分世界的高潮，是在19世纪末。经过差不多400年的殖民史，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供欧洲人去“拓荒”了。如果他们再想对地缘政治格局作出改变的话，下一步的重点就只能放在内部利益分配的重组之上了。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有操作性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是由于欧洲那种周期性的，带有“剪羊毛”性质的排犹太潮，又一次达到了高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内部的矛盾日趋激烈化。这也为犹太人在其间游走，提供了空间。

除却把“世界”的概念做大，让欧洲人的视线不再集中于所谓宗教圣地的争夺之上以外，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欧洲势力控制、影响之下的的现状，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梦想提供了另一个机会。那就是，假如犹太人不是执着于一定要在迦南之地复国的话，他们有机会从那些数倍于欧洲本土的殖民地中分得一杯羹，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国。当然，这种异地建立犹太国的想法，一定会受到那些认定迦南之地，才是犹太人“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反对。只不过，当一个民族被复国梦想折磨了二千多年后，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并非是不

能被接受的。

在异地重建犹太国的方案中，非洲、美洲甚至中国的东北地区，都曾经被不同的犹太活动家们考虑过。只是相比于重返迦南之地的诱惑，这些方案始终无法在犹太人内部达成共识。毕竟支撑犹太人走过这三千多年历史的，是他们那引以为傲的犹太教义。而如果犹太人不能回到“迦南之地”复国，即使能够得到更肥美，更广阔的土地建立犹太国，也得不到上帝的庇护和救赎。因此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交流之后，主流意见最终还是趋向于把返回迦南，作为奋斗目标。

第二节 犹太人通过购买土地方式回到迦南定居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迦南”，早以成为阿拉伯人所覆盖的“巴勒斯坦”了。犹太人并无可能仅凭宗教上的理由，就能游说欧洲政治家们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犹太人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向阿拉伯人表露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巴勒斯坦的居住权。当一个民族希望获得一块被他族占据的土地时，无外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取得；一种是交换获得。以犹太人当时的情况而言，想靠武力渗透巴勒斯坦肯定是不现实的。

至于交换嘛，这倒是犹太人的强项。当你把建立一个国家当成一门生意来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先按照商业规则行事，“买”进目标区域的土地，不失为一个曲线复国的好办法。前提是该地区承认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放在中国这种土地政策的国家，买也是白买）。当然，理论上即使你能够买到一个地缘板块所有的土地产权，也未必能够建立一个国家。因为就一个国家的建立来说，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承认。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你买到再多土地，也只是一个大地主而已。不过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你不能出现在那片土地上，并在人口比例上取得一定优势的话，所谓复国之说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当时的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阿拉伯人应当会对此有所警觉。问题是，19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们此时的重心在于和欧洲帝国们的地缘博弈之上，并没有空闲去关心犹太人在一块不属于核心区的土地上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在土耳其的的管辖之下，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情况下）。而就阿拉伯人方面来说，你也不可能让他们在还没有行政约束之前，就要求那些“地主”们，在面临一场有利可图的交易之前，优先考虑什么“民族大义”。

其实就算是有国家、民族意识，你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将之置于个

人利益之上。即使是巴勒斯坦人有强烈建国愿望的今天，这种交易也仍在犹太人尚未能通过战争手段全面控制的耶路撒冷中进行（城内还有 20 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看来，不管通过什么方法，都不能阻止他们取回上帝应许之地的目标。假如犹太人允许偶像存在的话，倒是可以建议他们仿造“正义女神”（就是港片中，经常能在法院门口看到的那个）的样子，制一尊女神像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不过这个蒙眼女神的左手上，就不再是代表公平的“天秤”，而是代表财富的黄金；至于右手，倒是依然可以拿着那柄剑。只是含义不再是“正义”，而是“武力”了。

第三节 迦南之地的高地分布

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巴勒斯坦地区虽然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基本容纳了这个星球上的各类地形，其内部也可以划分出好几个亚板块来。从犹太人“买回”迦南之地的计划来看，精于计算的他们，并不会把钱撒向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而是会根据这些亚板块的地缘价值，来选择重点突破地区。这倒是和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是一致的。至于说，巴勒斯坦地区内部，又可以分为哪几个亚板块，他们又各自有什么样的地缘价值，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

就基本地形来说，由于西亚裂谷的存在，巴勒斯坦地区整体呈现“两高两低”的结构。而这在种地形结构中，被沿海平原和裂谷包夹的裂谷西侧山地，无疑是整个地区的核心板块所在。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谁能够占据这条高地，谁就能够对两侧的低地带形成强大压力。而那让犹太、基督、伊斯兰三教都魂牵梦萦的“耶路撒冷（jerusalem）”，正是在这片核心高地上。

从地理结构和环境上来看，这条核心山地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再被分割为三部分。首先我们在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条山地带整体呈“北高南低”的走势。在山地带的北部，有一片明显东西向的断裂带，将之分割为两部分。其中海拔较高的北部，被称之为“加利利山脉”，南部海拔相对较低，地势相对更平缓的区域，则被称之为“中央高原”。既然有“中央高原”的称呼，说明这片高原的南部，应该还有一个独立的高地区。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中央高原所在的那部分山地开始向南延伸并走低时（大致和死海南北两部分的分割点在一条直线上），它开始受到红海两岸强烈的热带沙漠气候所影响，所以中央高原以南一直延伸到红海的区域，都被打上了另一个更能体现它特质的标签“内盖夫荒漠”。

从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来看，居中的“中央高原”无疑是整条山地带的核

心区域，并由此而成为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核心板块。就我们的解读内容来看，将地理单元划分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对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按照当年犹太人内部的行政划分，中央高原还可以被南北分割为“撒马利亚山地 (Samaria)”、“朱迪亚山地 (Judea)”（耶路撒冷所在地），而中央高原过渡到沿海平原的区域，还可以单独成为板块——“施腓拉低地 (shephelah)”（相对高原就是“低地”了）。

对这样小的一个地缘板块，做如此细致分割，看起来实在没有必要。尤其是在习惯了“地大物博”概念的中国人看来，这颇有点“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只是时光倒流个二三千年，这片微缩“世界”的每一个拥有独立地理特征的亚板块，都曾经生活过不同自我认知的族群。而犹太人也相当于打了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才把上帝的这块试验田最终统一在犹太王国的大旗之下。

第三节 犹太人优先渗透巴勒斯坦沿海平原

相比南部被内盖夫荒漠所覆盖的地区，中央高原和加利利山脉的水资源保有量要好得多，也能容纳更多的城镇（现在没有古典时期好了，很多区域需要机井抽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死海南部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影响，中央高原西侧面向死海的一面，很早就已经荒漠化了。这种荒漠化的环境，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当然没有太大价值了。不过这倒是为那些热衷于“修道”的宗教人士，提供了一个既能近距离瞻仰圣地，又能够避世修身的好去处。反正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说，物质方面的需要是能够最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所以你如果去旅游的话，可以在那些荒地中，看到不少修道院）。

单从地缘位置和宗教感情来看，犹太人“买回”迦南的计划，应该将耶路撒冷所在的中央高原作为第一重点。然而现实的犹太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向这块核心之地渗透，而是把目光锁定在沿海平原之上。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犹太移民基本都是渡海而来的，首先从沿海地区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更符合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原则；另一方面，从地缘特点来看，沿海平原也拥有更好的农业潜力和更多的人口承载量。其实说起来，经过二千多年的离散史，犹太人早已从一个一心耕作这片“流奶与蜜之地”的农耕民族，转变为一个完全和农业生产脱节的民族了。这当然不是犹太人本身不愿意从事看似低产出的“农业生产”，而是没有人会给他们一片可以永久居住，并耕种的土地。

今天我们谈到以色列的成就，会经常提到它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不得不说，这个意识力超群的民族，的确在迦南之地创造了奇迹。即使是在我们刚才判定

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内盖夫沙漠，犹太人也经营出了一片片绿洲。假以时日，犹太人并非没有可能像他们当年“由点及面”渗透巴勒斯坦地区那样，将占以色列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荒漠地区，尽数改造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面积在减少的国家）。

犹太人改造迦南之地的行动，并非始于以色列建国以后，而是在他们踏上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手上购买到第一片土地时就开始了。在那时的犹太人看来，建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经营好自己手上的农场，就是这个梦的开始。尽管在我们看来，上帝已经抛弃犹太人两千多年了，但在犹太人决心重返迦南的那一刻起，上帝似乎眷顾这群“上帝的选民”了。相信上帝的人，总是会告诉我们“上帝是公平的”；不一定信仰上帝的人，也常常认可“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所需要的“公平”和“机会”，正是在他们最不善长，而又持之以恒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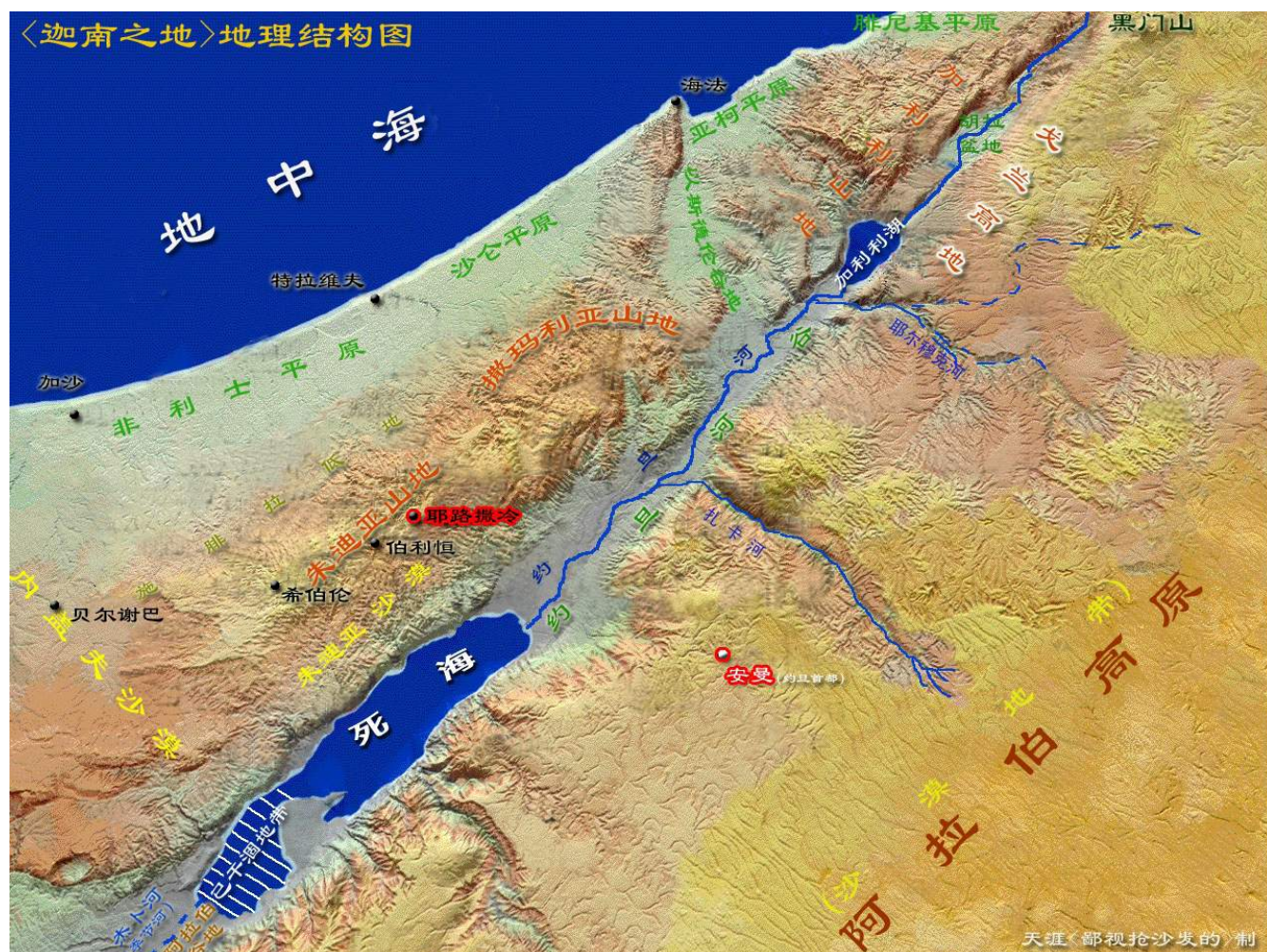
第四节 迦南之地的沿海平原地带

既然基于步步为营、层层渗透的原则，沿海平原成为了犹太移民最先渗透的区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条平原带的结构做个解读了。记得在《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中，我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沿海平原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圣经时代的地缘结构，整个沿海平原带，由北至南可分割为：腓尼基平原、亚柯平原、沙仑平原、非利士平原。按照一般规律，位于中间的亚柯平原、沙仑平原应该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沿海平原的核心区，也是当年犹太人经营迦南之地的重点地区，而位于南北两边的“非利士平原”、“腓尼基平原”，就未必能够完全属于犹太人所有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圣经时代，还是现在的地缘格局，犹太人都未能在上述两个区域占得优势。在犹太人开始经营迦南之地时，他们在这两个区域的对手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现在，以色列人则要在这两个方向，面对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从现在的地缘结构来看，腓尼基平原并不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范围之内，在英、法分割西亚裂谷地带的协议当中，它已经被完全划分给了黎巴嫩，连带北加利利山脉也成为了黎巴嫩的南部屏障。

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也不能完全归结于英、法之间的交易。因为就腓尼基平原这个地缘板块来说，本身就是由从加利利山脉和北边“黎巴嫩山脉”上面流淌下来的河流，共同冲积而成的。至于到底是控制黑门山以南地区的族群，还是黑门山以北的民族，能够取得这条地缘交接地带的控制权，就取决于双方的实力了。就现有的实力对比来看，能够从整个西方输血的“犹太人”，肯定

要比黎巴嫩人强大得多。但就二千多年前的情况来看，醉心于经营“迦南之地”的犹太人，实力却比不上经营黑门山以北海岸线的“腓尼基人”强（包括现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海岸线）。后者凭借他们的海洋优势，甚至成为的罗马人的主要对手（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



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

从整体地理特点来看，山脉更靠近海岸线的“西亚裂谷带”北部地区，在形成天然良港上更据优势。这也是当年腓尼基人，能够纵横地中海的地理原因。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地区所对应的沿海平原，东西纵深就要显得更深些了。从农业的角度来看，这倒是能够给犹太人提供更多的农业空间，但同时也限制了犹太人的海洋潜力（没有好的天然良港）。因此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相对于迦南之地的面积来说），但犹太民族的原始属性，还是属于农耕民族。假如要在中央之国找两个沿海板块来做类比的话，浙南（杭州湾以南）和苏北（长江以北）在地缘属性上的差别，倒是可以为我们理解腓尼基板块和迦南板块之间属性差异，提供参考。

通常在地缘分析中，我们习惯于为某一地理单元或者族群，以生产方式的划分，标示出“地缘属性”（如农耕、渔猎、海洋、游牧等等）。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地缘属性指的是该地理单元或者族群，最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也是在该民族形成过程中，对文化影响最深的生产方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一个族群长时间离开他赖以生存的地理单元，或者该地理单元适合的生产方式，发现变化，那么这个族群的地缘属性也会随之改变。

不过鉴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当地理背景发生变化之时，处于其中的民族，一定会想尽办法来保有自己原始的“地缘属性”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我们定义为“渔猎民族”的女真人。尽管这支诞生于白山黑水之中的边缘民族，最终得以入主中原，但在他们的统治过程中，还是通过一切行政手段来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由皇室主导的，每年一次的围猎，以及禁止满洲人从事农业生产等）。当然，这种主观上的坚持，最终还是敌不过地理环境和地缘环境的变迁。现在的满族，已经基本失去“渔猎民族”的属性了。

虽说迦南时期的犹太人，被我们定义为“农耕民族”，但这并不代表迦南所对应的海岸线中不存在出海口。只不过这些港口的条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海上生产罢了（渔业、海上商业等）。从现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对应的沿海平原来说，整体是呈北窄南宽的三角形状。这也意味着整条海岸线的北段在海港方面更占优势。而这种地理差异的形成，却和“远”在非洲的尼罗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差异不仅在圣经时代，造就了犹太人和非利士人的长期博弈，也和今天“加沙”问题的形成，有着因果关系。

第五节 尼罗河泥沙对非利士平原海岸的影响

其实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北部的山地更接近海岸线，一些山地的突出部已经直接面对海洋了。北部的腓尼基平原、亚柯平原，中部的沙仑平原，就是被这样的突出部所分割而成的。比较特别的是南部的非利士平原和沙仑平原的切割问题，因为从地图上，我们很难看出这条中间没有明显山地分割的平原带，有必要被打上两个地理标签。

真正让非利士平原独立出来的地理原因，并不是像山地这样明显的陆地分割线，而是在海岸线的形态上。因为在非利士的海岸线上，有向内陆渗透达6公里距离的沙丘带。这条沙丘带，并非是由发源于东侧高地之上的河流，所带来的泥沙形成的，而是由西侧隔西奈半岛相望的“尼罗河口”，所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像所有的河流一样，尼罗河在入海之时也从它的流经之地，带出了不少泥沙。鉴于尼罗河纵穿了广阔的东部非洲腹地，河水中所携带的泥沙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泥沙不仅在尼罗河口，扩张出了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还在海水和海风的带动之下，向东推移至西奈半岛以及非利士平原的海岸线，

并使得陆地与海洋之间形成了大片沙丘缓冲带。

从成陆的角度来看，尼罗河水也算为它的亚洲邻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只不过这样的话，西奈半岛和非利士平原也就失去了成就天然海港的机会。其实说起来，尼罗河三角洲也同样“深受其害”。但拥有一条大河的入海口，古典时期的埃及人还可以在河口建设港口，显示自己的海洋影响力。这种兼得海、河之利，既可外联海洋，又可内通陆地的港口形态，也是大多数世界名港的初始状态（现在技术发展了，很多就用人工岛把码头向海洋延伸，以建设更深的船位了）。

相比之下，非利士平原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建港了。毕竟东西纵深不过一、二十公里的平原带，不足以形成大型河流。假如没有尼罗河泥沙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那么非利士平原的海岸线即使不能成就常年能避风雨的深水良港，也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条件尚好的点上，勉强成就一些小型港口的。现在的话，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如果想从海洋之上得到些许利益的话，就只有在非利士平原以北寻找机会了。而犹太人和其他土著民族，在迦南之地的海岸线上，寻找到的位置最南的建港地点叫作“雅法”（并不能十分确定，是不是犹太人最先发掘这个点的海洋价值）。这个点本身，大致也是非利士平原和沙仑平原的分割点。换句话说，尼罗河泥沙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向北延伸至雅法，基本就到头了。

第六节 巴勒斯坦地区的特拉维夫和海法港口

提到“雅法”这个名称，估计大家都会很陌生。虽然这个港口城市，在四千年前就已经颇具知名度了（之所以有条件建港，也是因为靠海之处有山丘凸起），但说到“特拉维夫”这个城市名，关注过以色列的人应该都会有印象。如果你在政治上，认定耶路撒冷已经完全归属于以色列的话，那么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如果认为耶路撒冷不是属于以色列的话，那么特拉维夫这个人口接近 40 万，犹太人占比 95% 的城市，就是以色列的第一大城市。

需要说明的是，特拉维夫之名只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是“特拉维夫——雅法”。在犹太人大规模回流之时，雅法这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是完全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为了拥有一座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港口城市，犹太人决心在雅法旁边购地建设一座新的港口城市——特拉维夫。在以色列人通过中东战争完全控制整条岸线之后，这两个新旧城市，自然也就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城市了。

说起来，“特拉维夫——雅法”并不是巴勒斯坦地区港口条件最好的地点。如果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北看的话，就会在沙仑平原和亚柯平原的分割点上，看

到一条由中央高原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明显的突出海洋的岬角（这个突出山地，叫作“迦密山”）。单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个岬角也应该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好的建港地。而在这个点上，也同样有一个可以把历史追溯到公元前的城市存在，它就是在以色列城市规模紧随特拉维夫之后的“海法”。

单从港口条件来说，海法应该比特拉维夫要更好。因此在英国人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也将海法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来经营。并将它已经废弃多年的港口，改造升级为适应现代船舶依靠的深水港口。只不过基于它的地理位置过于靠北，犹太人在建国之后，还是选择了离耶路撒冷地理距离最近的“特拉维夫”作为临时首都（1948年）。尽管现在以色列人宣称耶路撒冷才是他们真正的首都，但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毕竟耶路撒冷的地位未定），大多数国家还是更愿意把大使馆建在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和海法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无疑影响了它们在城市规模上的排名，但这并不是我们重点所关注的（巴勒斯坦地区也不只是这两个港口）。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在犹太人决定大规模“迁回”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在特拉维夫以北能够供犹太移民直接登陆的沙仑、亚柯平原，会是犹太人首先经营的重点地区。而在这两条沿海平原带购买到足够的土地，并站稳脚跟之后，犹太人接下来就会向那些没有海洋之利的地理单元，做进一步渗透了。

从犹太人最南的登陆地点“特拉维夫”位置来看，继续向南部的非利士平原渗透无疑是一种选择，问题是在这个方位上所遇到的阻力也会比较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非利士平原在海路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它在陆地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基于这个原因，善于利于自己游牧属性进行商业活动的阿拉伯人，对非利士平原的控制力也比较强（人口密度也大）。

第十七章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业开发

第一节 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的分界线

要理解非利士平原的地缘枢纽地位，我们就必须对它周边的地理板块做一个了解。我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是北部非洲最为富庶的中心。早在阿拉伯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在此经营出古老的文明了。如果尼罗河三角洲想向东与亚洲诸文明进行交流的话，首先必须穿越的是一个呈倒三角状的半岛——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目前在地理划分上被视作亚洲的一部分。而它与埃及西部的地理分割线，也是亚、非大陆的分割线，即苏伊士运河。其实就算没有苏伊士运河，我们也很容易在红海西北部的苏伊士湾与地中海之间划出一条距离很短的直线，对这两个地理单元作出一个切割。相比之下，西奈半岛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地理分割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红海北部的另一个分支“亚喀巴湾”，并没有像苏伊士湾那样指向地中海，而是直指西亚裂谷带的腹地（或者说其本身就是西亚裂谷的一部分）。要是按照它的延长线来划的话，那整个以色列都得划到西奈半岛去了。因此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的地理分割线，通常是以现在埃及和以色列的国境线为标准。

虽然没有明显的河流或山地，来分割这一大一小两个半岛，但也并不表示当年英国人是随手在地图上一划，就分割了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因为就这条近似于直线的分割线来说，其南北两个基点的确立，还是有迹可寻的。确定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分割线的南部基点并不困难，亚喀巴湾的北部端点就是天然的基点。只是在具体划分国境线时，为了让分割出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南部的出海通道多挤出一点岸线来，这个基点略微向西奈半岛方向移了一点。虽然如此，在与阿拉伯人交恶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这条南部海上通道，也随时面临被埃及和约旦人切断的风险。

相比亚喀巴湾这个明显的南部基点，为阿拉伯半岛和西奈半岛的分割线找出北部基点多少要困难一点。因为从地理环境来看，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地理特征来承担这项任务。鉴于这个分割点也是地中海南岸与东岸的分割点，比较偷懒的方法，是遵从几何原则，找个转折点做基点，然后向亚喀巴湾方向的南点连线。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有可能把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分割给两个国家。

相比那些被地图划界硬性分割的行政区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这条边界还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因为这个分割点，基本也就是非利士平原与西奈荒漠

的分割点。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地区所对应的那段“地中海东部海岸线”，一直到非利士平原的南端，都算是有农业基础的“沿海平原带”，到了位置居于地中海之南的西奈半岛之后，情况就发生转变了。沿海地区再也无法产生连片的农业区，“荒漠”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地质标签。

西奈半岛这种整体荒漠化的情况，广泛存在于整个地中海南岸。只有在能依靠“阿特拉斯山脉”拦截地中海水气的西北非沿海地区，以及能够从整个东非收集雨水的尼罗河口，才有机会形成连片的绿色地带。相比之下，有阿尔卑斯山系横亘在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地区，以及本身就是高原地形的小亚细亚半岛，降水量就要充足得多了。至于阿拉伯半岛西侧的这条“西亚裂谷”地带，依靠这条迫近海岸线的高地，勉强经营出了一条沿海农业带，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第二节 非利士平原对于埃及进入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意义

假如当年地质变化时，西亚裂谷带不是从亚喀巴湾方向向北延伸。而是透过苏伊士湾在西奈半岛沿海地区向东北方向转向阿拉伯半岛的话，也许就有机会打造出一条，完美连接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沿海“沃地”来了。那样的话，当日埃及说不定就有机会东进“入主中原”，成就帝国之业了。

上述情况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了。现实的情况是，据守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如果希望向离他们最近的农业区“迦南”之地渗透的话，就必须面对荒漠化的西奈半岛的地理分割。尽管法老们可以在西奈半岛的沿海地区，寻找到一些有地下水源补给的地点，作为连接“尼罗河三角洲——迦南之地”通道之上的补给点。但比起一个能将二者连成一片，拥有高密度人口的沿海平原带，这些以点状分布的据点，所能起到的只能是战术支撑作用。从技术上看，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可能切断这类战术通道。这种战略性风险，也注定了诞生于尼罗河畔，带有强烈农耕属性的古埃及文明，即使能够把触角伸到阿拉伯半岛，也无法将之纳入古埃及的版图。

无法控制迦南之地，并不代表古埃及人就不会越过西奈半岛，向阿拉伯半岛渗透了。当埃及人的目光，沿着西奈半岛的海岸线越过这片荒漠化地区之后，他们首先能够接触到的绿色之地，就是非利士平原了。无论是从军事，还是商业的角度来看，非利士平原都是埃及人登陆亚洲的桥头堡。无论是军队还是商队，他们从非洲方向穿越西奈荒漠之后，非利士平原都会是他们最理想的补给点。

除了通过武力或者交换手段，从非利士平原获取利益之外。这条从地理关系上看，应该是新月沃地最南端地理单元的绿洲，还可以提供三条继续前行的

通道。或是继续沿海岸线北行，与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甚至更遥远的南亚、东亚地区交流；或是转向东北方向直接进入迦南之地的核心——中央高原，直至约旦河谷；如果目标是塞拉特山脉和内志高原的那些游牧部族的话，在非利士平原稍事停留之后，再向南行穿越内盖夫荒漠，也比直接由西奈荒漠转入内盖夫荒漠的走法要更轻松。

基于上述理由，作为走出亚洲，进入非洲之前的最后一块绿地，也作为走出非洲，登陆亚洲所能见到的第一片绿地，非利士平原这个三面为不毛之地（两面沙漠，一面海洋），北端对接整条新月沃地的狭长平原带，也就具有了枢纽地位。而这，也是巴勒斯坦人自始至终不肯退出加沙地带的原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现在巴勒斯坦人主权指向的“加沙地带”，并不是等同于整条非利士平原。但作为非利士平原的南部地区，加沙地带仍然具有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地缘价值。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是哪一个族群最先开发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非利士平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古埃及人肯定比非利士人更早知晓这片土地的地缘特点。因为非利士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并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就是埃及人的安排。

第三节 古埃及人将非利士人布局至非利士平原

关于非利士人的来源，一直都不是十分确定。毕竟不是每个民族，都像犹太人那样有部圣经，可以在剔除神话成份之后，能从中看出他们民族迁移的脉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埃及人眼中非利士人是一个航海民族（从地中海的结构来看，很有可能来自欧洲方向），并且曾经试图通过尼罗河口向尼罗河腹地渗透。虽说后来的罗马人用同样的路径攻占了埃及，但并不表示每个试图入主尼罗河三角洲的族群都会成功。而非利士人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对于这样一个外来入侵者，将之驱逐出境或者完全消灭，都是可以选择的手段，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

相比那些纯粹依靠武力解决的方式，埃及人在对付非利士人时，选择了一个带有交易性质的手段。那就是让战败之后的非利士人，迁移到阿拉伯半岛沿海平原的南部，作为法老们置于亚洲板块之上的棋子。而非利士人在埃及人授权之下获得的这片土地，也就被打上了“非利士”的标签，并被我们称之为“非利士平原（philistine plain）”。

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合作方案。从非利士人的角度来看，虽然非利士平原的地理环境，迫使其转而把目光投向陆地。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农业潜力，以及在商道之上的枢纽位置，同样能够让他们变得富足

（据说他们还有冶铁方面的技能，以获取额外的财富），因此欣然接受了埃及人的安排；而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没有良港支撑的非利士人，也就不再具备从海洋上威胁埃及本土的资本了（包括与其他海上民族联手反咬埃及的机会）。如果非利士人想在亚洲民族的挤压之下生存，保护他们从陆地上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和埃及人合作，接受埃及人的宗主权是唯一的选择。这样的话，埃及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越过控制力较弱的西奈半岛，渗透入了新月沃地。并在和亚洲文明的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总的来说，在面对一个实力足以超越埃及的强大帝国时，非利士平原所能起到的缓冲作用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这个帝国，能够从海路直接攻击埃及本土时（典型的就就是罗马帝国）。不过在犹太人控制迦南，以及试图从埃及返回迦南时，横亘在非利士平原的“非利士人”，却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因为如此，出埃及之后的犹太人，并没有选择经由非利士平原，进入迦南腹地的方案。

他们甚至没有敢于经由埃及人布设在西奈半岛沿海地区的那些据点东进，而是在进入西奈半岛之后就变更路线向南，沿着西奈半岛的边缘荒漠，走出了一条“V”字形路线，进入非利士平原南部的“内盖夫荒漠”。随后又跨越环境同样恶劣的阿拉伯谷地，由约旦河东岸高地绕过死海，回到约旦河谷。按照犹太人自己的记载，他们走的这条曲折路线花了四十年时间。至于为什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自然各种版本的说法为之解读（最为煽情，也最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不让生为奴隶的一代人，跨过约旦河”）。

只不过这些目前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更关注的是，非利士平原的地理结构和地缘价值。以及犹太人当初在荒漠之中“漂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教义得以诞生）对当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快我们会发现，一如当年非利士人是法老布设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颗棋子一样；现在的加沙地带，对于阿拉伯人的埃及来说，也据有同样的战略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于埃及的价值，巴勒斯坦人现在要和以色列人谈判建国的土地，就只有“约旦河西岸”这一个地缘板块了。

第四节 犹太人改造荒漠地和渗透以斯德仑谷地

在犹太人占据迦南之地的同时，也是非利士人强大的时期。基于有埃及这样一个强盛王朝在后面撑腰，犹太人最终并没有得到非利士平原。也就是说，实际上“非利士平原”这个地理单元，倒也算不上是犹太人的祖地了。单从民族感情上来看，西奈、内盖夫这两片荒漠之地，对犹太民族的意义反而更大。毕竟犹太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荒漠中盘亘的数十年间形成的。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在描述这片大家眼中的不毛之地时，我并没有用一般国内地图上习惯标注的“沙漠”，而是用了“荒漠”这个标签。这是因为，“沙漠”这个概念，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存在的。那就是了无绿意，一眼望不到头的漫漫黄沙。而实际上，在大多数被定义为沙漠的地区，内部结构也是有区别的。在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全部沙化的地貌，那些尚未完全风化为沙粒状的石漠化地貌，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在蒙古高原之上，这种地貌被称之为“戈壁”。

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除了那些因为商业、军事等行动，在做足准备情况下穿越它们的旅行者外，真正的沙漠之地本身是无法支撑人类生存的。在地缘博弈当中，通常也只是当作纯粹的地理屏障来定位地缘属性的；至于后者，由于还处在沙漠进行时，水源和土壤条件相对较好（只是相对沙漠了），会有一些顽强的动、植物生存其间。这也为那些耐旱的游牧民族生存游走其间，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这些游牧民族，能够并且愿意长期生存在荒漠地区，并有机会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和其他地缘板块展开博弈，与他们能够控制商道而获取额外利益是分不开的（中东的地理结构，使得那些农业板块之间的陆地交通线，必须经过荒漠地区）。

弄清了“荒漠”和“沙漠”的区别，我们也就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是女作家三毛喜欢的“撒哈拉大沙漠”，还是犹太人穿越西奈、内盖夫沙漠，其实都是沙漠、石漠相间的地区。对于他们来说，在其中选择相对生存条件较好的地点生存（重要标志就是有水源），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如何阻止土地石漠、沙漠化，甚至将已经荒漠化的土地，逆向转化为农业用地，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已经重新开发迦南之地百年之久的犹太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犹太人看来，只有把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重新经营为“流着蜜与奶的土地”，才能够真正完成救赎。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武力或交换，获得新的土地了。只有把目光锁定在那些绝大多数人都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漠化地区，犹太人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理论上，如果以色列能够把占国土面积一半的荒漠化地区，都转化为农业用地，犹太人在中东的生存空间和实力，也会有成倍的增长。

不管是要逆向转化荒漠化地区，还是维持现有的土地不被荒漠化，其中的关键都在于一个字——水。有水的话，这些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就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结构来说，约旦河无疑是这片土地地表水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一个试图在迦南之地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是必须在约旦河谷占据主导地位的。对于这一点，二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就已经十分清楚了。正因为如此，从海法——特拉维夫一线登陆成功的犹太人，在依托海上交通线，将沙仑、亚柯两条沿海

平原，作为重点经营板块的同时，开始了向约旦河谷渗透的征程。而在这个渗透的过程中，加利利山脉与中央高原之间的那条断裂带——伊斯德仑谷地（Jezreel Valley），也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成为了犹太人势在必得的一个板块。

伊斯德仑谷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连接沿海平原和约旦河谷的战略通道，还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片水资源充沛的低地。南北两侧高地汇集的雨水，在滋润山谷脚下的低地之后，再东向汇入约旦河。就这一战略通道的体量来看，并不比那两个沿海平原要小多少。对于渴望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犹太人来说，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本身的农业潜力来看，伊斯德仑谷地的价值都要高于非利士平原。

第五节 犹太人渗透至加利利湖地区

顶着世界上最精明商人的头衔，犹太人当然会计算好他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锁定最有潜力和最有机会控制的地理单元进行突破，是犹太人“买回”迦南行动中的战略规划；而在迁入的犹太人当中达成共识的多点购入，渗透到一定时候自然连片，最终取得在此板块的优势地位（在人口和土地拥有量上压倒阿拉伯人），则是属于具体的战术手段了。

正是这种战略战术的完美结合，犹太人才得以在建国的窗口出现之时（1947年），能够在亚柯平原、沙仑平原、伊斯德仑谷地，取得地缘优势，并在巴、以分治方案中，得到这几个水源充沛的低地。不过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不能渗透进约旦河谷，就不能算真的取得巴勒斯坦地区。而约旦河谷当中，最具战略潜力的区域，并非像一般河流那样在下游河口处，而是在中上游地区。在那里，北部的黑门山，西侧的加利利山脉，以及东侧的戈兰高地之上，所汇集下来的河水，在三座高地之间注入了两个盆状低地：胡拉盆地和加利利湖。

说起“加利利湖”来，大家应该很自然联想到“加利利山脉”了。的确，这个湖的西侧就是加利利山脉。不过加利利山脉并非湖水的唯一贡献者，东侧的戈兰高地，也一直在为加利利湖输送宝贵的淡水资源。因此，如果从战略上来看，如果你想完全控制加利利湖，就必须同时占据两侧的制高点。即使是在二千多年的圣经时代，人类尚无法通过控制河流的走向来影响加利利湖区的生态环境时，这些水源充沛的高地如果被“异族”所控制，对犹太人的生存也是莫大的威胁。

关于犹太人对加利利湖两侧高地的争夺，在随后解读中东战争的过程中都会一一展开的。现实的问题是，在英国人所划定的，有明显边境线的“巴勒斯

坦地区”中，加利利山脉的北部，以及戈兰高地，是被分别划给法国人控制之下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也就是“大叙利亚地区”）。所以对于尚处在复国准备阶段的犹太人来说，先从阿拉伯人手中把环“加利利湖”的低地带购买在手才是最重要的。

犹太人把环加利利湖地区列为另一个重点渗透板块，并非只是看中湖边那些水量充足，可供农业生产的低地。更重要的是，加利利湖虽然不大（大约长20公里，宽10公里），但却足够深。和约旦河谷南端的“死海”一样，这也是西亚裂谷形成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深坑。其湖底海拔最深处，达到了—213米（水深48米）。虽然比不上死海那一400多米的低点，却也足以让“加利利湖”赢得“世界海拔最低淡水湖”的称号了（海拔最低的咸水湖，自然非死海莫属了）。

作为约旦河谷当中最大的天然湖泊（也可以说是唯一），控制加利利湖的意义在于，即使犹太人不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向约旦河下游渗透，他们也可以将这个天然水库中的湖水引向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只是如果那样的话，可怜的约旦河下游及死海就再也不能接收来自圣山之上的雪水了。即使是加利利山脉和戈兰高地上的雨水，也会被截流大半。

第六节 犹太人对胡拉盆地中的湿地进行改造

加利利湖并非是约旦河谷中，唯一的盆地状低地。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位于黑门山脚下，面积与之相当的盆地——胡拉盆地。相比加利利湖那超低海拔，胡拉盆地那接近海平面的海拔就要“高”得多了。这种恰到好处的地理结构，让胡拉盆地既没有转化为加利利湖那样的天然水库；也没有天然成为适合人类居住、开发的平原，而是以一种介于平原和湖区之间的过度地貌——湿地存在的。除了胡拉盆地那略低于海平面的海拔之外，黑门山、加利利山、戈兰高地上流淌下来的河流，才是在整体干旱的阿拉伯半岛，出现这奇迹般存在的湿地的主要原因（这些过路的河水，最终都汇入加利利湖了）。

假如让现在的环保主义者们来处理这块湿地的话，他们一定会兴奋不已，并竭尽所能要求相关国家给予保护的。事实上，如果这一区域始终在阿拉伯人控制之下，这个愿望也许能够实现。因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原始生产方式更多的是靠天吃饭。这些湿地的边缘固然能够为他们的牲畜提供食物和饮水，但就湿地本身来说，却没有去改造的源动力。然而当这类湿地落入农耕民族的控制之下后，其命运几乎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转变了。这一点，相信几千年来一直在不懈改造自然，扩张耕地的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即使是在几十年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那些热血青年，还在政府的组织之下，将东

亚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大型湿地——北大荒，转化为重要的粮食基地——三江平原。

基于胡拉盆地的湿地性质，犹太人只需要在其周边有限的，适合居住的土地上购买、建立定居点，就能够在整个板块内取得人口上的优势了。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因为在 1947 年的巴、以分治方案中，犹太人凭借渗透胡拉盆地边缘所取得的人口优势，得以将整个盆地区纳入以色列的法定领土之中。而仅仅是在三年之后，也就是在遭受阿拉伯人突袭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后（1948 年），刚刚稳定住阵脚的犹太人，就开始着手疏浚河道，将这片植被茂盛的沼泽之地，变身成为面积达 6000 公顷的农田了。

从技术上来看，改造这样一片沼泽地的难度，要比变沙漠为农田的难度低多了。如果犹太人能够一直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话，相信在古典时期他们就已经完成这项任务了。至于那些多余的河水，自然也没有浪费。作为犹太人控制的另一个重要板块——加利利湖区，慷慨的敞开了它的胸怀，全盘接收了这些宝贵的水资源。同时，为了“善待”这些来之不易的水资源，以色列人还以加利利湖为起点，开挖一系列水利工程，以保证让湖水当中的每一份子都只能滋润以色列的土地。至于约旦河谷下游地区的阿拉伯人，无论他们是被称为巴勒斯坦人，还是约旦人，都只能另辟蹊径的重新寻找水源了。

第七节 犹太人一战中站队英国后看到的复国希望

从巴勒斯坦地区的降雨量来看，整体就是北高南低。精明的犹太人又把渗透重点，放在了最有农业潜力的几块低地中。从技术上看，无论复国成功与否，犹太人都算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站住了脚跟。不过从建立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土地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从政治上得到国际承认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而所谓“国际”承认，说穿了就是大国之间达成妥协了。如果有大国愿意支持，即使你在其他方面尚不成熟，也可以得到一个“法人”资格。否则的话，你买再多土地，也最多只能谋求一个自治地位。

犹太人最终得以独立建国是在 1947 年。但就他们在政治上看到复国机会来说，还要往前推进三十年，也就是一战时期。这一次名为“世界大战”，实为“欧战”的殖民帝国之间的混战，给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获得大国支持，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前提是，这其实也是一场赌局，你必须看清形势，站队成功。对于犹太人来说，在战争初始阶段，就作出明确的决定有些困难。鉴于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还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奥斯曼帝国又和德国是同盟国。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犹太人，似乎从天然属性上，应该归属为同盟国阵营。

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一场政治赌局，巴勒斯坦地区现在归属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战后归谁所有。

说起来，协约国方面的英国人很早就盯上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巴勒斯坦地区。毕竟对于这个海洋帝国来说，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是它一直梦寐以求的。只是鉴于西奈半岛的地理环境以及防御纵深，如果不能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即使英国人从埃及人、法国人那里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也随时有可能被奥斯曼帝国，或其他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帝国切断。

现在摆在犹太人面前的选项已经很简单了，要么和土耳其站在一起，祈祷同盟国获胜；要么迅速向英国人靠拢，赌协约国胜利。现在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当然是应该和英国人结盟的。只是犹太人要是真等到战争结束后再站队的话，那就真只有打酱油的份了。比较稳妥的时间点，是在战争已经过半，走势看起来有些明朗化时再明确站队。假如从时间上来看，犹太人最终和英国人达成的协议是在 1917 年。在这一年的 11 月 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英国女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寄出了一封信，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一战持续时间：1914 年 8 月—1918 年 11 月）。

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个圆滑的表态。因为这份后来被称作“贝尔福宣言”的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建立“犹太国”的字样。不过鉴于犹太人后来最终复国成功了，所以现在英国也乐得和犹太人一样，认定这里面提到的“犹太民族之家”，指的就是独立的“犹太国”（这样英国人就可以认为，他们是犹太复国的第一功臣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英国人愿意给犹太人画张饼，当然也意味着，犹太人有他们的利用价值了。而这个价值最终得以体现，与犹太人之前持之以恒的返回迦南之地，并苦心经营定居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八节 地中海气候特点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

在犹太人返回迦南之地之前，这块他们梦中的家园，早已不是流淌着蜜与奶的土地了。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边缘控制区，土耳其人并没有打算向阿拉伯半岛殖民，并把它当成突厥家园来经营。至于已经变身为“原住民”的阿拉伯人，的确也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像农耕民族那样精心呵护土地，合理配置水资源。说起来，迦南之地这样紧临地中海，看上去应该自然条件不错的土地，就农业价值来说，其实是比不上身处季风区的东亚大陆的。

在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当中，夏季从东南太平洋上空刮过来的“东南季风”，总是会为这片土地带来丰沛的降水。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农作物的生长期；而

到了冬季，影响东亚大陆的就是由亚洲大陆北部，刮来的干燥的北风了。不过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已经结束了。从土地上得到收获的农民们，可以利用这段空闲的时间，来准备一年一度的节日了。相比于受季风影响的地区，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气候，就显得有些异样了。那些环绕于地中海的周边地区，倒也能像那些季风区一样，定期从海洋中接收潮湿的气流。

悲剧的是，和季风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地中海气候”影响下的地区，是在冬天接收潮湿气流。那些能够凭借高地拦截到水汽的地理单元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最不适合农业生产季节，得到了这些宝贵的淡水资源。至于夏季，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降水量又和季风区的冬季有得一比了。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最起码，我们经常在夏天“享受”到的，又湿又热的“桑拿天”，就不会在地中海周边出现了。那些喜欢晒太阳的欧洲人（尤其是平时晒不到什么太阳的北欧人），尽可以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中，享受他们的日光浴（4—11月份，基本不下雨）。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国家，正是靠这种气候吸引游客，拉动 GDP 的。

问题是，当大家的口袋都有点紧的时候，那些晒太阳晒到生出懒筋，并从“阳光经济”中获益颇多的南欧国家，经济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了。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环地中海地区，由于受这种冬天潮湿，夏季干燥的气候影响，农业生产与气候不合拍，自然也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而那些对水资源要求较低的旱地作物和木本植物，诸如小麦、葡萄、橄榄一类的作物，也就成了地中海沿岸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了。当然，雨水既然落在了地上，人类总归是有机会利用的。因此通过水利工程建设，合理的分配、利用水资源的“灌溉农业”，也就成为农业增效的主要手段了。

只不过最起码在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购地时，他们还没有发现当地的阿拉伯人，有系统改造巴勒斯坦地区水利系统的想法。对于这个游牧属性的民族（阿拉伯人）和那个同样游牧出身的宗主（土耳其人）来说，他们做得更多的，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犹太人眼中的“上帝应许之地”，已经变成树木稀少，土壤板结的土地了（在缺少维护的情况下，冬天的雨水和河流，把表层富含营养的土壤都冲掉了）。

第十八章 英国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调解

第一节 英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所持态度

尽管我们把那些老大帝国的对外扩张行为，统称为“殖民主义”。但事实上，“殖民”本身并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扩张方式。一个地区的原住民文明程度和人口数量，以及土地本身是否适合欧洲人大规模定居等，都是是否真的采用殖民方式坐实一块土地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巴勒斯坦地区对于以英国为首的海洋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但这片贫瘠的土地，对于普通英国民众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当然，如果欧洲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以宗教思想为主的话，相信也还是能够吸引到足够的移民前往圣地的。就像中世纪的那些试图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中夺回的十字军那样。可惜的是，现在的欧洲人已经务实得多了，能够放眼全球的他们，所要考虑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即使有足够多的宗教狂热人士愿意移居耶路撒冷，英国人也不会考虑用这种方式渗透巴基斯坦的。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相当于把阿拉伯人推向土耳其人一边，并掀起一场新的宗教战争了。为了宗教上的理由去承担如此之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实在是不划算。虽然英国人再也不会仅仅出于宗教因素去移民巴勒斯坦地区，但这并不妨碍犹太人会这样去做。

对于英国人来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出现，并非是英国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不过从客观效果来看，却让他们的手中又多了一张牌。一方面，和这些在欧洲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犹太人打交道，要远比和那些完全处于两个世界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容易得多；另一方面，这些丧失土地达两千多年，却又对土地无比珍惜的犹太人，在挖掘巴勒斯坦地区农业潜力上所做的努力，也是促使英国人下决心认可犹太人复国的原因之一。在英国人看来，既然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是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有人愿意付出努力，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富庶，总好过让它继续向荒漠化转变来得好。

总的来说，在犹太人拥有强烈复国愿望和实际行动的前提下，英国人的确没有理由一定要去扭转这个趋势。更何况，犹太人愿意为此而甘心情愿的为女王陛下服务。满足他们，远比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简单得多（阿拉伯人想要恢复的可是帝国雄风）。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基于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地区的存在，英国人必须小心翼翼的避免因为犹太人的存在，而将整体的阿拉伯人推到对立面去。即使这种影响仅仅是在阿拉伯半岛，其对于地缘政

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在给犹太人作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承诺之时，也不忘附上了一个约束条件：“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

这种法律文字游戏让人看着有些晕。实际就是在说犹太人不管建国也好，自治也罢，都需要在不影响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真有本事利用商业规则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回”全部迦南之地，英国人也是乐见其成。否则的话，英国人并不愿意见到治下的两个民族成水火不容之势。因为那样的话，英国人作为宗主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了（更有可能被其他试图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所利用）。

第二节 英国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和解

为了避免犹太、阿拉伯两族，最终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对立局面，英国人除了对犹太人作出承诺时，拟定了制约条款外，对阿拉伯人方面也做了工作。作为英国操控阿拉伯半岛政治走向的另一张，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哈希姆家族来说，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

犹太人并非不知道，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希望的是统一阿拉伯半岛。因此，在确定英国人态度的同时，犹太人更需要明确阿拉伯人的态度。在英国人看来，如果犹太人能够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共同为帝国的利益服务，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基于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共同努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19年，哈希姆家族最杰出的成员，也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达成了协议。在那次谈判当中，犹太人让哈希姆家族充分相信，犹太人可以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影响力，帮助阿拉伯人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并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存在，只为能会给犹太人带来更多的财富。

也许在双方会晤之时，的确提到了建立“犹太国”的说法。但费萨尔后来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只是说到“将以最热烈的态度，欢迎他们返回家园，叙利亚拥有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这里的叙利亚，指的是包括整个西亚裂谷带的“大叙利亚地区”）。换句话说，这个“共同的空间”，是以什么样的形势存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包括贝尔福宣言在内的，对犹太、阿拉伯关系所作出的模棱两可的定义，为1947年确定犹太、阿拉伯分治方案时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可以认定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国际法地位的国家；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阿拉伯国家属性的巴勒斯坦国中，给予犹太人高度自治权，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最终方案。

假如犹太人没有那么强烈的复国愿望，阿、犹两族并非没有可能在巴勒斯

坦地区和平共处。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阿、犹关系势同水火，而穆斯林给人的印象，也似乎总和极端主义挂钩。但在历史上，穆斯林帝国对于教义的扩张和对异教徒的态度，并非想象中那么强势（印度最后的王朝“莫卧尔王朝”，也是穆斯林建立的）。穆斯林信仰的统治者，更多的是采取实用主义来统治被征服地区。即你可以保持你的信仰，前提是你要交比穆斯林更多的税。依靠经济杠杆的自然调节，伊斯兰教得以在绝大部分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民族中迅速铺开（这种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在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中也在运用。只不过让很多少数民族感到郁闷的是，其导向是逆向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身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的民族，都会受到这种诱惑。自认为拥有更强大意识形态的犹太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能说所有犹太人的后代，都避免了这种转换。但即使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世居于此的犹太社团依然能够保有他们在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允许这样一个有经商才能，又愿意多缴税以维持自身文化特点的民族存在，并没有什么威胁，反而能够在经济上为君主们创造更大的收益（事实上，在欧洲的犹太人，也同样在用他们的经济能力向统治者们换取生存空间）。

第三节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爆发冲突的根源

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英国的政治家，还是哈希姆家族，他们在桌面上所达成的那些模糊协议，并无法从技术上为巴勒斯坦地区带来稳定。显而易见的是，基于犹太民族的封闭性和强烈的复国愿望，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排他性、独立的“犹太国”；而已经完全覆盖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阿拉伯人，是不可能接受在自己的心脏位置建立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那样的话，北非及阿拉伯半岛的陆地通道势必被割断，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梦想，也会变得遥不可及。阿拉伯人这种基于地缘政治角度的担心，也是他们后来必将置以色列于死地的根本原因。

可叹的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能够将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的特殊地理位置，恰恰又是以色列得以生存下去的根本原因。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当大家还面临共同的敌人时，彼此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只会被掩藏，而不会消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这样的。当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这座压在两个民族头上的大山消失之后，矛盾自然也就爆发了。最先对犹、阿共存的局面产生不满的是阿拉伯人。

其实在犹太人移民之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整体是持欢迎态度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购地、移民行为，不仅为当地的上层阶级直接带来了财富，

也为下层阿拉伯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总督，对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毕竟这些善于经营的犹太人，能够比阿拉伯人创造更多的税收（反过来也减轻了阿拉伯人的税收负担）。回想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各地从上至下对“外商投资”的那种狂热态度，我们就不会对于阿、犹两族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蜜月期感到惊讶了。

不过这两件相隔百年的事件本身，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中国与外来投资者的合作，说穿了只是单纯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这些外来投资者，绝大多数并没有移民的目的；另一方面以中国的实力，也随时有力量在外来投资者的行为，将要影响自己根本利益时，对相关政策做出调整。相比之下，犹太人的目的就没有这么单纯了。在一战结束之后，因为“站队成功”和贝尔福宣言的原因，犹太人很自然的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公开表露他们独立建国的政治主张了。在这种心态指引之下，从 1919 年起，犹太人前后掀起了三次移民高峰。

面对犹太人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度，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可能不感到忧虑。在此背景下，1920 年初，耶路撒冷爆发了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而紧接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迅速被组织起来，并开始准军事化的进程。由此，巴勒斯坦地区延绵至今的暴力之火被点燃了。

第四节 英国为平衡阿犹关系牺牲哈希姆家族利益

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新宗主的英国人，也是十分头大的。一方面从实际效果来看，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有助于大英帝国经营这块战略要地，并避免以“土著”自恃的阿拉伯人尾大不掉。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可以由此而向遍布全球，拥有庞大财力的犹太社团示恩。以此来获得犹太财团对英国的战略支持；另一方面，犹太人过于强烈的追逐他们的复国之梦，又势必会影响到阿拉伯人的利益。如果英国人完全站在犹太人一边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将整个阿拉伯版块推到对立面了。有鉴于此，如何平衡阿、犹两族的关系，成为了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既然英国人并无可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做出完全偏向一方的选择，那么在这种平衡当中，那些不愿意接受对方存在的激进主义者，注定要成为牺牲品了。最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哈希姆家族。这个立志要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家族，虽然为协约国在亚洲战场上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试图统一阿拉伯半岛，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志向实在太大，大到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在这种思维导向下，哈希姆家族其实是不可能真的容忍犹太人，在一个可以将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的重要地区，建立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

为了实现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战后的哈希姆家族甚至不愿意承认，英国和它的盟友拥有对大叙利亚地区的宗主权（而在战时的协议当中，英国人特意把叙利亚从未来的阿拉伯王国中切割出来）。为了英、法两国能够稳定的保有最具战略价值的“西亚裂谷地带”，英国人在承认哈希姆家族拥有伊拉克地地区统治权之外，还把约旦河谷以东的“外约旦”地区分割出来，交给哈希姆家族管理。问题是，这些做法并不能真正满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胃口。和英国人一样，他们也十分清楚，对于中东及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具有地缘枢纽作用的“大叙利亚”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如果继续被外族统治，对阿拉伯民族意味着什么。

相比于踌躇满志的哈希姆家庭，那个兴起于内志高原，出身不那么正宗的沙特家族，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从哈希姆家族夺得圣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想法，将来也许会有。但最起码从现状来看，扶植沙特家族会比继续让哈希姆家族做大，要更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更希望以裁判官身份，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内部博弈之中的英国人，并不会很明显的发表声明成为哪一方的盟友。但作为实际宗主的他们，绝对有能力让事态朝着有利于地区平衡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平衡理念的指导之下，沙特家族得以战胜哈希姆家族，从后者手中夺得包含两大圣地的汉志地区。而失去了圣地的哈希姆家族，尽管十分清楚英国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但面对强大竞争者的存在，也只能接受继续依附大英帝国，管理约旦、伊拉克两地区的现状。有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的互相牵制，阿拉伯人被整合到同一杆大旗之下，并强大到足以对抗英国在中东利益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

相比之下，面对巴勒斯坦的局势，英国人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承认犹太人有建立“犹太国”的权利，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如果英国人真敢这样做的话，已经被分化、平衡的阿拉伯世界，就有可能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而重新统一起来。就像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以色列建国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很快就联合起来，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

第五节 犹太人以建立准军事组织应对英国的平衡之术

在处理完阿拉伯人一方以后，英国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在犹太人那边了。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就是犹太人不要再坚持一定要建立“犹太国”的想法。问题是面对一个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一个民族的梦想，英国人所能作出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日，英国人为了完成战胜同盟国的目标，已经正式承认了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存在。也许英国人可以对犹太人玩文字游戏，认为所谓的“犹太人之家”，并非指的是独立的“犹太国”，但你无法阻止犹太人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贝尔福宣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限拖延犹太人复国的时间表。换句话说，英国人不愿意看到，双方矛盾总爆发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于英国人这种左右逢源，大玩平衡之术的做法，精明的犹太人很快便洞察于胸了。为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制定新的战略。首先，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巴勒斯坦局势，犹太人需要继续增强自己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实力。除了继续移民，加紧向那些无法抗拒金钱诱惑，而愿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们收购土地以外；另一方面，激进分子们的准军事化组织也日益完善，并投入到爆力冲突当中去。相比于缺乏组织性的阿拉伯人来说，犹太人在军事化的进程上，效率要明显高出许多。

这些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经受阿、犹暴力冲突洗礼的准军事组织，其成员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也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主要有三个：哈加纳、伊尔贡和施特恩邦）。因此我们并不需要为犹太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受到阿拉伯国家突袭之后所作出的反应，感到惊奇。对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了二十多年的犹太战士而言，他们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了（以色列建国以后，有不少政府首脑，都是出身于这些当时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准军事组织。比如曾任总理的贝京、拉宾）。

一手拿钱，一手拿枪，是 1920 年之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生存空间的战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运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但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他们当中总是有合适的成员，出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去分饰不同角色的。只不过在大历史的视角之下，这些个人的行为在经过内部平衡之后，最终者会显示为一个族群的行为方式。对于试图复国的犹太人来说，除了那些在巴勒斯坦地区，或柔或硬的拓展生存空间的成员以外，在国际上寻找新的支持者，是另一些具备政治、外交才能的成员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六节 犹太人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者帮助其复国

很明显的是，只想在巴勒斯坦地区保持平衡的英国人，并无法给予犹太人想要的东西。在爆力冲突的后期，英国人为了对付日渐强大的犹太准军事组织，已经开始直接派遣军队对其展开搜捕、镇压行动。而失去耐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将爆力恐怖行动，指向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英国人身上了。犹太人对英国人的绝望，还需要一定时间发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国际上，寻找新的

支持者来帮助他们实现复国之梦。对于那些有志完成这项使命的犹太精英来说，每一个可能帮到他们的大国，都是可以接触的对象。甚至像德国这样一个，后来成为犹太人恶梦的国家，也曾经成为考虑的对象。

寻找德国作外援的想法，并非是因为德国对巴勒斯坦有兴趣，而恰恰是德国人在三十年代逐渐表露出来的反犹情绪。基于商人的计算，有犹太精英认为，既然德国人那么讨厌犹太人，那么不妨和希特勒达成一项协议：德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而犹太人则自觉自愿的离开这个越来越讨厌他们存在的国家。作为这项交换的附加条件，犹太人还可以帮助德国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就像他们当年帮助英国人抵抗土耳其人那样。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商人所计算出来的双赢合作，并非总是适用于政治家的想法。德国人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所做出的种族灭绝行为，很快也让对德国抱有期待的犹太精英放弃了幻想。

其实我们并不能责怪在犹太人当中，有成员会有这样幼稚的想法。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能够洞察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一切能够让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想法，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为此，远东的犹太人当中，甚至有犹太社团和轴心国的另一个成员——日本合作，以期待在日本取得最终胜利后，能在中国东北或者俄国远东得到一块土地，完成他们建立犹太国的梦想。

即使是单从利用反犹情绪来加速犹太人“返回”迦南之地的设想当中，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最起码在犹太人开始对希特勒抱有幻想时，同样讨厌犹太人的波兰政府，就很愿意和那些犹太准军事组织进行合作，以帮助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获得更宽松的生存空间。因为那样的话，波兰人就有机会把更多的犹太人“送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了。所以说，我们并不能说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过于幼稚，而是希特勒的想法过于疯狂，超出了现代政治家的思维范畴。

第十九章 犹太人在美国和苏联支持下完成建国

第一节 英国在二战不能给予犹太人复国希望的原因

应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犹太人第一次有机会从大国那里获得“复国”的承诺。尽管这个承诺显得有些模糊，但只要犹太人足够努力，让对方觉得支持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张支票还是有机会兑现的。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太人希望从英国人那里兑现支票的可能性，反而变小了。

至于原因嘛，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英国和他的盟友们又一次面对一个，几乎与上一次阵营相同的利益联盟。只不过这一次英国所处的联盟，被称之为“同盟国”了；而那个一战时期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现在重新组合后变身为“轴心国”了。既然世界又一次被分裂为两大阵营，那么在“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中占据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属于必须争取的对象了。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英国人上次可以极力拉拢阿拉伯人，把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所代表的“同盟国”势力中分割出来。这次也同样不会冒险把阿拉伯人推向敌方阵营的。与上次的博弈格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土耳其人，而是对方阵营的主力——德国人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站队错误而几乎丧失了所有殖民地的土耳其人，这次变得非常谨慎。上一次的教训，足以让土耳其人对选择搭上德国人的客船心存阴影。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要是土耳其人依旧选择站在德国人那边，那么1942年之后，在战略上由守转攻的俄国人，一定会抢在英国人之前在君士坦丁堡开辟第二战场的。要知道，为了能够获得黑海——地中海的自由通行权，俄国人可是绞尽了脑汁。而和俄国人“东正教”渊源的希腊人，也会很愿意和俄国人联手，将土耳其人赶回亚洲老家的。当然，在同盟国一方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时，选择站在英国人一方，风险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德国人凭借闪电战，在欧洲战场上势如破竹时。

当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而无法判定车流方向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静止不动。因此，即使同盟国方面非常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但谨慎的土耳其人仍然直到1945年初，整个欧洲战场行将结束时，才加入同盟国，并最终取得“战胜国”的身份。单从国家立场来看，土耳其人这种骑墙骑到最后一刻，再成功站队摘果子的做法，其务实程度仅次

于那个先加入“轴心国”，后转为“同盟国”的意大利了。

土耳其人选择的这种观望态度，并不代表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就没有对手了。相比上一次，德国人这次的准备要充分得多，在战略战术上也更为成功。即使没有土耳其人的协助，德国也同样可以在地中海的对面开辟战场。不过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重心始终是在欧洲战场上的。在地中海沿线开辟新战场的重任，本来是交给另一个同样在地中海拥有地缘优势的盟友——意大利来承担的。相比土耳其与阿拉伯半岛的紧密地缘关系，亚平宁半岛的地缘优势是在北非。因此意大利为轴心国在阿拉伯世界所开辟的战场，也是由北非而起的。

至于结果嘛，相信多少对二战史有些了解的人，都已经十分清楚了。英国人对付这支更愿意享受地中海阳光的军队，根本没有任何困难而言。而轴心国在北非战场的颓势，直到德国人决定亲自介入北非战场之后，才得以扭转。

虽然北非战场算不上是二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场，但非常明显的是，身为“土著”的阿拉伯人倒向哪一方，都能够为之增添胜利的砝码。而貌似仅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发挥一定影响力的犹太人，是没有那么大的战略价值的。换句话说，指望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公开支持犹太人的建国主张，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战后也没多少机会，因为战争时期，英国人会给阿拉伯人更多的承诺）。

英国人靠不住，德国人又是犹太人的大克星。看起来犹太人是没有办法像一战时那样，从战后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中获利了。不过结果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二战的爆发，才真正让犹太人完成他们的复国梦想。而这一切的发生，直接得益于一个新的海洋帝国——美国的崛起。

第二节 二战后美俄的崛起为犹太人复国提供了新的契机

从地缘视野来看，二战以前的世界和二战以后的世界，有着明显区别。二战以前的“世界”，很明显的被限定在“欧洲”范畴之内。在那些欧洲国家看来，作为一战当中的参与者，无论是那些打酱油的亚洲国家，还是为帮协约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美国，都只是作为这个“世界”的边缘力量参与其中的（甚至那个介于欧、亚之间，努力想成为欧洲一员的“俄国”也是如此）。世界的中心和核心利益所在，还是在于欧洲大陆的争夺。而在二战结束之后，“世界”的范围明显回复到了它的本来面目。欧洲以外诸板块的崛起，使得欧洲只能以一个配角身份，参与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苏联”和海洋联盟的主导者“美国”，则将整个地球一切为二，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

单从博弈的主角来看，两个时代的差别在于，前者的真正主角可以说是英国和德国；冷战时代的主角，则是美国和苏联。只不过从地缘博弈的特点来看，

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仍然是海权与陆权的争夺。或者说美、苏两国所各自倚重的地缘优势和以欧洲为主战场的英、德两国并没有区别。在这场世界格局大转变的前提下，犹太人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换句话说，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乃至像法国这种欧洲国家）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态度，将决定犹太人是否能够完成他们的复国之梦。

从国际舆论的角度来看，德国人那在现代政治理念下，显得惊世骇俗的做法（屠杀犹太人），为犹太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分。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些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再次向世界阐述他们那渴望拥有一片立身之地的理想时，即使是阿拉伯人也很难提出反对意见。不过阿拉伯人的看法是，既然错误是德国人犯下的，为什么不能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犹太国”，而要让阿拉伯人来为这个错误买单？只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即使没有这样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放弃回到这片“上帝应许之地”的想法的。更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几个重要地理单元中，已经占据了优势。

即使是按照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在二战之后得到全面推广的“民族自决”原则，犹太人也有机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独立出一个“犹太国”来。不过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立来说，国际舆论也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渗透程度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要主导世界规则的大国们意见达成一致。这一点，一战时期的犹太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一次他们把宝压在了在帝国范围内，还能全天二十四小时看到太阳的“大英帝国”身上。其结果就是，犹太国得以“合法”的在巴勒斯坦地区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力。虽然这种“政治权力”并未能被明确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虽然英国人出于稳定中东局势的需要，不愿意进一步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对于一直力图从“大国”那里得到政治支持的犹太人来说，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一战只是欧洲内部地缘博弈放大版的话，那么二战就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了。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最大后果就是，美、苏两国凭借各自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超级大国。而能不能获得这两个世界主宰者的支持，才是犹太人是否复国的关键。

第三节 美国价值观的评价及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

对于犹太人来说，美国的崛起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在英国因反对旧有政治、文化体系（包括王权和教权）而被迫移民的“清教徒”，在开拓这片新大陆，并建立明显有别于“旧大陆”的美国体系时，不仅给予了

自己机会，也给予了同样受到欧洲旧体系排斥的犹太人以机会。在欧洲一次又一次反犹大浪潮中，基于新大陆的容量以及开放性，美国成为了犹太移民最大的目的地。

关于所谓的美国精神和价值观，我想经由美国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的宣传，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了。总的来说，如果这些价值观不成为服务于“国家主义”的手段的话，本身还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的。最起码，清教徒们抛弃那些造就祭祀阶层，服务于贵族阶层的宗教体系，转而务实的肯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搭建社会架构的做法，极大的刺激了“新大陆”的经济潜力。并最终在经由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将这种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实力，从而全面体现出了北美大陆腹地的地缘潜力。

单纯的对比北美腹地的地理条件，这片土地本身也的确拥有在某一阶段成为世界中心的潜力。不过建立美国的那些移民也的确用他们那种开放的态度，加速了这一进程（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发现新大陆并成功移民的是中国人。有没有机会让华夏化的“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所建立的那套包括精神和制度的体系，是否真如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具有“普世价值”，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话题。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没有政治约束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才能，并且有机会将这种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对于犹太人在美国所积累的财富，以及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在网络和书店里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数据和阴谋论。基于我们一贯对于证据的态度，在不能去采集那些无法证实的所谓“证据”的情况下，并不会去试图论证犹太社团对美国的政治态度有多大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力是真实存在。在犹太人渗透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以及日后建国、立国的过程中，美国的犹太财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让一个国家的重大政治决定，仅仅服务于一小部分利益阶层是做不到的。对于试图借助国家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人和社团来说，他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是让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并最终在这个国家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获得相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而这，也是犹太社团在游说美国政治集团所秉持的原则。简单点说，犹太人需要让美国政治家明白，扶植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节 俄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考量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它们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过程中，中东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板块。即使不考虑它那显而易见的连接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枢纽位置，仅仅是苏伊士运河和已经开始展现决定性影响力的波斯湾石油，也足以让两个超级大国为之侧目。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应该更能在美国施加影响力。不过从实际结果来看，苏联人反而不用犹太复国主义们重点游说，也愿意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

俄国人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俄国人一直想向中东渗透，但苦于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高原国家的阻拦，俄国人一直无法从陆地渗透至阿拉伯板块。当然，如果俄国人具有海洋优势的话，这些陆地的障碍都不是问题。就像之前控制海权的大英帝国那样，它可以通过海路将女王的影响力，投送到世界各主要板块。相比于英国的海上影响力，俄国离中东最近的黑海舰队，甚至没有办法突破土耳其海峡，自由的进出地中海。也正因为如此，在经由二战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俄国人即使想在中东的核心区有所作为，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英国人在此做大了。

现在的话，最起码从实力和话语权来看，俄国人已经可以放眼全球，开始它世界霸主的战略布局了。而撞上枪口的“犹太国”独立问题，正好可以作为俄国布局中东的第一步。鉴于英国人的中东战略，是建立在扶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英国人认为已经控制了阿拉伯板块，不愿多生枝节）。俄国人可以期待的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新生的犹太国可以成为红色帝国，插入中东地区的一颗钉子，并由此而破坏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版图。不过光是在政治上支持犹太国建立，并不足以让俄国人有信心将犹太国拉入自己的阵营。因为可以预见的是，将会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可能支持犹太国的建立。

要想保证新生的犹太国倒向自己，俄国人还需要观察犹太人内部的政治取向。而观察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俄国人愿意积极推动犹太国诞生的另一个原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于历史原因，寄居于东欧和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占了世界犹太人总量的大多数。这也使得苏联和东欧地区，成为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最大输出地。鉴于俄国早在1919年就转型成了红色政权，以及东欧地区正在开始的制度转型。俄国人可以期待在新生的犹太国中，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犹太人会占据大多数。

能够给予俄国人信心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前，那些来自苏联地区的犹太移

民已经为犹太移民的集体农场，带来了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这种将集体主义运用到极致的意识形态，也正好切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快速开发巴勒斯坦地区的想法。为此，那些来自苏联地区的犹太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了中东唯一一个合法的共产党组织（这个唯一，当然指的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了）。有了这些基础，俄国人有理由认为，新生的犹太国很可能成为中东第一个红色政权。

第五节 在美苏支持下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方案

与俄国的主动支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说服美国政治家方面，要多费些周折。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英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在面临可能搅乱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风险时，美国人所要考虑的，肯定会比之前在中东毫无利益可言的苏联要多。不过从海洋联盟内部的权力争夺来看，美国确实也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划分利益版图。换句话说，就是美国需要在那些地缘关键点上直接插手扶植盟友，建立利益区。只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竞争，要想让对手主动交出权力都是非常困难的。

假如犹太国建立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的话，美国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会和英国人多协商一下，以避免因内部协调不一致，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但现在看来，由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造成国际舆论很明显的倒向犹太人一面（对于大多数无直接利益的中间国家来说，这点很重要）。加上俄国人看起来已经急于谋划扶植赤色“犹太国”了。美国人在权衡在三之后，还是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游说，准备全力支持犹太国的建立了（这也让英国人感到非常不爽）。

有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时间，看来是指日可待了。至于那些打着“联合国大会”招牌的法律问题，只能算是走程序罢了。对于这个结果，最为不满的当然是阿拉伯人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并在这个国家内部给予犹太区以自治权，是能够接受的最高底限了。即使是曾经由印度等中立国家提出的“少数派方案”：建立一个由阿拉伯区、犹太区组成的“联邦国家”的提议，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方案。

不管阿拉伯国家愿不愿意，在最终决定巴勒斯坦地区命运的联合国大会中（1947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分治方案，获得了通过（赞成票为33票，超过了2/3的绝对多数线）。除了十个穆斯林国家之外，只有印度、希腊以及古巴这三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至于那个悲情的“大英帝国”，既不能投赞成票，开罪那些对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阿

拉伯人；又不愿意投反对票，去完全割裂和犹太人的联系（更何况这样做等于和美国唱反调）。最终只能以弃权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在联大的“民主权力”。

虽然从政治和程序上来看，犹太人无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复国之梦，但就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犹太人和那些支持分治方案的国家来说，他们还来不及考虑这两个新生国家将来该如何相处。最现实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该如何划分国土。

第二十章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后的领土分割状况

第一节 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各自分得的领土部分

关于犹太人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策略和方向，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到 1947 年为止，犹太人所购买的土地，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北部那些水量相对充沛的低地，占据优势了。这些板块包括：沿海的“沙仑——亚柯”平原；加利利山脉和中央高原之间的“以斯德仑谷地”；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湖”沿岸地区，以及胡拉盆地。而阿拉伯人仍然占据优势的也有四个板块，即加利利山脉和中央高原两块高地，以及南部沿海的“非利士平原”和加利利湖以南的半条“约旦河谷”（另外半条属于约旦）。

最终的分治方案，也正是依照上述结构划分的。即犹太国得到了他们努力渗透，并占据了优势的四个板块；而阿拉伯国则保住了犹太人基本还没有渗透进来的那三个半板块（约旦河谷只能算半个了）。需要说明的是，犹太人在上述四个板块中的优势，其实只是相对优势。从人口上来看，在这些板块的阿拉伯人并不比犹太人少多少（分治之时，犹太国土地上犹、阿两族分别为 49.8 万和 40.7 万）。而阿拉伯人占据优势的土地上，阿拉伯人所占据的就是绝对优势了（阿、犹太两族人口分别为 72.5 万和 1 万）。

也就是说，按照公平原则，阿拉伯人其实是吃了大亏了。对于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人来说，他们对于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持的是无所谓的态度（除了少数有政治野心的人）。如果没有犹太人横插一脚的话，整个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外约旦地区的民意，并不介意共同接受哈希姆家族的领导，并合并成为一个国家。说穿了，这次分治方案，就是各国出于不同目的（有的是为了利益，有的纯粹就是想补偿犹太人），共同扶植出一个犹太国来。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在那些板块的微弱相对优势，也就变成他们获得整个板块的绝对优势了。

假如不考虑那几十万被划在犹太国境内的阿拉伯人，单纯视阿、犹两族为两个分家的兄弟的话，目前这种分配方案也算是差强人意了。犹太人在土地质量上占优，阿拉伯国则在土地面积上多过犹太国。不过从后来的舆论风向来看，一般都认为犹太人在分治当中占了便宜。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以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犹太人分得了更多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占据了巴勒斯坦地区 56% 的比例。刚才我们也说了，以上述板块的面积来说，阿拉伯人所分得的土地明显是多过犹太人的。那为什么最终结果，会是以色列占优了呢？

假如我们把刚才所列的那七个半板块拿到地图上去做拼图游戏的话，就很快能够得到答案了。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板块：占据巴勒斯坦地区 40% 强的南部“内盖夫荒漠”地区没有归属。仅这一块沙漠地区的面积，就基本相当于阿拉伯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积了。如果说北部和沿海那些板块还能够用人口及双方所控土地比例，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归属的话，那么这片荒漠化的土地就很难用这个原则来划分了。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鉴于这片土地的荒漠化程度，能够活动于上面的也只是少数“贝都因人”。

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对“贝都因”这个概念做个解读了。很多人可能是从与卡扎菲相关的新闻中听闻这个名称的。那位在几个月前殒命的阿拉伯枭雄，总是喜欢自诩为“最后一个贝都因人”。他口中所说的“贝都因人”，其实指的就是那些还保持原始阿拉伯人游牧生活方式，游走于沙漠当中的部落。卡扎菲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向阿拉伯世界表明，他才是最正宗，最能坚守阿拉伯原始文化的领导者（本人也的确是牧民之后）。为了证明这点，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总是带了一顶帐篷，并住在里面（虽然听说他那顶帐篷里面的设施十分豪华）。

不过在现在的阿拉伯文化中，这些坚持在荒漠中游牧，并且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贝都因人”，很多时候已经是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了。尤其是在那些可以借助石油美元舒舒服服的住在城市里，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阿拉伯兄弟看来，这些人就是一群“乡下人”。所以说，虽然很多时候，有人喜欢用“贝都因”来代指正宗的阿拉伯文化，但如果你遇到阿拉伯人，千万不要认为他们都会喜欢别人称之为“贝都因人”的。

第二节 阿拉伯人失去内盖夫荒漠对其亚非交流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文化来说，沙漠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标签。并不是说这些骑着单峰驼游走于沙漠之中的牧民，就不喜欢水草丰美的绿洲了。而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他们比其他民族（同样包括其他游牧民族）更适应干旱环境罢了。

鉴于荒漠化的土地，并没有足够的产出来支撑阿拉伯人成为一个强势民族。阿拉伯人很自然的发现，凭借他们所处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相比其他民族更适应在干旱之地游走的生活方式，“商业”成为了生产方式的重要补充。也正是因为有控制商道的力量，古典时期的阿拉伯人，才有可能从一个沙漠之中的“边缘民族”，进而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西北非之所以无法成就阿拉伯帝国和文化中心，也和区位不如东部板块有关）。

尽管随着文明的进程，阿拉伯民族中的统治阶级也不可避免的和其他民族一样，最终选择了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定居，并建立城市。甚至这些定居绿洲在文明状态上似乎有了进步的城市居民，已经很有些瞧不起“贝都因人”这种仍然固执保持原始生存状态的同族兄弟了。但这也并不代表阿拉伯人就会轻易的放弃，像内盖夫荒漠（Negev Desert）这样的“不毛之地”。尤其是这片土地占了巴勒斯坦地区40%以上的份额时。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这片荒漠和环境类似的西奈半岛一样，都是亚非大陆交通枢纽的一部分。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如果失去了内盖夫沙漠，他们即使能够得到“非利士平原”这条沿海通道，那些从北非而来的阿拉伯兄弟们，在非利士平原稍作休整后，也无法就此转向穿越内盖夫地区，以进入赛拉特山脉中的两大圣地朝圣。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在穿越后来在地缘政治上被称之为“加沙走廊”的巴占“非利士平原”，然后东北方向登上耶路撒冷所在的“中央高原”，最后再穿越约旦河谷进入阿拉伯高原——赛拉特山脉。

单从交通和商业角度来看，这显然并不能让阿拉伯人感到满意。更为重要的是，在犹太人得到加沙走廊以北“沿海平原”，以及内盖夫沙漠的情况下，“非利士平原”（加沙地带）和“中央高原”（约旦河西岸）之间，就只存在战术层面上的接触点了。而这种脆弱的连接，显然无法承担起整个阿拉伯文化区中，北非——阿拉伯板块之间交流的需求。

如果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本身就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在阿拉伯板块的心脏中钉下了一颗钉子的话。那么失去了内盖夫地区，就足让阿拉伯人从战术层面上真实的感受这种割裂感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犹太人在思考“以色列”的立国方案时，并不是出于分割阿拉伯的想法来做的（这其实是大国们在考虑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只是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利益罢了。

第三节 以色列将内盖夫荒漠纳入其领土的缘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内盖夫乃至西奈荒漠地区，对犹太人来说也同样有着特殊意义。当年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带领从埃及逃出的犹太族人返回迦南时，就在这两片荒漠之地兜兜转转的盘桓了四十年。也就是在这期间，犹太教得以完善成型。在犹太人再次回到迦南之地，并站稳脚跟之后，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包括了内盖夫荒漠的北部。

所以从感情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地理环境相对更好的“非利士平原”，对于犹太人来说，反而算不上是“迦南之地”的范畴了。反倒是内盖夫这片不毛

之地，是上帝许诺给他们的土地。所以犹太人在最初布局北部低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不畏艰险的成员，在内盖夫北部有地下水资源供给的点上（也就是有几口出水的深井罢了），进行开拓活动了。尽管在荒漠地区进行农业开拓，相比北部平原要面临成倍的困难，能够移民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同样的，那些只会适应而不会改造环境的阿拉伯人，在这一地区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犹太人试图说服的那些据有投票权的国家看来，犹太人在内盖夫荒漠地区所建立的“基布兹”（非常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拓荒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如果不考虑政治和自身的利益，仅仅从一个公正的旁观者角度来看，将一块大家看起来都没有生产价值的土地，交给一个努力改造，并取得实际效果的民族，总是好过让它继续荒下去。也许时间推移到现在，有了石油美元做底气的阿拉伯人，也有了足够的范例，来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有改造沙漠的想法和能力；但在 60 多年前，阿拉伯人甚至在约旦河谷这样水量充沛，只需挖掘沟渠就能改造出大片可耕作用地的地区，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们更多的是满足于在河水水量充沛的季节游牧于此；而在牲畜得不到足够食物时，就转移到其他地区去。

虽然在争夺内盖夫地区的政治博弈中，犹太人有信心向联合国成员们证明他们绝对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让内盖夫地区变得更有价值。就像他们当年也同样用这点让英国人眼前一亮，接受犹太人帮助“管理”巴勒斯坦地区一样。但我们前面也分析了，这样做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巨大风险。那就是势必会严重分割整个阿拉伯板块。而这又将会使得阿、以两族陷入无休止的摩擦当中。正是基于这点考虑，作为犹太人建国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在这点上犹豫了。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他们注定要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中东的利益，那么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地缘格局的不合理，而随时存在战争风险的话，并不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是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定局的 50 年代，依然有美国政治家建议以色列将内盖夫沙漠地区交给阿拉伯人，以换取和阿拉伯人的永久和平。当然，最终的结果，美国还是接受了内盖夫地区成为犹太国一部分的方案。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游说。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决定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一方面，犹太人已经说服了大多数的国家，接受他们的方案。美国人如果一定坚持反对的话，势必会影响这个新生国家和自己的战略关系（尤其是在俄国人也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内盖夫地区的矛盾，新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也注定不可能在现有格局下和平相处。

并非是出于“事后诸葛亮”思考，我们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你的视

线在巴、以分治的地图上面停留几秒钟，相信很快就能感觉到问题的所在。不知道大家在看过之后，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反正我当年第一次看到时，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怎样的智商，才能划出这样神一般的地图来啊！

第四节 巴以分治方案让巴以两国形成复杂的地缘关系

在1947年11月29日，那个可以称得上是经过全世界主要政治家集体讨论，并结合各种因素而决定出来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中，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被分成了六个区，其中巴、以双方各占三个区。也许有人认为，用一句成语来概括这个神一般的划分方案的话，那就是“犬牙交错”。而我个人脑海中最初闪过的成语是“梅花间竹”。我承认，用“犬牙交错”来形容巴勒斯坦地区的巴、以两国的地缘关系，应该是最为贴切的。这充分反映出了两国那种紧张状态，相比之下“梅花间竹”就显得太过诗情画意了。因为自从犹太国获得这张出生证后，巴勒斯坦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跟诗、画无关，等待双方的，将是血与火的考验。

在今后的解读中，我们应当可以正式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概念，来表述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格局了。需要说明的是，不出意外，阿拉伯人继承了“巴勒斯坦”这个已经明显被打上穆斯林标志的国名（“斯坦”二字的来源及意义，尚有争议。但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穆斯林国家的专用后缀）。而犹太人在确立国名时却并没有定名为“犹太国”，而是“以色列”。说起来这也和犹太人的历史有关。在历史上，犹太人真正在迦南之地建立起来的统一王国就叫“以色列”。而在经历大卫、所罗门这两个知名度颇高的王之后，统一的“以色列”王国被分裂成了“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对于立志“取回”迦南之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然更希望用“以色列”这个名称来讨个好彩头了。至于“以色列”和“犹太”两词的含义以及来历，那就属于神学领域的范畴了。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阿、犹两族用什么样的国名，都不会对双方的地缘关系有影响。不过相信经过我们之前那么多内容的解读，大家应该和我一样，不再认为这是一个近乎儿戏的分治方案了。从划分国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割方案中，遵循了地理单元完整、少数服从多数等诸多政治原则。从巴勒斯坦地区内部结构来看，似乎也很难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了。但这种从局部来看没有问题的划分方案，整体看来却无法保持平衡。这就好像你将衣柜里最好的外套，最好的鞋子，最好的帽子……穿戴在身上，最终却很有可能以一个怪异的形象出身在众人面前一样。整体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分治之后的巴、以两国，不平衡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隶属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的板块，都被对方的国土所包围。当然，你不能说它们各自的国土就处在完全分离状态；因为每个国家被分割开的三块国土，又都以点状接触的方式串连在一起。不要以为这六块土地，需要很多的连接点。事实上那些“天才”的政治家（他们当中一定有对几何学特别精通的数学家）仅仅设计出了两个点，就让巴、以两国看似处在分割状态的国土，串连了起来。只是这两个被命名为“X”和“Y”的连接点，是在为双方共同承担连接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方不愿意和平相处，对方都不可能通过这两个点连通自己的国土。

以政治家们的才能，当然十分清楚这样的设计是多么的不稳定。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方案，只能说是一种妥协。一种在分割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帮助犹太人建国所做出的妥协。问题是，建立这样两个怪异格局的国家，需要妥协的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虽然得到了菲利士平原这条沿海地带。但就这一板块的地理结构，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那些在尼罗河入海时还冲积过来的泥沙，使得它的海岸线并没有可堪大用的港口。其实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港口条件都不算好。能够矮子里拔高子，称得上是“大港”的，特拉维夫——雅法算是一个。这也是离菲利士平原最近的港口城市了。

第五节 雅法和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关于特拉维夫和雅法的地缘关系，我们之前也解读过了。相比有二千多年历史的雅法古城，特拉维夫的历史要短得多。这是犹太移民在雅法边上全新建的一座新城。而建造这座新城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法从阿拉伯人所控制的雅法购买到足够的土地，并控制港口。精明的阿拉伯商人更愿意把房子高价出租给犹太人，以细水长流的方式，笑看那些源源不断由雅法登陆的犹太移民，为他们创造新的财富（现在肯定笑不起来了）。

不管现在阿拉伯人有多么后悔没有在犹太人最初开始移民时，就主动采取措施阻止；但在巴、以分治之时，犹太人转而建造新城的举动，还是让雅法老城的阿拉伯人在数量上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其实只要看看以色列建立以后，国内犹太人所占的比例（阿、犹两族相差不是很大），就知道像雅法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只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再想细分犹太人所占据相对优势的板块是不现实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力保雅法这个出海口能够以飞地的形式留在巴勒斯坦的版图内。当然，在随后的中东战争中，整个巴勒斯坦都丧失了独立地位。像雅法这种飞地，肯定是第一个被解决掉的目标了。不过最起码在当时，阿拉伯人的这个要求还是被接受了。那些决定两国命运的政治家们应该也觉得，出

于平衡的原因，基本可以被归类为高地国家的巴勒斯坦有个出海口也并不过份。

相比雅法，更让所有人头痛的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参照雅法的解决方案，以及阿、犹两族都不可能放弃这座圣城的态度。这座被巴勒斯坦领土所包围的圣城，同样也应该可以划出一半来（怎么划，又是个技术问题了），以飞地的形式置于以色列的管辖之下。如果犹太人希望采用这种方式分割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倒也是有足够的话语权。因为在这延绵半个多世纪的渗透过程中，尽管整个中央高原并不属于优先突破的板块，但就耶路撒冷这个点来说却是例外。在犹太人终于可以拿到以色列的出生证时，他们渗透至耶路撒冷的人口，已经可以占据耶路撒冷总人口的半壁江山了。

不过耶路撒冷问题从来就不是阿、犹两族的问题。在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中，由欧洲基督徒所组成的“十字军”，也同样以夺回这座浸透了耶稣鲜血的圣城为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东征。当基督教世界有机会又一次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时候，将之完全交给两个异教徒国家分割的方法，并不是最佳方案。唯一能够让基督徒们觉得没有浪费历史机会，又看似兼顾了阿、犹两族矛盾的方案，就将耶路撒冷归属为由联合国托管的“国际共管城市”。如果说耶路撒冷的国际共管问题，基督徒们还可以用避免激化双方矛盾，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来的话，那么将耶路撒冷南部的“伯利恒”从巴勒斯坦分割出来，也划入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际共管区”，就明白无误的显露出这种私心了。这座被认定为是耶稣出生地的城镇，对于基督徒来说，和耶路撒冷一样具有圣城的地位（耶路撒冷是受难、复活地）。

六块被分割的国土，以及两座处于国际共管的城市，加上一块飞地，这就是巴、以分治之后的地缘格局。相信任何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从地图上看到这种结构，都不会认为这种结构能够和谐的存续下去。只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战争来临得这么快。英国人在方案规定的最后期限未到来之前，就提早的结束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1948年5月14日，最后期限为8月）。

犹太人没有浪费一天时间就紧接宣布了“以色列国”的建立（在此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是“犹太国”）。而同样连一天时间也没有浪费的还有阿拉伯人。如果不是考虑到凌晨更适合发动一场突袭的话，他们也应该会在同一天就向这个新生的国家发起攻击，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而这种战术上的考虑，也仅仅为新生的以色列争取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1948年5月15日凌晨，由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所组成的阿拉伯联军，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民族独立之战

第一节 阿拉伯各国家参战的意图和目标

将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五个阿拉伯国家列出来，我们会发现，它们“恰好”都是位于中东的“大新月沃地”国家（包括尼罗河下游）。如果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以“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而言，它所直接影响的也正是这条中东地区心脏地带的完整性。面对这种结构性矛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如果能够和平相处，那反倒是奇迹了。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并不仅仅给犹太人带来了希望，阿拉伯人也同样看到了民族崛起的希望。鉴于稳定中东局势的需要，大国们在允许犹太人复国的同时，也同样不愿意站在人口基数更大，覆盖地区更广的阿拉伯人的对立面。

对于犹太人这颗钉子，首先感到不满的，是目前控制了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作为最有资格成为阿拉伯世界新领袖的哈希姆家族，之前虽然被来自内志的“沙特”家族从背后捅了一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重新获取阿拉伯世界最高影响力的想法。更何况，从板块的完整性上来说，外约旦本来就应该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不把理想定得那么远大，约旦国王也是最有权利成为包括巴勒斯坦、外约旦地区在内的新王国的统治者。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基于“大叙利亚”的地缘概念，这两个刚刚从法国的控制下独立出来的国家（1946年），也同样有理由认为，犹太人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如果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新生的以色列就此夭折的话，相信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和叙利亚的本土政治家们，一定还会就大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进行一番内斗的。不过现在最紧迫的事情，还是将以色列这个诞生不到一天的国家，扼杀在摇篮当中。如果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参战国家，因为犹太人直接从他们的土地上“割肉”，所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话；那么埃及人参战的直接理由，就是以色列完全切断了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联系。之前我们也分析了，经过复杂的外交斡旋之后，犹太人说服了大国们同意把南部的内盖夫地区，划分给“犹太国”。对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他们不爽的当然是这么大块土地归属了自己的对手。

而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和整个阿拉伯半岛腹地的交通通道基本就被切断了。之所以说是“基本”，而不是完全，是因为巴勒斯坦所分得的菲利士平原，还和同样归属于巴勒斯坦的中央高原之间有一个点相连。只是这个点，也是以

色列连通沿海平原和内盖夫地区的交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想连通自己的国土，还是埃及人想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交流，都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风险。有鉴于此，在埃及人的作战计划中，即使不能够一鼓作气拿下以色列，也要迫使犹太人放弃内盖夫荒漠地区。

其实在分割之时，巴勒斯坦也并非在内盖夫沙漠地区一无所获。为了让巴勒斯坦与埃及这两对阿拉伯兄弟有足够的接触面，制定分割方案的政治家们，“大方”的在两国边境地区，为巴勒斯坦切割出了一条沙漠走廊来。这也使得巴勒斯坦最南边以菲利士平原为核心的这块领土，整体呈现为一个折角形。问题是，这种看似照顾了埃、巴关系的方案，并没有解决以色列事实分割了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特别是这条划分给巴勒斯坦的沙漠通道，其实是个“死胡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向南一直延伸到亚喀巴湾与约旦的国土相连。如果来自埃及的朝圣者，希望由这条传统路线去圣地朝圣的话，仍然不得不经由以色列的国土（受影响的，当然不仅仅是朝圣者了）。

本来在犹太人获得大部分内盖夫地区的情况下，让阿拉伯人打通一条沙漠走廊，连接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也不是问题。特别是犹太人本身，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分割阿拉伯世界。但问题是，如果犹太人允许阿拉伯人打通了菲利士平原——亚喀巴湾的沙漠通道，就意味着自己丧失了直接进入红海的出海口。而对于战略纵深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以色列来说，失去了面向红海的出海口，其对以色列地缘结构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丧失一块沿海平原。基于这个原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谁能面对亚喀巴湾的问题上，又面临了结构性矛盾。

实际上，早在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矛盾就已经爆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望依靠英国人取得独立地位的汉志王国，在哈希姆家族的带领之下，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亚喀巴湾的控制权，从而打通了与埃及的战略通道（1917后）。只是在1925年，哈希姆家族被沙特家族所击败，而不得不仰英国人之鼻息生存之后，以“亚喀巴”为核心的亚喀巴地区就被割让给了英国人。当然，能够让哈希姆家族聊以自慰的是，亚喀巴这座城市是归属于外约旦。而外约旦，现在算是由哈希姆家庭统治了（虽然是英国人“委托”管理的）。

第二节 色列和约旦在亚喀巴湾的海岸线

现在的情况是，英国人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情况已经无能为力了。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外约旦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唯一能够指望的红海出海口，就是阿拉伯河谷中间以西至埃及边境的那一点点海岸线了。在犹太人看来，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

二千多年前，王国时期的犹太人就已经把“迦南之地”的范围，延伸到亚喀巴湾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现实的地缘结构的需要，犹太人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宗教理由，一定要站在亚喀巴湾的海岸线上。

说起来，当年英国人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去，从法律上造就出个“约旦”国，对阿拉伯人来说，也是好事。否则现在的以色列，即使对控制整个约旦地区没有兴趣。但最起码，不会放过包括约旦河谷、死海、阿拉伯河谷在内的裂谷地带，并在裂谷东侧的高地上谋求制高点。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红海那可怜的海岸线，也就成倍的增加了。其实不仅以色列会感觉红海的海岸线有点短，约旦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只不过在现在的格局下，犹太人已经基本没有机会扩张自己的海岸线了。而约旦人就不同了，理论上如果他们的邻居“沙特”，愿意“帮”一把的话，还是有机会拓展一下自己的海岸线的。相比以色列在地中海还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仅仅拥有这一个出海口的约旦，对于扩张海岸线更有紧迫感。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把亚喀巴湾放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现在约旦在红海的海岸线要比以色列大概长一倍。这其实已经是约旦和沙特“友好协商”之后的结果了。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相应的，约旦也在东部交割给了沙特几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区。让哈希姆家族感到悲催的是，包括两大圣地在内的沙特领土，本来都是哈希姆家族的祖地的，现在却要向自己之前的对手，来交换那么一点点海岸线。也许有一天，哈希姆家族会重新燃起对沙特家族的仇恨。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犹太人这个共同的敌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只有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甚至大叙利亚地区，都置于哈希姆家族的掌控之下，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回到圣裔家族手中。

第三节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战前的准备情况

从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刻起，这个新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的沐浴在战火中。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只能算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双方分别在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又分别进行了四次战争，合计为五次中东战争。至于今后还有没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没有人能够有准确答案。最起码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叙、以两国之间，无论从地缘矛盾，还是从政治需要来看，如果引发新一次的中东战争，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大背景上来看，以色列之于阿拉伯世界的地缘位置，是这一系列战争的根源。不过具体到引发每一次战争的导火索来说，却还是有差别的。相信大家手头一定能够收集到很多，从军事、政治、外交等角度分析中东战争的文章。

而我们这次的着眼点，依然是“地缘”。即相关国家发动这些战争，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地缘目的，而战争之后，新的地缘格局又是怎样。只有清楚了这些之后，才有可能对整个中东局势今后的走势，有个清醒的认识。

假如我们要为第一次中东战争，取一个带有地缘色彩的名字的话，那么它可以被叫作“独立之战”。无论对于谋求“复国”的犹太人来说，还是认为自己的民族从此之后，可以摆脱西方附庸地位的阿拉伯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独立战争。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犹太人的着眼点主要在“国家”之上。即使是在战争进行之前，这些精明而又执着的复国主义者们，就已经从地理、人口结构上做好了准备。而对于大部分阿拉伯人来说，暂时还不会想那么远。对于他们来说，先把这些异教徒从阿拉伯的土地上赶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基于这个共同的目标，不仅那几个与巴勒斯坦地区地缘关系紧密的国家直接参战，像沙特、也门这些并没有直接地缘利益的阿拉伯国家，也有数量不等的志愿军参与了战争。虽然说，阿拉伯人凭借突袭占据了先发优势，并且在实力上明显占优。但从战略准备上来看，犹太人却要充分得多。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犹太人已经可以确信英国人不会真心支持他们的复国梦想时，他们就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了。那些在和阿拉伯人、英国人的冲突中，所建立起来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军事组织，也成为了迅速组建起来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

相比犹太人的未雨绸缪，阿拉伯人的战术准备则要落后得多。一直视自己为这片土地当然主人的他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和前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博弈上。尽管阿拉伯人最终通过政治博弈，也同样获得了独立地位。但在国家独立层面上，他们和犹太人其实是处在同一时间段（即使是像埃及这种名义上 1922 年独立的国家，其实国防方面，之前也主要是由英国人负责的）。因此在战争开始之时，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也只是 4.3 万人。相比以色列所迅速组织起的 3.4 万兵力，并没有绝对优势（不能一战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去）。谁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取决于谁有更好的补给和更高的效率。

第四节 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如果仅仅观察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格局，阿拉伯人无疑是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我们不要忘了，犹太人历经千年的离散史，已经让他们的族人遍布全世界。尤其在美国这个世界的新霸主那里，犹太人无论是在财富，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就是说，阿拉伯人固然可以凭借民族、宗教感情，联合北非——阿拉伯半岛的地缘力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犹太人

也同样可以凭更强的凝聚力，从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吸取力量，以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并非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险恶。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术层面上，犹太人也正是凭借他们能够从世界范围内补给的背景，顶住了阿拉伯联军的第一波攻击，最终反败为胜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仅在武器、金钱上向以色列输血。更以每月万人的速度向以色列移民。这些冒着战火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毫无疑问的都是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的生力军。仅仅在开战后两个月，这些包含了很多二战老兵的新移民，就为以色列新增了六个旅的兵力（事实上，以色列在宣布建国之前，就已经加紧采购武器、组建军队，进行战争准备了）。

为阿、犹两族爆发战争感到紧张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对手。那些刚刚在政治上催生了以色列的联合国成员们，同样感到头痛。不过只要是一个正常人，看到那张阿、犹分治的地图，都不应该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罢了）。正是看到了这个方案的不合理性，主持调解工作的联合国代表，提出了一个看似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方案：将原来划给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山脉”板块，与划给以色列的“内盖夫”地区交换。这样的话，两个国家就不再被各自分割成三块，以色列等于分得了巴基斯坦地区的北部，而巴勒斯坦地区则占据了南部。

如果在最初的分治方案中，按照这个格局来分割的话，也许战争不会来临那么快。特别是埃及人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被隔离感了。不过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再想让双方坐下来，重新讨论分割的问题已经没有可能了。在阿拉伯人看来，既然我有机会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去，为什么还要保留这颗钉子；而在犹太人看来，仅仅是得到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并无法让以色列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更何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夺回全部的“迦南之地”。所以无论方案是否“合理”，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相比后来的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所历的时间是最长的。从 1948 年 5 月 15 日，阿拉伯联军突袭以色列，到 1949 年 3 月，以色列取得最终胜利，并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80% 以上的土地为止，历时十个月（停战协议到 7 月才签订）。对于两个刚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来说，这场战争的来临都显得十分仓促。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对于战争的进程都没有详细的计划。因此，时间拉长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效率。在战争进行当中，由联合国协调的两次停火期间，他们比阿拉伯人获得了更多的武器、人员补给。以至于在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方面在兵力上已经对阿拉伯联军取得了

压倒性优势（以军约 11 万，阿军约 6 万）。当然，以色列能够如此快速的扩充兵力，除了加速移民之功外。全民动员的体制，也是重要因素。这种全民皆兵的体制，在依旧处于战争准备状态的朝鲜半岛，以及台湾岛，也同样存在。

如果你对军事细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寻找相关文章以供参考。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格局。而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方向。

附第一次中东战争进程表：

第一阶段：阿军发起进攻至第一次停火（1948 年 5 月 15 日—7 月 8 日）

第一次停火：1948 年 6 月 11 日 – 1948 年 7 月 8 日

第二阶段：以军的第一次进攻至第二次停火（1948 年 7 月 9 日—10 月 14 日）

第二次停火：1948 年 7 月 18 日 – 1948 年 10 月 15 日

第三阶段：以军的第二次进攻至战争结束（1948 年 10 月 15 日—1949 年 3 月）

战争结束：1949 年 2 月，以、叙签订停战协定；3 月，以、约签订停战协定；7 月，以叙签订停战协定。注：伊拉克拒绝和谈，但表示尊重其他国家的决定，并从巴勒斯坦撤军。

第五节 以色列战后对巴勒斯坦部分领土的占领

尽管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对付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对付一个有严密组织性的团队时，数量上的优势却往往会转化为劣势。因为在技术上，你很难协调联盟内每一个成员的行为，亦有可能让你的对手找个突破口。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曹操每每听到对手有新盟友加入，反而大笑不止的原因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联盟一开始的共同目标，一定是要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这个国家。但随着战事的进展，每一个参与者都渐渐的把关注点，放在与自己关系最为紧密的地缘利益上了。而在所有参战国家中，埃及和约旦两国是与以色列地缘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因此在今后的日子中，介入巴勒斯坦事务最多。

从地缘格局来看，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那个理想化的阿、犹分治方案就被彻底的改变了。首先巴勒斯坦彻底失去了北部的“加利利山脉”版块。为了让北部两块最有价值的低地能够连成一片，犹太人并不想让阿拉伯人对此存有任何幻想。当然，即使是得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北部所有土地，犹太人在地缘上依然没有安全感。当年英、法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时，将“加利利山脉”北部，以及戈兰高地分别划给了黎巴嫩和叙利亚。使这两片高地成为了犹太人头上高

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这种地理结构上的劣势，最终也通过不同的形式转化为对以色列实实在在的威胁，并最终引发了两次中东战争。

虽然北部的边境划分，注定会成为引发新战争的导火索。但对于战端初启的双方来说，现在还只来得及把注意力放在巴勒斯坦地区内部的行政结构上。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他们在战争中所丧失的，并不仅仅是全部的“加利利山脉”板块。中部的“中央高原”板块和南部的“菲利士平原”板块，也同样遭到了以色列的压缩。

在“中央高原”板块，犹太人的地缘诉求非常明确。那就是即使不能占据全部板块，也务必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战略通道来。最终的停战线，也的确如此。犹太人在中央高原的西南部，撕开了一个喇叭形的突破口，并由此将控制区延伸到了耶路撒冷。至于原来划给巴勒斯坦的那部分“菲利士平原”，犹太人也没有手软。不仅当初“额外”搭给巴勒斯坦的南部边境那条“内盖夫荒漠”走廊，被以色列尽数“收回”，巴勒斯坦的北部控制线也南收缩了不少。由于上述两个板块都被大幅度的压缩了，因此战后的巴勒斯坦事实上就被分割为两块完全不相连的独立板块了。当然，以色列倒是再也不用担心，自己需要和巴勒斯坦去共享什么 X、Y 点了。

第六节 巴勒斯坦能保住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原因

根据各自的地缘特点，仍然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这两个板块，被分别打上了新的地缘标签。包含半个耶路撒冷的中央高原地区，因为整体位于约旦河的西侧，因此被称之为“约旦河西岸”；而被压缩得只剩下“加沙”一个重要城镇的沿海平原，则被叫作“加沙地带”。这两个板块，也成为了时下“巴勒斯坦国”建国，所要求的领土。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尽管仅仅是在几个月之前，他们还踌躇满志的希望借助阿拉伯兄弟们的帮助，建立一个覆盖全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但现在，巴基斯坦人甚至没有机会喊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主张来。因为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其实关心的并不是要不要建立“巴勒斯坦国”，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随后的和谈过程中，各参战国也是以维护自己的地缘利益为出发点。至于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最后还是要靠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努力。其实这也不能怪阿拉伯兄弟们现实，事实上也正是埃及、约旦两国，出于维护自身地缘利益的需要，才为巴勒斯坦保住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两

个板块。如果没有这种“自私”的考虑，相信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就已经能够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全境了。

即使不看战争过程，仅凭地缘关系分析，相信大家也能够判断出，巴勒斯坦能够保住“加沙地带”，主要得益于埃及的军事存在。对于埃及来说，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东面的邻居，是一个由异教徒控制的国家。特别是犹太人与西方盘根错节的渊源，让正在试图崛起中东的埃及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这和当年英国人试图在巴勒斯坦地区扶植犹太人，以缓冲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地缘威胁，道理是一样的。基于这个地缘诉求，即使埃、以双方达成协议，将加沙地带并入埃及，也无益于解决埃及人的担心。相反，埃及却要为一个深入对手腹地的“突出部”，耗费更多的国防力量。

正因为从地缘安全上来看，在自己的东部扶植一个阿拉伯化的缓冲国，会更符合埃及的地缘利益。所以埃及在控制加沙地带之时，并没有试图将“加沙地带”并入埃及。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约旦了。因为很快，“约旦河西岸”就和东岸一样，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了。

第七节 沙特家族信仰的宗教教派的特点

相信在所有参战的阿拉伯人中，最为关心巴勒斯坦命运的就是“哈希姆家族”了。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地盘，仅仅依靠“圣裔”的身份，哈希姆家族并无法获得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而巴勒斯坦地区，正是哈希姆家族最为现实的扩张方向。最起码那个从巴勒斯坦地区当中分裂出来的“外约旦”地区，已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了。更为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还是除了麦加、麦地那之外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

在哈希姆家族暂时看不到重回汉志的希望之下，能够成为耶路撒冷的主人，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唯一方向。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把沙特作为主要对手，重新夺回汉志地区，不过英国和他的盟友们可不希望看到这点。要知道，让一个不那么名正言顺的家族成为圣城的统治者，比让“根正苗红”的哈希姆家族回到圣城，控制上的风险要小得多。

不过英国人在当初设计这种平衡关系时，固然在地缘关系方面足够巧妙，但在宗教层面上，却没有做更多的考虑（暂时想不到那么远了）。因为沙特家族所信奉的教派是18世纪兴起于内志地区的“瓦哈比派”。简单点说，这是一个归纳为逊尼派中的次派，属于逊尼派中的“原教旨主义”。目标是完全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正统信仰，并在生活中要求严格履行教规教法。不过对于沙特

家族和瓦哈比派“鸠占鹊巢”的行为，穆斯林内部一直有异议，甚至有认为它是属于逊尼派之外的教派。

当然，沙特家族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归类的。非常现实的是，他们更愿意让瓦哈比派的原教旨信仰，成为整个逊尼派教众的共同信仰。而不愿意像波斯人那样，以异类的身份被排除在穆斯林主流信仰之外。正因为沙特家族在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原教旨倾向，以及他们所占据的极为重要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宗教还是石油方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这也正是虽然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沙特目前成为了西方最可靠的盟友，但基地组织的许多核心成员（包括拉登），却同样也出自沙特的原因。

沙特家族这种一方面在宗教上坚持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却在地缘政治上奉行务实主义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平衡（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离，也正是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做法）。相信凭借这种政、教分离的方式，沙特会比另一个用“政教合一”方式，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伊朗，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

第八节 哈希姆家族将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合并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试图“小宗代大宗”的沙特家族身上移开，回到哈希姆家族身上。不管他们心中还有多大的抱负，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在所有参战国中，约旦方面也可以说是最尽心尽力的。而最终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包括半个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被约旦军队所控制。当阿、犹两方都无法彻底将对方赶出巴勒斯坦地区之时，将耶路撒冷作为分割点，是双方暂时能够接受的共同底线。1950年四月，哈希姆家族正式宣布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地区合并，正式更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简称约旦。

对于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并无所谓自己归类于哪个国家。事实上整个阿拉伯文化中，民族意识要高于国家意识。不过对于那些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失去了独立建国的身份，无异于也剥夺了他们进入最高权力圈的机会。因此，尽管哈希姆家族似乎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向他们统一“大巴勒斯坦”地区的目标（包括外约旦地区在内），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在不久之后，那些被犹太人驱逐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那些渴望最高权力的巴勒斯坦精英们，将会使约旦河西岸成为哈希姆家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从现在的情况看，仅仅能够统治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无疑已经放弃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想法了。在放下了这个沉重包袱之后，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

考虑，约旦王室反而成为了缓和阿、以关系的积极斡旋者。当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约旦方面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最起码在他们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站到了耶路撒冷之时，是肯定还有更多想法的。

从最高权力的争夺来看，竞争者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而这些竞争者所依托的资本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哈希姆家族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他们虚幻的家族身份上，那么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高领导权的另一个竞争者——埃及来说，它能够依托的东西就要务实得多了。为埃及支撑了 5000 年文明史的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地区；以及苏伊士运河所带来的世界级的地缘影响力，是埃及人自认为能够领导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地缘资本。不过，想让这些地缘资本成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助推剂，埃及人首先要取得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

要知道，尽管在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埃及虽然算是完全取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作为埃及地缘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苏伊士运河”，却仍然处在英、法两国的支配之下。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不可能令埃及人满意。为了争夺这条世界级的地缘枢纽，埃及人和英、法两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按时间顺序，被称之为“第二次中东战争”。鉴于以色列的地缘位置，犹太人也不可避免的被卷了进来（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以配角身份出现在中东战争中）。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中东战争之海权之战

第一节 埃及在尼罗河建造阿斯旺大坝

应该说，在近代最先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是“哈希姆家族”。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阿拉伯世界最终由这个世居麦加的圣裔家族做精神领袖的话，逊尼派和什叶派应该都可以接受。不过历史已经进入了 20 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君主制显然已经走向了末路。民众更热衷于，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成为政治游戏参与者的“革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仍然控制约旦、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还是占据了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苦心经营“海湾君主国”体系的沙特家族，都显得有些落伍了。而那些能够以“革命”的形式更换政权体系的国家，在制度和民众基础上无疑更有优势。

最先在阿拉伯世界中掀起社会革命浪潮的是埃及。而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真正能够称上领袖级人物的“纳赛尔”。1952 年 7 月 22 日的夜晚，一批埃及军官在纳赛尔的带领下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宣布废除埃及的君主体系，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英国人在埃及所扶植的，仍然是他们至今仍然热衷的君主国，史称“法鲁克王朝”。即使不讨论制度层面上的优劣，一个新时代、新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代表着更多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这次革命，本身就是由军官组织所发起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为埃及今后的外交风格注入了强硬的色彩。

我们之前也说了，无论埃及是着眼于国内建设，还是急于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都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地缘资本。对于挖掘尼罗河潜力这点来说，埃及人似乎能做得并不多。因为 5000 年来，尼罗河的自然规律早已为世人所知。每年 6 ~ 10 月河水定期泛滥所留下大量肥沃的河泥，会很自然的为农作物补充肥料。无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先民，还是埃及现在的主人——阿拉伯人，都只需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可以了。不过，既然埃及人希望自己的地缘潜力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只沿着前人固定下来的道路走了。为此，他们必须为尼罗河动一个大手术。

纳赛尔准备为尼罗河动的大手术，我们在埃及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尼罗河谷修建一道大坝——阿斯旺大坝。在身处沙漠地带的埃及人看来，让这些河水留在埃及境内，将沙漠变成良田，远比让他们白白流入大海要有多得多。在 1971 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1960 年动工），结果也的确如埃及人

所愿，埃及的农业产值从此番了一翻。这意味着埃及能够自给自足，养活的人口也成倍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斯旺大坝相当于为埃及再造了一条尼罗河。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阿斯旺大坝的建造，也改变了尼罗河两岸几千年来农业规律。那些原本依靠尼罗河泛滥，就可以靠天吃饭的下游地区，就再也得不到那些饱含肥料的淤泥了（再想保证产量，就只能用化肥了）。

而这些被截流在大坝北部的淤泥，也并没有为上游地区带来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应该在下游入海口处形成的“三角洲”，转而在大坝的入口处成型了。这样的话，其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所能带来的效率也就逐年递减了。尽管阿斯旺水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并极大的改变了尼罗河下游的生态环境，乃至地缘结构，但如果让埃及人再选择一次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建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阿拉伯地区更为接近真理。

就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来说，资金来源是最为重要的。同样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修建地下管网，汲取地下水资源的利比亚；还是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的沙特，都是在从石油上获得额外利润之后，才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尽管现在石油工业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比起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邻居，埃及那点油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埃及人有一个看起来比石油更可靠的，巨大的财富之源——苏伊士运河。

第二节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

没有一件事情比收取过路费来得更舒服的了。从古至今，无论是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强人；还是现在打着“收费还贷”旗号，垄断路权的收费公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一本万利的从物流渠道上获利。

如果 19 世纪中叶，法国人没有和阿拉伯人的前宗主土耳其人达成交易，挖通苏伊士运河的话，埃及人肯定还要头痛怎么先弄到挖运河的钱。其实说起来，最初作为地主的“埃及”，也并非不能从苏伊士运河中获益。在最初的合作方案中，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所占据的是 52% 的股权，而埃及方面则分得了 44% 的股权。当然，这个股权其实和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由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所获得。当英国人试图控制这条东、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埃及“政府”所掌握的这部分股权上。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作，英国人终于在 1875 年低价收购了埃及名下的那部分股权。由于法国人在最初的开挖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民间资本参与，而英国则是以政府的名义收购埃及方面的股权。因此，在实际动作中，作为最大单一股东的英国人，实际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控权。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开挖一条运河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是无法因为主观意识而减少的。而从政治角度解决所有权问题，很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对于1952年的那批革命者来说，他们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项政治决定，即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并国有化。以让这条交通大动脉所产生的利益，真正能为它的所在地“埃及”服务。

从战术角度看，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可以直接为计划中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也有人认为，是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导致了埃及要收回苏伊士运河。也有人认为，是西方国家因为埃及的“革命”倾向，中断了提供给阿斯旺大坝的贷款计划（7000万美元），导致了埃及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以支撑大坝的修建。其实从战略上看，有没有大坝和革命，埃及人都肯定要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让自己最大的财富之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本身就是一个引发政治动乱的定时炸弹。任何一个窥伺政权者，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政府。而“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遵守之前在所谓“不平等”状态下所订立的商业条约。无补偿的以国家的名义，收回那些在外国政府及个人名下的资产。

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名义，剥夺前“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上世纪中叶，民族独立者们通行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在做出这些政治决定时，都不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你的体量足够大，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当然可以更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正面的例子就是1949年以后，同样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的红色中国。事实上，即使当初不是出于保留一个对接西方窗口的考虑，而立刻收回香港的主权，英国人也断然不会试图在军事上有所反应；

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一条“海上交通大动脉”地主的巴拿马，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当巴拿马的政治家试图用收归国有的强硬手段，取得巴拿马运河主权时，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至次年2月”）。尽管在1999年，巴拿马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努力，貌似完全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但它那强大的邻居，仍然保留有“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优先通过和采取行动的权力。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正义”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真正的战略目的的。假如这些理由只是针对个人，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话，当然是问题不大。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政治家本人的命运，最终都不是由个人操守来决定的。单从利益的角度看，埃及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在战略上可以提升国家的地缘实力，更可以直接为另一项国家工程“阿斯旺大坝”提供战术支持。而对于英、法两国来说，失去了苏伊士运

河的管理权，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更标志着这两个仍然拥有诸多海外利益（特别是英国）前世界强国，将很快失去它们的世界影响力。

假如埃及有中国的体量，那么英、法两国未必敢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之争；而假如埃及只有巴拿马的实力，他的政治家也未必敢在刚取得完全独立地位后，就那么快的作出强硬反应。正是因为埃及和英、法两国都觉得自己有获胜的机会，苏伊士运河之争，才如此之快的以战争的形式浮出水面。至于那个同所有阿拉伯人都有些结构性矛盾的以色列，也同样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

第三节 埃及禁止以色列利用苏伊士运河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世人，犹太人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敌人。反过来，当埃及人成为英、法两国的敌人之时，犹太人也就很自然的成为这两个前“大国”的潜在盟友了。当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并不一定成为他们直接参战的理由。作为一项军事行动来说，它还是必须有很具体的战术目的的。这就好像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是战略对手了，但却并不表示，美国在军事打击它的某个对手之时，中国就一定要介入一样（更别说军事介入了）。至于以色列为什么参战，它的战术目的是否实现，我们下面来看看。

从英法和埃及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中东战争被称之为“苏伊士运河战争”无疑要更为合适。而对于以色列来说，也同样有动机为了这条运河而战。因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尽管埃及和阿拉伯联盟遭遇了失败，被迫和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和平的开始。对于处在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来说，它的对手有足够的地缘资本，来从各个角度扼杀这个新生的国家。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就是最先被阿拉伯人所使用的地缘武器。

虽然埃及人还是为夺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做准备，但针对以色列的封锁行动已经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以色列藉的船只被禁止通过苏伊士运河，就连为以色列运送物资的其他国家船只也同样不允许通过。对于埃及人的这种做法，掌握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英、法两国，当然可以进行交涉。只是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去激化埃及人本来就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以色列人对于打破苏伊士运河的封锁，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假如埃及人和它的阿拉伯盟友们，所能做的只是封锁苏伊士运河的话，那么对以色列的影响倒也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因为相比于那些必须倚重于苏伊

士运河的国家，以色列特殊的位置，使它有两段海岸线可以对接地中海和红海。也就是说，即使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以色列也可以利用他们地中海的海岸线，与欧、美进行交流；而当日费尽心机打通的亚喀巴湾出海口，也能连通东部的红海、印度洋。问题是，埃及人手中的王牌并不止是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需要，他们同样可以封锁亚喀巴湾。

第四节 埃及在亚喀巴湾封锁以色列的出海通道

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解读一下亚喀巴湾的地缘结构了。红海的北部到了西奈半岛的南端，就分支为了两个海湾。一条是西侧的“苏伊士湾”，从行政上看，这条被包围在埃及本土和西奈半岛之间的海湾，尽数由埃及所控制。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它的名声远比东侧连通西亚裂谷带的“亚喀巴湾”来得大。不过对于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大巴勒斯坦地区”来说，亚喀巴湾的重要性就要比苏伊士湾重要得多了。在当年英国人分割巴勒斯坦、外约旦之时，大巴勒斯坦地区在亚喀巴湾所面对的那一“角”海岸线，又被一分为二。分别分割给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地区。至于除此之外的亚喀巴湾绝大部分东西海岸线，以及亚喀巴湾连通红海的“蒂朗海峡”，则由沙特、埃及两国所据有。

让约旦这个兄弟国家经由蒂朗海峡出海，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不过以色列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既然埃及人能够封锁苏伊士运河，那也同样能够联合沙特封锁蒂朗海峡，让以色列的南部出海口成为聋子的耳朵。事实上埃及人如果要想封锁蒂朗海峡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寻求沙特的支持。因为尽管横亘在蒂朗海峡口的“蒂朗岛”归属于沙特，但宽约九英里的海峡主航道却并不在海峡当中，而是在靠近埃及海岸线一英里处。这么近的距离，无论是按照当年海洋国家所约定的领海规则（3海里领海线），还是后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12海里领海线），都明白无误的位于埃及的领海之内。当然，即使主航道是由埃及、沙特两国所共有的，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也同样会联手对以色列进行封锁的。

现在的情况就让以色列非常难办了。如果苏伊士运河或者蒂朗海峡中，有一条对它开放，都可以让其很方便的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物资交流。而现在埃及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废掉了以色列当日苦心周旋而来的南部出海口。加上陆地上的封锁，以色列通往东方之路就等于彻底被封锁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地球是圆的。犹太人如果想的话，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仍然可以到达世界的任意一个靠海的角落。但那样所要付出的成本，将成倍的增加。

最为现实的考虑就是，尽管以色列身在世界上最富含石油的版块之上，但

它却无法从阿拉伯人手中获得一滴油。在这个版块中，唯一有可能为以色列供油的，就是和阿拉伯人也同样有着民族、宗教矛盾的波斯人。鉴于和北方邻国——俄国长期以来的地缘矛盾，这一时期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和以色列一样，同样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虽然表示伊朗并不会因为地缘矛盾，而拒绝与以色列交易。但要是必须围着整个非洲转一圈才能买到油的话，那犹太人肯定也承受不起的。

经过上述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以色列有着足够的动机被英、法两国拉进“苏伊士战争”的同盟中去了。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战争更应该被称之为“海权之战”。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锁定在苏伊士运河之上，而是可以在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中作出选择。能够通过战争同时打通这两条海上通道，当然是最好了。即使只能打通一条，以色列的战术目的也算达到了。其实对于英、法、埃三国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海权之战”呢。

第五节 以色列和英法联军出兵侵入埃及

虽然说英、法是战争的主导者，但最先发动战争的却是以色列。这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主角未必会第一个露面。按照三方约定，由以色列先派出军队攻占西奈半岛，然后英、法则以保护运河为由出兵占领苏伊士运河（塞夫勒协议）。而埃及方面，当然也不是没有准备。自从准备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那一刻起，埃及人就已经知道战争无法避免了。为此，埃及人将叙利亚和约旦这两个国家拉入自己的军事同盟（军事上由埃及统一指挥），为的就是希望从侧后方牵制以色列，避免犹太人从东线向自己施压。

单从军事角度看，经过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洗礼，以色列的常备军已经达到10万人的规模。而埃及方面的总兵力则为15万。但从装备和战斗力来看，即使是埃、叙、以三国合力与以色列PK，也没有胜算。对于这点，以色列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1956年10月29日下午，随着以色列的第一支突击部队（500人）空降在西奈半岛的中部，第二次中东战争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而此时，距离埃及和叙、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还不到一周时间。从战术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攻击还是有些出乎埃及人预料的。换句话说，埃及人本来还希望能够有多点时间进行军事上的部署。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埃及和他的阿拉伯兄弟们将经常性的体验到，犹太人那高效率的战争动员能力。

在以色列兵分四路越过埃、以边境，迅速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推进之时，埃及人除了调动西奈半岛上的驻军（约三万）进行逐级抵抗以外，更需要从本土调集主力，越过运河向西奈半岛进行增援。问题是埃及人这次所面对的并非只

是以色列，英、法两国才是幕后的主导者。

当埃军主力渡过运河，准备增援西奈半岛时（离开战也就一天时间）。英、法两国开始以“拉架”的姿态，出现在埃、以两国面前。既然是拉架，就要提出方案。英、法两国给出的方案是：1、埃、以两国以运河为界停战（以色列稍微“吃点亏”，多退个10英里）；2、由英、法两国作为“和平使者”，出军保护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并将敌对两方隔离开。假如苏伊士运河是埃、以两国的界河，这个方案多少还说得过去。而现在，如果埃及答应了这个方案，不仅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还等于把西奈半岛的控制权移交给了以色列。面对这个明显的偏架，埃及人当然不可能答应。

英、法两国其实也没有指望埃及会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这样调解，无非是遵循所谓“先礼后兵”的原则罢了。既然只是走过场，英、法两国甚至连合理的考虑时间都没有给埃及（30号发出，31号就要求答复）。在埃及人明确拒绝两国的提议之后，真正的“苏伊士战争”爆发了。和以色列从地面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不同，由地中海基地（塞浦路斯、马耳他）而来的英、法联军，主打的是空军和海军。由此，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的制空、制海权，很快就归属了英、法联军。

以埃及和他们那些阿拉伯兄弟的实力，想在正面战场同时应对英、法、以三国联军，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机会。不过埃及体量决定了它可以在抵抗中为自己争取时间（如果是巴拿马那种体量，一次战争就可能解决问题了）。从运河运营的角度来看，埃及人固然很难阻止英法联军进入运河区。但同样的，如果英、法两国不能够和身为地主的埃及达成政治和解，他们也同样很难维护运河的安全。说得再简单点，埃及人即使保不住主权，但同归于尽、两败俱伤的能力还是有的。最典型的战术举动就是，在埃及人即将遭受英、法攻击之前，他们利用沉船及石块、混凝土，阻断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行。

假如苏伊士运河真的成为了长期胶着的战场，唯一可能从中取利的，倒是以色列。因为有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顶着，他们最起码可以通过占领西奈半岛，来保障蒂朗海峡的通行。这样的话，以色列就等于打通了红海——印度洋航线。他们最需要的伊朗的石油也可以安全的抵达以色列了（如果埃及占了下风，不要指望约旦、沙特会去找以色列的麻烦）。至于英、法两国，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要知道，供给欧洲的石油，有三分之二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输入欧洲的。假如因为战争原因，苏伊士运河长期不能使用。那么即使那些海湾产油国没有站在埃及这边对英、法实施石油禁运，英、法自己的阵角也会大乱。

第六节 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没有支持英国和法国

在埃及人不肯妥协的情况下，苏伊士运河能否重新通航，变得很难预测。从英、法两国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在这个时候给予支持。一方面，如果强大的美国能够加入英、法一边的话，有利于进一步向埃及施压，尽快达成政治妥协。另一方面，从战术角度看，英、法两国也希望美国能够提升自己的石油产量，以暂时性的补上因苏伊士运河停航和可以预见到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能源缺口。单从政治关系上来看，美国似乎没有理由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并没有站在英、法两国一边，而是选择了支持埃及。

其实英国人并不应该为美国的态度感到惊愕。往远了说，作为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美国，就是通过和英国决裂才获得独立地位的；往近了说，以色列建国那件事，美国人就已经和英国人唱反调了。说到底，都是利益在作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当然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了。虽然说美国和英、法两国是紧密的盟友关系。但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为悲剧的是，美国现在是老大，并且是试图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老大。从地缘角度看，当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的时候。新旧两股势力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矛盾了。鉴于欧洲人，特别是英、法两国，之前已经把海洋利益瓜分得差不多了。同样试图依托海洋称霸的美国，肯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把海上的利益交割给美国的。这不仅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实力增长问题，也关系到联盟内部的话语权问题。

武侠小说里面有句话，叫作“你最好的朋友，往往就是你最危险的敌人”。放在美国和这些老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有这层意思。因为如果是对手，你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与之正面博弈，争夺地盘、利益。但如果是“朋友”，很多东西就不方便直接出手了。比如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如果英法不放手，美国人估计再等50年，也无法让这两个铁杆盟友心甘情愿的交给美国的。不过，要是埃及人先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然后美国再通过控制埃及，来间接得到苏伊士运河的主导权，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就好像《亮剑》里孔捷借李云龙之口，对358团参谋长说的那套“道理”一样：同样一批物资，让土匪过了一道手，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英、法两国如果被逼退出了苏伊士运河，也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能够填补上这个空缺。因为在铁幕拉开之后，这个世界就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唱主角的。在这种针锋相对的争霸局面下，任何一个地区都

有可能成为双方博弈的战场。更何况是苏伊士运河和中东这样一个焦点地区呢。事实上美国冷处理英、法两国的请求，也是和苏联的介入有直接关系的。与当日美、苏两国“不约而同”的支持以色列建国一样。在中东这块地盘上，这两个新生的超级大国之前都没有直接利益可言。在这种抢地盘的时候，任何可能被争取的国家都是两个霸主需要拉拢的。因为你不拉，就意味着它可能投入你的对手怀抱中，并反过来成为你的敌人。这种局面，对于小国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机遇。使得他们有机会待价而沽，最大限度争取自己的利益。等到地缘格局稳定了，他们往往就必须做出非黑即白的决定了。

鉴于苏联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埃及，急于将之拉入自己的阵营。美国即使不考虑借机逼迫英、法两国，让出苏伊士运河来，也不会站在埃及的对面，迫使埃及加速倒向俄国人。事实上，单就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件事本身来说，俄国人已经开始介入了。在战争爆发之前，俄国人已经开始为埃及人提供武器，并提供训练了。可惜的是，以色列的攻击来得太快了，这些军事上的准备都还在进行当中（比如很多飞行员，都还在苏联训练）。

第七节 埃及向以色列妥协允许其通过蒂朗海峡

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再加上苏联人明确站在埃及人背后的态度（俄国人甚至直接提出了战争威胁，以向埃及人表明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人）。占据军事优势的英、法两国，就只能选择退出苏伊士运河了。从这个角度看，埃及看起来应该是第二次中东战争最大的赢家了。不过埃及人，并不是唯一从战争的结果中获益的参与者。以色列也同样达到了他们的战术目的。对于以色列来说，大国们怎么博弈是他们的事。以色列所关心的是出海口问题。即使英、法两国退出了苏伊士运河，也不代表着以色列军队就会退出西奈半岛。因此，如果想彻底结束这场战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也必须达成停战协议。

其实就以色列人提出的条件来说，并不需要埃及付出代价。究其根源，还是埃及想借通行权问题扼制以色列。既然以色列又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军事能力，埃及也已经拿到了他最想得到的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就显得不明智了。所谓来日方长，如果将来埃及和阿拉伯盟友们，还想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战争，技术上同样还可以随时关闭航道的（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

另一个迫使埃及做出妥协的原因是，和埃及一样，以色列目前也是美、苏两国争夺的对象。美、苏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选择站在埃及人一边，并不代表两国也会帮助他们对付以色列。在没有划分阵营之前，两个超级大国需要的是平衡。而埃及人在海权问题上针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态度，并不被认为是有利

于平衡的方式。

当一方没有能力完全压倒另一方时，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就成了必须的选择了。在埃、以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埃及虽然没有承诺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但以色列的船只终于可以通过蒂朗海峡了。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已经足以打破海上封锁了。当然，这种暂时性的妥协，决不代表博弈的结束。对于把以色列紧紧包围起来的阿拉伯人来说，除了海峡（运河）通行权以外，他们在地缘上还有几张牌可以打。而这些地缘牌的使用，也贯穿了其后几次中东战争。至于下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又打出了哪张地缘牌，我们后面再解读。

第二十三章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之争

第一节 以色列通过国家输水工程调配水资源

1967年6月5日——10日，由以色列方面挑起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为“六日战争”。在军事史上，这是一场被军事发烧友们视为经典的战争。相信很多朋友，期待我从军事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细节。不过这些事情，军事爱好者们应该会做得比我好，在这里，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更宏观的层面，从地缘因素来探究一下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吧。

所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单就军事层面来说，以色列方面为了这六天的战争，也肯定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当然，这些战术性的东西自然会有军事将领们去负责。政治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以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色列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是我们最先需要知道的。从地缘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一次中东战争解读为“独立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标注为“海权之战”；那么第三次中东战争，则可以被定性为“水资源之战”。因为纵观战争的前因后果，争夺水资源才是以色列率先发动攻击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类来说，水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相比其他版块，干旱的北非——阿拉伯半岛地区，对于淡水的渴望要更加强烈得多。单就巴勒斯坦地区分割的情况来看，以色列应该说是占据了足够的优势。北部包括加利利湖、胡拉盆地、以斯德伦谷地在内的富含淡水资源的版块，都被划入了以色列的境内。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压缩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丧失大片法定领土后，很显然在水资源的分配权上，也同样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虽说自犹太人决心重返迦南以来，冲突和战争就一直伴随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战争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之所以要进行战争，无非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很快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当中了。在所有的计划当中，如何调配水资源无疑是一切的基础。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少”的结构。北部山、谷中的最高降雨量，可以达到800毫米/年，而南部的内盖夫荒漠地区，就只有可怜的25毫米/年了。如果以色列希望耕耘每一块来之不易的土地的话，他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方法，以让北部相对充裕的水资源，均匀的供给自己的国土。尤其是那占据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内盖夫荒漠地区。

以色列人所展开的这项“北水南调”工程，叫作“国家输水工程”。简单点说，就是从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加利利湖”，向西经过以斯德伦谷地、沿海平原，最终将淡水输送至南部的内盖夫荒漠地区。当然，内盖夫荒漠地区并不是唯一从中获益的版块，干渠中途经过的每一个以色列控制区，包括通过战争抢得的半个耶路撒冷，都可以通过密布的支线从中获益。这其中在技术上的最大要求，就是要避免浪费。一是防止由于输水线路过长而带来的水资源损失（包括蒸发和渗漏）。在淡水贵如油的中东地区，这种浪费无异于犯罪。

对此，以色列人的解决方案，是把主要管线铺设于地下，而非露天水渠。这样除了可以防止因蒸发、渗漏而导致损耗外，亦有利于通过管网控制设施，精准的分配水资源。相比犹太人的精打细算，埃及人所建设的阿斯旺大坝就显得过于粗犷了。暴露在北非炽热阳光之下的“阿拉旺水库”（也叫“纳赛尔湖”），虽然勇夺“世界第一人工湖”的称号，却也因此把超过10%的尼罗河水送上了天。更可惜的是，基于埃及那平坦的地形，这些水汽基本不会变成降雨，回到埃及的土地上。以色列人的精打细算，并非只体现在输水工程上。

严格来说，想到通过地下管线输水以避免损耗，并非需要很高的智商。但以色列人在水资源终极使用方式上，却绝对有着很高的创新。这项技术就是著名的“滴灌技术”。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把淡水通过直接连通到农作物根系的“终端输水管线”，将水资源用在农作物生长上面。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在传统灌溉过程中，必须交给天、地的那部分损耗。当然，比之传统的浇灌方式，使用滴灌技术开展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会增加成本。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让自己的国土，重新变成“流着奶与蜜”的土地，更为重要的了。至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学习到什么，我想无论从意识和技术上，这种珍惜水资源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

第二节 以色列从加利利湖调水对约旦河谷的影响

这项被以色列视为命脉的“国家输水工程”，是在1953年开工，1964年主体工程竣工。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建设，目前每年已经能够为以色列60%的土地供水了。在这项事关以色列国运的工程中，用来输送的水源并不仅仅包括加利利湖的淡水。实际上，以色列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水资源，包括北部山区的地上水，沿海平原的地下水，在供给当地之后，都可以通过这项工程进行再分配。不过在所有的水源当中，加利利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水源地。

为了让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能够长久成为犹太民族的生命之源，以色列人在使用加利利湖的水源时，也是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测算。在他们看来，一

下子把加利利湖那几十亿立方米的湖水抽干，显然是不明智的。最科学的方式，是计算出加利利湖每年的集水量，然后再导出不超出这个数值的淡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加利利湖每年能够补入 4.7 亿立方米的淡水。而精打细算的犹太人，几乎没有“浪费”这些宝贵的水源。在加利利湖能够从约旦河上游河流所补进的淡水中，将会有 95% 的份额被用来输入国家输水工程的网络。

如果以色列人不将加利利湖的湖水导向西侧的国家输水管网的话，这些由上游地区汇入加利利湖的湖水，本来是应该由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谷所接收的。事实上，要是犹太人不来的话，加利利湖和约旦河谷每年所能够接收到的河水会更多。因为以色列人在建设国家输水工程的同时，也将位于加利利湖上游的“胡拉盆地”，由自然状态的湿地改造成农业用地了。所以那些从黑门山及两侧高地上下来的河水，在胡拉盆地就已经被消耗掉一部分了。

就工程设计这个层面上来看，犹太人为以色列的国土改造所做的这一切，应该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好的样板了。只是抛开政治层面，单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扼杀约旦河谷的生态环境。没有了上游来水，约旦河下游只能依靠河谷两侧高地的河流补水，以维持一个“河”的形态。按照计算，即使约旦河下游失去了上游来水，河谷两侧的高地应该还能为它补入约四成多的水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现在的约旦河已经基本无水可补，变成一条污水横流的排水渠了，而那个本应成为约旦河水终极归宿的死海，也因此快真的“死”了。

如果让以色列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全部“迦南之地”，相信他们是绝对不会以牺牲“约旦河谷”的环境为代价，把约旦河上游来水从加利利湖抽走的。就算不念及约旦河谷在迦南时代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个完全有条件经营好的地理单元（比内盖夫荒漠好改造多了）。悲剧的是，当年英国人为了让新分割出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两个版块，都有机会分配到亚喀巴湾那可怜的出海口，将本该将由一个国家管理的约旦河，变成为了一条界河。从政治实践来看，并非没有两个邻国能够互相协调，共同经营好一条界河及其流域的案例；但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来看，最起码在中东战争这个阶段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不管约旦河谷在圣经和犹太人的历史中，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地缘政治结构逼迫以色列只能暂时置它的死活于不顾，把河水引向内盖夫荒漠了。其实就这项工程来说，早在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去之后，精明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设计了。因为以这种政治现状来看，犹太人当下只能寄希望于，在分割出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地区中寻求复国。而在这项影响以色列国运的基础工程之中，加利利湖的控制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现在大家是不是对犹太人的“深谋远虑”，又多了一层敬佩之心？其实地

缘就是这样，即使你把地缘的焦点集中在地理结构这个大背景上，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然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地缘处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三千多年前，“上帝”选择了迦南之地作为微缩的世界来演示人类的文明进程；同样，三千多年后，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又一次在迦南之地上，以更为精彩的方式演示了地缘博弈中的种种战术。

第三节 约旦和以色列争夺耶尔穆克河水资源

相比犹太人的未雨绸缪，阿拉伯人就显得后知后觉得多了。最先受到触动的，是与巴勒斯坦地区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约旦。很显然，以色列在约旦河上游所做的一切，将会直接影响到约旦的利益。我们之前也说了，以色列把约旦河上游的水引走，并不代表约旦河下游就此会“死亡”。从一条河流水系结构来说，绝大部分情况并不会只从上游源头处得到水的。那些在不同河段汇入干流的支流，会共同织就一张“鱼骨”状水网。之所以说是“鱼骨”状，而不是树状，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这张网能够一直织到下游靠近出海口处。

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的。比如尼罗河，它的整个水系就像一棵上面枝繁叶茂，下面“光棍”一条的大树。如果不是因为上游地区有足够的高地涵养水源，这条大河中的异类，很可能就像大部分从沙漠中穿行的河流一样，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河了。另一个异类就是黄河，它在流经华北平原时，也无水可补。不过这种状况，就不是天然形成的了。自从战国时期，魏国开始为这条反复无常的母亲河筑堤防洪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治理”，黄河已经被那些河堤围成一条孤独的“悬河”了。就原始状态而言，约旦河还是一个上、中、下游都有支流补水的，标准的“鱼骨”状结构。鉴于整个西亚裂谷带北高南低的地形，其北部支流所能供给的河水，也远高于南部。这其中最大的支流，就是东北侧靠近戈兰高地南缘的“耶尔穆克河（Yarmuk Rive）”。而它汇入约旦河的河口，也正在加利利湖以南不远处。

在犹太人开始动工把加利利湖的水引走之前，阿拉伯人实际上对改变自然环境，并用之来影响（或为造福，或为武器）地缘结构，并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说，在阿拉伯人覆盖约旦河谷时期，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去如何合理开发约旦河谷的地缘潜力，将之变成一片农业之地。更多的时候，阿拉伯人只是把这里当成一片自然放牧之地。即使是按照常规情况，农业基础最好的下游出海口处的“三角洲”地区（成片的平原最大，且利于疏浚成灌溉农业区。就约旦河的情况来说，这个出海口，就在死海北边了），在有前人打下的基础，阿拉伯人也没有尽心去维护。目前处在这片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镇，就是经常出现在以、

巴新闻中的“杰里科 (Jericho)”。

在犹太人的祖先出埃及重返迦南之时，这个位于死海西北部的“世界最古老城镇”（考古研究表明，有 9000 年人类连续居住的历史），也是他们渡河后最先攻打的城镇。在 19 世纪，犹太人开始以购地移民的方式渗透巴勒斯坦地区时，尽管整个约旦河谷暂时不属于重点经营的板块，但基于杰里科的历史、地缘位置，以及相对较好的地理条件，也成为了犹太人希望能够控制的要点。一直到 2005 年，准备“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才算彻底准备放弃杰里科，将其交给巴勒斯坦人自治。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约旦河西岸地区，包括杰里科都被并入了新的“约旦哈希姆王国”（之前的约旦，叫外约旦）。从地理结构上看，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谷，似乎已经置于一个国家控制之下了。

在犹太人把约旦河上游的水引向西部沿海平原之后，约旦人如果无力改变这个现状的话，作为约旦河最大支流的“耶尔穆克河”，相当于成为了“新约旦河”（去除掉加利利湖及其以北水系）的源头，并为之提供大部分水源了。尽管这条新约旦河的水量，比之前少了许多；但如果耶尔穆克河，及其汇入约旦河口处的以南地区（包括河口）都归属于约旦的话，那么从地缘结构的完整性上来看，约旦并非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分割。毕竟新的约旦河谷，在结构上可以重新自成体系。可惜的是，这种看似平衡的结构并没有出现。因为耶尔穆克河并非完全由约旦所有。它的北部干流是叙利亚和约旦的界河（叙利亚部分就是戈兰高地），而南部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国境线，与河道呈麻花状交叉。

也就是说，以色列同样可以通过耶尔穆克河的下游河段，分享到“新约旦河”的水资源。其实即使约旦能够全数得到耶尔穆克河的下游河段，也不等于以色列不能从“新约旦河”中获益。因为约旦所控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北部并未到达耶尔穆克河——约旦河河口处。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河道中，将本应流入约旦领土的河水截流掉部分。这样的话，约旦即使能够控制绝大部分的约旦河谷，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荒漠化了。有鉴于此，约旦人很快就开始向它的对手学习，以自己控制的耶尔穆克河河段为起点，在约旦河的东侧，重新开挖了一条贯穿约旦河谷的水道。

鉴于约旦人叫约旦河谷东侧的这片低地为“果尔地区”，因此它被称之为“果尔运河（canal de ghor）”（1958——1966 年，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尊重，正式名称为“阿卜杜拉国王运河（King Abdullah Canal）”）。在残酷的地缘政治面前，约旦河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为了不让对手从约旦河受益，以色列和约旦两国相当于各自为政，将约旦河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条新的河流。只是这样水资源之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对这种和敌人分享水资源的现状都不满意的双方，

很快又被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第四节 约旦河下游和死海的补水问题

相信对于水的重要性，在沙漠地带生存了几千年的阿拉伯人，应该比谁都清楚。可是说到利用水利工程来改善地理环境，犹太人就显得有计划得多了。在犹太人的复国、建国计划中，水资源的争夺绝对是事关国之命脉的大事。因此犹太人并不会放过，任何一处他们能够得到淡水的机会。包括在在耶尔穆克河这样一条，按照公平和平衡原则，看似应该交给约旦人使用的河流。在以色列已经截流了约旦河上游水源的情况下，犹太人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霸道。不过在中东这个水贵如油的地区，水资源永远没有够的时候。特别是犹太人还准备把内盖夫荒漠，改造成犹太人的生存之地时。所以，即使是在以色列通过五次中东战争，在水资源的使用上占尽了优势的今天，仍然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水源。

和沙特一样，以色列也把增加淡水资源的希望寄托在海水淡化技术上。就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从海水中获取的淡水资源，已经基本追平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淡水量了（准确的说应该是“咸水淡化”，因为淡化的不仅是海水，也有含盐量较高的地上、地下水）。依以色列和约旦的地理关系来看，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分属两个对立的民族，都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矛盾。按照地缘规律来看，约旦河所哺育的这个国家，无论是叫“迦南”、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其西部边界都应该在约旦河谷西侧的高地上。实际上在圣经时代，犹太人也就控制了死海以北，约旦河谷以东的制高点。现在这种结构，使得以色列和约旦双方，永远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当双方都明白，保持敌对状态对大家都没好处时，合作也就成为必然了。

从“水”的层面上来看，双方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从自己引走的约旦河水中分配出一些来，以挽救濒死的约旦河下游。说实话，要做到这点真的很难，毕竟大家在水资源上都不宽裕。不过相比约旦河下游的补水问题，另一个受双方分流影响而面临生态灾难的重要板块——死海，似乎会更有希望起死回生。鉴于约旦河已无水补入死海，仅仅依靠两侧高地上，那几条季节河补进那一点点水，死海是无法维持正常水位的。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海的含盐量也越来越高了。有人可能会说，反正这也是个海边不长草，海里不养鱼的咸水湖，含盐量再高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们仅仅把死海的价值锁定在第一产业上，这样想当然没错。不过相信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应该没人想过在死海里养出点东西来。

作为世界上最神奇的湖泊，死海的名声是建立在人可以在其中浮而不沉的“奇迹”之上。由此，死海每年也为周边地区带来了不菲的旅游收入。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不仅可以在死海体验“不死传说”，还可以因死海中的矿物质，而治疗一些皮肤上的疾病。这对于那些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欧罗巴人种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要是死海这种人不敷出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相信除了想把自己腌成咸鱼，保证肉身不腐的人以外，不会再有人想去死海游泳了。这种情况，无论是以色列、约旦，还是希望建国的巴勒斯坦人，应该都是不愿看到的。

如果说约旦河缺的是淡水，那么死海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的方案，就是从死海南部，铺设一条纵穿阿拉伯谷地的输水管，从亚喀巴湾抽取红海水以补入死海。这个方案的“环保”之处还在于，由于死海顶着“世界海拔最低咸水湖”的称号，这些引过来的红海水，在输入死海时会有上百米的落差，而利用这个落差所得到的水电，亦可循环利用到红海水的输送工程上。当然，也有环保主义者认为引红海水进死海，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不过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方案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整个方案中牺牲最大的，应该是那些被无端带入死海的，来自红海的生物了。可以预见的是，它们一旦被送入死海，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对于这点，那些被河流带入死海中的鱼虾，相信最有感受。

红海水应该怎么输送到死海，约旦河下游又如何起死回生，是需要以色列和约旦两国互相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个人相信，在以、约关系已经趋于和平的今天，这些问题是会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的。只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心希望置以色列以死地的阿拉伯人，是绝对不愿意和犹太人合作的。

第五节 阿拉伯人在约旦河上游修建大坝反制以色列

如果说约旦人修建“果尔运河”，是对以色列截流约旦河上游水源，并意图染指下游剩余水资源的被动反应的话，那么随后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就算得上是主动出击了。犹太人所构筑的国家供水体系，不仅让约旦感受到了直接威胁，也让阿拉伯人意识了一个置以色列于死地的好办法。要知道，以色列所控制的加利利湖、胡拉盆地，其实只是两个低地蓄水区。真正的为它们提供淡水的，是来自北部和东西两侧的高地。

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虽然他们通过战争将原先划给巴勒斯坦的南“加利利山脉”抢到了手中；但上游更多的高地，包括北“加利利山脉”、黑门山、戈兰高地等，早在英法划分势力范围时，就被划入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境内。以色列的“不幸”，就是阿拉伯人的“大幸”。既然以色列可以把水从加利利湖引走，那么掌握了上游水源的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可以在那些河流

上面筑坝，以让以色列打造的这个“天然水库”陷入无水可补的境地。为了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阿拉伯国家内部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即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求尽快掐断犹太人的淡水供给链。

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在 1964 年全面完工时，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约旦河上游地区修建的那些水坝，也初见规模了。除非犹太人愿意坐视自己辛苦打造的供水系统成为一个摆设，否则的话，这次主动出击的就是以色列了。很快，以色列的空军就空袭了这些水坝。从技术角度看，破坏总是要比建设来得容易，时间、成本也要低得多。阿拉伯人辛苦半天修筑的水坝，在以色列空军的一次突袭之下，就付诸东流了。由此，阿拉伯人也意识到了，如果不在军事上对以色列形成压倒性优势。想靠断流的方式来削弱以色列，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说，阿拉伯人放弃约旦河上游的截流工程，以色列的空中打击是直接的战术原因；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战略上。因为阿拉伯人始终无法在军事上，特别是空中打击力量上，对以色列形成优势。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不去打击以色列的水利设施，以削弱以色列的战争能力，这就是直接原因。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对抗当中，军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政治才是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这里说的政治因素，既包括外部势力的干涉，也包括双方内部是否能力形成合力。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凝聚力无疑是强过阿拉伯人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合作中产生的摩擦。更在于，基于拥有“祖国”的渴望，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从外部补给以色列。而阿拉伯方面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第二十四章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整合问题

第一节 埃及凭借地缘实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说起来，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国家”为政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这种“国家”，有着明确的技术标准。比如，你必须在联合国拥有一个席位，并以此为法律基础，遵守或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而在古典时期，所谓“国家”的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宗教、文化、人种、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紧密政治体形成的基础。就阿拉伯人的历史来说，宗教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是要强过“国家”概念的。而在 20 世纪中叶，当边界、主权分明的现代意义国家开始分割整个地球时，那些之前国家观念不强的地区，在观念上也就存在一个转变过程了。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宗教和民族认同感向来都是最重要的地缘因素。当他们内部诸板块不得不依照西方人的标准，包裹上现代意义的国家标签之时，并不能很快习惯这种分割。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应该是置于所谓“国家利益”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甚至非阿拉伯系的穆斯林国家），会愿意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即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不过既然“国家”这种政治板块划分方式已经成为了国际标准，那么阿拉伯的政治家们也必须开始面对这个现实。即你的国家利益，是否应该高过阿拉伯的整体利益。

当大家都开始过渡到以国家为基础考虑问题时，合作之间的消耗也就开始变大了。当然，通过国家同盟的方式解决权力集中使用的问题，也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比之各项资源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调配，同盟的力量始终是无法达到 $1+1=2$ 的理想状态的。对于这一点，想必当年誓夺武林至尊的左冷禅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说金庸心里清楚）。否则他也不会稳坐五岳剑派盟主之位时，还是冒险将联盟升级为“五岳派”。若不如此，他如何有机会斗得过，令出一门，结构严密的“日月神教”（相信力保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家，也十分清楚这点）。

单从争夺阿拉伯国家“盟主”的角度来看，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无论是沙特家族掌控圣地的优势，还是哈希姆家族的神圣血统，都无法支撑他们窥伺盟主之位。整体的地缘实力，才是亘古不变的后盾。就这点来看，坐拥尼罗河三角洲、苏伊运河，集生存环境、区位两大优势于一身的埃及，无疑是盟主之

位最有利的竞争者。而通过第二次中东战争“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更加使得埃及真正坐实了阿拉伯盟主之位。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埃及应该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之中的赢家，但埃及人心里很清楚，在军事上他们其实是失败的。如果埃及人想坐稳盟主之位，并在今后的日子里带领阿拉伯兄弟们消灭以色列，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自身实力。当一个联盟中的带头大哥能够和对方的实力对等时，那些小弟们的实力即使再不济，也可以在平衡的天平上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当然，这种计算的前提是，小弟们不能跑到对方阵营中去。好在虽然从个体的角度看，的确有阿拉伯人为了利益在为犹太人工作（比如内盖夫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阿拉伯国家中是决不会有敢于站到以色列一边的（最多观望了）。

第二节 埃及主导建立阿拉伯统一国家面临的困难

埃及人做大自己的方式，除了挖掘内部潜力，比如建造阿斯旺大坝，增加有效国土以外，开疆扩土也是一个办法。具体的办法就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下，由埃及——叙利亚组成的，并准备吸收伊拉克加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1958年成立了。

埃及人所主导建立的这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在埃及部分也曾经提到过。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新国家的建立，仅仅是为了对付以色列。事实上，这是泛阿拉伯主义者，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步。而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中扭转劣势。只不过，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来看，以色列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阻碍泛阿拉伯主义者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最大障碍。对于新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说，它甚至无法形成一个整体。

一个一分为二，两块国土之间的地缘实力又不存在质的差异的国家，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谁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无论你把政治中心放在哪一边（或者说由哪一边来主导），并由此来掌握政治、经济的主导权，都势必会引起另一边的不满，持续一段时间后，分裂也就成了必然的选项了。这和处在二者之间，是否是敌对国家无关。就像很多观点认为，印度的介入是导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无论中间是哪个国家，像东、西两巴这样的国土结构，都必将走向分裂。反之，如果二者之间的地缘实力存在质的差异，这种风险就会小得多。就像目前看来，阿拉斯加并无从美国分裂出去的风险一样。

对于上述风险，埃及人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唯一的解决办法，还是拔除掉以色列这颗钉子。真正将埃及、叙利亚，以及其他准备吸收的阿拉伯国家联

通起来。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一方面埃及需要消除以色列的存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在地理结构上，具有完整性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构成向心力；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国家不能通过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那么他们又很难在实力上压倒以色列。甚至有可能因为内部整合，而消弱本来的力量。

上面所说的问题，很快就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运作当中显现出来了。在埃及人取得了共和国领导权的情况下，叙利亚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憧憬的阿拉伯民族复兴事业在为自己取得预期收益之前，就已经被迫丧失了原有的权力（叙利亚的政治、经济权力，都由埃及人控制了）。也许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你可以责怪这些叙利亚人不顾全大局。但叙利亚人也同样可以想，既然大家现在是一家人了，那为什么不是叙利亚人到埃及去主政呢？对于这种因明显的地缘分割而无法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紧随叙利亚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北也门”，就看得比较清楚。与叙利亚完全将自己的主权交给埃及人不同的是，也门人认为先以联邦的形式加入，会更符合这种支离破碎的现状。

说起来，以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地缘结构来看，将之整合为一个国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其困难之处，不仅在于以色列的存在。更在于阿拉伯内部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类型的地缘矛盾。比如什叶派就对于这种泛阿拉伯主义不感兴趣。在整体人数上处于劣势的他们，更愿意在自己处在相对多数的板块，建立一个自己能有更多话语权的国家。另外，以埃及现有的政治结构而言，它那实践泛阿拉伯主义的共和国，所能够吸引的只能是那些同样革命化的国家。对于那些君主国来说，除非他们的君主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王位。否则在技术上是没办法和埃及“共和”的。显然，让君主们主动放弃权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节 阿拉伯世界统一失败后以国家结盟方式合作

君主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并不代表埃及和它的革命战友们，就会放弃他们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想法。而因地理位置原因，约旦、伊拉克很自然的成为了下一步目标。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统治这两个国家的哈希姆家族也紧急沟通，准备成立新的泛阿拉伯国家——“哈希姆阿拉伯联邦”。

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统一的进程中，等于存在了两个体系。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处在第一线的哈希姆家族顶不住了的话。占据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沙特家族，一定会和其他非嫡系的海湾君主国们抱团，组建第三个泛阿拉伯国家政治体系（现实中他们也通过“海合会”抱团了），以避免被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者夺权。

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看，“君主制”与“共和制”相比是不占据优势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承诺“民主”的共和国明显更有吸引力。因此在哈希姆家族的成员准备组建君主制的阿拉伯联邦时，地缘上与叙利亚关系紧密的伊拉克，首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而主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和叙利亚执政者同出一门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对于一直试图控制中东局势的西方来说，哈希姆家族的崩盘，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地区以外的干预者来说，存在相互平衡的几个政治体系是件好事。任何一股势力独大，都会最终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锄强扶弱”，永远是西方输出民主者们所愿意做的。之前在哈希姆家族执掌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时，扶植沙特家族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不能看着哈希姆家族被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者所湮没，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伊拉克爆发革命之后，作为前宗主的英国便“义不容辞”的驻军约旦，以防止新的变故。

革命之后的伊拉克，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符合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条件。但现实的地缘分割，使得伊拉克人对于接受埃及人的领导心存疑虑。从叙利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认为伊拉克不应该受埃及人领导。毕竟伊拉克的革命，是在叙利亚的推动下进行的。叙利亚人应该在伊拉克的权力分配当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问题是，以伊拉克的地缘实力、历史来说，他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如果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伊拉克人当然愿意加入了。反之，他们不如再观望一下，等待自己上位的机会。

其实不管革命之后的伊拉克有没有加入，在地缘结构上不具有稳定性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都很难维系下去。特别是共和国的核心板块——埃及，被以色列阻隔在另一片大陆时。因此到了1961年，叙利亚终于宣布退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本来就是进来试试水的北也门，也跟着退了）。而埃及人为了保留住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梦想，继续将这个国名保留到了1972年。说起来，无论是埃及试图建立“共和制”的阿拉伯统一国家，还是哈希姆家族一直梦想恢复的“帝国”体系。客观上都是为了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提高运行效率。但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做法反而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让各国在联合对抗外敌之前，不得不对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们提高警惕。

曾经有人总结过，两个人之所以要结婚（也包括同居），客观上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节约生活成本，对经济上更有利。假如两个人结婚后，反而要消耗更多的成本，那么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了。不管这个关于婚姻的总结是否正确，对于目前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强行整合到一个政治体中运行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埃及所主导的这次整合失败之后，阿拉伯世界也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改变阿

拉伯内部国家关系的时候。

虽然尝试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实践失败了，但并不妨碍这些拥有共同宗教、民族属性的国家，以结盟的方式重新达成一致。从技术角度看，有了以色列这个共同的敌人存在，大家更容易先放开彼此之间的矛盾，协调一致。其实早在1945年，埃及就开始操作阿拉伯国家结盟的事了。在埃及的倡议之下，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也门、黎巴嫩七国，就已经正式搭建起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就是“阿盟”的组织平台。只不过1964年之前，阿盟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协调机制，以统一的面目展现自己的政治观点。

当埃及人无法通过国家合并的形式做大自己实力的时候，所能做的就是退而求其次的在现在国际框架下，坐稳“盟主”这个位置。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阿盟“首脑会议”，便是埃及这种新动向的尝试。显然，这种相互尊重主权，不谋求改变合作方政治体制的做法，更符合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主权”、“人权”之争）。因此第一次阿盟会议取得了空前成功，并由此建立了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首脑级理事会”，以定期召开商讨地区性重大问题。而埃及的“盟主”地位，则体现在阿盟的总部被常设在了开罗。

第四节 以色列面对阿拉伯国家结盟的反制行为

就地缘视角下的中东战争而言，我们的解读重点并非在战术层面。阿拉伯国家如何在内部挖掘自己的地缘潜力；以及以色列如何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舞台上，凸显自己的地缘价值，并以此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才是我们解读的重心所在。从阿拉伯国家所能挖掘使用的“地缘牌”来说，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联盟，也是手段之一。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困难。相信很多人心目中都曾经感叹过，以阿拉伯国家上亿的人口数量，如果能紧密联合起来，怎么可能灭不了以色列呢？

不过很多事情都是知易行难，一个由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联盟，其效率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弹性。如果组织不好的话，在对抗当中所能使用的力量，甚至可能不如一个国家放手一搏；而即使组织好了，也只能接近 $1+1=2$ 的理想值。而要想等于或者大于这个值的话，将联盟内部诸国组合为一个国家，并采用中央集权的手段可以说是技术上唯一可行的方案。只可惜，以阿拉伯世界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只能在“联盟”的框架下，来寻求这种合力了。

面对阿拉伯国家在“阿盟”的框架下空前团结，最为担忧的无疑是以色列。从战术层面来看，合力切断约旦河上游水源的决议，也正是这次阿盟首脑会议所做出的。面对这种战略压力，以色列所能选择的，就是在阿拉伯联盟的军事

准备完成之前先发制人。在以色列相对阿拉伯国家战略上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下，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可以说一直是以色列的国策。其实像以色列这种以战术的主动来对冲战略被动的做法，也是红色中国所一直在做的。如果我们回顾 1949 年以后的历次战争，就会发现无论宣传机器如何在传达中国是被迫出手的信息，就战争本身来说，中国其实都是主动发起的一方。

也正是这种战略上被动和战术上主动的差异，造成了一种误解，即国内很多愤怒青年长期认为，中国是一只人畜无害，甚至有些懦弱的“小白兔”（这种战略上的无奈，无疑也被宣传机器刻意放大了）；而在国外很多国家看来，这却是一只长着钢牙的，好战的兔子。以色列给人的这种“好战”印象，和中国当初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战略对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不在战术上掌握主动权的话，估计我们现在在地图上，也就看不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了。至于我们正在解读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正是这种战术的完美体现。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有明确的战术目的，你不能因为仅仅看对方不顺眼，或者觉得对方是自己潜在的敌人，就去发动一场战争。好像网络有非常多的人，仅仅因为中、美目前在战略上存在利益冲突时，就随时认定中、美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想法，就过于空泛了。从战术的目的来看，夺取约旦河上游的水资源控制权，无疑是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而在这场“水资源战争”当中，最为关键的地理单元就是“戈兰高地”。而“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也算得上是现在中东问题三大死结之一了。

第二十五章 英法在西亚裂谷带的势力分界线

第一节 英法两国以海岸线为准则分割西亚裂谷带

戈兰高地之名，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关于这块高地的位置，估计大家已经能够从所附地图，特别是《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上看到了。从地理结构上看，戈兰高地是“西亚裂谷带”东侧高地的一部分。北面紧挨着它的，就是西亚裂谷带与北延山地的分水岭——黑门山。而从地缘板块划分来看，戈兰高地则是属于巴勒斯坦板块与叙利亚板块的交界处。至于它到底应该算哪个板块，或者说在行政上归属哪个国家才更符合地缘规律，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曾经解读过，在约旦河北段有两处低地承接了上游来水。一处是北面海拔接近海平面的“胡拉盆地”，另一处就是低过海平面 210 米（最低点）的加利利湖。在阿、犹分治方案中，这两个汇集了约旦河上游来水的低地，都被划入了以色列的国土之内。虽然这种划法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当我们把历史再向前延伸一点，去看看这两个低地是如何划入“英属巴勒斯坦”时，可能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我们所说的包括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个标签，叫作“英属巴勒斯坦”。而与这个地缘标签相对应的，就是北边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法属叙利亚”。这两个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地缘标签，产生于一战时期（1916 年）。当时预感到自己即将取得胜利的英、法两国，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地图上，分割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遗产了。从地缘分割以及公平角度来看，法国人得到叙利亚，英国人得到巴勒斯坦也算得上是一个平衡的方案了。只是这两个地理板块，虽然因为地理结构的原因，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但相比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海岛的天然陆地边界，为陆地上两个紧密相连的地理单元划分边界就要困难得多了。

单纯从地理分割上来看，我个人认为黑门山的分水岭，应该成为法属叙利亚与英属巴勒斯坦的分割线。如果英、法两国能够确定以黑门山为分水岭坐标的话，他们大可以以这个坐标为基础，划出一条直线来，完成整条西亚裂谷地带的划分（至于东面的沙漠地带，怎么划倒不重要）。如果这样的话，加利利山脉、黑门山南麓、戈兰高地，以及包括上约旦河（加利利湖以北）在内的约旦河谷，都应该归属于英属巴勒斯坦。不过对于当时的英、法两国来说，他们之所以要费尽心思渗透阿拉伯半岛，并非是因为这片干旱之地有什么过人的物

产，而是它的海洋价值。无论是将地中海视作重点经营的后院的法国，还是意在苏伊士运河安全的英国，视线都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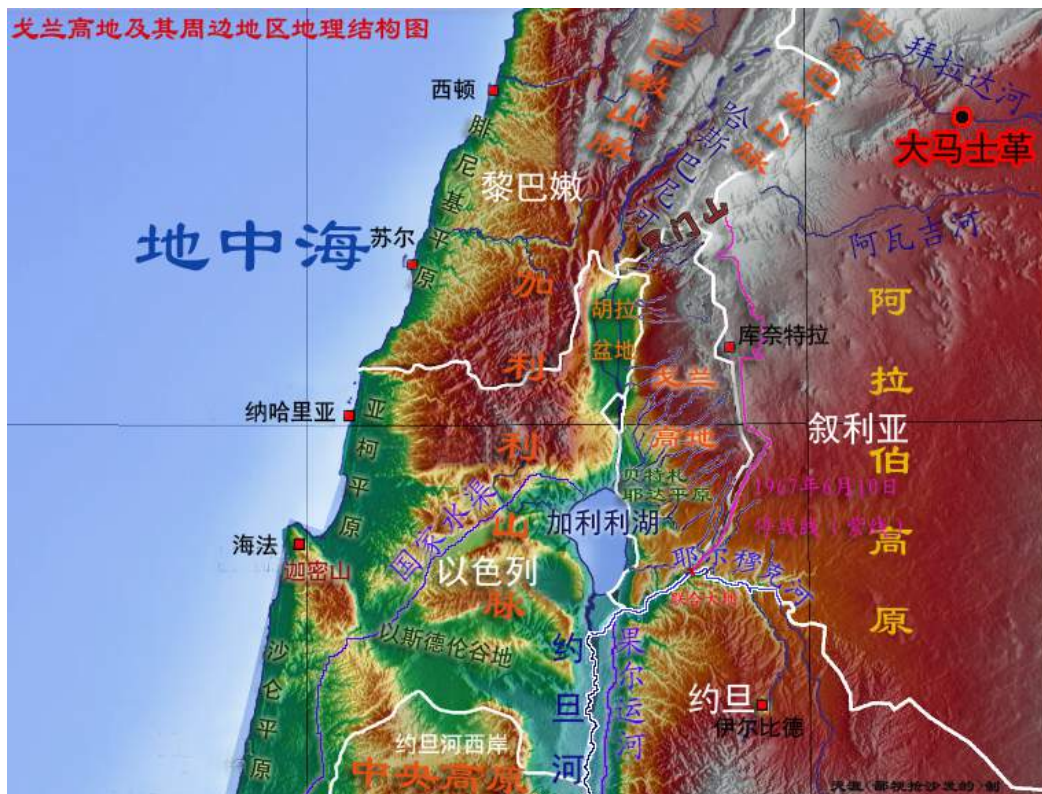
当我们以沿海地区的划分为基础划分整条西亚裂谷带时，就会发现这个方案和以黑门山为基点的划分方法存在偏差。这主要是因为被视为大叙利亚地区一部分的“腓尼基平原”，并非完全由黑门山以北的“黎巴嫩山脉”西流之水冲积而成的。与黎巴嫩山脉相连的加利利山脉北段，同样也为这条沿海平原的形成（南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地缘属性上来看，覆盖黎巴嫩沿海地区的腓尼基平原和南边的巴勒斯坦地区沿海平原相比，具有更多的海洋属性。山、海之间过近的距离，虽然压缩了平原带的东、西纵深，却为天然良港的形成创造了基础。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腓尼基平原以及它身后的黎巴嫩山脉地区，形成了与南部沿海平原不同的地缘文化。在圣经时代，这里也是为著名的海洋民族“腓尼基人”所占据。

既然从地缘角度来看，整条腓尼基平原应该归属于北部的“法属叙利亚”，那么按照腓尼基平原与南部亚柯平原的分割点——加利利山脉西侧临海的那个突出部为基点，来划分英、法两国殖民地的话，就会发现，西亚裂谷带本身的地理完整性，就被打破了。加利利山脉北段、黑门山、胡拉盆地，以及戈兰高地北部，就将被划入法属叙利亚了。而实际上，在英、法两国最初确认的分割方案中，法属叙利亚甚至还拥有 2/3 的加利利湖。至于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加利利湖的特殊构造，使得它与戈兰高地之间的地缘关系有些纠结。

第二节 戈兰高地划入叙利亚的地缘背景

按照标准的地理结构，加利利湖与两侧高地整体应该呈一个盆状结构。两侧高地面向湖区的一面，应该缓缓的向下伸入湖底。这样的话，湖区四周应均匀的分布着环状低地带。最终在行政分割时，湖区应该与周边直至高地分水岭的陆地，被划分在一个地理单元之内。如果按照这种理想的地理结构，加利利湖应该与东侧的戈兰高地地缘关系紧密。而包括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在内的整个湖区，同样也应该与约旦河下游地区，关系更为紧密。由此，在英、法两国切割西亚裂谷带时，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都应该被划入英属巴勒斯坦的版图之内。

假如戈兰高地与加利利湖的地缘关系，真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呈理想状态，那么今天的中东局势也许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不幸的是，加利利湖是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它的很多地理特征，并非如其他湖泊那样呈现理想的状态。这一点，亦直接影响了它与戈兰高地的地缘关系。那么



戈兰高地及其周边地区地理结构图

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戈兰高地面向加利利湖的一面，并非是缓缓伸入湖区，而是在加利利湖的东侧，形成了 300 多米的高度差。也许再经过 N 年的冲刷，来自戈兰高地上的河水，会把戈

兰高地冲刷成一个西高东低，角度较小的斜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之前人类就灭亡了）。不过现在，居住在加利利湖西、南两侧的居民，如果希望登上戈兰高地的话，就得想办法攀登上那落差达 300 多米的高山（道路必须回折成“之”字形）了。这种交通上的不便，直接影响到了戈兰高地与巴勒斯坦的地缘融合。

相比之下，戈兰高地与东面阿拉伯高原之间的高度差，就小得多了。这其实也是整条西亚裂谷带东侧的特点。整条裂谷东侧隆起的狭长高地带，基本上可以和阿拉伯高原无缝对接。在一般的地形图上，我们甚至只能通过河流的走向，才能察觉出这两块高地之间的分水岭在哪里（河流向西流的区域属于裂谷带；反之则算是阿拉伯高原的一部分）。有鉴于此，如果你想从戈兰高地进入东侧的高原或高地，要比从加利利湖方向登上高地容易得多。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叙利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并非是在沿海平原，而是在裂谷带东侧山地——前黎巴嫩山脉东侧的“大马士革（Damascus）”。而从戈兰高地的地缘中心——库奈特拉，到大马士革仅仅只有 60 公里。

海拔和距离上的优势，固然是戈兰高地与东侧阿拉伯高原地缘联系更为紧密的重要原因。但它如果和叙利亚板块内的其它人口密集区之间存在大片沙漠地带（这在中东是很常见的）的话，那戈兰高地也未必会更容易被由东、北两面而来的人所渗透。只不过，无论是在圣经时代，试图将戈兰高地归入“迦南之地”的犹太人，还是在和法国人商讨论划界事宜的英国人，都会发现，由于可以受到从西侧山地（黑门山、前黎巴嫩山脉）上流下来的雪水滋养，以大马士

革为中心，包括前黎巴嫩山——戈兰高地东侧的狭长地带，都算得上是阿拉伯高原上难得一见的绿洲。正因为如此，从伊朗高原、两河中下游地区南下的商人，并不一定要走沿海平原，才能打通到达约旦河谷，直至非洲的商道。而那些由地中海，经腓尼基平原登陆的货物，也可以在横穿裂谷带后，在大马士革中转，与阿拉伯高原腹地的阿拉伯部落交易。

有了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加上本身靠山临河的优越条件。早在公元前 5 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大马士革就奠定了它在叙利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既然大马士革本身就是据有强大辐射能力的地缘中心，而它与戈兰高地之间那短短的 60 公里路程中间，既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又有连接成片的淡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相连，那么戈兰高地上的定居者很自然的就成为叙利亚人了。即使不考虑水源被截断的问题，单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在戈兰高地被划入叙利亚的情况下，叙利亚人对加利利湖区也拥有了相当大的地缘优势。相信那些定居于加利利湖沿岸地区的犹太人，每次抬头仰望东岸那片高地上的阿拉伯人时，都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一点，印度人在不时仰望占据喜马拉雅山脉之巅的中国人时，应该会更加理解。而实际上，法国人为叙利亚留下的“遗产”，还不仅仅是戈兰高地。甚至在已经明确归属于以色列的加利利湖上，叙利亚人同样在主张权利。

第三节 英法在戈兰高地和其以西约旦河谷的划界

在上一节我们分析过了，由于加利利湖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因此它与戈兰高地相邻的一面落差很大。想等到戈兰高地面向加利利湖的一面完全被河水冲蚀成一个缓坡，可能就不是人类所能等得起的了。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当你从西侧划船横渡加利利湖，在东侧登岸之后就必须马上爬山。因为从技术上看，从高地西流而下的河流，虽然很难把整个高地冲刷成一个缓坡，但将高地上的泥沙带到河口处，并在湖边淤积成一块临湖平原，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流速锐减，泥沙就容易沉淀）。这种位于河口处的平原外轮廓通常成三角形，所以也被称之为“三角洲平原”。

在加利利湖的四周，最有可能形成大块三角洲平原的，无疑是北部约旦河上游（上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的河口。而事实上，上约旦河三角洲平原并非位于加利利湖的正北方向，而是东北方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戈兰高地遵循着西亚裂谷带（黑门山以南的核心部分）降水量北高南低的走势，高地之上流入加利利湖的河流，大半是经由加利利湖的东北角，将河水注入加利利湖的。在约旦河和这些河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加利利湖的东北岸更快速的被填充出了

一片介于山、湖之间的平原——贝特扎耶达平原 (Plain of Bethsaida)。

在任何时候，淡水湖周边的平原带都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人们只需对河流加以疏浚，就能够获得平整而又肥沃的农田。而在湖水当中的渔业资源补充下，这类沿湖平原经常也能得到“渔米之乡”的美誉（早在圣经时代，湖里的鱼就已经多到让耶稣惊叹不已了）。鉴于“贝特扎耶达平原”的地理位置，来自戈兰高地之上的居民，显然比来自加利利湖西、南侧的居民，更容易迁入、开发这片平原。也就是说，当英、法两国试图分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时，法国人和贝特耶达平原上的村庄（当时的数字是 7 个），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片平原应当和戈兰高地一样，属于叙利亚的一部分。

由于戈兰高地几乎拥有了加利利湖东侧的全部岸线，加之贝特耶达平原上的叙利亚居民与加利利湖的地缘关系紧密。因此在最初的英、法分割方案中，法国人得到了 2/3 的加利利湖区（后来经过协商，变成 1/3）。甚至由于贝特耶达平原的西边缘是加利利湖与胡拉盆地之间那段约旦河，因此这段约旦河本身也被划入了法属叙利亚。不过这一点，显然无法让犹太人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加利利湖和胡拉盆地都是他们以后建国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两个集水之地被迫与叙利亚分享，天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以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当然是不可能直接去和法国人谈判的。不过他们却可以通过英国人向法国人要求全部胡拉盆地以及加利利湖的主权（包括连接两块低地之间的那段约旦河）。

犹太人之所以可以向英国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那些犹太移民在英国人准备接管巴勒斯坦地区之前，就已经对他们所购买的土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无论是那些英国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在参观过那些犹太人所建立的农场之后，相信都会由衷的觉得将巴勒斯坦地区交给犹太人经营，会比阿拉伯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也正是英国人在政治上愿意给予犹太人移民自治权的根本原因。谁不愿意自己的领地被经营得更好呢？

让英国人理解犹太人只有得到更多的水源，才有可能帮助英国人把巴勒斯坦地区经营的更好，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当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在帮英国人，而是在帮他们自己。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 1916 年英法双方确定初步分割方案后，双方对边境问题的划分问题又进行的多轮的磋商。最终 1923 年的方案中，英国人得到了全部的胡拉盆地（当时还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沼泽）、加利利湖，以及连接两块低地的约旦河。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英国人为了完全得到这些低地也付出了相应的对价。而这个对价，就是英国之前所分得的戈兰高地西南部的土地。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方向把界线划到戈兰高地之上，是因为和叙利亚人在加利利

湖东北岸更具地缘优势一样，巴勒斯坦人在加利利湖南部的约旦河谷也同样更具地缘优势。巴勒斯坦人在经营约旦河谷之时，不可避免的将活动范围向戈兰高地的西南角渗透了一些。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初的分割方案中，英国可以在耶尔穆克河以北的戈兰高地西南部拥有立足点。现在既然英国人那么想得到低地的湖水，那么法国人相应的，也就希望得到全部的高地优势了。

第四节 英法对加利利湖水域的划分

其实如果加利利湖与戈兰高地的连接面都是落差很大的断面的话，英、法两国一个得水，一个占山，在不考虑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也算得上是达成了地缘平衡。因为这种山、湖之间的高度差，使得戈兰高地之上的居民，本身并不会和加利利湖有太多的地缘关系。或者说，他们的生产生活并不会和山下的加利利湖发生太多联系。可现在的问题是，加利利湖的东北岸存在了这样一块依赖湖岸经济的平原。即使英、法两国已经在技术上尽最大可能保证这一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但把湖全部划给英国的做法，还是等于断了生活在“贝特扎耶达平原”上叙利亚人的生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贝特扎耶达平原一并划给英国。只是划分一片大量居民居住的板块，远比在地图上分割一片无人居住的水面或者沙漠要麻烦得多（现在也是这样）。既然贝特扎耶达平原上的居民从地缘关系和心理认同上，都是属于叙利亚一部分，英国人也没有强求法国人“让出”这块平原（要的话，还得交换）。反正就这次交换而言，英国人目标是在淡水资源上。最终英属巴勒斯坦的边界划在了胡拉盆地以南的约旦河和加利利湖距河（湖）岸仅十米的地方。这种妥协，既让英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水资源，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叙利亚人所居住的贝特扎耶达平原在结构上的完整性。问题是这样的划法，依然无法解决叙利亚人入湖打渔的问题。

在英、法两国为加利利湖东北岸划出这样一条离岸十米的国境线后，东北岸叙利亚居民的“出湖权”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解决的话，英属巴勒斯坦与法属叙利亚之间将时刻处在矛盾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又一轮的妥协。在确定叙利亚方面的需求点之后，英国人同意开放东北岸的“出湖口”给平原之上的叙利亚村庄。如果双方能够一直和平相处，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案。因为这些生活在湖边的叙利亚人要求的是捕鱼权。而英国人和犹太人看中的则是湖水的所有权。

不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分割法能够相安无事，前提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能够和平共处。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的话，相信这一点还是很好

解决的。不幸的是，随后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了，犹太人成为了整个加利利湖区的所有者。由此，戈兰高地东北岸的模糊划界问题，也成为了以、叙双方无法达成和解的焦点问题。

有人问我，如果让我来划的话，以色列的国界应该在哪里，才能和阿拉伯人达成平衡，我的答案是无解。因为在技术上，包括以、埃和以、约之间的关系，都有机会达成和解，在双方各取所需的情况下维持平衡（现在也的确做到了）。但有三个问题始终在技术上难以解决。这三个问题包括：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巴勒斯坦的国土结构问题。以及我们正在分析的“戈兰高地”归属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中东问题的三大死结”。

那么这三大死结有没有可能解决呢？这就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了。如果站在平衡的立场上，全世界关心中东政局的政治家应该都还没有想到答案。但如果只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要么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然后再在内部划分政治版图；要么以色列把这三大死结中所涉及到的地缘板块，尽数收入囊中。就第一种方案而言，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已经尝试过了，很不幸的是，不仅没能将犹太人赶到海里去，还把巴勒斯坦人分到的土地丢失了大半。

既然阿拉伯人尝试过他们的终极解决方案，那么在第一、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占据了军事优势的犹太人，也没有理由不尝试下自己的终极解决方案了。我个人一直认为，二战时期的德国人虽然给犹太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创伤，但却并没有影响到犹太人在战术上模仿德国军队。其实说起来，以色列数面受敌的战略格局，又何尝不是在中东翻版永远在思考两线作战问题的德国呢。为了弥补这种战略上的劣势，闪电战也成为了两国军队共同的选择。

第二十六章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水资源之战

第一节 埃及建设跨红海大桥的设想

在又被称之为“六日战争”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战略、战术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问道，既然以色列能够轰炸阿拉伯国家的水利工程，以阻止他们截流约旦河上游水源，那么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反制以色列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阿拉伯国家当然也会这样做。不过以色列同样清楚，以它的国土纵深来说，如果制空权被对手掌控的话，将意味着什么。即使阿拉伯国家不那么“恶毒”的往加利利湖里丢生化武器，失去制空权的以色列，也无法在常规战争中坚持下去。因此在以色列的军事战略中，掌握制空权始终是被列为第一位的。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在“六日战争”的战术运用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句话叫作“对付狙击手，最好的手段就是狙击”，制空权也是如此。不过这次以色列并没有试图在空战中压制阿拉伯联盟，而是釜底抽薪的调动所有的飞机，对所有可能参战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突袭。至于空袭的战术目标，自然是那些军用机场了。空袭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的 25 个空军基地、450 余架战机被摧毁。在这些损失中，有 3/4 都是由阿拉伯联盟的老大——埃及所承受的。说起来，在和以色列相邻的阿拉伯国家中，埃及与以色列的地缘矛盾其实是最小的。埃及人之所以一直想置以色列于死地，更多的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即埃及人认为，以色列切断了它与阿拉伯半岛的地缘联系，进而成为了埃及谋求阿拉伯世界盟主的绊脚石。

有人会有疑问了，以色列横在中间，埃及人固然必须经由它打通连接阿拉伯半岛的陆地通道，但如果埃及人一定不想受制于犹太人的话，完全可以横渡红海进入阿拉伯半岛。其实这样理解，就是狭隘的理解了“地缘联系”这个概念了。所谓地缘联系，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只是交通线那么简单。分属两个板块的族群，在经济、文化、亲缘关系等方面的联系，都是属于“地缘联系”的范畴。这种联系越频繁，双方的地缘关系也就越紧密。而这一切，在根本上又取决于两个地理单元之间，所拥有地理通道的数量和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水路运输，还是更为先进的空中运输手段，都无法替代陆地通道所能起到的作用。这种一水之隔所引发的地缘差异，相信很多生活在江边的朋友会深有体会。

当然，被水隔开的两个地理单元，也并非没有办法弥补地缘交流上的不足。技术上最为常用的方式就是铺设桥梁隧道，以使两个被“水”分割开的地理单元，

有机会增加地缘联系。这种用技术改善地缘关系的方式，在一些被河水分割成两块的城市中，运用得尤其多。为了让整个城市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更像是一个整体，在一座被水分割的城市中，往往要用数条甚至数十条过江通道来融合两岸的地缘关系。在无可奈何的接受以色列存在的现实之后，埃及人也的确想到了建设一条跨红海的大桥，来打通与阿拉伯世界的陆地通道。而在红海的另一侧，沙特人也同样希望有这样一座红海大桥，能够让更多的非洲穆斯林前往两大圣城朝觐。

对于沙特人来说，这些朝觐的穆斯林为之带来的经济效应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够增强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过桥而来的朝觐者，所支付的过桥费（别以为只有中国才有收费站）也可以保证这是有一项能够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工程。其实在技术层面上建设一条连接埃及、沙特的红海大桥并不难。因为这项工程并不一定要跨越宽度在 2、300 公里的红海核心区，最佳的选址是在亚喀巴湾与红海的连接处——蒂朗海峡。虽然说，在这条十几公里的海峡上面建桥，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仍然是有难度的。不过只要有人出钱，相信是绝对难不倒伟大的中国路桥建设者的。

虽然从资金、技术、动机角度看，建设红海跨海大桥的设想，都应该很容易被埃及、沙特的政治家们所重视。在现实的却是，这项被双方讨论了几十年的工程，至今仍然是空中楼阁。这其中的直接原因，仍然是那个在陆地上阻路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在蒂朗海峡建桥无异于再一次的封锁了亚喀巴湾，使他们面对亚喀巴湾——红海的出海口，又一次成为了聋子的耳朵。相信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潜在的投资者，都不会怀疑以色列人为了捍卫红海出海权会再一次使用武力。在阿、以没有实现全面和解之前，贸然投资几十亿美元建设这样一条跨海通道，其命运很有可能会像 1964 年底，约旦河上游的那些水利工程一样。

我个人还是相信，将来有一天红海跨海大桥还是能够建起来的。毕竟以色列的出海权并不是必须牺牲掉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技术手段得到保证。问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对于以色列来说，当时并看不到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希望。鉴于埃及是阿拉伯联盟中实力最强，给予以色列压力最大的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预想中的红海跨海大桥所连接的埃及国土——西奈半岛，成为了以色列势在必得的战略目标。

第二节 以色列要求埃及将西奈半岛非军事化后退出

在历次有埃及参与的中东战争中，西奈半岛都是埃及和以色列争夺的目标。

其实说起来，这也是由于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而造成的。要是按埃及人的想法，他们更希望每一次的战火都烧在内盖夫地区。虽然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西奈半岛兜兜转转了几十年，让犹太人对西奈半岛充满了感情。不过如果不是埃及人总是要为阿拉伯民族共同的事业“强出头”的话，以色列人并没有改变以、埃边界的想法。

毕竟对于以色列来说，有内盖夫沙漠以为缓冲，并作为扩张生存之地的空间，就已经足够了。为了西奈半岛这样一块，对于以色列来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土地，去挑战阿拉伯联盟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完全没有必要。要知道，西奈半岛关乎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问题。如果这一核心问题受到了挑战，埃及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管怎么说，在埃及没有解除对以色列的敌意之前，以色列对埃及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主动出击，占领西奈半岛。将对手用来保卫核心利益的缓冲区变成自己的战略纵深。这一点，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就做到了。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是真的有想法一定要取得西奈半岛的。占领行为更多是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只要埃及人愿意坐下来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西奈半岛是完全可以交还给埃及的。这一点，埃及的政治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阿拉伯联盟将联盟之力发挥到极致，却仍未取胜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也成为了第一个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1979年）。而这也意味着埃及放弃了争当阿拉伯国家盟主的想法，务实的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做打算了。

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未真正民族和解之前（这一天是什么时候，我还没看到）。以色列还是要“先小人，后君子”的在技术上做足防范措施。而针对埃及的防范措施，就是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从技术上在不影响埃及主权的前提下，为以色列得到了战略缓冲。而一旦埃及军队试图在西奈半岛重新部署时，以色列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战略预警时间，并继续他们那“闪电战式”的战术主动。

用非军事化的条款将军事功能从西奈半岛的地缘属性中剔除出去，只是以色列为了保证自己地缘安全，所做的一项努力。为了不让埃及、沙特计划中的跨蒂朗海峡而建的“红海大桥”，成为限制自己出海权的障碍，以色列按照和平条约规定退出西奈半岛之前，有针对性对的西奈半岛临近蒂朗海峡的地质结构，做了一些干扰，以增加埃及建桥的难度。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也好，蒂朗海峡跨海工程的破坏也罢，其实都是以色列方面，在以、埃双方无法真正做到互信的情况下，所必须作出的地缘干扰措施。

至于埃及方面，他们也深知如果不这样的话，无法感觉到安全的以色列是无法和埃及维持和平的。这样的话，埃及依旧还是要被拖在战争的泥潭中。不

过在西奈半岛问题上，埃及人也同样有机会改善这片战略要地的地缘结构。以在战略层面上让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第三节 埃及建设兼具供水与交通功能的隧道连接西奈半岛

从基础性的地缘条件来看，西奈半岛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这倒也不是埃及人环保工作没做到，犹太人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缺水对西奈半岛的地缘潜力，所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无水，西奈半岛无法支撑更多的农田、人口、城镇。也让对手的攻击、占领行动，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埃及人如果能让西奈半岛这块边缘之地，变身为人口众多的核心之地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为西奈半岛引水。想为西奈半岛引水的话，当然不能指望它西侧的苏伊士运河了。事实上这条运河的修建，反而让西奈半岛本身与核心区的距离感更强烈了。因为陆地通道的断绝，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尼罗河三角洲与西奈半岛居民的交流频率 随着时间的积累，地缘关系的疏远也就再所难免了。

现在看来，能够为西奈半岛提供淡水资源的，就只能 是尼罗河了。其实埃及人还是幸运的，最起码他们还有尼罗河水可调。后面我们分析到叙利亚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处于新月沃地核心地区的国家，在水资源方面受到的制约有多大。从技术上看，把尼罗河水输入西奈半岛的工程采用隧道的形式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可以避免河水在输送过程中的损失，又可以穿越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决定和以色列达成政治和解之时，埃及人就迫不及待的设计、施工这项叫做“艾哈迈德·哈姆迪隧道（Ahmed Humdi Tunnel）”历史性工程了。

从地理划分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算是打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而“艾哈迈德·哈姆迪隧道”的地缘价值则在于，这是一条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大动脉（西奈半岛属于亚洲）。不过埃及人的关注点，显然并不在这种象征意义上。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如何为隧道同时设计、挖掘出地下交通线来。最终，1980年完工的“艾哈迈德·哈姆迪隧道”，不仅为西奈半岛滋养了1.4万公顷的农田；更以每小时2000辆汽车的通行效率，拉近了西奈半岛与尼罗河三角洲的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看，埃及人经营西奈半岛的意义和以色列经营内盖夫荒漠一样，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抛开政治层面不看，单看改善地理结构的价值，假以时日，如果以色列和埃及能够各自努力，把西奈荒漠和内盖夫荒漠绿化的话，那从尼罗河谷到波斯湾口的这条“大新月沃地”也就真的“圆满”了。

第四节 以色列击败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

从地理位置来看，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南边的埃及，也不是北面的叙利亚，而是与之对分约旦河谷——阿拉伯谷地的约旦。英国人当年在峡谷中间为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地区所划定的那条分界线，在技术上存在很大缺陷。假如被约旦河分割的是两个阿拉伯国家，当然问题不大。但如果是两个长期处在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如此漫长，又没有高地依托的边境线，就很难让双方感到安全了。

鉴于以色列的整个东部边境都暴露在约旦面前，如果约旦有足够的实力从自己的西线对以色列发起攻击，以色列方面所能感受到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特别在加利利湖与约旦河谷交汇之处，算得上是以色列在东线的咽喉之处。假如阿拉伯人主动发起进攻的话，无论是戈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军队，还是外约旦高原上的约旦军队，都势必会选中这个点作为主攻方向。由于没有制高点，以色列军队的防御难度会很大。正是由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有如此漫长的边境线，约旦在阿拉伯联盟中的作用如何，也直接影响了博弈的结果。因此在1964年之后，凭借阿盟首脑会议的成功召开，正式成为阿拉伯联盟盟主的埃及，在做战争准备之时，也极力要和约旦组成紧密军事同盟。

从阿拉伯的整体利益来看，约旦当然会站在埃及这边。只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埃及人需要的是更紧密的军事同盟。或者说，是军事的统一指挥权。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革命成功的叙利亚方面倒没有太大问题（虽然叙利亚人不太愿意在政治上受埃及人管理）。但要约旦国王在把自己的皇家军队交出来，就很难说不会有顾虑了。不过，基于共同的利益，约旦方面还是同意了埃及的要求。1967年5月30日，约旦和埃及签署了五年共同防御条约。而这也成为了以色列先发制人，展开全面攻击行动的导火索。5天之后，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说起来，就以、约之间现在的地缘关系而言，约旦即使不被埃及拉入伙捆在同一辆战车，以色列也得找个理由对付约旦的。因为如果约、以双方维持约旦河谷中心那条边境线的话，虽然双方都会觉得自己边境的河谷低地不太安全，容易受到对方攻击，但在两国分别控制裂谷两端高地的前提下，这种不安全感是对等的，也算得上是一种平衡了。只是现在的约旦王国所包括的国土，却不仅仅包括当初英国人分给它的“外约旦高原”，而是把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下的那部分“中央高原”给吞并了。这样就使得约旦军队可以堂而皇之在中央高原之上，俯视以色列控制范围内的所有低地平原。

换句话说，有了约旦军队参与的阿拉伯联军，在发动突袭行动时，不仅能够轻易的把以色列一分为二，更可以全面打击以色列国内所有的人口密集区。对你的邻居占有地理结构上的进攻优势，并不是错。但如果你的邻居比你强大，这种优势，反过来就会惹火上身了。最起码，以色列军队一定是不愿意，整天处在这种高地威胁之下的。至于以色列的政治家，他们的关注点更在地缘板块的完整性上。而如果在与约旦的战争中，能够将之赶回到约旦河以东地区，将有助于解开中东问题三大死结中的前两个：即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以及巴勒斯坦的国土结构问题。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以色列在对约旦的攻击行动中，完全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约旦部署在中央高原上的军队尽数被歼。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的归属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国土结构也不是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就根本不存在了。无论是约旦直接吞并掉的约旦河西岸，还是埃及只占不管的“加沙地带”，现在都被以色列控制了。现在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承认；另一个就是如何消化这些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让国际上承认以色列的占领合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毕竟当初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给了巴勒斯坦一个独立法人地位的。以色列人当然也清楚军事上的占领落实在政治层面上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他们在如何消化巴斯坦土地的问题上，倒是可以争分夺秒。这种消化，技术上主要指的就是改变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人口比例了。这一方面需要巴勒斯坦人的“配合”，愿意迁出去；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色列有足够的人力，补充进去。由此也产生了两个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的名词：巴勒斯坦难民和犹太人定居点。

第五节 巴勒斯坦难民与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

在以色列人看来，对约旦河西岸以及整个耶路撒冷的占领，其实应当是他們和巴勒斯坦人的事。至于哈希姆家族将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王国一事，即使在阿拉伯内部也是存在很大异议的。最起码巴勒斯坦人发现，约旦人其实并不是想帮他们建国时，大家原本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就出现裂痕了。196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也在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让约旦感觉到不安。

在还没有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前，就去争巴勒斯坦地区最终的国家归属问题，多少显得有点早。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重要。对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因为战争原因，大批从

巴勒斯坦地区涌入的难民怎么处理。在战争中，因躲避战场而逃离家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毕竟没有平民想被误伤。一般情况下，在战争结束后，这些难民都会返回家园。只不过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在以色列看来，那些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正好给犹太人“让”出了生存空间。

至于说以色列是否有足够的人口来填补这些空间，倒是不用担心的。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的人口储备库。为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实现人口比例的逆转，以色列欢迎任何符合条件的犹太后裔，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而在那些原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兴建定居点，就成为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了。对于以色列这种移民渗透的举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关于以、巴的新闻中，有相当一部分总是有关犹太人定居点的博弈。

无论是出于阿拉伯的“民族大义”，还是约旦给自己设定的国家范围，它都无法拒绝接收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于，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的诉求并不完全和约旦的国家利益和拍。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经历过几次中东战争之后，约旦方面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是绝对没有机会再跨过约旦河的。既然这个现实已经无法改变，那么就只有接受它了。而以色列方面也非常愿意在自己漫长的东线，能够有一个在政治上实际保持中立的国家存在。

只是约、以之间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固然能够解决掉两国之间的地缘矛盾，但却无益于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首先这些难民如果回归到约旦河以西的土地上，无论他们的家园是在明确归属于以色列的部分，还是将来有可能划入巴勒斯坦国的部分，都将对以色列之前的努力开倒车；而约旦方面，即使愿意，也有条件接受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为约旦国民，并为之提供新的家园，也无法阻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毕竟对于普通的阿拉伯人来说，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约旦人，甚至以色列人并不重要，能够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巴勒斯坦人当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激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约旦人也感到不厌其烦。

最终在法律上把约旦河西岸从约旦的国土中分离出去，并开始拒绝接收巴勒斯坦人为约旦国民了。假如时光能够倒流的话，我相信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约旦人，都不会希望再主动开启战端。不过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了，那在没有打够之前，政治家们还是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军事家身上的。真正让阿、以两方的政治家都觉得战争无法解决问题的节点，要到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了。在我们正在解读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战争仍然是最直接的手段。对于埃及来说，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西奈半岛的控制权；而对于约

旦来说，他们所丧失的也并非只是约旦河西岸那部分“额外”的土地。

第六节 以色列控制耶尔穆克河下游地区

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即使不存在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能够合法的占有全部巴勒斯坦地区，按照英国人当初分割外约旦、巴勒斯坦的方案，以、约之间在耶尔穆克河下游也存在地缘冲突。

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既然以色列已经得到了加利利湖以北，约旦河上游的水源，那么耶尔穆克河的水应该由约旦人来使用，会更为合理。只是在政治博弈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合理可言，更多的只是赢家通吃的想法。说起来，参照约旦河上游犹太人为了得到水源，而影响英、法分割方案的举动。我丝毫不怀疑耶尔穆克河下游河段成为了巴勒斯坦地区、外约旦的界河，是犹太人留下的一个伏笔。为了就是将来有机会，染指这条约旦河下游流量最大的支流。

既然以色列现在已经在军事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在“拿回”约旦河西岸和半个耶路撒冷的同时，就没有理由不让以色列军队攻击得更深入一点。最终以色列把整个耶尔穆克河下游河谷，尽数纳入自己掌控中了。当然，仅仅是控制下游河道，并不代表你就拥有了全部水资源。特别是在三年前，阿拉伯联盟已经尝试过截流约旦河上游水源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想得到耶尔穆克河水资源的主控权，在战略上仍然要防止上游的约旦、叙利亚两国截流水源。

在战争之后，约、叙两国会如何想办法在自己仍然能够控制的河道中，抽取耶尔穆克河的河水，是以色列所需要关注的。不过现在摆在以色列面前的，就有一个现实的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在一年前，约旦已经在耶尔穆克河下游修建了一条灌溉运河“果尔运河”，将水引入自己一侧的约旦河谷。当然，凭借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完全可以炸毁或者控制这条运河的河口，以阻止耶尔穆克河的水被引走。但炸毁一项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的民用工程，和阻止一项工程计划的实施，在国际政治舆论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以色列方面一直试图阻止蒂朗海峡的红海大桥修建。而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可以在大桥修建后，影响到以色列的通航权时，再突袭解决的原因。总之一句话，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让问题发生。

虽然以色列暂时不能运用武力切断果尔运河，但却并不代表以色列人什么都不能做了。所谓杀人未必要见血，温水也能煮青蛙。为了不让果尔运河正常运行，以色列方面在运河河口的维护上，为约旦人制造了很多障碍。比如他们一方面通过干扰水流，让泥沙更容易在运河的取水口处沉积；另一方面以各种

理由阻碍约旦方面清淤。在这种干扰之下，果尔运河所能够引走的耶尔穆克河河水，就大大减少了。

所以说，在没有主权的情况下，那些由他国“恩赐”的权力，很多时候并不像大家所感觉的那样美好，就像很多人所关心的图们江出海权一样。无论是翻出 100 多年前的中、俄划界协议，还是现在去和俄、朝两国协商，中国的民用船只借道图们江口出海的想法，在政治上问题都不大。但如果这两个邻居不对河口处的河道进行清淤、维护，甚至在河上修建跨河大桥的话，中国方面的这个出海权能够多大程度落在实处，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协商这些技术问题。只不过主动权在人家手上，谈出个什么价钱来，就要看对方的了。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在以、约两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两国的边境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但耶尔穆克河的河水分配问题，仍然是两国地缘关系中的重心。约旦方面也不时的会提醒以色列，应当按照协议中的约定，让约旦方面得到应有的份额。不过在约旦已经决定保持中立身份的今天（协议中约定，两国都不得加入反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事实上将约旦从反以同盟中分离出来了），以、约两国之间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地缘矛盾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耶尔穆克河的水资源分配还算是个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的竞争问题。但约旦河谷以及死海的存亡问题，可就是影响到两国根本利益的，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了。

第七节 以色列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

相比以、约两国在水资源上，合作多于竞争的现状。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协调起来就要难得多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爆发了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共投入了 2000 多辆坦克在这个弹丸之地之上（也有埃及坦克在此协防）展开搏斗。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方面不仅将戈兰高地上注入约旦河流域的河流尽数拿下，还突破了戈兰高地的分水岭，将控制线布设在了高地的东面。也就是说，身处控制线东侧的叙利亚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都再也看不到以色列的土地了。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缘政治上的“戈兰高地”，和地理概念上的“戈兰高地”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地缘政治上的“戈兰高地”，其实还包括部分黑门山的南麓。以色列在战争中，一定要把北部控制线推进到黑门山分水岭，并不是因为，黑门山在犹太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圣山”地位；也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即不希望阿拉伯人，站在这个比戈兰高地更高的制高点上俯视自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水资源。要知道，约旦河有三个源头共同在

胡拉盆地汇集成约旦河干流。除了西侧发源于前黎巴嫩山脉西麓的“哈斯尼巴河”之外，巴尼亚斯河、达恩河都是发源于黑门山的西、南。既然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上游的水资源，那以色列军队就没有理由不把战旗插到黑门山上了。

在黑门山南麓和戈兰高地被以色列攻占之前，最没有安全感的是以色列；而在这两块地方归属了以色列之后，战略形势就完全倒转过来了。想想看，戈兰高地离大马士革那 60 公里的距离，叙利亚人还能睡得着觉吗？现在看起来，单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戈兰高地问题似乎也很难解决。归属了哪一方，对方都会感觉到不安全。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安全感，也并完全无解。可以参照的案例就是西奈半岛，以色列军队在 70 年代末和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向埃及交还西奈半岛时，就同时约定了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从而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拉开了一个缓冲之地。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非军事化，并不是说埃及方面就不能有一兵一卒进入。而是只能有少量用于防御的，携带轻型武器的边防部队。其原则，就是决不能对以色列的国土安全造成威胁。从埃及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来看，这种相当于割让了部分主权的做法，并不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但考虑到阿、以之间那纠缠不清的恩怨，这也是现阶段能够让大家避免擦枪走火的唯一方案了。所以如果哪一天，埃及方面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试图进一步驻军西奈半岛的话，那就意味着以色列军队的参谋机构，又该高速运转了。

如果叙利亚想通过谈判手段收回戈兰高地，放弃在戈兰高地的驻军权是必须的，这一点叙利亚方面也十分清楚。有了埃及的例子在前面，接受这点也并不算丢面子（话说回来，面子都丢多少回了）。然而双方的政治家也同样清楚，戈兰高地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安全问题。戈兰高地上的水资源才是以色列最想要的。单从地表情况来看，由于有充沛的降水，以及从黑门山上补给的雪水，戈兰高地就是中东少有的绿色高地。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能够放手经营这块土地的话，其人口承载量并不会低于一块沿海平原。

虽然在叙利亚同意戈兰高地非军事化的和平方案中，以色列也不可避免的需要把他们在戈兰高地上建立的大批农场，交还给叙利亚。但同时不对那些流入以色列境内的河流进行截流，也是叙利亚必须作出的保证。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保证戈兰高地上那占以色列天然淡水补给 1/3 比例的水资源使用权，是事关国家命脉的核心利益。

第八节 土地换和平原则的提出

以色列放弃对戈兰高地的占领 + 戈兰高地非军事化 + 叙利亚保证不影响戈

兰高地河流的原始状态，这就是希望看到中东实现和平的政治家们，为双方开出的和平药方。而这个窗口期出现在 90 年代。当冷战中的一方：苏联轰然倒下之后，美国成为了这个地球上唯一的霸主。与此同时，之前作为美苏双方角力的主战争——中东，美国也成为了唯一能够左右局势的外部力量。换言之，这时的中东，就是美国的地盘了。

在冷战时期，基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在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有市场。美国能够在中东所牢牢抓住的铁杆盟友，就是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有着很深渊源的以色列了。这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代理人战争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性举动，也同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它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平衡的中东，而不是始终处在战争边缘的状态。

犹太人其实并不应该为这种局势的转变感到不解，因为一战前后的英国人，就已经给犹太人上了一课。为了在一战中获得最后胜利，英国人在战争期间也许诺给了犹太人“复国”的憧憬；而英国得以掌控中东局势之后，如何维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平衡，就成为了英国人的关注焦点。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在英国人那里，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梦想就被彻底否定了。

与 70 年前的情况不同的是，犹太人现在并不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复国了；但与 70 年前的情况相似的是，在地区局势主导者的眼中，对目标过于执着的犹太人，还是必须牺牲掉部分利益。上一次英国人是希望犹太人放弃建国的梦想。这一次美国人，则是希望以色列将历次中东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能够部分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土地换和平原则”（1991 年 10 月，西班牙马德里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上确认的原则）。

最起码在以色列强硬派的眼中，“土地换和平原则”是一个出卖犹太人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在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结构和戈兰高地的归属权，这两个核心问题上，以色列必须作出让步了。否则的话，按照强硬派的想法，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兴建犹太人定居点，阻止难民返回等做法，慢慢的转变这些土地上的人口比例。直到有一天以既成事实逼迫世界承认。虽然最终获得国际认可，需要非常复杂的外交努力，以及很长的时间等待，但从地缘渗透的角度看，时间是在土地实际占领方一边的。

第九节 叙利亚在加利利湖的出湖权问题

如果叙、以双方，按照前面我们所列出的三原则来解决戈兰高地问题的话，也许在 21 世纪初，戈兰高地问题就可能解决掉了。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已

经认可在叙利亚方面保证军事安全，以及水资源安全的前提下，撤出戈兰高地的方案。然而叙利亚方面却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恢复 1967 年之前，双方实际控制线的要求。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奇怪。就以、叙两国之间，不就是个“戈兰高地”问题吗？为什么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解读过的加利利湖的东北岸归属问题。当初英法两国，一个得“山”（戈兰高地），一个得“水”（加利利湖），本来也算是各取所需了。无奈加利利湖东北岸有块在加利利湖区，体量颇大的“贝特扎耶达平原”。这块由戈兰高地上的河流带下来的泥土，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平原，地缘属性很显然和戈兰高地更近，并归属了叙利亚。为了让平原上的叙利亚村庄维持他们入湖打渔的生产方式，英、法两国又反过来对叙利亚划出了出海权。

英、法两国当时这种模糊的做法，为后来的以、叙关系埋下了一颗钉子。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在领土方面的注意力是在巴勒斯坦身上。也就是说，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潜在的领土纠纷还没有爆发。加利利湖东北岸的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叙利亚手中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的对手是埃及，其着眼点是在争取红海的出海权。因此也无暇顾及维护“加利利湖”主权的完整性。等到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随着整个戈兰高地都归属了以色列，加利利湖也好，贝特扎耶达平原也罢，当然都没有叙利亚什么事了。

如果戈兰高地一直在以色列手上，那么东北岸问题也不会单独提出来。然而现在以色列有意接受“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退出戈兰高地的话，那叙利亚人在东北岸的出湖权就浮出水面了。按叙利亚人的想法是，我要这段水岸是为了在湖上讨生活，而不是去和以色列分水。在自己保证加利利湖的湖水归以色列所有的情况下，以色列方面应该作出让步；然而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把国境线，围着加利利湖转一圈的话，战略上无疑是十分危险的。这也将为以色列利用加利利湖的资源埋下隐患。最起码以后在加利利湖上还有什么大动作的话，在外交层面上，最低限度要知会叙利亚方面了。

其实土地换和平原则固然能暂时解决以色列和埃及、约旦，甚至黎巴嫩之间的和平问题，但在巴勒斯坦国土结构、耶路撒冷归属，以及戈兰高地问题上，任何退让都可能触及到以色列的地缘结构完整。所以在叙利亚还想讨价还价时，以色列方面也开始反思，在土地上的退让是否能够真的为以色列带来和平了。随着 2001 年，以色列强硬派的代表沙龙上台，这扇可能为中东带来和平的窗口，也被无限期的关闭了。

从远景来看，在戈兰高地这样利益复杂交织的地缘板块，践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远比在利益关系清晰的西奈半岛难得多。而在把戈兰高地的控制权交

还给叙利亚后，叙利亚人是否会真的愿意看着着自己领土上的水，“白白便宜”犹太人，是存有很大疑问的。即使面上不动，底下的小动作也是防不胜防的。这一点，在耶尔穆克河的河水分配上，一直给约旦暗中使绊子的以色列，心里应该最清楚了。

实际上，以叙利亚现在的水资源结构来说，如果拿回了戈兰高地控制权的话，图谋上那丰富的水资源也是迟早的事。要解读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详细解读下叙利亚的地缘结构了。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与叙利亚在水上面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邻居——土耳其，也将又一次登场。

第二十七章 阿拉伯国家在河流水资源面临的不利局面

第一节 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建水坝

叙利亚的地缘结构，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也粗略解读过了。简单点说，这个国家是由处在拐角处的新月沃地：两河流域中游 + 西亚裂谷带北段，搭上大片骆驼比较适应的荒漠腹地组成的。你永远不能指望，阿拉伯国家全境都是水源充足之地。所以像叙利亚这种，能够占据新月沃地中间一段的国家，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了。最起码，阿拉伯半岛三大名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都跟这个国家有关系。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叙利亚的地缘结构，就会悲哀的发现，叙利亚虽然与这三大名河都有关系，但却不能主导任何一条河流的水资源分配权。这也意味着，叙利亚在地缘结构上不够完整，并最终因此而影响它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在衡量地缘结构是否完整的指标中，能够完整拥有境内主要河流的主权，是一个重要标准。从这点看，占据青藏高原这个亚洲水塔的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地缘结构完整的国家。反观叙利亚，就没那么幸运了。首先来看看两河中的底格里斯河。很多人初看那张《叙利亚地缘位置结构图》估计还看不到底格里斯河从叙利亚哪里经过。其实我们再看得仔细点，就会在叙利亚的东北角，发现一小段，总长约 50 公里的河道，作为叙利亚、伊拉克的界河而存在的。这样一小段的界河，自然不可能为叙利亚带来太大的利益了。除非叙利亚人能够狠过以色列人，一面从流经自己边境的那段河道拼命抽水，搞个“国家输水工程”；一面通过武力威胁上下游的土耳其、伊拉克不许影响自己的水资源分配权。很显然，叙利亚是没有能力做到这点的。真要有独立 PK 土、伊两国的实力，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也会先想办法把戈兰高地抢回来。

既然底格里斯河指望不上了，那么幼发拉底河呢？从流经叙利亚的河流长度来看，叙利亚倒是应该从幼发拉底河受益不少。毕竟幼发拉底河的中游，相当于在以东方向对穿了叙利亚的国土。问题在于，叙利亚的东部国土是处在两河的中游地区，地势属于上游高原与下游平原之间的台地。这也意味着，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无法像在下游平原那样，通过建设网状的灌溉系统，自流形成连片的耕地。真正能够润泽的，也就是河流两侧的河谷地区罢了。

虽然说地处两河中游的叙利亚，不具备形成大片冲积平原的地理条件，但也不是说，叙利亚就不能挖掘幼发拉底河的潜力了。毕竟在工业时代，人类拥有比古典时期更多的技术，来改善自己的地缘环境。相比下游平原，中上游的

河谷地形，会更有利于筑坝蓄水。在蓄水成湖之后，不仅湖两岸的生态环境能够更好，还能够利用河流的落差发电，将水抽至高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因此在 60 年代的时候，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上拦起了水坝——塔布卡水坝 (Tabqah Dam)，形成了水面达 610 平方公里的巨形人工湖——阿萨德湖。无论从位置、作用、命名方式来看，叙利亚的“阿萨德湖”和埃及人建设在尼罗河谷的“纳赛尔湖”都如出一辙（还都是苏联帮着建设的）。不过埃及人虽然因纳赛尔湖的诞生，盘活了尼罗河中游的大片荒地，却也影响了下游尼罗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

相比之下，叙利亚人在建坝蓄水时，就要“洒脱”得多了。毕竟如果下游地区需要有什么调整，也是伊拉克的事情。虽然这并不代表，叙利亚就会像以色列对待约旦河那样，把上游来水尽数拦截走。但这样一个地处荒漠的大湖，即使叙利亚人只是用来发电，而不灌溉新的土地，蒸发掉的水份也足以让下游的伊拉克，感到水量的减少。为了保护已有的耕地不受影响，伊拉克人就必须再向它的下游地区说声抱歉了。只是伊拉克已经是最下游了，它下面还有谁可以转嫁风险吗？

当然有的，对于一条奔流入海的河流来说，海洋才是它最终的归宿。也就是说，伊拉克如果不想自己用水减少的话，就只能减少两河流入波斯湾的水量了。于是乎，可怜的波斯湾不得不变得越来越咸了。好在这个海湾虽然封闭，但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连通印度洋。否则长此以往下去，波斯湾估计就成为第二个死海了。

第二节 安托利亚高原相对阿拉伯半岛的地缘优势

既然叙利亚能够凭借水坝获得比古典时期更多份额的幼发拉底河河水，那么叙利亚的水资源安全应该比古典时期更有保障了。相应的，地缘实力也应该随之增加了。但事实上，叙利亚的地缘安全，反而比古典时期更加恶化了。因为正在得意于人工湖为自己带来额外淡水资源的叙利亚人，猛然发现自己的上面还有人。并且土耳其人也正在用同样的方法，扩张上游山地中的耕地面积。更为致命的是，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高原及其南麓山地所建设的水利工程，并不仅仅是出于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一直试图恢复在阿拉伯半岛影响力的突厥人，此举更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目的。此时叙利亚人才会感受到，被土耳其人卡住脖子的感觉了。

即使按照古典时期的标准，安纳托利亚高原对于阿拉伯半岛的地缘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低地民族要想控制高地，本身就有些困难。这种困难

不仅仅源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也在于高地的地形会对土著民族的防守更加有利。想想中国历经二千多年，才能真正控制内蒙古高原；以及现在低地的英格兰人，还在为高地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们头疼不已，就明白这种地缘控制有多么困难了。不过，这并不代表最初占据高地的土著民族，就可以一直高枕无忧了。只不过那些凭借技术和其他优势，取得高地控制权的外来民族，最终融合为土著民族后，这个规律依然存在。

如果按照东亚的规律来看，安纳托利亚高原虽然具有防御上的战略优势，但以人口承载量为重要指标的地缘实力而言，天平应当是倒向低地的。可惜，非常不幸的是，西亚不是东亚。受不到季风润泽的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大陆，在整体的生态环境上，远比不上北部那条高原带。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要想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控制安纳托利亚高原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作为低地民族，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某一时期渗透至高地。比如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就控制了伊朗高原，并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中亚。不过，政治上的胜利并不代表地缘上的融合。就好像你现在去伊朗的话，看到的都还是雅利安人的后裔，而不是阿拉伯人一样。如果说阿拉伯人还曾经在伊朗高原上政治扩张成功过，那么他们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这倒不是说，安托托利亚高原本身的地缘实力就要优于伊朗高原，而是得益于它的地缘位置，以及另一项地理属性——半岛。

就地理标签而言，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小亚细亚半岛划上等号。鉴于它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与欧洲古典文明中心——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小亚细亚半岛在选择地缘融合的方向时，比伊朗高原有更多的选择。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时，凭借自身的海洋属性，小亚细半岛成为了以巴尔干半岛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以此抵御了阿拉伯半岛那次强大的攻势。而在古典时期的后期，占据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人，也终于凭借海洋和高地的双重优势，建立横跨欧亚、掌握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的奥斯曼帝国。

在欧洲人的强大攻势之下，奥斯曼帝国的结局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不过能在古典时期末期为西亚的帝国时代收官，还是为土耳其人在地区地缘结构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这一优势的最大体现，就是将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亚美尼亚高原，大部归入了土耳其的版图。也许这块高原曾经的主人——亚美尼亚人，最应该为失去这块在地缘结构上有机会自成一体，但在地缘位置上又很难夹缝求生的地缘板块，而感到遗憾。不过相比在大高加索地区尚求得了一个独立法人地位的亚美尼亚人，现在居住在亚美尼亚高原的“库尔德人”，就不仅仅会感觉到遗憾了。

第三节 土耳其在两河水资源上分配上的重要角色

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本身就自成体系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来说，能够把阿拉伯人压缩在低地之上，并且在与伊朗高原的地缘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缓冲之地，固然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主控亚美尼亚高原的主要地缘意义，并不在这两方面。能够控制高原西部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源头，才是土耳其人最大的收获。也是土耳其人，试图主导中东局势的底气所在。

水资源对于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性，相信已经不必我多言了。以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而言，土耳其人并没有太多手段，借助这一优势来影响阿拉伯半岛。在古典时期，处于河流下游的低地，虽然不时的会受到高地民族的冲突，但就水资源这块来说，却并不用太担心人为因素。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不受高地民族的干扰之下，为自己的土地规划设计水利工程，扩大生存之地。

既然叙利亚人能够在中游地区，建设大坝截流部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那么身处更上游的土耳其人，也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开发自己的东南地区。假如当年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地缘分割线，能够建立在亚美尼亚高原南缘的分水岭——东南罗斯托克山脉上的话，那么现在的叙、伊两国也不会这么被动了。而现在，土耳其人利用他们的帝国余威，基本把亚美尼亚高原南延高地划走的现状，让土耳其人不仅可以掌握更多的水资源，更在两河地区有相对平坦的地区可供开发。

这些介于高山和平原之间的高地，在古典时期固然很难成为灌溉农业区，但在现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难度了。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不过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人显然有双赢的办法。这些从高地奔流而下的河水，在土耳其境内有足够的高差。把单纯蓄水的水利工程，变成为综合性的水电工程是非常合适的方法。为此，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土耳其开始人计划耗资上百亿美元（现在已经投入 300 多亿美元了），在两河上游地区构筑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简称 GAP）。

对于下游国家来说，上游国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构筑起了拦河大坝，都必将对下游地区的生态平衡，以及地区地缘政治造成影响。就像叙利亚人修坝的初衷，应该并没有太多地缘政治方面的想法。毕竟在水贵如油的中东，谁都不会放过一个能为自己多留点水的机会。然而大坝建成后，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地缘政治上产生了影响。1974 年底至 1975 年初，由于受气候影响，幼发拉底河的流量骤减了 1/4，叙利亚为了保证自己的供水，很自然的把这些损失尽数转嫁给了下游的伊拉克。为此，萨达姆向叙利亚发出威胁，要空袭萨德湖的拦河大坝。

好在大家同属阿拉伯体系，这场兄弟之争最终在沙特的协调下解决了。

说起来，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的话语权上，的确底气不足。相比底格里斯河在下游地区，还能从伊朗高原承接一些支流补给。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就只能面对干旱的阿拉伯高原了。不过叙利亚人也别高兴太早，它真正能够掌握的，也就是从中游补进的，以“哈布尔河”为主的几条支流（幼发拉底河北，靠近叙伊边境）。而这些北线支流的流量，只占整个幼发拉底河水系的一成左右。也就是说，九成的水源是被土耳其人所控制。如果土耳其人想对叙利亚政局施加影响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调节”幼发拉底河水量来做到这点。只是这样做的话，会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会把伊拉克给稍进去。在玩弄地缘平衡时，同时和两个实力不弱的邻居为敌，并不是最好的方案。好在土耳其人还有另一张王牌可打，那就是“底格里斯河”。

相比幼发拉底河上的“零”话语权，伊拉克在底格里斯河的水资源上，多少还能做点主。由于这条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边缘（东南托罗斯山脉南麓）的大河，有一半多的水量，是通过伊朗高原南麓的支流来补给的。土耳其人在理论上可以控制的水量，约占底格里斯河总流量的4成左右。只是对于一个国家、一条河流来说，这四成的弹性，已经足够造成致命威胁了。所以假如土耳其人所针对的目标只是伊拉克的话，那么他们只需要把底格里斯河的水龙头拧紧，就基本可以在不影响叙利亚人的前提下，卡住伊拉克人的脖子了。

对于自己这种所拥有的能够影响一半新月沃地的能力，土耳其人也并不讳言，尤其是他们已经通过打造 GAP 项目为两河安上了水龙头时。“水资源本该是土耳其的，石油才是他们的，我们不与他们分享石油，他们也别想和我们共享水资源”，这就是土耳其人在 90 年代初向下游阿拉伯国家发出的政治宣言；而更为圆滑一点的外交辞令就是“我们虽然不考虑和下游国家分配水资源，但很愿意和下游国家分享水资源”。至于这一字之差，所包含的政治企图，相信已经昭然若揭了。

第四节 土耳其在中东国家的售水计划

单从地缘位置、能支撑大规模人类生存的国土面积，这两项指标来看，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无疑是阿拉伯半岛，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结合宗教影响力与石油资源，沙特阿拉伯的地缘实力也肯定是位列前三。也就是说，仅凭掌控两河水源这一项优势，土耳其人就足以对两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施加地缘影响了。而事实上，土耳其人凭借水资源所能辐射的影响力，并不止限于这两个下游国家。既然海湾国家的石油能够通过管道、海运等方式，远销到海湾以外

的地区。那么土耳其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它那丰富的淡水资源，卖给其他阿拉伯国家。

既然犹太人可以搞出个国家输水工程，把其北部相对丰富的水资源输送到以色列全境，那么阿拉伯半岛国家如果愿意和土耳其充分合作的话，在技术上也可以打造一个“中东输水工程”来。而在具体的计划中，土耳其人推销的这项工程，被称作“和平输水管线计划”。其线路有两条：一条向东，沿着海湾沿岸，向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阿曼，这几个多油少水的海湾君主国供水（东线）；另一条向南，指向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地区，直至沙特。

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他们是非常愿意用这些上天赐予的水资源，来“帮助”这些曾经的帝国子民的。对于土耳其来说，能把水卖出油价钱来，的确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方案。不过更诱人的前景是，当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水龙头都要受土耳其人的影响时，谁在地区事务中会更强势，就不言而喻了。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让土耳其人为之提供参照的是俄国人。这几年冬天，俄国人似乎总是要用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来做点文章，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为了针对乌克兰人的背叛。实际上，是在对整个欧洲施压，让老欧洲认清楚，俄国这只骆驼还没有瘦死。

不过土耳其人要想真的实现“水变油”的战略构想，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搞出国家输水工程来，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国家；而俄国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输气管网渗透欧洲，则得益于当年红色帝国的建立。现在土耳其人要是想布这样一个局，政治上的困难无疑是最大的。最起码，他要先把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下游国家搞掂，才有可能过境卖水。因此土耳其虽然凭借地缘优势，已经掌控了这两个国家的水龙头，并让两国不得不正视土耳其的存在。但在具体使用这一战略武器时，还是非常慎重的，以避免适得其反，激化民族矛盾。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就曾经多次要求土耳其截断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来水，均被土耳其人拒绝了。对于一个试图成为地区领导者的国家来说，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就阿拉伯半岛现在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土耳其人想通过跨国管线卖水还不现实。至少伊、叙两国会担心，这些按照国际法则自己本来有份的水资源，一旦能卖上钱了，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对于这点，土耳其人倒是可以解决。因为土耳其人所拥有的，并非只有两河的上游。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它有多条水量不错的河流，在流经沿地中海的沿海平原后，汇入地中海。把这些河流的水收集起来，就足以帮阿拉伯半岛腹地国家解决缺水问题了。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对于土耳其这项前缀为“和平”的商业计划中，所包含的地缘政治

目的，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有办法的话，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交到一个有野心的异类手中。在这种战略思维指导下，像沙特这种有石油资本的国家，宁愿把钱花在成本更高的海水淡化工程上。

虽然让整个阿拉伯半岛国家，都愿意配合土耳其人铺设输水工程的计划，目前难以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人就不会去思考别的办法和那些缺水的中东国家，如以色列、约旦等国单独谈“水”生意了。只是不管用什么方案，土耳其人的定价，都一定要比海水淡化的成本要低。比如用超级油轮运水，就是一种选择。而在诸多方案中，有一个方案看起来比较有想象力：就是用巨大的塑料水囊，装满淡水后用拖轮牵引到买水的国家那里。从可行性来看，以色列人估计会比较感兴趣。约旦如果也想这样做的话，最好还是由以色列在陆地中转一下。否则埃及人就要头疼让不让这些水囊过境了。假如用水囊或者油轮卖水的计划试点成功了。包括突尼斯、利比亚等北非国家，都是土耳其计划中的潜在客户。

千万不要以为土耳其人和它潜在的商业伙伴们，是看到中国人的顺水千里飘流木、竹，才如此有想象力的。事实上在古典时期，那些居住在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富人们，就经常派人行船到阿拉伯河河口，用羊皮水囊装水然后随船带回来使用。在水贵如油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目前土耳其“水”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但掌握了中东水塔而他们，绝对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水，终有一天能够撬动阿拉伯世界的地缘天平。

第五节 埃及水资源受到尼罗河上游国家的牵制

假使说土耳其在水资源上的控制权上，是中东最有强势的國家的话，那么叙利亚就可以说是最弱势的国家了。这个弱势并非体现在绝对水资源的拥有量上，而是对水资源的控制权上。底格里斯河基本上算擦边而过，幼发拉底河的水龙头又在土耳其那里。好不容易从法国人那里“继承”了戈兰高地，想着能够当一回巴勒斯坦的家，却又被以色列“横刀夺爱”。即使以色列人愿意把吃进去的肥肉吐出来，也一定会要求叙利亚不能打戈兰高地水资源的主意。只是大马士革一带虽然靠着“前黎巴嫩山脉”东麓流下来的拜拉达、阿吉瓦两条河流，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少有的生机之地。但现在，水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大马士革的本地水资源，目前只能供给 1/3 不到的人口）。一边等着用水，一边又看着自己的戈兰高地成为了以色列的水塔，潜在的矛盾什么时候爆发，谁也无法预料。

从地理结构上看，水资源的控制权是掌握在高地之上的。而叙利亚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悲剧，就在于板块之内没有与其纵深相匹配的高地做水塔。

这出悲剧在埃及也同样在上演。从技术上看，如果尼罗河上游的苏丹也效法以色列，对埃及拧紧水龙头的话，那埃及人将一粒水也得不到。因此在埃及的地缘战略中，苏丹一直是其密切关注，并希望控制的对象。好在大家都属于阿拉伯联盟，而埃及的实力又明显是大哥级的，因此埃及和苏丹的地缘矛盾算是在内部得到了解决。根据 1959 年双方签订的协议，埃及人每年可以分配的尼罗河河水，是苏丹的 3 倍（埃及 555 亿立方，苏丹 185 亿立方）。

鉴于埃及的人口基数、强势地位，以及要为阿拉伯世界承担的责任，埃、苏之间当年的河水分配协议，倒也不算是不平等条约。只是苏丹并非是唯一能够影响埃及用水的国家。从尼罗河水的控制上看，苏丹东面的埃塞俄比亚才是真正的关键先生。要知道，埃塞俄比亚高原流下来的河水，占到尼罗河中下游流量的 80%。如果这个高地国家，想效法土耳其的话，埃及人恐怕就顾不上去关注以色列人的动向了。与和埃及同属阿拉伯国家的苏丹不同，埃塞俄比亚并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这个国家和其他尼罗河上游的黑人国家一样，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为了两个阿拉伯国家的用水安全，而去限制自己对境内水资源的利用。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游国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配合，埃、苏之间的协议就是一张废纸。说起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地缘关系，也足够复杂的。这个比欧洲人还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不仅仅在主体宗教上和阿拉伯人格格不入，更和以色列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埃塞俄比亚人的圣经中，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所罗门王”，曾经和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有过一段恋情，并生有后代。而埃塞俄比亚的皇族更一直声称，自己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代。为此，他们甚至将所建立的王朝称之为“所罗门王朝”。

第六节 以色列说服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建立水利工程

尽管在埃塞俄比亚以外的圣经旧约中，示巴女王到底是哪的人，并没有定论（有历史学家认为是在也门一带），但以色列显然是接受这个说法的。在从世界各地所接收的犹太移民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后代，被称之为“法拉沙”人。不幸的是，这些没有在 4 世纪和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一起，改宗基督教的犹太后裔，现在在种族上已经彻底变成黑人了。在以色列国内，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黑人一样，成为最易遭遇种族歧视的族群。

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关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传说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能够在借此在非洲找到一个可能的盟友，才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鉴于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埃及领头的阿拉伯联盟，曾经试图以约旦河上

游的水资源，作为战略武器扼杀以色列。以色列也希望通过远交近攻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具体的做法，就是战略联盟阿拉伯世界的上游国家，并推动他们发现自己在水资源方面的地缘优势。在这种战略思维指导下，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都成为了以色列可以发展的盟友。

其实以土耳其的实力和野心来说，没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也会帮助阿拉伯人安上水龙头的。相比之下，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人就成功的劝说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右岸的那些河流上，修筑庞大的水利工程。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来说，发展水利工程的着眼点还是在于自己的民生上。当然，他们也没有理由拒绝战略上另有目的的犹太人来帮自己的忙。反正如果能够凭借这些大坝水库对下游国家产生影响的话，所增强的也是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埃塞俄比亚将来能不能在战术上帮到自己，也并不重要。能让埃及人意识到自己的后院并非绝对安全，别总是把头扭到东方就行了。

埃塞俄比亚人的这种做法，很明显让埃及和苏丹两国感到了不安。为此，埃及人运用了他们在非洲强大的影响力，阻止了埃塞俄比亚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埃塞俄比亚自身政局不稳，这些工程大都被搁置了（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只不过从长远来看，尼罗河流域形成用水协议机制是势在必行了。至于埃塞俄比亚人，倒也不用太急，反正地缘优势在他们一面。

埃及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但好在它在非洲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是重量级国家。凭借苏伊士运河的影响力，大国们也不希望看到埃及和上游国家因水而发生激烈冲突。但回到叙利亚这里，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在叙利亚的邻国中，土耳其、以色列，甚至伊拉克，实力都不弱于叙利亚。也就是黎巴嫩和约旦的实力明显弱于叙利亚。问题是，和叙利亚在水资源分配上出现最大矛盾的，恰恰是三个实力最强的邻国。在这种地缘政治结构下，叙利亚想不悲剧也难了。

第二十八章 西亚裂谷带北部的地缘格局

第一节 黎巴嫩的地理结构

即使叙利亚和以色列能够重启“土地换和平”谈判，解决掉叙、以双方的地缘矛盾；并且凭借在伊拉克上游的地理优势和在伊拉克的政治交往中稍显强势，它也没有机会扭转对土耳其的地缘劣势。在土耳其人凭借帝国余威在中东所获得的地缘优势中，叙利亚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种此消彼涨的地缘博弈，并不仅仅体现在叙利亚没有机会把国土延伸到亚美尼亚高原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图的话会发现，叙利亚人的前宗主（奥斯曼土耳其）在被迫和阿拉伯人分家之时，还顺手从叙利亚的核心区割走了一块肉。这块肉不仅让叙利亚损失了部分海岸线，更让一条叙利亚本有机会掌握全部话语权的河流成为了国际河流。这块引发叙、土领土争端的土地，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地缘标签，叫作“安条克”。而那条被土耳其人顺带割走部分的河流，则叫作“阿西河”。

西亚裂谷带的地理结构，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条纵贯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峡谷地带。依山伴海的结构，加上西风从海洋上带来潮湿的气流，让西亚裂谷带成为了阿拉伯半岛水源最充足的地理单元。由此西亚裂谷带，也成为了新月沃地的半壁江山。既然是峡谷结构，天上又有相对充裕的降水，那么裂谷当中就没有理由不汇集出与之同向的河流了。当然，由于西亚裂谷带内部还分为不同的板块，这些由两侧高地汇流而下的河水，并没有汇集成一条大河。而我们之前重点分析的约旦河，就是黑门山以南的西亚裂谷带核心区的主要河流。

在黑门山以北的“西亚裂谷带”北延山脉中，山地也同样是沿两条平行线向北延伸的。只不过与黑门山以南北高南低的情况不同，北延山脉的结构正好相反，是南高北低。如果划分其内部结构的话，又可以分为两块，即南段山脉形态明显的“黎巴嫩山脉”和“前黎巴嫩山脉”。前者位于西侧，紧邻腓尼基平原与地中海；后者位于东侧，又被称之为“东黎巴嫩山脉”，对接阿拉伯高原。两条山脉之间所包夹的谷地叫作“贝卡谷地”。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对贝卡谷地进行了一场高技术含量的空中打击，使得这条谷地成为了全世界军事家所关注的地方。

关于贝卡谷地和黎巴嫩的地缘结构，我们要到第五次中东战争才会具体分析。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叙利亚。其实我们在地形图上，很容易看出两条“黎巴嫩山脉”应该是黑门山以北地区最重要的地理单元。因为山势再往北走的话，

就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是说，这两条平均海拔达到 2000 米的山脉，是西亚裂谷带北部的主要集雨之地，将之称为这一地区的水塔并不为过。事实上大马士革一带之所以能够成为绿色之地，也正是得益于从前黎明巴嫩山脉东麓流下来的，以拜拉达河、阿瓦吉河为代表的河流。而在贝卡谷地之中，同样也存在着纵穿谷地的河流。

黎巴嫩地缘结构图

利亚和阿拉伯人看来，黎巴嫩很明显应该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而从整个叙利亚的地理结构来看，在北部两河流域没有占据制高点的情况下，两条黎巴嫩山脉就是叙利亚的一级地形。如果没有了这段山脉，不仅将破坏叙利亚地理结构的完整，更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造成极大的风险。

第二节 黎巴嫩的独立对叙利亚地缘结构的影响

有一种看法是，为了更好的掌握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半岛，西方需要以色列这样一个钉子，插在新月沃地之上。而假如当初犹太人没有做那么大的努力，从无到有建立起以色列的话，这个战略重任很可能就会交给黎巴嫩了。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一战之后，成为大叙利亚地区宗主的法国人，之所以在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分割出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黎巴嫩地区的居民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从技术上看，在黎巴嫩以基督徒为主复制以色列建国的道路，并非没有可能。

虽然法国人当时考虑把黎巴嫩从叙利亚独立出来，可能没有考虑到创立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但很明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被完整的分割出来，对叙利亚的地缘影响会是多方面的。尽管在分割之时，叙利亚方面保住了前黎巴嫩山脉东麓的领土，以此来保证大马士革南北地区的河流控制权在自己手上。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条重要河流的源头被黎巴嫩所掌控了。这条河流，就是源头处与利塔尼河相邻，同样发源于黎巴嫩山脉东麓的“阿西河”。

阿西河是阿拉伯人的叫法。按我个人的理解，这应该指的是“阿拉伯西侧的河流”。它还有一个音译的名字叫“奥龙特斯河”。这条河流，在穿出贝卡谷地之后一直向北延伸，直到遇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延伸下来的伊斯肯德伦山脉之后，开始向西转向流入了地中海。也就是说，从河流的角度看，利塔尼河+阿西河，就是“西亚裂谷带”北延山脉的中轴线。而在缺水的阿拉伯半岛，两条河流也自然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地缘作用。

如果按照叙利亚人的想法，他们应该很希望自己的领土能够切入贝卡谷地。最起码把阿西河发源、流经的这段谷地和山脉划归己有。不过法国人更愿意保证贝卡谷地的完整性，还是将黎巴嫩的北部边界划在了贝卡谷地谷口。让叙利亚人庆幸的是，黎巴嫩不是以色列。作为阿拉伯联盟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国家，黎巴嫩可以说是最弱的一环。而它只有两个陆地邻国的现状，也让黎巴嫩不得不依附于叙利亚。因此在叙、黎关系中，叙利亚完全占据了主动，甚至长期驻军黎巴嫩。

虽然黎巴嫩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阴影下，并且叙利亚人一直认为，黎巴嫩

应该是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但现状是，黎巴嫩毕竟是一个独立国家。当以色列最终愿意以土地换和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第五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南线压力锐减的黎巴嫩也开始用更独立的思维，来为自己的国家做规划了。这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就是在阿西河上游筑坝，构筑灌溉系统，以开发北部山地。并不十分清楚，这项有中国投资参与的项目，在政治上是如何与叙利亚方面协调的。不过叙利亚人肯定会十分关注这项工程影响，因为叙利亚方面早在阿西河流出叙利边境后不远处，就修建了一座拦河大坝，开发了一片灌溉区。按照惯例，无论发不发电，一座蓄水大坝都会带来一个人工湖。

阿西河上的这片人工湖叫作“霍姆斯湖”。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有点印象了？在最近的叙利亚新闻中，“霍姆斯”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这个反对派的大本营，成为了政府军主力攻击的对象。而传说中被叙政府军俘获 100 多法国军人的城市，也正是“霍姆斯”。鉴于这座城市与贝卡谷地的地缘关系，在这个传说中被俘的，还有来自黎巴嫩的武装人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叙利亚这次的动乱中，还有两个城市也是反对派比较集中的地区。一个是霍姆斯北部，同样受益于阿西河和霍姆斯湖的哈马省；另一个则是幼发拉底河谷的代尔祖尔。虽然说这几个叛乱城市，在整体实力上无法与大马士革 PK。但由于它们都处在重要的农业区，动乱本身不可避免的对叙利亚的农产品供应造成了很大影响。

要是说在阿西河上游，叙利亚还可以凭借对黎巴嫩的地缘政治优势，施加强力干扰（甚至在很多叙利亚人心目中，黎巴嫩还是有机会“回到”叙利亚的怀抱）的话，那么让土耳其割取了阿西河下游平原，就是叙利亚心中永远的痛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叙利亚从占据地缘优势的土耳其手中，拿回阿西河下游平原的机会基本为零。以这片平原为核心，被称之为“安条克”的土地（现在叫安塔基亚），不仅让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们耿耿于怀，更直接与掌握叙利亚军、政大权的阿拉维派有密切的地缘关系。

第三节 安条克在古典时期的重要地缘地位

我们先来解释下什么是“安条克（antioch）”。很多人知道“安条克”，是因为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曾经以阿西河下游平原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安条克公国”（1098——1268 年）。而这个欧洲基督徒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的第一个据点，并不是“安条克”这个地缘标签的首创者。实际上它的历史还要早上 1300 多年。

公元前 4 世纪，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仅

仅用了 10 年时间便创立了西起巴尔干半岛，东接南亚次大陆，南至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帝国”。不过在这位英年早逝的君主离世之后，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们便瓜分了帝国的领土。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将领不够忠诚，谁让这位病逝时只有 33 岁的君主，没有留下子嗣呢。

在这次瓜分中，击败竞争者得到两河平原和波斯高原的将领叫作“塞琉古”（也译作“塞琉西”）。其后，他又向西夺取了现在的叙利亚地区，并将国土延伸到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南部。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塞琉古帝国”的王朝，也被认定为叙利亚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帝国。其政治中心，便是在阿西河下游平原。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塞琉古将自己在阿西河下游平原西部的帝都命名为“安条克”。

实际上，统辖波斯高原和两河平原的帝国，将地缘中心放在安条克并不是个好主意。不过，鉴于塞琉古帝国的建立者是来自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无论是从寻找归属感的角度，还是恢复亚历山大帝国的角度看，安条克都是不折不扣的枢纽。如果从欧洲出发的征服者和商旅，先跨越狭窄的土耳其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半岛的话，他们在穿越小亚细亚半岛后，准备进入新月沃地时，首先到达的就是安条克平原；而如果你从地中海沿线任何一个点，试图从海路进入新月沃地乃至更远的东方的话，阿西河口一带也是最佳的登陆地点。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这里也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终点。从东方而来的商旅，在这里就会把货物卖给那些中转商，让他们继续把货物转运到地中海沿线的那些文明之地。

既然安条克平原具有如此重要的枢纽地位，那么这片土地就不大可能只被马其顿人和十字军所看中了。事实上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安条克平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耶稣被犹太人出卖给罗马人之后，他的门徒开始沿商路向外传教的过程中，安条克（原名“安提拉”）被认为是最早以基督教名义传教的地区。从这层意义看，将安条克称之为基督教的摇篮并不为过。

古典时期发生的那些历史故事，足以证明安条克的地缘地位。如果没有苏伊士运河的开挖，东西方商路必须以“海——陆——海”的方式中转交易的话，那么走西亚裂谷带最北端的安条克，会比走裂谷带南边的苏伊士，更快到达东方那些文明中心。而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安条克的这种枢纽地位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苏伊士运河线全程海运的成本优势，足以把安条克从东西方交通枢纽的位置，拉低到地区枢纽的地位。

第四节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安条克的政治归属问题

即使不再承担东西方交流的重任，从板块位置来看，安条克也是小亚细亚

半岛、亚美尼亚高原、阿拉伯半岛三板块的交集之地。如果有一个帝国由上述三板块组成，那么安条克平原会是政治中心最好的选择。然而不幸的是，最后控制这三个板块的奥斯曼帝国，对向欧洲扩张更感兴趣。为了这个战略方向，他们更愿意把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变身为自己的政治中心（更名为“伊士坦布尔”）。这种选择也不能说错，毕竟在突厥人崛起之前，除了波斯人曾经透过小亚细亚半岛向欧洲渗透过以外。大部分时间，小亚细亚半岛都是欧洲人向亚洲渗透的跳板。也就是说，即使出于战略防御的角度，突厥人也更倾向于把政治中心放在压力最大的一面。

如果奥斯曼帝国不分裂，那么不管安条克是不是政治中心，它的地区枢纽地位还是可以在帝国内充分体现的。只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突厥人不得不把阿拉伯板块从自己的国土中分割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位于小亚细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与阿拉伯板块相接的安条克平原，也成为了两个族群争夺的焦点。由于土耳其人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亚美尼亚高原，而阿拉伯国家中，由叙利亚承担了连接两河流域和西亚裂谷带的任务，所以安条克也转而成为了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争夺的焦点。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单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实力对比来看，完全占据高地优势，又拥有充足水资源的土耳其，显然是属于优势方。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一战之后的阿拉伯半岛是协约国的战利品。而代表协约国来争夺阿拉伯半岛利益的英、法两国，又把争夺的重点放在了地中海沿线。在两国的分配方案中，黑门山以北的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被加上了“法属”的前缀，成为了“法属叙利亚”。也就是说，现在站在土耳其人面前，与之争夺安条克的并非阿拉伯人，而是法国人。作为战败国的土耳其，可以说是没有机会胜出的。

一般情况下，叙利亚再从法国人手中独立出来后，就可以正式、合法的继承安条克了。虽然土耳其人很有可能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甚至发动战争争夺，但主动权就在叙利亚一边了。这就好像以色列虽然通过战争得到了戈兰高地，但英、法两国当初的划界，却始终无法让以色列把这种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这种实力较弱的板块因祸得福，得以在强邻重压之下，谋得争议板块的情况，在后殖民时代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发生。就好像如果东亚能够在没有西方殖民者干扰的情况下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中国在西南的国境线，是否有机会再向南推进点就会明白。殖民统治虽然严重的伤害了被殖民国家的主权，但在客观上也的确让一些实力较弱的地缘板块，借力在和它的强邻打交道时，获得更多的利益。

假如这个世界再没发生什么大事，让土耳其对法国人的战略价值突然提升，也许直到今天“安条克”还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件大

事终究还是在叙利亚独立之前发生了。为了更大的战略利益，叙利亚的“安条克”也被法国人出卖给了土耳其。这件大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节 法国二战为拉拢土耳其让安条克并入其领土

印象当中，土耳其在二战中的态度，已经在前面的内容中解读过了。在一战中站错队，惨遭肢解的土耳其，这一次的政治态度相当谨慎。在没有看清战争走向之前，并不愿意轻易的表态。为此，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希望通过外交努力，将土耳其人拉入自己的阵营。英法这边，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开辟新战场，以牵制德军；而如果这一次，土耳其人依旧站在德国人一边，并负责他们最想得到的巴尔干半岛的话，那么德国人可能就不必为了南斯拉夫的抵抗，而推迟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了（这样的话，在严冬来临之前，德国人并非没有机会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最起码穷山恶水出来的突厥人，战斗意志肯定要比喜欢在地中海边上晒太阳的意大利人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直骑墙的“中立者”，并没有机会参与胜利者的盛宴。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奇货可居的他们在左右逢源时不会得到一些好处。而为了让土耳其人在战争开启之后能够站在自己一边，1938年的法国就不得不把安条克“让给”了土耳其。当然，对于以民主先行者自居的法国人来说，无论幕后的交易有多么的肮脏，貌似民主的法律程序也是一定要走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就这样把安条克交给土耳其人，老大帝国的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因此这块战略要地，并没有直接交给土耳其，而是在土、法两国军队的“保护”之下，先行独立成为了“哈塔伊共和国”。

哈塔伊是土耳其人对原“安条克”公国所在区域的叫法。当我们看到“安条克”这个地缘标签时，它其实有几层含义。在地理概念上，阿西河下游与那些从北部山地而下的支流，所共同冲积而成的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安条克平原”。与一般河流最大的平原是入海口处的“三角洲平原”不同的是，安条克平原的主体并不在入海口处。由于阿西河最后的一段旅程，是穿越伊斯肯德伦山脉和阿拉维山脉之间的谷地。阿西河水系所携带的泥沙在转向地中海方向时，就开始沉积了。在这里，伊斯肯德伦山脉、阿拉维山脉，以及亚美尼亚高原南延山地，共同围就了一个盆地型结构。这片土地平整，水资源丰富的板块，也就成为了安条克地区的地缘核心。

从中心城市的设立角度来看，大平原的腹地并不最好的选择。依山伴水，能够扼守交通要道的地点，才是最受政治家和军事家们青睐的。因此当我们所说的“安条克”是一座城市的话，那么它的位置就是在安条克平原西部，伊斯

肯德伦——阿拉维山谷口处。其实这也是个地缘规律了，即拥有良好农业条件的地区，未必会产生中心城市。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区位上有交通枢纽地位的点，才更有机会。这就好像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虽然一直以江南渔米之乡闻名于世，但在漫长的古典时期，这一地区的核心城市却是扼守江东门户，农业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南京”。而在西方殖民帝国，为东亚开启海洋之门后，位于长江口的上海，才有可能从一个“县”级行政区，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要是 2012 真有大灾，中央之国成了一片“海中地”的话，用不了多久，南京就能重新超越上海，成为江南的核心城市了）。

按照土耳其人的发音习惯，安条克这座城市被称之为“安塔基亚”，而它所在的版块，行政建制则是“哈塔伊省”。这倒也不错，免得我们在今后的行文中，把这两个地缘标签弄混了。在划分行政边境时，山脉、河流总是最好的分割线。不过法国人从奥斯曼帝国分割出法属叙利亚时，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从结果上看，法国人更倾向于以海岸线的方位来做划分。也就是说，法国代表阿拉伯半岛拿走南北走向的，方向上应属于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而土耳其人则保有小亚细半岛的，东西走向的海岸线。这样的话，地中海的东北角——伊斯肯德伦湾的顶点，就成为了双方的行政分割线了。

不过这种划分方法让土耳其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这样的话，法属叙利亚的西北角，与土耳其在半岛东南部重要的沿海平原“奇里乞亚平原”之间，并没有高大山脉以为分割（只有一些丘陵，勉强可以充当分割线）。也就是说，不论站在土耳其人对面的，是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如果就这样划分边境的话，感受更多地缘压力的，就是土耳其了。

在土耳其人看来，能够接受的地缘平衡线，应该是伊斯肯德伦山脉。不过由于这条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延伸下来的高大山脉，事实上伸入了阿拉伯半岛的西侧，完全以它作为分割线的话，会让法国人（叙利亚人）感觉到吃亏过多。因此比较能够平衡的方案，应该是在伊斯肯德伦山脉的西侧，寻找一个山海相接的点作为双方北部边境的起点。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找到这个点，而按照这个原则，山脉西麓的海港城市——“伊斯肯德伦”，以及它右侧的伊斯肯德伦山脉归入叙利亚。而再往北的叙、土边境，则以伊斯肯德伦山脉分水岭作为分割线，直到与安条克盆地平原的北边边缘对接。其实中世纪的安条克公国，在西北方向就是以这样一条分割线，来和邻国维持平衡的。

所谓世事无常，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并不是总能按照技术上的理想值来划分边境的。既然伊斯肯德伦山脉两侧，已经被划为了一个行政区，那么土耳其人在要挟法国人“归还”哈塔伊省时，就没有理由再把安条克平原及阿西河口，留给叙利亚了。而失去安条克平原的叙利亚，对其地缘结构完整性的

影响，要远甚至于失去哈塔伊省的土耳其。这一方面是因为，无论哈塔伊的归属如何，站在高地上的土耳其，都有绝对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安条克平原和阿西河口对于叙利亚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价值。

第六节 安条克脱离叙利亚对其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叙利亚是新月沃地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枢纽国家。能够横跨两河流域以及西亚裂谷带的版图，就是支撑这种枢纽地位的地理基础。不过从结构上看，两河流域和西亚裂谷带之间，必须存在一个过渡地带来连接整个新月地带。从板块对接的角度看，东南托罗斯山脉以南的亚美尼亚高原南麓山地，都可以算作这条绿色长廊的中间地带。问题是，新月沃地本来还承担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任务。而在具体交通路线的选择上，地势相对较低，能够直线连接两河中下游地区和西亚裂谷带的线路，就会更受青睐了。按照这个思路，叙利亚北部东邻幼发拉底河河谷，西接安条克平原的“阿勒颇高原”，就更有区位优势了。

实际上，和土耳其境内那些真正的高原相比，海拔不过数百米的“阿勒颇高原”绝对不算高原，只能叫高地了。不过也正因为海拔相对较低，地势较平坦的原因，阿勒颇高原才成为商旅们的选择。在叙利亚的版图中，这片高地基本是被“阿勒颇省”所辖。而位于高地中心的绿洲城市“阿勒颇”，也成了为新月沃地真正的枢纽点。在目前叙利亚的城市排名中，阿勒颇仅次于大马士革。可以说，如果想要控制叙利亚的北部局势，阿勒颇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与阿勒颇目前上百万的人口量相比，地缘地位并不亚于阿勒颇的安塔基亚就要可怜得多了。如果安条克平原和安塔基亚仍然在阿拉伯人的版图内，那么从两河流域乃至波斯湾地区针对地中海的贸易，就必然按照传统的丝绸之路，经由安塔基亚和阿西河口转口了。无论是道路还是石油管线，穿越伊斯肯德伦山脉和阿维拉山脉之间那个缺口（也就是阿西河下游谷地），都比翻越阿拉维山脉进入沿海平原的难度要低。而这也是与安塔基亚同纬度的阿勒颇，能够在阿勒颇高地的竞争城镇中胜出的重要原因（直线距离）。

正因为脱离了阿拉伯半岛这个母体，安塔基亚地区再也无法成为阿拉伯半岛在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窗口。而失去了安条克平原和阿西河口的叙利亚，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港口，南移到了阿拉维山脉西麓的“拉塔基亚”（叙利亚最大的港口）。经由阿勒颇——安塔基亚的商路，也同样被阿勒颇——拉塔基亚所取代。同样被转移的，还有那为城市带来财富的贸易量。

没有了阿拉伯半岛的物流，也许安塔基亚还能指望成为亚美尼亚高原甚至

波斯高原的出海口。但鉴于它突出部的地理结构，无论从距离还是安全的角度看，伊斯肯德伦山脉以西地区，包括伊斯肯德伦港，都会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并没有必要跑到安塔基亚去绕一圈（比如土耳其和伊拉克在上世纪 70 年代合作的一条石油管线，就是直接由伊斯肯德伦出海的）。在这种两边不靠的情况下，尽管安塔基亚现在依然是哈塔伊省的政治中心，但在土耳其人的版图中已经沦为了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周边农业区的管理者了。

现在看起来，安塔基亚和安条克平原如果留在叙利亚的话，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不过在政治博弈中，决策者们并不会特别关注这点。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类争议板块在国与国的地缘博弈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 1938 年，安塔基亚和整个哈塔伊省独立成为了“哈塔伊共和国”。当然，如果你多少了解点历史的话，就会对这种先独立后加盟的把戏感到好笑了（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迫不及待的土耳其人，甚至在第二年就开始了“哈塔伊共和国”的回归进程。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技术上需要做一些准备，土耳其人也许在 1938 年就走完这个过场了。而之所以要做技术准备，完全是为了让标榜“自由、民主”的法国人面子上过得去，不至于让他们再面对叙利亚人时无言以对。要知道，虽然我们笼统的把法国对叙利亚的这种统治行为称之为“殖民”，但在一战以后，这种获取海外领地的行为，在技术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点说，在被殖民国家民族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并且成长出一批具备西方思维的精英时，以前那种基本不考虑被殖民地民族情绪的做法，变得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英法两国为了打击同盟国联盟时，给阿拉伯人画出民族独立大饼的情况下，直接把土耳其的殖民地划到自己名下就没法交待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而瓜分德、土留下的殖民地，一种由国际联盟授权的“委任统治”，成为了新型的殖民地管理方式。

所谓“委任统治”的逻辑，就是认定这些前殖民地暂时还没有独立建国的能力，所以需要委任一些体制成熟的国家来提供指导，“帮助”它们进行统治。这样的话，既让急于瓜分战利品的协约国成员们能够获得收益，又能够给那些之前被忽悠的内应以交待。至于说要“委任统治”到什么时候，就不好说了。反正如果没有二战，使得这些前殖民地又一次有了选择的机会的话，40 年代末那场民族独立浪潮估计还得推迟点爆发。

第七节 土耳其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

叙利亚的下一步局势 如何变化，谁也无法准确预料。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

定的：一是无论法国人多么想在拿下利比亚之后，一鼓作气再强出头“重返叙利亚”，土耳其人都不会让法国人得逞的。也就是说，利比亚的事，土耳其人插不上手，但叙利亚的事，为西方做排头兵的一定是土耳其；二是叙利亚现政府一旦倒台，随之而来的教派冲突，以及对阿维拉派的反攻倒算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先说说第一点。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战争并非是首选的选项。事实上，土耳其人对于直接干扰邻国内政，以及直接使用军事力量，顾虑是非常大的。鉴于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曾经的“殖民史”，过于强硬的形象，有可能会引起阿拉伯世界民族情绪的反弹。倘若土耳其人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划上等号了，那土耳其人想成为中东局势主导者，乃至穆斯林世界领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会进行行政、经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时不时的让一些非官方组织，站在穆斯林的立场上帮阿拉伯兄弟们出个小头，以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为土耳其人树立起正面形象。比如2010年5月31日，土耳其前往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船与以色列海军发生武装冲突，造成9名土耳其人死亡（一名为美籍），数十人受伤的事件，就为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拉分不少。

从土耳其的立场上来看，一个混乱的叙利亚并不是它所愿意见到的。法国人和美国人，可以在打烂一个旧世界后，看到情况不妙便抽身而去，而土耳其人就不行了。叙、土两国漫长的边境线以及地缘关系，固然让土耳其有能力影响叙利亚局势。但叙利亚一旦陷入混乱的话，很难说那些手中有枪的各派力量，在失去强力政府管理的情况下，不会对土耳其的边境安全造成威胁。尤其是叙利亚东北部，也有让土耳其人头疼不已的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不愿意看到叙利亚大乱，但它还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叙利亚民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叙利亚部分我们也解读过，老阿萨德在设计政治结构时，为各教派设计出了一个平衡而又能掌握的体系。这使得叙利亚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不是以教派背景来划分的。也就是说，逊尼派和其他一些小教派同样在政治结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少数派”政权，这种做法无疑是明智的。也正因为如此，叙利亚才能长期保持稳定。问题是，如果这个平衡的结构一旦被打破（而不是在稳定的前提下改进），教派、民族一类的原始属性就必将成为大家划分阵营的主要标准。这一幕在铁托维护了半个世纪稳定的“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就已经上演过了。在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等族群标准划分阵营后，被迫卷入这场变革的普通民众为求自保，一夜之间就可能举起屠刀指向自己曾经的同事、邻居乃至亲属。

第八节 叙利亚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冲突

在中东这片土地上，教派冲突的风险要远大于民族冲突，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这也没办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会划分群体。即使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民族，下面照样会重新分割出新的族群来。为了维护叙利亚世俗政权的稳定，也为了自己所属教派的安全。当年老阿萨德执政时，对于宗教极端势力，尤其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采取的是非常强硬的打压措施。但凡有人敢以宗教名义号召发动所谓“圣战”的话，一律以叛国罪论处。

其实像“穆斯林兄弟会”这种宗教性质的社会组织，在每个阿拉伯国家甚至穆斯林国家都存在。这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兴起于埃及的宗教组织，在最近的埃及大选中，甚至以正式政治组织的身份，获得了四成以上的选票。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以逊尼派教义复兴伊斯兰文化，用传统的宗教结构来主导政治结构，因此不可避免的与所在国家的政权，尤其是世俗政权发生冲突。而在叙利亚，鉴于阿萨德政权的什叶派背景，二者之间甚至没有妥协的空间。这也使得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也更加血腥。

在叙利亚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冲突的案例中，1982年的“哈马事件”无疑是最为血腥的一次。作为新月沃地的一部分，阿西河谷一直是叙利亚核心地区的组成部分。而阿西河畔的哈马、霍姆斯也因此成为了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世居之地。这其中，哈马又可以算得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在那次冲突中，先是穆斯林兄弟会发动“圣战”，攻占了哈马的各级党政机关，杀死了包括省长（哈马省）在内的数百名复兴党干部。十天之后，铁腕的老阿萨德又派军收复了哈马，全歼了穆斯林兄弟会武装。

由于哈马一直都是叙利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中心，这一次老阿萨德决心彻底解决掉穆斯林兄弟会的生存土壤。因此在针对哈马叛乱的军事行动中，不仅叛乱的核心成员被尽数消灭，连同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同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逐户清剿中，上万名（估计在1—3万之间）平民因为与叛乱分子的关系而死于战火。另外约八十万的逊尼派平民逃离了叙利亚。从此，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宗教极端势力（比如基地组织）视叙利亚为禁地。甚至促使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决定从此放弃暴力活动，通过政党化这种“和平”的方式，向政治领域渗透。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西方这次助力阿拉伯世界刮起的革命“春风”，给穆斯林兄弟会渗透政治圈，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异教徒”就会用自己帮助搬起的石头，砸自己的脚面了。

看到阿萨德政权和逊尼派极端势力的这些血腥冲突后，相信没有谁会认为

叙利亚政权硬着陆后，会和平过渡了。可以说，如果叙利亚乱了的话，其影响力要远大于利比亚。至于说将来如何收场，谁也无法预料。我只能说，肯定有更多的平民死于战火。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组织，大多数都是在黎巴嫩受训的。之所以会有这层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阿西河谷直通贝卡谷地，地缘关系更近。更因为黎巴嫩本来就是一个各种教派、势力交织的板块。如此接近三大宗教发源地的位置，以及多山的地形，使得黎巴嫩内部教派的类别非常繁杂。你不仅能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种大教派的角度在里面找到教友。也同样可以细化出天主教、什叶派这类二级教派，甚至还有一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黎巴嫩特有的教派。

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在新闻中，看到有黎巴嫩武装参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行动，就认为这是黎巴嫩政府的官方态度；同样，也不能看到有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什叶派极端组织存在，就认定黎巴嫩应该是伊朗的盟友。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在我们只是以历史事件为参考来进行地缘解读，并不属于半仙性质的预测。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把历史推进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看看阿拉伯联盟针对犹太人的战略反攻，阿拉伯国家又依托了什么样的地缘武器，以及对中东地缘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至于说这些“历史”对解读今日的政局有什么作用，就看大家自己的理解了。会“渔”的话，总比去半仙那里求“鱼”要好得多。

第二十九章 阿拉伯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埃及和以色列维持持续有限战争状态

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看，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都取得了近乎完美的结果。从埃及人手中夺取西奈半岛；从叙利亚人那里占得了戈兰高地；吞并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并顺带把约旦人从耶尔穆克河下游南岸赶走，这样的结果已经使得以色列在地缘安全上，得到了足够的保证。如果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仍嫌不满意的话，再想办法把黎巴嫩境内的北加利利山脉吃掉，以色列的地缘结构就会更加完美了。不过鉴于黎巴嫩本身的体量并不足以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这片高地并非非拿不可（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政治家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这片土地）。

如果能够保住上述战利品，相信犹太人是愿意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和邻居们签订和平协议的。然而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从战略安全角度来看，约旦人并非不可以接受放弃约旦河西岸，最起码他们的首都安曼和以色列之间，还有外约旦高原作缓冲。但埃及人却怎么也不可能接受，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存在。那样的话，不仅运河的安全会受到直接影响，埃及的心脏——开罗，也毫无安全可言。至于叙利亚人，当他们站在戈兰高地上时，以色列人会担心他们的水源安全；而当以色列军队控制戈兰高地后，大马士革就必须直接承受军事压力了。

既然阿拉伯人无法接受战争的结果，那么双方的战争状态就不可避免的还将持续下去。只不过已经在战略上接近取得完美结果的以色列，这时的战略思维出现了微妙变化。既然想拿到的都已经拿到了，如何保住这些胜利果实，就成为了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贯以攻代守的以色列军队，也不可避免的开始转入战略防御了。这其中最为典型表现就是，以色列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修建一条坚固的防线——巴列夫防线（Bar-Lev Line）。

修建“巴列夫防线”看起来，并非多余之举。因为无论是当事双方还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埃及人是绝不会放弃西奈半岛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迟早会爆发的。只不过，一场全面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消耗。无论下一次战争中谁会是战术主动者，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不过这并不代表埃及人就会在准备好之前，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了。要知道，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如果被以色列占据这么大一片战略要地，而不及时作出反应的话，埃及的领导能力势

必会受到很大质疑，并直接影响到下一轮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埃及如果独自发动战争的话，是没有胜算的）。

基于向世人展示埃及一直在战斗的原因，1967年——1970年期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维持了一种有限战争的状态（埃以消耗战争——War of Attrition）。在这期间，苏伊士运河两侧直至地中海发生了无数次渗透与反渗透，突击与反突击的小规模战斗。而埃及方面最大的成果，就是在1967年10月21日，用反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海军的驱逐舰“埃拉特号”（也是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导弹击沉军舰）；当然，对于这样重大的损失，以色列人也不可能没有报复行动的，运河西岸的苏伊士、伊斯梅利亚两市，也遭到了以色列炮火的报复性攻击，出现了大量平民伤亡。

从战略上来看，埃及和以色列都清楚，这些回合性质的小规模战斗，除了证明双方仍处在战争状态以外，对改变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对这场拉锯战的最初发起者埃及来说，战争还有另外的意义——消耗。埃及人十分清楚，就军队的战力来说，优势是在以色列一面；但就整体的地缘实力来说，优势却是在埃及一面。即使这些在报复与反报复之间轮回的战争，会让埃及承担更多的损失，但作为人口更多，纵深更大的埃及来说，却应该比以色列更能承受这些损失。也就是说，纳赛尔试图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国力来拖垮以色列。

这种在商战中被称之为“以本伤人”的战术，其逻辑就是：“如果这场战役中敌人造成我们三千人的伤亡，我们仍然能够坚持战斗，因为我们有人力资源储备；如果我们成功造成敌人一万人的伤亡，那么敌人将被迫停止战斗，敌人没有人力资源的储备。”（当时的一位新闻记者总结的）。这套逻辑在后来的两伊战争中也伊朗人所使用。人口数量倍数于伊拉克的伊朗，在武器补给不如伊拉克的情况下，也曾经用人海战术来消耗伊拉克的战斗能力。从战术效果来看，埃及能否以一场消耗战来拖垮以色列，是很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在以色列可以从全世界的犹太人那里，获得额外补给的背景下。这一点，纳赛尔和埃及的政治家们，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在进行消耗战的同时，埃及人也同时在酝酿一场决战，以夺回西奈半岛。

第二节 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停战状态的不满

假如埃及和以色列都只是非洲中部的两个小国，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战是和，很大程度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了。虽然大国们也一定会为此说上几句，甚至直接干预，但并不会当成外交重点。只是埃及和以色列的地缘位置太敏感

感了，假如因战争引发苏伊士运河关闭和石油价格飙升的话，受影响的不只是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美、苏两个势不两立的大国，也倾向于在阿、以之间暂时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而不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

鉴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中东再重燃战火，在消耗战进行了第四个年头时（1970年10月），埃及方面迫于压力，不得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结束这种让双方都疲于奔命的战斗状态。问题是，从战略上来看，以色列人会很乐意看到双方维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吃进去的阿拉伯领土（按两个超级大国的想法，就先维持个二三十年再说）。而对于埃及和叙利亚来说，这种眼睁睁看着以色列消化自己国土的做法，无异于慢性自杀。正因为如此，一场由埃、叙两国主导的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反攻也就在所难免了。

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有理由为现状感到不满。从双方的地缘实力对比来看，相信任何一个评估者在看地图时都会为阿拉伯世界的失败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人口数量几乎过亿，也算具有很强向心力的民族，居然被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民族打败，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纳赛尔才会认为，就算以成倍的损失和以色列进行消耗战，也应该有机会把犹太人给耗死。

对于以色列为什么能够支撑到现在，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纳赛尔其实心里也很清楚，那就是来自外部的干预。基于以色列存在的地缘政治价值，以及自身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以色列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不愿意把中东作为冷战对抗前线的想法，又使得苏联在是否全力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备战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在以色列政治上明显倒向西方阵营的前提下，阿拉伯世界应该是苏联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如果把中东变成代理人战争的主战场，苏联也同样有巨大的风险。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阿拉伯世界采用何种方式和以色列对抗，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排除外部干扰。即使不能让那些大国倒向自己，最起码也要让他们保持中立，让博弈在一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要做到这点，看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自从这个世界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阿拉伯世界就彻底丧失了和西方对抗的资格，同时也失去了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不过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工业化固然是阿拉伯世界的死穴，但同时也为阿拉伯人提供了另一项在古典时期所不具备的地缘武器——石油。阿拉伯人所掌握的石油对于这个世界有多重要，我想已经不需要花时间去论证了。

第三节 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影响西方对战争态度

如果阿拉伯人想将石油作为战术武器，影响大国态度的话，他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协调一致。就合纵连横这点来看，这其实是很困难的。首先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并没有处在阿、以对抗的第一线。也就是说，犹太人虽然伤害了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但并没有影响到那些产油国的国家利益；不但石油资源并非控制在一国手中，那些产油国是否能够共同对敌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公平的说，阿拉伯世界的凝聚力算是不错的。最起码在对抗以色列这个问题上，的确曾经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是毕竟这个民族目前是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客观上给了外部势力分化的机会。

而当大国们，特别是美国，把波斯湾产油国单独剥离出来，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重点经营时，阿拉伯联盟也就等于被人抓住死穴了。美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单独经营波斯湾产油国，已经是冷战之后的事情了。最起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人对于真主赋予他们的这些资源，还是充满着政治幻想的。也正是因为这张牌还没有正式发挥过作用，阿拉伯人才会心有不甘，认为自己绝对有实力把以色列人赶下海。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如果阿拉伯人威胁控制石油出口的话，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而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家的美国，同样也无法独善其身。

其实就产油国本身来说，即使没有以色列，他们与西方国家的“石油战争”也迟早要开打的。鉴于西方自殖民时代以后一贯的强势地位，各产油国的石油公司，有相当的股权是控制在西方国家手中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想办法通过非商业行为国有化的话，这些产油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资源被别人吸血。这种背景和埃及国有化苏伊士运河，并引发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背景是一样的。

比资源控制权更为重要的，还是资源的定价权。从市场的角度看，占据世界石油出口大部分份额的阿拉伯国家，应该在石油定价上更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原油的标价权也是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的。从利益争夺的角度看，标价权其实比控制一部分股份，要更容易获得利益。仅仅依靠一些数字游戏，就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财富坐上过山车。既然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博弈，是无法避免的。而现在又有了以色列这个现实的眼中钉需要拔掉，那和以色列有直接矛盾的埃及、叙利亚等国，与那些手握资源的阿拉伯兄弟，就更容易合力进行战术准备了。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正竭力协调，准备对以色列和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反击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就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了。这个成功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由此而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埃及人。在 1970 年 9 月 28

日主持召开阿拉伯联盟紧急会议后，突发心脏病离世，时年 52 岁。如果你相信伟人决定历史的话，那么纳赛尔的离世无疑对阿拉伯联盟是一个重大打击，也应该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实际上，历史走向并不是由某一位精英人物所决定的。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把握机会，而不是真的在创造历史。所以纳赛尔的离世，并没有影响阿拉伯联盟的既定战略，也没有影响到埃及作为阿拉伯联盟盟主的地位。

当然，如果你理解的“历史”，不是我说的“大历史”，而是那些以人物串连起来的人文史的话，那么纳赛尔的离世也的确改变了“历史”。最起码取代他领导阿拉伯联盟绝地反击的不会是他，而是他的继任者“萨达特”了。不过从历史轨迹来看，谁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并不重要，这场战争具体发生在哪一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如果没有主动发动一场将所有底牌出尽的决战，是绝对不会死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接任总统之位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准备的萨达特，只是碰巧在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完成一项历史任务罢了。

第四节 影响历次中东战争快速结束的因素

仔细研究几次中东战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战争的时间都特别短。除了双方都没有准备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打打停停的持续了半年时间以外，其它几次战争大都一周时间内就终结了主要战事。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也不过进行了不到二十天时间（1973 年 10 月 6 日——10 月 24 日）。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固然与双方的战略纵深、地形有关，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决定了战争的效率，那就是——武器。

由于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在杀伤力和远程投送能力上，都比之前有了质的突破。在这种技术背景下，一场高级别的战争，不仅能够迅速消耗掉战争双方的战争能力，更会缩短双方的战略纵深。也就是说，如果一方能够迅速取得军事优势（特别是制空权），让对方的核心圈（体现为政治中心、政治领袖等）直接感受到战争威胁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而如果政治家和国民不是一定抱着你死我活的决心的话，主战场的失利就足以让他们作出妥协的决定了。

在现代战争中，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涉，也更多的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由于阿、以双方都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不能自己制造武器，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军用物资，因此也为大国影响战争的走向提供了途径。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够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武器补给，谁就更有机会赢得战争。而大国对于交战双方的政治态度，也能够从武器供给的角度上看出来。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

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多么的重要。否则战端一开，你根本没有机会把你在人口、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连续作战的军事能力。一旦之前储备的军事物资耗尽，又得不到补充的话，即使你的体量再占优势，也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从这点来看，犹太人就看得比阿拉伯人清楚多了。最起码你现在能够在国际武器市场上，买到以色列出产的尖端武器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至于阿拉伯国家，除了石油和宗教极端主义者，估计大部分人想不到其他东西。

在阿、以双方热衷于通过战争解决矛盾时，这个世界是被一道铁幕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双方希望在政治、军事上获得支持的话，就必须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对这个双分世界感到满意的。一开始就和西方世界存在结构性矛盾的红色中国，以及因强烈的地缘矛盾导致交恶的中、苏关系，使得红色中国希望能够在在这个两分的世界，以“第三世界”为基础突围，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来。只是鉴于当时的实力所限，这更多表现在外交事务和经济合作上。具体到军事方面的全面支撑，也就只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少数几块实验田了。

以中东这种强度和广度的博弈来说，中国显然不是双方所考虑的后台。而中国所能够选择的，也无非是根据政治多数的原则，选择站在“正义”的阿拉伯人一方（要是犹太人有十几个国家，而阿拉伯人只有一个，“正义”的一方应该就是犹太人了）。如果不是以色列和美国那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阿拉伯国家并非不愿意让美国人来帮助自己。但现状是，他们如果想置以色列于死地的话，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苏联了。其实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如果有得选择，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中东再燃战火，因为那样会让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只是大国固然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需求，“绑架”小国进入自己的阵营。拥有地缘价值的小国，也同样可以“逼迫”大国成为自己的后台。

第五节 埃及逼迫苏联和欧洲持有利于己的战争态度

在逼迫大国提供支援的事情上，最先做出动作的是埃及。而具体的战术要求，就是要苏联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撑（当然也是要花钱的）。由于埃及和阿拉伯联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报复倾向太过强烈，苏联人当然清楚，埃及人这样做是为了重启战端。为了逼迫苏联做决定，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布局了。那场持久了三年多的埃、以消耗战，有一个战术目的就是让苏联人看看，自己的武器有多么落后。这显然会让苏联人面子上挂不住，要知道如果让那些游走在美、苏两大联盟之间的小国，对苏联的军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俄国人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武器出口的收益了。

上述做法的主要目的是逼迫苏联在提供军事支援时，能够毫无保留的把最先进的武器提供给参战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前提还是要苏联人肯铁心做埃及和阿拉伯联盟的军事后台。这点，就不是让苏联武器露拙就能做到了。最终让埃及人如愿以偿的，还是因为博弈中第三方的选择权。简单点说，埃及人向苏联人表示，如果他们真的不愿意帮助埃及的话，那么他们将别无选择的投入美国的怀抱。虽然苏联和美国已经达成交易，维持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现状，但如果埃及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那这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平衡，就等于把俄国人踢出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别无选择的必须帮助埃及进行战备工作了。

在搞掂俄国人态度之后，西方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了。埃及人倒也没有指望美国人会完全放弃以色列，站到自己的背后。不过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其态度却并非不可影响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地缘板块之一，欧洲人虽然在战略上已经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表示欧洲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了。毕竟双方只是盟友，而非一个国家。即使不能指望欧洲成为自己的后台，但最起码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保持中立，断绝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假如能够做到这点，不仅以色列无法从欧洲购买武器，即使美国在战争期间全力支援以色列，效率上也因此而打折扣。毕竟俄国人的飞机和舰船从黑海到地中海南岸的尼罗河三角洲，要远低于美国人横穿整个大西洋、地中海的距离。

要想逼迫欧洲人保持中立，用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威胁就不灵了，毕竟争夺世界的是美、苏两国。小弟们考虑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即使是欧洲这个副手级的小弟也不例外。如果埃及人威胁对欧洲关闭苏伊士运河，是个施压的办法。不过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毕竟上一次埃及人做类似举动，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事实上埃及人有更好的牌可以打，那就是“石油”牌。这当然不是说埃及人自己有油，而是他的阿拉伯兄弟们的地下藏着足以影响世界的石油。向欧洲发出断油的威胁，在后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不仅欧洲人在军事上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往来，其中立的政治态度，也使得战争期间的美国空军在支援以色列时，不得不选择非常精准的航线。以从随时可能对其发起攻击的北非阿拉伯国家，以及不想惹火上身的欧洲“中立”国家的领空中间，穿行而过。

在政治上搞掂苏联，中立欧洲以后，阿拉伯联盟在外交层面上已经扭转了劣势。接下来，一场阿拉伯人期待以久的复仇之战，就将正式上演了。

第六节 阿拉伯人选择赎罪日和斋月节发起进攻

“赎罪日战争”是以色列及西方国家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叫法，而阿拉伯

人则把这次战争叫作“斋月战争”。从攻击日的选择上看，我们也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的这次战略反击，计划得有多么的细致。作为犹太教最重要的节日“赎罪节”，犹太人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全天禁食；二是向上帝祈祷赎罪。很显然，犹太人在这一天的战斗力和防范心是最弱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将这一天作为法定假日，以使国民能够专心向上帝倾诉自己一年当中所犯下的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赎罪节这天也成为了以色列全年当中动员能力最差的一天。

既然萨达特他们清楚赎罪节是以色列的国家防御力最弱的一天，那么以色列的军事家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点。只是历史给了阿拉伯人一个很好的掩护，那就是这一天也正处在穆斯林的“斋月”当中。说起来，斋月和赎罪节其实是系出同源。其典故都来源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伊斯兰教中称“易卜拉辛”）。按犹太圣经（也就是基督教旧约）的说法，就是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杀子献祭。而亚伯拉罕到达了指定地点，并准备照做的时候，上帝相信了他的忠诚，并指示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祭，代替人类赎罪。这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的“替罪羊”一词的由来。

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由于将其与犹太教的切割点，放置在了亚伯拉罕之后，因此犹太人关于亚伯拉罕的记录也成为了穆斯林的记忆。不过作为拥有后发优势的伊斯兰教，其有机会在宗教影响力上更进一步。将“赎罪日”扩充为“斋月”就是技术上的一项改变。当然，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饿一天是没问题的，饿一个月估计也没命想问题了。所以除了和犹太人一样的祷告以外，穆斯林每日只是在日出与日落之间这段时间禁食。解读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亲缘关系，总是会让我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两句诗。不过这也不是这两教之间的问题了，但凡世人的关注点主要在意识形态上了，那些细微的差别都有可能導致分裂和对抗。真要解读这个问题，就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了。好在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只是从技术上分析一下罢了。

其实犹太教设定的赎罪节是在7月10日，而阿拉伯人的斋月则是在9月。如果这两个时间都是按照同一部历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他们永远不可以发生交集。事实上阿拉伯人在吸收犹太教教义的同时，也的确同时吸收了犹太人的历法“犹太历”。只是犹太历虽然是一部以月相为准的阴历，但也像中国的农历一样，会跟据太阳运行的规律进行修正，也就是定期把阴阳两历相差的时间，用闰月的形式补上。这样就使得历法本身，不至于误差太大（阳历是最贴合真实时序的，这两种历法算得上是“阴阳合历”了）。

问题是斋月的开始和结束，都以新月的出现为准。鉴于月亮有如此重要的指示作用，伊斯兰教本身并不允许出现用阳历来修正阴历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

伊斯兰历就成为了一部纯阴历。简单点说，就是一年只有 354 天多。其后果就是，斋月的时间在阳历当中，是在不断变化的，一年当中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出现在斋月当中。如果有谁对历法和数学特别感兴趣，可以去算一下赎罪日和斋月大概要多少年能碰到一起。我个人估计，萨达特应该不用去做那么多计算，因为他很容易发现，1973 年的斋月，可以和犹太人碰到一块。

应该这样说，即使斋月没有和赎罪日碰到一起，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两者能碰在一起，客观上也的确影响到了以色列对战争爆发点的判断。因为不管对于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非常神圣的日子，是向主诚心祈祷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应当尽力避免使用武力。基于这一点，以色列的政治家们在 1973 年，是有充分理由认为阿拉伯人应该不会在斋月发起进攻的。埃及人敢于在斋月发动战争，也验证了一个道理：尽管有的时候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显得凌驾于政治之上，但从本质上来看，意识形态始终是在服务于现实政治，或者说受制于利益的。

并不十分清楚，萨达特在选择发起“斋月战争”时，有没有考虑过宗教方面需要如何去解释。但后来的宗教极端分子，显然认可了这种做法，并从宗教方面为之找到了理论依据。即：如果是为了反抗“异教徒”压迫而发起的“圣战”，那么在斋月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在用行动向真主证明自己的忠诚）。从技术层面上看，斋月当中大量的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中集体祷告，也为试图用宗教的力量煽动武装暴乱极端分子制造了机会。正因为如此，对于驻伊美军来说，斋月往往成为了他们最为紧张的日子。

第七节 以色列对战争来临的误判

从战术层面上看，埃及在犹太赎罪日发起的这次攻击，是非常成功的，以色列方面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然，犹太人之所以误判，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斋月的原因。从战略层面上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做的“维持现状”的共同保证，是以色列失手的根本原因；而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所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也不可避免的让以色列人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在这种屡战屡胜的背景下，以色列人从心理上很难相信阿拉伯人胆敢主动发起全面战争。

以色列很快就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埃及和阿拉伯联盟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他们有了“石油”这张底牌。有了这张最有地缘价值的资源牌，阿拉伯人才能够在外交层面上，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站在自己一边，甚至包括欧洲都不得不和以色列进行切割。至于美国，阿拉

伯人也同样相信会有所顾忌。从地缘意义上说，第四次中东战争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石油之战”。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盲目相信仅凭体量，就能很快把犹太人赶下海的“独立之战”；到第二次中东战争，几方以争夺海权为战术目标的“海权之战”；再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双方为了水资源的控制权，而你来我往的“水资源之战”；直至这次以控制石油出口为外交底气的“石油之战”，阿拉伯联盟可以说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地缘牌。而在所有有战略意义的地缘牌中，石油控制权显然是攻击力最强，影响面最大的。

阿拉伯人有理由相信，在打出这张牌为阿拉伯人争取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后，以色列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很快就会被卧薪尝胆的阿拉伯联盟所击溃。只是反过来，如果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准备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那阿拉伯人也同样会丧失再战下去的信心。由于以色列的纵深问题，先发制人一直是他们的战术主导思想。只是正常情况下，没有谁会为了战争而战争的。先发制人的前提是，你必须预判出危险即将来临。依照以色列的动员能力，参谋们要求情报部门提供的预警时间是48小时。也就是说，犹太人只需要两天时间，就有把握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非常可惜的是，这一次埃及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色列方面直到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还在争论埃及人会不会真的有胆发动战争。

在现代战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话，是有可能在瞒过对方的情况下，将军队调至前线的。不过要想瞒天过海的话，战术上也不是没有办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演习之名调动军队。假如对方警觉了，进入战备状态的话，那么这就是真的演习；假如几次反复之后，对方松懈了，那么真正的攻击就开始了。在埃及发动攻击之前，类似的假动作就曾经多次进行。其实再严密的战术部署，也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判断战争是否将要来临时，主要依据的并不是那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而是那些战略性上的可能性。这就好像在德国入侵苏联，日本空袭珍珠港之前，苏、美两国都从多渠道获得了相关情报，但两国的政治家始终相信，如果对方理性的话，应该不会冒险与自己为敌。

单从战略层面上看，以色列人也认为，埃及人如果足够理性的话，应该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苏联的全力支持，埃及是没有能力发动战争的。而埃及方面虽然成功的用倒向美国的威胁，让苏联在军事上提供了援助；但基于不愿意看到埃及挑起战争的出发点，苏联在军援埃及时做出了很多保留。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联更倾向于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性武器。从这种做法中，以色列当然能够判断出，苏联并不希望埃及主动挑起战争。

关于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预判错误这件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答案。不管怎么说，一贯袭击他人的以色列，这次也终于尝到了被人突袭的滋味了。事实上，西奈半岛并不是唯一的主战场。即使没有阿拉伯联盟这个平台，被以色列侵占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也会成为埃及在军事上的盟友。也就是说，只要战争开打，以色列就一定会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其实从地缘结构上看，以色列更应该担心三线作战的。不过约旦虽然和以色列接触面最大，但实力也是最弱的。更重要的是，约旦并不像埃、叙两国一样，被以色列割取了大片领土，本身的战争欲望也要低得多。

就战争能力和战争欲望来看，不和以色列接壤的伊拉克，反倒要比约旦强得多。特别是伊拉克那兼具传统、现代地缘优势的结构，让革命上台的复兴社会党，也同样燃起了领导阿拉伯联盟的欲望。而要完成这个心愿，凸显自己与以色列的矛盾，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办法。

第三十章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石油之战

第一节 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

到底有多少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会直接参战，在战前是一个很难评估的问题。不过陆地攻击会从哪里发起，却是可以判断的。很显然，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一定是攻击的最前沿。也就是说，除非战争不爆发，爆发的话以色列就一定要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最终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埃及开始渡过运河向“巴列夫防线”发起攻击时，叙利亚人也同时向戈兰高地展开了军事行动。由于这一次阿拉伯人，终于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掌握了战术主动，以色列国防军在一开始的接战中，可谓是溃不成军。

好在一直缺乏纵深的以色列，在上一次战争中占得了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这两块从别人身上割下来的领土，也一如以色列军事家所设想的那样，为他们在战争中争取了时间。不过两线作战永远是这样的，除非你有压倒性的优势，否则一定要选择一边作为重点，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把主力集中在另一边。也就是说，要么北攻南守，要么南攻北守。以军事实力和攻击力来说，埃及无疑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方面在战术上应该先集中力量稳定住南线，再回头对付叙利亚。

不过从纵深的角度来看，如果叙利亚方面在戈兰高地取得突破的话，将可以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北部的人口、经济重心。别的不说，如果叙利亚人从高地上下来，破坏了加利利湖输水工程的话，以色列就受不了了。反过来，即使西奈半岛丢了，以色列国防军理论上也还可以在内盖夫地区逐级抵抗，争取时间。最终以色列还是选择了“南攻北守”的战术，即把埃及作为主要对手。所谓擒贼先擒王，把埃及拿下了，也就等于打掉了阿拉伯人再战的信心。另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在南线看似有足够的纵深，但在现代战争的技术条件下，那点纵深并不足以让以色列人感到安全。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问以色列人，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时间”。无论是从军事还是外交的角度看，以色列都需要时间来稳定阵脚，寻找反击的机会。在苏联被捆绑到阿拉伯战车上，欧洲迫于石油压力而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美国成为了以色列唯一可能获得外援的国家。与苏联的想法一样，美国本来也是希望以、阿双方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同时也忌惮于阿拉伯人的石油威胁，在是否支援以色列的时候犹豫过。不过随着阿拉伯军队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美国人还是下定了决心，全力支持以色列。毕竟如果以色

列人撑不住了，美国所期望的平衡也同样会被打破。

第二节 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战略意义

尽管美、苏双方的本意，是不想中东打成一个烂摊子，但从过程和结果上来看，第四次中东战争还是发展成为了一场冷战当中的代理人战争。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人这时已经制造出了核武器，一旦在常规战场上失败，面临灭国的危险时就玉石俱焚。美国人就是顾虑这点才全力提供军援，让以色列不至于被逼上绝路。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寄人篱下二千多年的犹太人其实很清楚，靠人不如靠己。要是自己手上没有杀手锏的话，保不齐哪天也有可能被人所出卖。

尽管不是很清楚，以色列方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是否真的向美国发出了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被默认为有核国家，客观上也的确减少了战争风险，为阿、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创造了基础。因为作为承受战略压力的一方，以色列的核武器很显然是保命用的，并无可能主动向阿拉伯国家发起攻击。如果阿拉伯国家不想和以色列同归于尽的话，那么在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再想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就很难成为战略目标了。反过来，以色列有了核武器这个终极保障，也有可能在地上作出一定让步，不那么强烈的把国家安全寄托在扩大战略纵深上了。

既然核武器成为了以色列弥补地缘劣势的终极武器，那么以色列和那些认为以色列存在合理的国家，就不可能让周边国家也拥有同样的能力了（说穿了就是逼迫阿拉伯国家在承认以色列的情况下进行和谈）。因为任何一个以色列的潜在对手拥有核武器的话，都会打破这种平衡，让中东重新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以色列在八十年代空袭了伊拉克的核设施；伊朗直到现在，仍然处在因为试图发展核武器而面临战争的风险中。

因为核武器而获得终极安全感，进而影响地区地缘平衡的例子还有很多。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代表世界主要政治力量拥有了核力量，客观上降低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如果没有的话，很难保证美、苏之间当时不会尝试更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而另两个“不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直想跻身一级大国行列的印度来说，它的核武器计划并非针对实力较弱的对手巴基斯坦（因为没核武器，他们也是优势方）。

只是大国们即使默认了印度可以拥有核武器，但从地区平衡的角度看，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却无疑是雪上加霜。正是出于维持地区平衡，牵制印度的需要，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也被大国们所默认了。而在巴基斯坦拥有

核武器这层终极保障之前，他们也曾经热切的希望从同属穆斯林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战略支持（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巴基斯坦就曾经派出空军前去助战）。

第三节 美苏在战争中对以埃双方的大力军援

回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话题，在美国的大力军援和情报支持之下，以色列军队终于在埃及的突袭之下稳住了阵脚。而以色列军队一直以来的“以攻代守”的战术，又一次的在战争当中得以体现。具体表现就是，以色列军队并没有把主力纠缠于西奈半岛，和埃及军队展开拉锯战，而是出奇兵从埃及防线的缺口处（这一发现要感谢美国的军用卫星）突破了苏伊士运河，将战火烧到了苏伊士运河的西岸。

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大大出乎了埃及方面的预料。按照萨达特的预估，只要埃及军队能够站上西奈半岛的土地，控制运河东岸，哪怕最终不能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巨大的胜利。而现在，以色列军队的做法，却让这条底线成为了泡影。也就是说，如果战争就这样结束的话，埃及固然能够重新控制西奈半岛的部分领土，但以色列方面也同样把触角，伸到了尼罗河三角洲。这显然对于埃及方面是不划算的。

并不是说以色列把战火烧到了苏伊士运河以东，就意味着埃及败局已定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场代理人战争。由于战争初期的战况过于激烈，双方所储备的武器弹药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谁能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取决于谁能够接受更多的外援。在美、苏双方都开足马力紧急军援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效率显然要更胜一筹。为了帮助以色列扭转战局，美国人甚至直接把空军正在使用的飞机，涂换成以色列空军的标志，然后由飞行员直接飞到前线交付给以色列人。其他武器大多也是运到之后，就马上能够投入战斗。

相比之下，俄国人在效率上就要差多了。武器落地之后，还需要埃及那些技术不太过关的专业人员重新组装。至于这种效率是不是跟“体制”有关，我倒没兴趣去研究。不过俄、美双方介入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而不是让自己所援助的一方，在战场上获得压倒性优势（那样只会让战争时间拉长）。在战争进行了两周多后，以、埃双方在美、苏两国的调解之下，同意停战。不过谁都知道，停战不代表和平，甚至不代表这次战争结束了。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双方就曾经打打停停，几次停火。因此为了维持双方的平衡，苏、美双方继续高力度的军援阿、以两方。

当然，如果双方达成默契都不援助的话，仗也不会再打起来。只是它们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国们热衷于外交干涉，无非也是为了利益，那些武器可是一大笔收入呢。由于美国在这两周多战争期间的空援效率实在太过精彩了（按当时美国总统的要求就是：把所有能飞到以色列的东西，都飞过去），给人一种误解，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是空中补给。不过从战略角度看，空中补给只是权宜之计，综合计算下来，美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紧急补给中，有九成的物质仍然是通过海路。假如埃及人有办法在海上取得优势的话，也同样可以让以色列失去战争能力。

有世界上最大的陆权国家“苏联”作后盾，埃及军队这一次在陆地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也让以色列人意识到，阿拉伯人并不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然而苏联的短板也很明显，那就是海上实力远不如美国。而这也间接影响到了埃、以双方的海上实力。虽说在之前的消耗战中，埃及海军利用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埃拉特号”驱逐舰，但在斋月战争开打之后，埃及海军的表现却差强人意。非但无法封锁以色列的海岸线，反而被迫固守于港口之内。

这样看起来，在美、苏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没有海洋控制权的埃及和阿拉伯联盟并无法彻底击败以色列。也就是说，无论埃及人怎么努力，哪怕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在美国仍然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战略上也改变不了现状。这一点，战后的埃及也看得十分清楚。

第四节 埃及战后和以色列的和解

当埃及人尽全力一击，用光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地缘牌也无法取得胜利后，萨达特也开始以埃及为本，考虑下一步的战略了。首先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上看，苏联人都不再被埃及人视为可靠的盟友了。既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么如果也同样和美国人站在一起，让美国来调解埃、以双方的矛盾，也不失一个选择方案。事实上，如果不是埃及执意要上位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话，双方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地缘关系来看，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地缘矛盾。西奈半岛完全可以用非军事化的办法，成为双方共同的缓冲区。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可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放弃了领导阿拉伯联盟，以及与以色列对抗的外交政策。转而开始以国家利益为重，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世界的带头大哥愿意率先和自己和解，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这最起码意味着自己今后，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了。虽然把西奈半岛这块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多少有些心有不甘。但以色列人也十分清楚，如果不把西奈半岛还给

埃及，和平是不可能到来的。既然战略缓冲和出海权，都能够通过政治协议来保证，又有美国居中调解，那么以色列如果还是一定要占着西奈半岛不放，也就有点不识实务了。

埃及的态度转变，无疑对阿拉伯联盟是一个重大打击。特别是对于与以色列还有无法调和矛盾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来说，更是一种出卖。事实上受到直接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巴、叙两国。以沙特为首的海湾石油国一开始也同样无法接受埃及的这种转变。它们之所以热衷于用石油禁运，来帮助阿拉伯联盟取得外交话语权，并非完全出于所谓的阿拉伯“民族大义”。从西方国家夺回石油话语权，才是终极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沙特以美国在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为由，联合了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发起了石油禁运，并由此酿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与埃及无关了。而埃及方面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逐出阿拉伯联盟。当然，在后来识实务的沙特家族和不识实务的萨达姆都被美国搞掂之后，回头再看埃及当年的决定，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唯一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就是做出这项重大决定的萨达特。被很多阿拉伯人视为“叛徒”的他，在埃、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的一次阅兵中，被几名士兵所刺杀。而随后上台的穆巴拉克，也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

尽管苏联解体之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都面对现实，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并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却至今仍然和以色列纠缠不清。基于戈兰高地的多重价值，如果让以色列人在它和西奈半岛之间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放弃面积更大的西奈半岛，而集中力量对付叙利亚。事实上无论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还是以色列的整体战略上，这一点都从未改变过。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取得军事主动权后，就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了。而这一次，以色列人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戈兰高地了。

第五节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交战

鉴于以色列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被动，以色列在战争预警和战争准备方面，可以说是设计得非常周密。这其中对于阿拉伯人是否会主动发动战争，就预设了一根战略红线。即叙利亚和埃及不会单独发动战争，而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埃及和叙利亚也不敢发动全面战争。最终以色列还是受到了阿拉伯联军的突袭，并不能说是这根战略红线有误，为了迷惑以色列，主要是因为埃及也看到了这一点，针锋相对的制造了战略假像。1972年7月，在战争前15个月，

萨达特宣布驱逐了所有苏联军事专家，并将苏联在埃及布设的所有军事设施收归埃及所有。这种做法，无疑向世人宣布，埃、苏关系不和。以色列方面做出战略误判也就情有可原了。

当然，萨达特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向以色列释放烟雾，更是为了向苏联方面逼宫，以让苏联放弃中立的态度。虽然在战争之前，以色列在埃、叙、苏三者的合作关系上做出了误判，但这条原则依然贯穿于后面的战争及以后的以、阿关系中。当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了西奈半岛的战局之后，叙利亚军队退出戈兰高地也就没什么悬念了；而当1978年，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之后，孤军作战的叙利亚，再想通过战争手段拿回戈兰高地，也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比于西奈半岛，戈兰高地最起码还有两点重要的战略价值不容以色列放手。一是高度上的优势；二是丰富的水资源。我们一直说，在古典时期高海拔地区对低海拔地区，天然具有军事优势。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现代战争中。与埃及军队同时发起攻击的叙利亚军队，最先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利用空降兵部队袭击了以色列在黑门山上的据点。在以色列控制这个制高点时，以色列军队在此布设的雷达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500公里以外的空域情况。从军事角度看，如果叙利亚方面试图用飞机或者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而如果这样做的是以色列，那么黑门山上的看守据点所威胁到的，就不仅仅是叙利亚的安全了。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也同样会因此而受到威胁。

正因为如此，以色列方面在进行反击时，派出了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并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夺回了黑门山上的据点。为了防止叙利亚军队从地面发起进攻，以色列重新登上黑门山之后，甚至破坏了上山的道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之前，对自己军事实力极端自信的以色列，想的只是如何维持住停火线。换句话说，那时的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都消化掉。不过埃及和阿拉伯联盟的绝地反击，终于让以色列的军事家们不那么自信了。政治家们则开始考虑南守北攻的新战略了。这一点，在战争当中的表现就是，在南线跨越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再试图向埃及腹地渗透，而是在取得了军事优势后，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调解；而在北线夺回戈兰高地后，以色列军队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大马士革前进，试图借机一举打掉叙利亚的战争能力。

这时的叙利亚，已经完全指望不上埃及了，为老阿萨德提供直接支援的，是伊拉克和约旦军队。在这场战争开打之前，已经十分忌惮以色列的约旦，在军事上一直处在观望当中。如果埃、叙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相信哈希姆家族也一定会从东线发起攻击，“收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很可惜，

现在战局已经发生了逆转。而如果叙利亚被以色列打垮的话，哈希姆家族即使没听过“唇亡齿寒”这句成语，也应该明白自己以后的战略处境有多么危险了。不过鉴于约旦的实力，以色列方面并不认为约旦的加入，会让战争的天平向阿拉伯方面倾斜。他们所真正担心的，是伊拉克。

第六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及在地缘政治格局上的影响

从地缘实力上来看，有石油之利的伊拉克要强于叙利亚，甚至不弱于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而在战后萨达特代表埃及用行动明确表示将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阿拉伯民族大义”为重。并由此放弃领导阿拉伯世界，及与以色列对抗之后，伊拉克方面也的确认为，自己当然的应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这种企图在萨达姆通过两伊战争做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后，变成越发明显。虽然萨达姆要在1979年才上任伊拉克总统（1973年是二号人物），但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实力却并非等到这位独裁者上台，才会体现出来。

在伊拉克、约旦两国出兵力保叙利亚之后，以色列在北线所面临的局面也变得复杂了。见好就收，成为了最明智的选择。而从战争的结果来看，这场倾尽了埃、叙、以三方国力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后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以色列在仍然占据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虽然从领土的得失来看，奋力一搏的阿拉伯人应该会非常失望，不过战争却还是极大的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以色列不再认为仅凭军事手段，就能压制住阿拉伯国家了；而阿拉伯方面也意识到了，通过战争手段逼迫以色列就范也成为了不可能。既然双方都明白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地缘平衡也就有了基础。

在阿拉伯世界里，就萨达特是否出卖了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一直存在着争议。从埃及的国家利益来看，前期通过斋月战争证明了阿拉伯军队的战力，战后又通过和平谈判手段收回了西奈半岛，因此萨达特应该算得上是英雄，或者说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从阿拉伯的民族大义上来看，萨达特的这种政治远见，也无疑会授人以柄。即使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后来都接受了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现实，叙利亚人也一定会一直耿耿于怀的。因为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与埃及实现和解的重要战略目的，就是分化埃、叙关系，让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叙利亚。而悲惨的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其实也不能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就一无所获。虽然以色列从战略上宁可放弃面积更大的西奈半岛，也不愿意放手战略价值更高的戈兰高地。但既然大家愿意以政治谈判的方式推进和平进程，占尽优势的

以色列就算是给居中斡旋的大国面子（主要就是美国了），也要适当做点让步的。至于这个让步有多大，又是否有损于以色列的地缘安全，我们后面再分析。所谓“谈判”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如果双方都不做出一点妥协的话，那这种“谈判”实质上也就不是谈判了。这就好像埃及虽然通过“谈判”拿回了西奈半岛，却又不得不在驻军权上做出让步一样。相比埃及，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能够得到的就要差得远了。

第七节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达成的停战线

就戈兰高地的范围来说，一直都有不同的数据。叙利亚方面认定的戈兰高地有 1800 平方公里。而现在通常被称作“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占领区，大约有 1100 多平方公里。其实是不是能够完全占领叙利亚所认定的“戈兰高地”并不是以色列所关心的。以色列所关心的是，自己是否能够把控制线跨过戈兰高地的制高点。事实上，由于这块高地的顶端起伏并不大，我们在地形图上很难找到戈兰高地的制高点。不过如果观察河流走向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找到整个戈兰高地的脊线——分水岭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争夺的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

由于戈兰高地紧邻着黑门山，戈兰高地本身的分水岭在军事上的意义会有所影响。因为在无法控制黑门山南麓的情况下，仅仅站在戈兰高地的高点上，在军事上仍然是无法掌控主动权的。以色列人之所以执着的要把势力线，推过戈兰高地的分水岭，说穿了还是为了戈兰高地上丰富的水资源。最起码，以色列的政治家会要求军事将领们在制定攻击计划时，要将戈兰高地上所有流向约旦河流域的河流，都纳入占领计划中。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军队就成功的越过了戈兰高地的分水岭，并将停战线向东推进到了高地的东麓。而这条停战线由于在当时的协议附图上，显示为紫色，因此也被称之为“紫线”。这其中最标志性的胜利，就是占领了戈兰高地的政治中心“库奈特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座城镇的位置，就会发现它恰好处在高地的脊线之上。

能够成功控制戈兰高地的脊线，并向东继续推进出一片缓冲地带，对于以色列来说，已经足够保障安全了。而这也为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对叙利亚方面所作出的“让步”，奠定了基础。当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不得不表态时，他们所作出的让步，就是把停战线退到戈兰高地的山脊之上。由于库奈特拉对于叙利亚来说，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所以在最后的谈判当中，以色列人也“大度”的把它交还给了叙利亚。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在 1974 年的停战线上，看到在库奈特拉这个位置上向以色列方向拐了一个弯。而这条

于 1974 年确定的停战线也维持到了今天。

以色列人所让出来的这条狭长地带，也并非不附条件的。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同样认为，自己和叙利亚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军事化的缓冲区。当然，按西奈半岛后来的情况来看，整个戈兰高地非军事化，应该会是最终的方案。只是现在，占据大部分戈兰高地的是以色列。作为胜利者，完全放弃戈兰高地的军事价值，是不被接受的。因此这个缓冲区被定在了 1967 年的停火线（紫线）和 1974 年的停火线之间，包括库奈特拉在内。这块区域，从行政权力上来看，目前归属于叙利亚，但叙利亚方面却不享有驻军权。

现在的问题是，这条缓冲带实在太过狭窄，很难提供足够的缓冲。如果有一方要主动发起进攻的话，这条最宽处不过十多公里的缓冲带，很快就会被机械化部队所穿越。而受到攻击的一方，并无法获得足够的预警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停战协议约定，由联合国出面，向以色列“让出”的这部分戈兰高地派驻维和部队，以隔绝双方可能的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叙利亚只是拿到了部分戈兰高地的“行政权”，而军事管理权，暂时由联合国代管。

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种设计还是其合理性的。最起码有维和部队在此驻扎，双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只是在叙利亚人看来，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分割叙利亚主权的前提下形成的，是绝对不可能作为终极方案的。然而在埃及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放弃与以色列对抗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现实也不得不作为叙利亚的权宜之计。既然叙利亚和以色列已经被隔离开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不愿意维持现状的叙利亚，就没有机会向以色列发起挑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叙利亚虽然无法从本土上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但却可以间接通过黎巴嫩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而这种做法，最终也导致了第五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第三十一章 黎巴嫩国内复杂的宗教教派结构

第一节 黎巴嫩复杂的教派结构形成的地缘背景

黎巴嫩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不断的出现，不过却从来没有详细解读过。无他，因为这个在中东国家中国土面积排名倒数第三的小国，一直要到第五次中东战争时，才会成为主角。其实如果不是犹太人那么执着的回到“迦南”之地，也许中东的风暴中心就是黎巴嫩了。比起巴勒斯坦地区来，黎巴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地缘结构的复杂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复杂性给黎巴嫩带来的影响，就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如果你问我去中东旅游最好去哪个国家，我会给你推荐黎巴嫩，因为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中东的天堂；如果你问我，要在中东生活一辈子的话，黎巴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会给你否定答案，因为我无法保证将来有一天，这个天堂会不会变成中东最恐怖的地狱）。

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有谁为了宗教问题而相互仇杀，并引发战争的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务实的中国人，基本是只会在吃不饱饭时才会想到揭竿而起，至于意识形态问题，那不是普通百姓所要考虑的。然而在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地中海文明区，教派之争却往往成为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因此一个地区的教派情况越复杂，潜在的战争风险也就越大。非常不幸的是，黎巴嫩正是中东教派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

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紧邻巴勒斯坦地区。靠着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三教圣地，让黎巴嫩比别的区域更有机会接受不同的宗教思想。只是这点虽然重要，却也不是造成黎巴嫩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就好像巴勒斯坦地区虽然是一神教起源的核心版块，但在犹太人“回来”之前，也同样和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已经是逊尼派穆斯林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就是说，靠近宗教起源地，并不是黎巴嫩地区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

从整体结构上看，阿拉伯半岛算是一个低海拔的板块，特别是对比它北面横亘着的那些一大片高原带时，阿拉伯半岛内部那些被标注为“高地”、“高原”的地理单元，就真的不算什么了。不过一定要在阿拉伯半岛，找片高地做“阿拉伯屋脊”的话，平均海拔有 2000 公尺的黎巴嫩山脉、前黎巴嫩山脉无疑是第一候选人。事实上黎巴嫩这个地缘标签，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通常就是跟山地（山区）联系在一起的。就好比大家一提到伊拉克，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河平原一样。

所谓有山就有水，在阿拉伯地区能够有高大山脉拦截水气的山脉，绝对可

以算得上是有福。特别是黎巴嫩的这两条山脉，靠近的是有西风吹过的地中海，更让它的沿海平原，有机会得山、海之便，在受益于高山之水的时候，还能享受地中海的阳光。当然，这种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只是让黎巴嫩地区有机会成为人口密集区。而真正让黎巴嫩教派结构错综复杂的原因，是它复杂的地形。

从地形的角度看，当你想在阿拉伯半岛寻找一片世外桃源的时候，黎巴嫩山区会比那些荒漠化的低地要更为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在中东穆斯林化的进程当中，那些被主流教派边缘化的教派，在历史上纷纷选择了在黎巴嫩山区寻找避难所。也可以说黎巴嫩的复杂地形，让生存其中的“异教徒”们，更有机会延续自己的族群和教派。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东和阿拉伯人当中，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主流教派则是“逊尼派”。从宗教的角度看，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属于“异教徒”；而从伊斯兰教内部的差异来看，“什叶派”则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至于说这两个“异端”，究竟那一个更不为逊尼派社会所接受，倒不一定，关键要看谁对他们的威胁更大。比如现在波斯湾那些坐在油桶上的君主们，宁愿选择让异教徒的美国人来保护，也不愿意和什叶派的波斯人达成和解。

不管怎么说，什叶派和基督徒肯定都是阿拉伯主流社会所不待见的群体了。经历了上千年的地缘博弈，地形复杂的黎巴嫩山区，也“不约而同”的成为了这两个倍受排挤的群体的天下。至于犹太人，倒是把视线投向了更为遥远的欧洲，而没有试图在黎巴嫩山区寻找落脚点。不过当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后，同样直接影响了黎巴嫩地区的地缘结构。

第二节 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与欧洲基督教的接触历史

假如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宗教的话，应该可以为黎巴嫩山区的各种教派列出一长串名单来。现在的话，我们只需把视线集中在那几个主要“异端”身上就足以解读黎巴嫩的地缘政治结构了。这几个“异端”分别是：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马龙派、德鲁兹派。当然，和所有穆斯林地区一样，以正统自居的“逊尼派”穆斯林，也同样在黎巴嫩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重要一席。

在阿拉伯半岛，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黎巴嫩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教派：基督教马龙派。与很多小教派一样，历史上马龙派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并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包括后来的所谓“新教”）。在教派地位上，应该是与这三大基督教派并列的第四大教派。说起来，马龙派比现在那些自立门户的教派要更有资格这样声称。因为所谓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在公元1024年正式分

裂的。而早在公元五世纪，马龙派便已经开宗立派，并在大叙利亚地区传播了。只是在公元七世纪，马龙派正式形成教会之时，席卷中东的伊斯兰教也已经被穆罕默德创立出来了。在伊斯兰教的重压之下，马龙派能够在黎巴嫩山区保存自己的教团已经要拜地形所赐了。也正是因为缺少发展的空间，现在全世界的马龙教徒加起来也不过四百万人，其中留在黎巴嫩的差不多一百万人。

当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狂热的希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时，能够在紧邻圣地的黎巴嫩山区发现基督教徒无疑是一件让他们兴奋的事情。而这些饱受穆斯林排挤，被迫躲在山区的马龙教徒，自然也非常欢迎这些十字军的到来。虽然欧洲基督徒在中世纪的那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条克建立的几个基督教小国，也被穆斯林所消灭，但黎巴嫩复杂的地形，还是为马龙派（也包括其他基督教派）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使得他们在遭受报复性清洗后，依然能够保存一定的人口规模，并持续在黎巴嫩山区发挥重要影响力。

马龙派和生存在黎巴嫩山区的其他基督教派，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为他们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们自己有力量对抗穆斯林世界，而是因为那些他们的那些欧洲教友们开始以一种决定性的优势重返中东了。在这些欧洲人当中，对于黎巴嫩基督徒的命运起到直接影响的就是法国人了。法国人和黎巴嫩基督徒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之前。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一直视自己为欧洲中心的法国，当然会对被异教徒所占据的圣地更感兴趣。而马龙派这种生活在“敌人”心脏，具有地头蛇性质的基督教派，无疑是一种战略资源。

从马龙派的角度来看，尽管历史悠久，并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教派，但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已经被一分为二切割的情况下，选择哪一方作为自己的后盾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西罗马帝国出身，被祭司阶层控制的“天主教”；以及东罗马帝国，集皇权神权于一身的东正教，虽然同属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小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就多次出现过假途伐虢，顺手把东正教城市劫掠一番的情况。从所处的地区来看，马龙派应该是属于东正教的辐射范围，也和东正教一样，明显融入了很多东方宗教的基因；但从教义来看，却又和天主教有些类似。说到底，选择和谁联宗，还是要看现实的利益了。不过很快，马龙派就不用为这事头疼了。

因为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不仅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并且把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更让东正教在他们的传统势力范围一蹶不振。如果不是一直被西欧视为野蛮人的俄国人接过了东正教的大旗，并据此来取得和西欧平起平坐的宗教、文化地位的话。东正教估计也就成为一个二流教派了。只是对于马龙派来说，身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俄国人就是另一个

世界了。相比之下，同属地中海地缘圈的天主教区和法国，地缘关系要相对紧密得多。18 世纪，马龙派终于下定决心，归宗于罗马教庭，名义上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支派。而这种宗教上的“明智”选择，也让马龙派在 20 世纪初，得以变现为政治资本。

第三节 法国将黎巴嫩从大叙利亚分离出来并让马龙派主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天主教背景的法国人成为了大叙利亚地区的新宗主。虽然让这个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来管理自己，让很多阿拉伯人感到不舒服，但对于马龙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问题是这时的马龙派总人口也不过 20 万人，加上叙利亚境内的其他基督徒，也只有几十万人。相比叙利亚境内接近千万的穆斯林来说，这个数量无疑不足以使马龙派拥有政治发言权。也就是说，单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法国人如果想扶植马龙派在叙利亚上位的话，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的法国来说，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某块殖民地上找到自己的“教友”才能展开统治的。殖民者完全可以利用被殖民地原有的内部矛盾，遵循“少数派原则”原则的方式，让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形成平衡。就好像在叙利亚地区同样被视为异端，而被迫躲进西亚裂谷带山地的“阿拉维派”，被法国人培育成军事代理人一样。殊途同归的是，孤独的阿拉维派在步入政治舞台之后，也想办法为自己的“什叶派”身份正名（之前一直被其他什叶派，认为是异端的）。以期凭借宗教属性，获得外部政治资源。而这个资源，就是以什叶派盟主自居的伊朗了。

虽然殖民统治并不一定需要有天然的同盟者作为支撑，但放着马龙派这样好的资源不用，也着实可惜。特别是在黎巴嫩山区还有亚美尼亚基督教、东正教等一些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加起来能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虽然在整个叙利亚地区，基督徒的数量微不足道，但在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黎巴嫩地区，基督教还是有相当优势的。如果法国人希望在“法属叙利亚”扶植自己忠实的盟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当中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再以“民主”的名义，让人口占据优势的的马龙派掌握黎巴嫩政权。这样的话，不仅让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拥有了一个国家级支撑点，更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在阿拉伯世界打下了一颗钉子。这个和日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地缘意义，是一样的。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马龙派成为了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巴嫩取得完全独立后，用宪法的形式把马龙派的政治主导权固

定了下来。这个政治主导权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黎巴嫩的总统必须由马龙派担任，而军队的控制权也是在马龙派手中的。当然，毕竟黎巴嫩是处在伊斯兰世界中，境内穆斯林也拥有半壁江山。所以作为平衡，议长和总理就分别由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了。至于其他的小教派，则根据 1932 年的官方人口普查，依比例分配议员一类的政治职位。要说这种根据人口比例、教派结构搞出的“三权分立”模式，在内部结构复杂的黎巴嫩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这点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奇怪，因为看到那张《黎巴嫩教派分布图》的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基督教和穆斯林犬牙交错的格局，像极了阿、犹太分治时，联合国为未来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分割的那张地图。而且和巴勒斯坦地区只有犹、阿两族的矛盾不同，黎巴嫩地区的教派情况则要更为复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又可细为实力相差不大，可能互不买账的小教派。也就是说，是不是依靠权力平衡就可以达到内部稳定呢？

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因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时间来有针对性的改变内部结构不同。黎巴嫩各教派的博弈，已经进行了上千年。而像马龙派这种古老的基督教派，甚至比穆斯林到达黎巴嫩山区的时间还要早。这种经由时间考验的地缘格局，虽然不可避免的仍然有矛盾存在，但最起码一点，大家都已经正视了对方的存在。不会像立国之初的以色列一样，被阿拉伯人视为突然插上一脚的外来户，必欲赶尽杀绝（现在也算经受了时间和战争的考验，从国家层面上基本被阿拉伯人认可存在了）。

第四节 黎巴嫩各教派人口比例变化使权力分配失衡

事实上，黎巴嫩地区的这些地方教派放在叙利亚这个大池子里，都算不上什么。法国人将黎巴嫩独立出来，也等于提升了所有教派的政治地位。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有大国愿意居中调解，并按照貌似公平的原则帮助制衡，并非没有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黎巴嫩成为了中东最开放，文化也最多元化的国家，贝鲁特也成为了“中东的巴黎”。如果你希望看到阿拉伯血统的美女，又不想只看到一生长袍的话，黎巴嫩会是最好的选择。在贝鲁特的海滩上，旅游者们能够看到和欧洲一样的风景。当然，这些美丽的风景肯定都是黎巴嫩的基督徒所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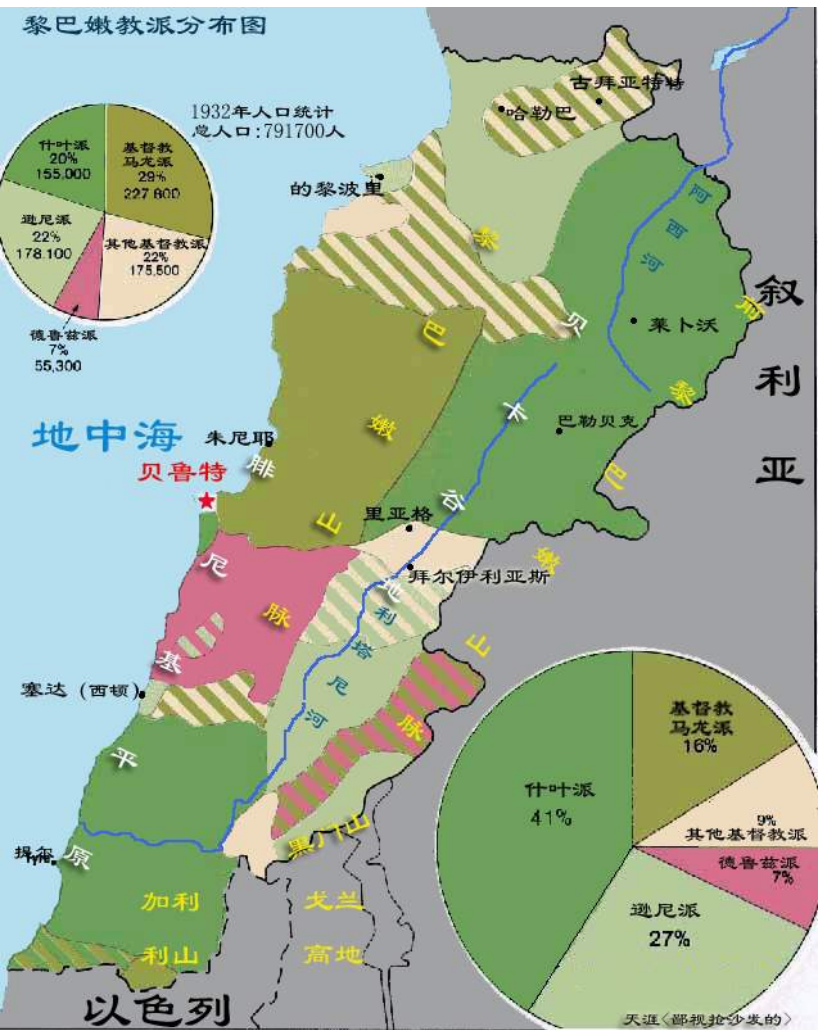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尽管按照最初的设计，基督徒主导了黎巴嫩的政治。但这个国家的法律属性还是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了，毕竟你的周围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不想和以色列一样成为人民公敌的话，最好的选择还是成为阿盟成员。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犹太人后来主动承担了打入阿

拉伯世界的“契子”的战略任务，黎巴嫩并非没有可能被再次分割设计出一个基督教国家来。

公平的说，抛开法国人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割出来的意图不说，单就它为黎巴嫩内部设计的政治架构来看，还是合理的。这种依据各教派人口分配政治权力的做法，也算得上是公平。至于马龙派掌握了最高权力，从小环境看，是因为他们有相对多数的优势。这个优势所换来的政治权力，也算是马龙派在黎巴嫩山区坚持 1000 多年的回报吧；而从黎巴嫩所处的大环境来看，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虽然在黎巴嫩占据了多数，但在整个中东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基督教派掌握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也很难利用这点来打压穆斯林教派。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会在阿拉伯国家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引火烧身。反过来，如果黎巴嫩是穆斯林教派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基督教派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在黎巴嫩独立之初（1943 年），法国人居中协调的政治方案，是以 6：5 的比例在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中分配权力（主要是议员席位）。而所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则是在 1932 年做出的。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分配方式还是符合

双方人口比例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相比基督教群体，穆斯林的生育率要明显胜过一筹。更为致命的是，黎巴嫩是被穆斯林世界所包围的。这种压力感加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诱惑，使得黎巴嫩的基督徒在基本没有迁入的情况下，大量外迁（特别是在后来战乱爆发后）。而反过来，流入的人口中又基本都是从周边地区移民过来的阿拉伯穆斯林。这种差异，导致黎巴嫩的人口比例很快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由此而引发了政治动荡。



黎巴嫩教派分布图

对于黎巴嫩现在的人口

结构究竟如何，各教派所占的比例有何变化，一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官方数据。因为自从 1932 年那次由法国人主导的官方人口普查结束，并据此来分配基督教、伊斯兰教派的政治权力后，黎巴嫩就再也没有做过人口普查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掌握政治主动权的马龙派也清楚自己和其他基督教派所占的人口比例在逐年下降。一旦有官方的数据出炉，那么按照黎巴嫩立国之初所确立的政治权力分配原则，黎巴嫩的政治主导权被移交给什叶派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按照非官方的统计，什叶派已经占据了黎巴嫩总人口的 41%，逊尼派则为 27%，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加起来也只有 25% 了。如果加上德鲁兹派这个也经常被划入什叶派阵营的“特殊”教派（7%），什叶派已经占据了黎巴嫩差不多一半的比例（德鲁兹派为什么特殊，我们后面会分析到）。这个比例足以让黎巴嫩面临变成一个“革命”的什叶派国家的风险，就像伊朗现在的情况一样。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风险，所以尽管黎巴嫩目前的政治权力分配，已经明显与人口结构不符，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并没有施压试图改变这点。即使是这次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西风是那么的猛烈。也没有看到西方和海湾国家义愤填膺的指责黎巴嫩的政治现状。

当然，相比建国之初，黎巴嫩目前的政治结构也不是没有作出调整。1989 年，在阿盟的居中调解之下，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通过协商，签订了“塔伊夫协议”，议定将议会席位调整为 5：5 的比例。从法律上让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平等分享黎巴嫩的政治权力。不过这个比例仍然与实际人口比例相去甚远。可以说，随着“民主”之风在阿拉伯世界越刮越盛，有关政治权力分配的博弈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节 约旦对以色列和解对其境内巴勒斯坦难民的影响

博弈大体上可以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像 20 多年前，黎巴嫩各派坐下来商谈出个结果来的情况，自然算是文斗了。只是大部分时候，人类更热衷于以“武斗”的方式来解决。即使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和解，也往往是在武斗没有结果后，才会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像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各教派能够坐下来重新调整权力架构，是在之前历时 16 年的黎巴嫩内战（1975 年——1990 年）无果的情况下才得以展开的。

当政治权力分配与人口结构严重不符时，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让享受超额权力的一方主动让出自己的政治权力。不过凡事总是有导火索的。黎巴嫩爆发内战的导火索，却是由于境内的“外国人”——巴勒斯坦人所点燃的。而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似乎又可以归结到犹太人头上了。

我们知道，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之后，以色列就已经占据了全部的巴勒斯坦地区。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政治家们如果还抱有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的话，就只能栖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当中的政治、军事组织，最好的栖身之处就是约旦了。实际上，约旦也容纳了最多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允许巴勒斯坦的军、政组织在约旦境内活动。

约旦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份责任，说穿了是因为在哈希姆家族心目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是一体的，都是属于哈希姆王国。尤其是在约旦已经通过法律手段正式将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的背景下（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只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在战场上的强势表现（包括他们所获得的外部支持），以及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实际上已经让约旦绝望了。尽管这时的约旦河西岸，名义上还是属于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但很明显，哈希姆家族已经不对跨过约旦河抱任何希望了。

如果说埃及主导对以战争的动力，是要争当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话，那么约旦之前之所以这么热心，所图的无非就是将巴勒斯坦纳入哈希姆家族的势力范围。既然现在这种期望已经成为了水中月，那么约旦就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对以关系，以及如何处置那些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兄弟”了。当巴勒斯坦人不再被视为国王的子民时，他们的地位很快就变得尴尬了。对于哈希姆家族来说，能吃下巴勒斯坦固然是好事。吃不下，也可以放手回去经营外约旦。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巴勒斯坦地区却是自己生长的家园。他们可以不在乎国名是什么，统治者是谁，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无法割舍的。

事实上，有调查表明，如果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现在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难民甚至已经愿意接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了。只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最起码以色列方面会有顾虑，如果接受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以色列公民，会稀释掉犹太人的比例，从而影响到以色列的政治稳定。以色列的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此之前，黎巴嫩的基督教派就已经感受到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的威胁了。

第六节 巴解组织被约旦赶出后进入黎巴嫩

虽然埃及是最早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1979年），并一度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叛徒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约旦是阿拉伯阵营中第一个崩溃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实际已经让约旦不再对“帮助”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抱有希望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只是让约旦更加相信阿拉伯人无力对抗有

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罢了。正是因为约旦的这种“先知先觉”，让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间就开始激化。

以约旦为基地，频频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和已经决定脱离泥潭的约旦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武装对抗。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镇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直接加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因为一直以强硬面目示人的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正是在召开阿盟紧急会议，调解双方矛盾时突然离世的，去世时年仅 52 岁。如果纳赛尔还在的话，相信亦无法改变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不过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也许就要推迟几年了。

在约旦决定把“巴勒斯坦”武装和政治机构“请出”约旦后，巴勒斯坦人显然需要另寻一个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显示存在的国家作基地了。从地缘关系来看，与以色列接壤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有约旦的前车之鉴，埃及和叙利亚显然也对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这个烫手山芋感到头疼。一方面无论是出于阿拉伯“大义”，还是自己的利益需求，埃、叙两国都不可能像约旦那样，简单的把巴解组织推出去（三方都跟以色列有领土问题）。在这种权衡之下，实力最弱，发言权最小的黎巴嫩就成了牺牲品，为阿拉伯国家承担了接收巴勒斯坦武装和解放组织的重任。

如果说在约旦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武装最感到头疼的是哈希姆家族，那么等他们到了黎巴嫩后，就该执政的马龙派头疼了。一方面以黎巴嫩南部的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活动的巴解组织，不可避免的把以色列的注意力引到了黎巴嫩境内；另一方面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起，到巴解组织生根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已经前前后后接收了 40 万的巴勒斯坦难民（那时的马龙派也不过这么多人）。完整的军、政结构，以及人口基数，足以在百万级人口的黎巴嫩打造一个自行其事的国中之国来。对于这个风险，急于送“瘟神”的哈希姆家族是最有发言权了。

第三十二章 德鲁兹派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特殊作用

第一节 德鲁兹派的产生过程和其异类的身份

相比哈希姆家族的顾虑，马龙派对入境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因为在经历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谁心理都清楚，想把以色列灭了，把巴勒斯坦人送回家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流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最终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需要所在国消化掉。可以想见，如果黎巴嫩日后被迫消化掉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会对原有的人口结构产生多大影响。这显然不是马龙派所愿意看到的。

尽管马龙派在黎巴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地头蛇，并且在立国之初，对比其他教派拥有相对的人口优势。但马龙派心里也很清楚，人口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你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政治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了。这一点，曾经在黎巴嫩地区和马龙派两分天下的“德鲁兹派”，应该是最有感受的了。在黎巴嫩的历史上，盘据北部山区的基督教马龙派和以南部山区为根基之地的伊斯兰教德鲁兹派，曾经是黎巴嫩地区地缘博弈的主角。在19世纪中叶，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奥斯曼帝国甚至将黎巴嫩分割为两个省，北部由马龙派管理，南部由德鲁兹派治理。

不过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了末路，真正在幕后主导局势的是法、英两国。基于历史和宗教关系，法国人当然选择成为了马龙派的强援；而英国人如果想在黎巴嫩有所作为的话，就只能选择当时唯一能和马龙派抗衡的“德鲁兹派”了。单就战略联盟的基础来看，显然法国人和马龙派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稳固，这也成为了法国人在一战后建立法属叙利亚的一个信心保证（相应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培植了犹太人牵制阿拉伯人）。而德鲁兹派和英国人之间却谈不上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基础，最终也被英国人放弃了。

之所以说英国和德鲁兹派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基础，并非仅仅是因为德鲁兹派是一个穆斯林教派。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样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有重大利用价值）。只是就这点来看，却是德鲁兹派的劣势。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德鲁兹派本身就是一个异类得不能再异类的教派，你几乎没有可能以和德鲁兹派的盟友关系中获得超额的利益。而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有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或者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德鲁兹派的异类首先表现在它的出身。这个在11世纪初，由一个正德皇帝（明

朝朱厚照)式的哈里发“哈基姆”(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所创立的教派,其教义是出自什叶派,因此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从常理分析,这位哈里发并没有动力创造一个新的教派。因为根据教义,谁担任了哈里发,谁就是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也即拥有了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只是这个最高权力其实是阶段性的。其权力和影响力,也会随着政治交替而消失。

很显然,这位离经叛道的哈里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领袖和名义上的宗教领袖。因此这位没事就喜欢微服私访,一个人骑着毛驴在荒野闲逛的哈里发(后来也是在一次闲逛中神秘“消失”了)。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最高的宗教定位,以永远的存在于臣民的记忆中。所以在哈基姆的设计中,自己才是真主在世界是唯一的代理人,或者说是真主的化身。即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只是隐遁了(隐遁伊玛目)。这种相当于把自己神化的做法,当然不能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所接受。无论是认为最高宗教权力可以归属于世俗政权领导者的逊尼派,还是认为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阿里后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根本区别就是,教权高于政权,祭司阶层可以以宗教的名义控制政权),都不会接受这点。

这位开宗立派的哈里发,对伊斯兰教的改造还有很多。比如不建清真寺、秘密传教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这些离经叛道之举更加使得德鲁兹派的教义,不容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不过老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以哈基姆“哈里发”的身份创立一个新教派,还是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的。而这些德鲁兹派教徒在备受排挤之后,最终也和同样被边缘化的马龙派、阿拉维派一样,选择了在西亚裂谷带的山地中繁衍生息,并借助山地的保护,将香火延续至今。

第二节 德鲁兹派忠于所在国的奇特教义

与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小社团一样,德鲁兹派能够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生存至今,也得益于他们内部的团结。其中秘密传教,不得向外部透露自己教派信息的封闭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相比其他的宗教派别,德鲁兹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规,使得他们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够在中东政局中发挥超乎自己体量的影响力。这个与众不同的信仰,甚至使得他们在和有法国人支持的马龙派,以及有更多外来人口补充的什叶派、逊尼派的竞争中落败,被迫大批迁出黎巴嫩南部山区后(到法国人正式入主叙利亚之时,就只有7%的比例了,现在差不多也是这比例。在黎巴嫩,只能算是二流教派),仍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阿以关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

又是如何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

有人问了，德鲁兹派的特殊之处，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加入军队？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有德鲁兹派分布的国家，出身德鲁兹派的军人都在军队中发挥着超乎其人口比例的作用。这其中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死对头——以色列。并且德鲁兹人的整体军事素养也要高于其他族群。在叙利亚军队中，德鲁兹人被阿拉维派视为可以依赖的伙伴，可以进入军队核心圈，以及掌握高科技和重武器。而在以色列，总人口不过数万的以色列籍德鲁兹人，在军队中也素以优秀军人闻名，并且有很高的忠诚度。

能够在中东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生存千年，德鲁兹人依托封闭的宗教、部族文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重视提升自己成员的战斗力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被所有人视为异端，又缺乏外援的他们，如果没有尚武精神是没有办法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至今的。比较奇怪的是，德鲁兹人能够在矛盾重重的阿、以国家都得到重用，这就不是部族文化中所带的军事基因所能解释的了。实际上，这种奇怪现象源自于德鲁兹人的另一个宗教原则，那就是忠于所在国家。也就是说，无论德鲁兹人流散到哪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何属性，教义都要求他们必须忠于所在国。

对于被所有人视为异端的德鲁兹派来说，这条原则的确定，与以前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到哪个国家都只顾埋头赚钱，为统治者创造财富，不试图影响所在地政治、社会结构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做法，也让所在国的统治者看到了他们的价值所在。不过这种不管意识形态，只问谁当政的做法（是不是有点眼熟？），除了让那些自视正统的穆斯林教派所不屑以外，也让德鲁兹人自己遭遇到了困惑，那就是有可能在战场上，出现兄弟相残的现象。我们之前也说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黎巴嫩山区的地缘格局，基本上是马龙派控制北部，德鲁兹派控制南部。

而那些统治黎巴嫩地区的外部势力，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的港口上（腓尼基平原）。由于山势的作用，黎巴嫩山脉的西侧沿海地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记忆中最早的一条海洋文化带。在此诞生的腓尼基人，曾经在北非开拓了迦太基文明，并成为罗马人最大的敌人。

第三节 以色列重视德鲁兹人并让其加入以军队

有人问了，黎巴嫩山区的体量比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小太多了，为什么还能生存下这么多异端？其实这就是一个费效比的问题了。一般情况下，外来势力能够直接控制黎巴嫩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又能羁縻控制黎巴嫩山区

的那些少数派教派就足以获得最高利益了。特别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控制黎巴嫩地区时间最长的阿拉伯人政权，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热衷于拓展宗教版图。在伊斯兰教的扩张中，向那些异教徒差别化的展示政治、经济待遇，才是伊斯兰教能够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当你因为所信仰的宗教不“正统”，而被课以更高的税收，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圈时，很少有人能够不做出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躲在山中形成自我循环、繁衍生息，较少的介入主流社会的食物链，也是马龙派、德鲁兹派这些异端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边缘化的生活，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德鲁兹人也好，马龙派也罢，都不可避免的会被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稀释掉。像马龙派和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基督徒，很多现在就已经移民至欧美。好像乔布斯的生父就是来自于叙利亚，由此很多人也把乔布斯和伊斯兰教扯上了关系。认为让一个穆斯林的后代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其实有很大可能，乔布斯的生父是一个从叙利亚移民的基督徒（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背景，只是推论）。

回到德鲁兹派的问题上来。由于德鲁兹派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包括现在以、黎交界处的加利利山脉。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境内，也不可避免的有了德鲁兹派的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来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德鲁兹派这种在哪国就忠于哪国的原则，是持欢迎态度的。加上德鲁兹人具有的军事素养，使得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享有同等的军事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一样，有义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服兵役。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义务”，要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权利，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权利。德鲁兹人也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失望，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

尽管根据自己的教义，以色列德鲁兹人这样做并没有问题，但他们穆斯林的背景，还是让他们承担了叛徒的骂名。对于尤为感到尴尬的，是那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德鲁兹派。为此，叙利亚的德鲁兹派就多次呼吁，以色列的德鲁兹人不要加入以色列军队。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此重视德鲁兹人，却并非单单看中他们军事素养及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的价值取向。德鲁兹人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缘价值，才是以色列人试图将德鲁兹人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主要目的。

第四节 以色列争取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派居民人心

虽然黎巴嫩山区是德鲁兹派用来避世的重要根据地，但这片山地并非德鲁

兹人唯一的根据地。在叙利亚的南部与约旦交界处，德鲁兹人在历史上还经营了一片山地——德鲁兹山。德鲁兹人在此生存的时间，并不比他们在黎巴嫩山区要短。在法国人思考如何统治叙利亚地区时，他们最开始的计划其实并不仅仅是把黎巴嫩分割出来，而是根据各叙利亚各地区的教派差异，将整个叙利亚分割为了五个独立国家（1920年后）。其中就有以德鲁兹山区为核心的“德鲁兹国”。只不过除了基督徒占据主导地位的黎巴嫩以外，其他分割出来的四个国家并不买法国人的帐，很快便迫使法国人改变了决定（1922年），重新统一了除黎巴嫩以外的叙利亚。

其实法国人设计这套方案，主要就是为了分割黎巴嫩了。只是单把黎巴嫩分裂出来指向过于明显。当然，如果叙利亚其他地区真的愿意分裂成几个小国，法国人倒也乐于看到他们互相牵制。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所能够发挥影响力和分化的，主要就是加利利山区的德鲁兹人了。至于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区的德鲁兹人，即使没有穆斯林的背景，也会按照同样的原则忠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德鲁兹人给以色列所带来的特殊地缘价值，并非指的是指望他们来分化拉拢阿拉伯国家中的德鲁兹人。其真正的价值，是体现在戈兰高地的争夺上。

从地理位置上看，戈兰高地正好处在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中间，而从地缘结构上看，戈兰高地无疑也是德鲁兹派两大根据地的连接枢纽。当以色列试图染指戈兰高地时，他们就会发现高地之上的两万多居民都是属于德鲁兹派。对于现在实际控制戈兰高地大部的以色列来说，能够在戈兰高地上遇到德鲁兹派，要好过遇到其他穆斯林教派。相比其他穆斯林，德鲁兹派的边缘性和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派所享受的“公民待遇”，让以色列对于“策反”这些德鲁兹人充满了希望。为此，以色列人向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开出了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以使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国籍。不过这种做法，无疑也让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人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经常向叙利亚方面表明自己的忠诚。

就现在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原住民来说，老一辈受叙利亚“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居民，从心理上还是认同叙利亚，并愿意与以色列人划清界限的。只是从出生之后，便接受以色列人管理的年青一代，却更向往以色列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了。对于这一点，以色列方面当然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如果戈兰高地就这样被以色列一直控制下去，时间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要知道，在现代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争议领土上居民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了）。如果有一天打起国际官司来，叙利亚方面当然可以提出，以色列在战争之后移入戈兰高地的那些犹太人，不应该对戈兰高地的归属有表决

权。

但如果土著的德鲁兹人最终也心向以色列，那么情况就十分不妙了。当然，所谓“民族自决”原则究竟能不能用，要怎么用，其实还是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大国的态度的。只是从这两点来看，以色列显然就更有优势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将会成为叙、以博弈的焦点。不过在黎巴嫩，他们现在虽然还是作为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存在，但已经无法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了。在 1970 年被约旦国王赶出来的巴勒斯坦武装开始以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经营独立王国后，黎巴嫩内部政治博弈的焦点也随之放到了这些“外国人”身上。而一场席卷黎巴嫩各派，持续时间长达 16 年的内战也拉开了序幕。

第三十三章 黎巴嫩爆发内战并形成的地缘格局

第一节 巴勒斯坦人进入黎巴嫩后引发黎巴嫩内战

在巴勒斯坦人到来之前，黎巴嫩可以说是中东最为稳定的国家。平衡的政治格局，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使得黎巴嫩的日子比起海湾那些产油国来说并不差。只是这一派和谐景象，很快就会被破坏了。巴勒斯坦人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反攻”巴勒斯坦地区，不仅对黎巴嫩的主权与完整造成了影响，更吸引来了以色列的目光，最终把黎巴嫩南部变成战区。而一旦巴、以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混战，黎巴嫩的其他地区也绝无幸免的可能。对此最有微词的肯定是黎巴嫩境内的基督教派了。从宗教和民族感情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了所谓的“阿拉伯大义”去开罪以色列。

黎巴嫩之所以能够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独善其身，保持相对稳定，与执政的马龙派以少数派的姿态温和的调节复杂的国内、国际关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与他们有基督教背景，能够得到西方的直接支持有关。既然马龙派能够迎接他们的欧洲教友（殖民时期的法国人），那些已经在人口上成为多数派的穆斯林同样也可以开门迎接自己的巴勒斯坦兄弟。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所进入的黎巴嫩南部山区，本来就是穆斯林的传统根据地（这时主要是什叶派了）。在穆斯林教派看来，这也没损害到基督教派的利益。

基于黎巴嫩复杂的教派关系，黎巴嫩政府的控制力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是那不成规模，人数仅两万余人的政府军，内部的组成也是按教派比例来分配名额的。当然，有政治优势的马龙派能够控制政府军中那些高级职位，以及让马龙派的军人受到更好的训练和操持更先进的武器。只是在黎巴嫩，武装力量并非全部集中在政府军手中，其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由各教派自行武装出来的“民兵”。那些主要教派所拥有的武装力量，都超出了黎巴嫩政府军的数量。更何况，如果情况一旦有变，那些因顾及教派禁忌而没有混编的政府军，也势必会按照教派结构进行分裂。

从国家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的国家当中，出现国中之国的情况。巴勒斯坦武装不听从所在国政令，而引发矛盾冲突的事情，在约旦已经上演过了。现在，该轮到黎巴嫩政府来头疼了。尽管从国家的角度看，黎巴嫩政府对巴勒斯坦武装的一些约束性措施并没有问题，而且同样的事情，当日约旦的哈希姆家族也做过。但受到弹压的巴勒斯坦人，却不认为这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在巴勒斯坦人和同情他们的穆斯林看来，巴勒斯坦武装和约旦的

摩擦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由马龙派所把持的黎巴嫩政府来做这件事，那就是异教徒的压迫了。因此，为了报复黎巴嫩政府的管制行为，巴勒斯坦武装把报复的目标集中在了基督教派身上，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而面对这些外来者的挑衅行为，基督教派的武装自然也会给予相应的反击。

在这场有“异教徒”参与的武装冲突中，带有强烈宗教感的那部分黎巴嫩穆斯林，很自然的开始以宗教背景划分敌我阵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就是再辩解这只是“路线之争”也无济于事了。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一场席卷黎巴嫩境内所有教派的内战开始了（1975年）。很快，本身就没有多少控制力的黎巴嫩政府军也开始分裂，穆斯林背景政府军宣布成立了新的“阿拉伯黎巴嫩军”。以黎巴嫩的教派结构来看，一旦陷入内战，就很难不与宗教战争挂上钩。而战争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走向的，尤其那些早就对基督教派控制政权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是很愿意把这看作是夺取政治主导权的一次机会。

第二节 黎巴嫩马龙派政府请求外部力量干预局势

黎巴嫩原有的内部结构毕竟是由长期博弈而形成的，并且曾经有过一段和谐相处的蜜月期。因此即使是在穆斯林教派中，也有不愿意看到内战演变为宗教战争的温和派。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受损害，那些看上去应该亲如兄弟，共同对敌的教派，为了争地盘与权力，也同样会产生矛盾。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黎巴嫩内战，发展到后来并不是以一种宗教战争的形态进行的（虽然很多极端穆斯林想这样做）。各教派选择阵营更多的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类似于军阀混战的内战形态，使得内战各方合纵连横的组合在不断变化。可以说，这是一场不能简单划分阵营的混战，今天的敌人也有可能是明天的盟友。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内战中转变过立场，投入过不同的联盟组合。

对于执政的马龙派来说，如果内战一直进行下去，显然于国于己都是不利的。因为以目前的人口比例来看，马龙派显然是在依靠当初的政治协议享受直管的政权权力。无论这种结构因何原因而改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降低马龙派的政治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马龙派其实是最希望黎巴嫩政局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而在战争开始之后，本来就不满马龙派政治地位的穆斯林主要教派也退出了联合政府。

以马龙派的力量，虽然对比其他单个教派拥有相对优势，但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并非能够凭一己之力搞掂所有教派（哪怕联合其他基督教派）。事实上，当初如果不是有法国人撑腰，马龙派也不可能光凭自己的力量就获得黎巴嫩的政治主导权的。也就是说，如果马龙派不想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就必须请求外

部干预。从黎巴嫩的地缘位置来看，可以有三个选择：要么请求以色列的支持；要么从西方，特别是要求法、美干涉。最后一种选择，则是请求阿拉伯国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帮助维持稳定。

单从对付巴勒斯坦武装这个诉求来看，马龙派倒是和以色列有共同的目标。而以色列也绝对有力量帮助弹压巴勒斯坦武装，及那些不满现在政治结构的穆斯林教派，只是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不光国内那些也希望看到和平的温和派穆斯林会被推到对立面。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甚至全部穆斯林也会将马龙派视为公敌。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色列人是肯定不能请的。

既然离着最近，又有足够力量的以色列暂时不在外援考虑范围，那么西方国家呢？从马龙派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渊源来看，这似乎是必然的选项。问题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满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而这时候直接军事介入黎巴嫩，显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以色列不能找，西方现在又靠不上。让很多人为之不解的事情便出现了，那就是马龙派出身的黎巴嫩总统开始请求叙利亚军事介入，以帮助黎巴嫩稳定局势。那么为什么会是叙利亚，叙利亚介入之后又让黎巴嫩内战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第三节 黎巴嫩各教派对邀请叙利亚军队入境的不同权衡

以地缘关系来说，叙利亚无疑是与黎巴嫩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这不仅仅因为黎巴嫩本来就是从叙利亚当中分裂出来的；更是因为黎巴嫩总共就两个陆地邻国，除了南线那个唯恐避之不及的以色列以外，黎巴嫩的大部分边境都是与叙利亚接壤的。从这个角度说，叙利亚也会是最为关心黎巴嫩局势的国家。即使叙利亚政府并不像那些叙利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坚定的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绝对希望能够将黎巴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虽说叙利亚方面有充分的理由介入黎巴嫩事务，不过如果想军事介入的话，还是要得到黎巴嫩方面的“邀请”。否则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入侵了。通常情况下，这种“邀请”并非一定要是在台上的合法政府，反政府武装的邀请也同样可以成为武装干涉的理由。至于哪一种更具合法性，就看干涉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了。就好像利比亚那充其量只能被归类于“叛乱武装”的反对派，刚闹出点动静就迫不及待的被西方国家承认为合法政权，并开始“合法”的受邀进行武装干涉一样。

以叙利亚的地缘属性上来看，黎巴嫩境内的穆斯林派别似乎更应该有理由“邀请”他们军事进入黎巴嫩。不过在做这个判断之前，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那就是执政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是阿拉伯世界中去宗教化最成功的政权。也就是说，以少数派和宗教“异端”身份上台执政的阿拉维派，执政的原则就是尽量避免宗教背景来左右政治走向。这种淡化宗教背景，致力于民族、教派和解的做法，也可以说是阿拉维派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毕竟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宗教背景上，并以之来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准的话，那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从淡化宗教差异，致力于民族和解的执政原则上看，马龙派和阿拉维派是很有共同语言的。只不过，垄断了军事权力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表现得更为强势，能够用铁腕来压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抬头。至于马龙派虽然通过“民主”的方式同各派达成了和解，但并没有做出努力消除大家的宗教观（也没有能力），反而是在认可大家以宗教背景划分阵营的前提下，能够相对合理的分配政治权力来维持平衡。这种平衡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中央政府的管控力低下，各派别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一旦出现战乱，就很容易变成以宗教背景为归类的宗教战争。

在知晓了这些背景之后，黎巴嫩各派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就很清晰了。在面对阿萨德家族这种强势淡化宗教矛盾的政权时，黎巴嫩那些潜在的圣战者是绝不会引狼入室的。而执政的马龙派如果想在阿拉伯国家中请求外援的话，叙利亚政府反而会是最合适的了。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叙利亚军队会对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来一场“圣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黎巴嫩战端开启，政府无法掌控局势的情况下，叙利亚军队被“阿拉伯威慑部队”合法的请了进来（1976年5月）。

第四节 黎巴嫩各教派分布范围的变迁

既然叙利亚军队实际上是被马龙派所代表的叙利亚政府请进来的，马龙派当然希望叙利亚军队能够帮助其控制那些穆斯林教派控制区，以使他们重新服从黎巴嫩政府的管辖了。以黎巴嫩当时的地缘格局来看，什叶派已经成为了最大的派系，人口比例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很自然的，什叶派也成为了最渴望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并试图从战乱中获取政治利益的教派。

我们之前也说了，黎巴嫩的地缘格局，曾经是以北部山区的马龙派和南部山区的德鲁兹派为主的。不过在18世纪时，这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得以成为了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其中所带来的地缘利益，就是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派，能够向沿海地区和南部的德鲁兹人控制区渗透。而德鲁兹人的处境就要艰难得多了，没有

战略盟友的他们，在基督教派的政治挤压下，不得不大量迁出黎巴嫩山区，到其他有德鲁兹人居住的地区。

这种外迁行为不仅让他们在黎巴嫩的人口和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也使得德鲁兹人的另一个聚集地“德鲁兹山”地区，成为了德鲁兹人最大聚居地。尽管马龙派在与德鲁兹人的地缘博弈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些具有更大人口优势的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特别是更有意愿躲到山里的什叶派），很快填补了德鲁兹派在南部山区留下的空间。甚至北部黎巴嫩山脉与前黎巴嫩山脉之间的贝卡谷地，包括前黎巴嫩山脉的北段，也基本被什叶派穆斯林连片覆盖了。

如果让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选择一块立足之地的话，贝卡谷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贝卡谷地与叙利亚境内的阿西河谷之间并无山脉隔断，本身地缘关系就十分紧密；另一方面贝卡谷地也是黎巴嫩的地缘核心，控制了 this 区域就很容易把军事影响力投放到其他区域了。至于马龙派，他们也愿意叙利亚军队驻扎在贝卡谷地。这样的话，基督教派控制区的东侧就有了安全保障。而马龙派控制区的南面，又是态度比较暧昧，并非其他穆斯林教派天然盟友的德鲁兹派控制区，安全形势并不算太严峻。

这样看来，有了叙利亚的军事干涉，黎巴嫩的局势应该有机会缓和，并且将权力重归马龙派执掌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联合政府了。可惜的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并不足以帮助黎巴嫩政府控制黎巴嫩的所有叛乱地区，反而让黎巴嫩的地缘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化了。

第五节 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马龙派之所以把叙利亚请进来，目的当然就是让叙利亚帮助稳定黎巴嫩的局势了。再自私点的想法，就是帮助马龙派在之前的政治权力分配方案下，恢复平衡。要说叙利亚军队入驻贝卡谷地，也的确帮到了马龙派和那些希望过太平日子的教派。这些教派也不光是基督教派了，毕竟之前和谐共处的日子，让很多人都记忆犹新。然而叙利亚军队并没有像马龙派所希望的那样，帮助黎巴嫩解决最大的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这个心腹大患不解决掉的话，黎巴嫩是无法实现真正和平的。

关于黎巴嫩内战为什么会爆发，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解读。一般认为，巴解组织的到来，在黎巴嫩南部搞出国中之国的结构，并与执政的马龙派产生矛盾和冲突，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即使没有巴解组织的到来，黎巴嫩也有很大风险会面临动乱。因为各教派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开

始倒逼政治改革了。如果没有大国从中调解，让马龙派愿意交给一部分权力来，武力解决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特别是每个派别手上，都有民兵武装的情况下。至于说是不是宗教战争，我个人认为不是。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最后宗教背景肯定会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主要识别标志。特别是那些宗教极端分子，一定会希望把战争的性质变成针对异教徒的圣战。包括面对黎巴嫩政府的约束而心怀不满的巴解组织，也会刻意作出这样引导。

现在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了，如果没有巴解组织的到来，黎巴嫩也会有动乱的风险，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而手中有枪，又认为阿拉伯兄弟们有天然义务帮助自己的巴解组织，无疑激化了黎巴嫩蓄积的内部矛盾，并将之引发为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派的宗教矛盾。换句话说，黎巴嫩政府所作出的任何约束巴解组织的做法，都可能被巴解组织解读为黎巴嫩的基督徒们，不愿意帮助穆斯林针对犹太人的圣战。事实上，像巴解组织这样在他国搞出国中之国，并祸及东道主的做法，是任何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是不能容忍的。只是黎巴嫩的内部结构太过特殊，使得国家利益和宗教、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让执政者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约定，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

在马龙派民兵武装和巴解组织开始混战之后，黎巴嫩政府中的穆斯林领导人甚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方面出于国家利益，他们最起码应当让政府军出面制止这场混乱；另一方面，又害怕以基督教派为主的军队加入，会激化矛盾，让事情变得更糟（自己还会被骂作叛徒）。这种患得患失的想法，让本来控制力就不强的黎巴嫩政府，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到后来，就只能依靠丛林法则来解决问题了。

对于自己的尴尬地位，马龙派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从语言和人种上看，他们应当也可以归为“阿拉伯人”。并且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也愿意跟穆斯林阿拉伯人声明这一点。但民族认定这点，从来都是多角度的。尤其在笃信宗教者看来，划分族群的最显性标准，应该是信仰而非人种、语言。从这层意义上说，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而会把同属穆斯林的“库尔德人”归入阿拉伯人体系。而实际上，库尔德人的语言和人种都和波斯人同出一系。

正因为如此，你愿意跟谁成为一族，又能够跟谁成为一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看所处的地缘环境，互相认同是否能有更大的利益。就好像马龙派今天愿意称自己也是阿拉伯人，但在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却认为自己和法国人同属一族；就像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华夏体系，却一定要把华夏文明下的“福佬”文化割裂成独立文明的台独主义者一样。

第六节 叙利亚利用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牵制以色列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内战刚启的黎巴嫩身上来。我们之前所分析的内容，已经告诉我们的了，从实力和问题的敏感度来看，马龙派要想力挽狂澜，稳定黎巴嫩局势是不可能的了。即使那些温和的穆斯林教派也觉得大家应该坐下来谈，不应该诉诸武力。但他们在巴解组织和穆斯林极端势力面前，也不敢轻易表态了。不过这些问题，如果让叙利亚人来处理，就没有问题了。作为阿拉伯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和以色列军队作战多年的叙利亚，完全有实力帮助黎巴嫩“平叛”。而且从压制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的角度看，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是有着共同的目标。而从对待问题的焦点——巴解组织的态度上，双方却有着利益分歧。

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当然是希望约束巴解组织甚至解除他们的武装的；但对于叙利亚来说，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却是他们用来袭扰以色列的一张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失去了戈兰高地这块战略要地，而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表面上让出了部分戈兰高地，却又把驻军权交给了联合国维和

部队，使得双方之前出现了一条虽无大纵深，却又难以逾越的缓冲带。也就是说，现在叙利亚即使想通过军事手段搞一场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搞过的，强度有限的“消耗战”，也是不可能的了。这脱离军事接触的格局，显然对实际占领戈兰高地的以色列更有利，他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经营、渗透戈兰高地。

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盘据在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对叙利亚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巴解组织和马龙派武装的冲突刚开始时，叙利亚方面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当初



黎巴嫩地缘结构示意图

从约旦分流到自己境内的巴解组织开拔进入黎巴嫩。这种做法，无疑让黎巴嫩的乱局又加了一把火。叙利亚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默许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割据的做法，也让马龙派对于依靠叙利亚来为黎巴嫩恢复和平丧失了信心。

因为巴解组织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黎巴嫩的主权，还让那些不满马龙派掌权的武装有了依靠，并继续引发武装冲突。而正是由于叙利亚这种有私心的“维和”行动，基督教民兵和叙利亚军队之间也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为什么说，叙利亚军队的介入反而让黎巴嫩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的原因。内部权力分配的矛盾、宗教矛盾、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拉长了黎巴嫩战乱的时间。

到了 1977 年，黎巴嫩的国土大致被分割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马龙派和基督教派控制着黎巴嫩山脉的大部以及北部沿海平原（北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的黎波里”及周边地区是逊尼派的地盘，但在当时也是巴解组织据点，算是巴解组织控制区。一直到 1983 年才被迫撤出。至于前因后果，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的）。而贝卡谷地及前黎巴嫩山脉的大部，则由叙利亚控制；至于南部包括北加利利山在内的山区，则是巴解组织的控制区，这些“外国人”甚至将势力范围渗透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西郊。

对于黎巴嫩三分天下的格局，马龙派当然是最不满意的。不过他们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到不满的，最起码以色列方面也是非常不愿意看到黎巴嫩形成这各格种局的。至于以色列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黎巴嫩的地缘结构，我们后面会分析。

第七节 黎巴嫩穆斯林教派和巴解组织的互相利用

有人会说了，马龙派把叙利亚人请进来是“引狼入室”，其实倒也不能这么说。以黎巴嫩当时的乱局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军事介入的话，是稳定不下来的。而叙利亚军队进驻贝卡谷地，也的确给西北部数面受敌的基督教派稳定了局势，使他们有时间和空间恢复实力。

事实上，马龙派是否主动邀请叙利亚进驻黎巴嫩并不是关键。这是因为双方那密切的地缘关系，使得叙利亚人在心理上仍然认为黎巴嫩应该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即使暂时不能合并为一个国家，但在政治、军事上也应该为叙利亚所用。基于这个原因，叙利亚是非常希望把黎巴嫩变身成为附庸国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让巴勒斯坦武装进驻黎巴嫩南部，并激化黎巴嫩原有的矛盾，然后再以和事佬的身份进驻黎巴嫩，其实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布局。

从黎巴嫩的角度来说，虽然基于阿拉伯的民族大义，以及穆斯林的宗教感情，

各阿拉伯国家都有义务接待这些失去祖国的巴勒斯坦人。但真正落实下去，大家能出多少力，还是要看这些巴勒斯坦人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大好处的。像约旦最初肯慷慨的接受最多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允许巴解组织以自己的国土为基地活动，无非是因为哈希姆家庭族视巴勒斯坦为自己的国土。而当这种期待被以色列的军力无情终止时，巴勒斯坦人自然就被无情抛弃了。

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已经成为了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但对于那些渴望政治权力重新洗牌的黎巴嫩穆斯林教派来说，却是一块香饽饽。尤其是已经差不多占据黎巴嫩人口半壁江山的什叶派，以及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越马龙派的逊尼派，是很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过来帮助搅下局的。有了帮助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这杆超越国界的大旗，穆斯林教派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做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以此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了。

从地缘位置上来看，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在与巴勒斯坦人的互动双赢合作中，是最有可能获益的。因为无论从位置还是地形来看，巴勒斯坦武装选择这一区域完成他们的复国梦想都是必然的。当然，作为穆斯林世界的主要派别，黎巴嫩三巨头之一的逊尼派穆斯林，也不会让什叶派独自抢过这杆政治大旗的。虽然逊尼派穆斯林的主要分布地并没有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很难直接通过帮助巴勒斯坦人反以，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机会。作为阿拉伯文明的主流教派，逊尼派穆斯林虽然没能把马龙派、德鲁兹派、什叶派这些异端从黎巴嫩山区清除出去，但还是凭借政治优势在黎巴嫩沿海控制了几个重要港口地区，作为逊尼派的据点。这其中又以北部沿海港口城市“的黎波里”最为重要，这座与利比亚那座古城同样名字的城市，也成为了黎巴嫩逊尼派提供给巴解组织的另一块根据地。

虽然黎巴嫩内部的地缘政治史，从来都是以山区教派的博弈为主，但对于试图控制黎巴嫩的外部势力来说，黎巴嫩所拥有的海岸线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些古老的港口所具有的交通地位，不仅成就了腓尼基文明，更成为了外来势力征服黎巴嫩的首要目标。对于巴解组织来说，选择在的黎波里建设一块飞地性质的根据地，不仅能够通过海路获得海外援助，更可以在黎南部山区的主基地遭遇以色列强力攻击时，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层找到一块安全之地。在后来的历史中，巴解组织也的确把总部设在了的黎波里，直到1983年巴解总部和阿拉法特被迫离开为止。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巴勒斯坦人能够在黎巴嫩跑马圈地，是缘于他们和黎巴嫩本土的穆斯林教派有互相利用的价值。而这种结合，也让黎巴嫩潜在的因人口比例变化而产生的内部政治矛盾，有向宗教矛盾转移的趋势。只是矛盾的主体随着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强势介入，性质又发生了转变。混战成一团的黎

巴嫩各教派，以及巴勒斯坦人最终会发现，大家争来打去的，其实都成为了叙、以两国博弈的棋子。他们的命运，根本不取决于自己。

第三十四章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加利利山脉之战

第一节 以色列最初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对策

在叙利亚默许巴勒斯坦人搅乱黎巴嫩政局之时，以色列的介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因为通过四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三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已经暂时不会再有对以发动战争的可能了。埃及、约旦两国算是认清了形势，不愿意再做出头鸟对抗以色列，只求通过美国的调解，拿回自己的失地就可以了。而叙利亚则是因为戈兰高地之上已经由联合国划出了缓冲区，暂时无法对以色列展示自己的军事存在（更重要的是，没有埃及的支持，无法发动全面战争）。真正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反倒是那些用不对称战争手段，不断袭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

与那些“外国人”不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地缘矛盾基本无解。因此即使其他国家不再出于民族大义战斗下去，他们当中抱有复国梦想的人也会一直战斗下去的。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并不指望这些被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能够接受现状，但他们起码不希望，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武装会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也就是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流亡到那些不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并只是在政治上维持强硬态度的话，以色列人大可置之不理，一笑了之。但如果这些巴勒斯坦武装以以色列的邻国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的话，以色列就肯定要武力清剿了。

在1978年以前，以色列对于盘据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武装，还基本是采取空袭的打击方式，以期降低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应该说，还没有发展到要直接军事入侵黎巴嫩的地步。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不仅可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连锁反应，更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干涉。毕竟黎巴嫩的主权独立，是当年英法两国交易的结果。另一方面以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来说，尽管巴勒斯坦武装的袭扰，不时的让以色列人遭受一些小损失，但对以色列的国防安全并没有造成真正威胁。也就是说，像这种烈度的“战争”，空袭营地和小规模的特种作战其实就可以把问题控制在可控程度内。

相反，以色列倒可以隔岸观火，看看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是怎样内斗、消耗的。就像他们坐看约旦是怎样忍受不了巴解组织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最终赶走他们一样。不过这一切，随着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而发生了改变。在叙利亚直接控制贝卡谷地，并成为巴勒斯坦武装的直接后盾后，以色列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不成气候的巴解组织，以及人畜无害的黎巴嫩政府了。换句话说，叙

利亚以另一种形式对以色列的战略安全做出了挑战。而面对这个死对头，之前那种小打小闹的越境打击，已经不足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了。由此，针对黎巴嫩的入侵计划也进入了准备期。

第二节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山区清剿巴勒斯坦武装

从地缘结构上看，以色列如果想在北部获得足够地理优势的话，除了从叙利亚手中拿到戈兰高地以外，还必须占据全部的加利利山脉。当然，那个本来由叙、黎两国分享的西亚裂谷带制高点——黑门山，更是必须在以色列的掌控之下。不过这种战略威胁是否变成现实威胁，还是要看双方的实力对比的。相比之下，戈兰高地在叙利亚手中，对以色列造成的威胁，就比北加利利山脉在黎巴嫩手中，要大得多了。也就是说，以黎巴嫩的国家实力来说，如果不给以色列添乱，以色列并不会一定要把战火烧过去。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这一点也得到了验证。然而随着巴勒斯坦武装和叙利亚军队的到来，这种平衡也被打破了。

对于叙利亚人无意约束巴勒斯坦人的做法，不仅马龙派看出来了，以色列人也看出来了。很明显，在叙利亚人入驻黎巴嫩之后，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南部的实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会因为直接后援而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黎巴嫩日后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战略上的趋势都是成为一个对以色列构成实际威胁的板块了。因此1978年3月，以色列地面部队终于越过黎、以边境，直接对黎南山区的巴勒斯坦武装出手了。这次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以看作是5年后更大规模的“黎以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的预演。比较悲剧的是，虽然这两次战争都被评论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但实际上，黎巴嫩人至始至终都不是战争目标。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才是以色列的关注点。

黎巴嫩以后的局势走向如何，在当时谁也无法作出判断。不过无论从战略和战术角度看，北加利利山脉——黑门山一线，都会是以色列的控制目标。控制了这片山地，不仅巴勒斯坦武装的据点，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更可以让以色列的北部真正得到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也包括水资源的安全。要知道，黎巴嫩南部山地所流出的河流和戈兰高地一样，同样也在补给以色列。所以这次军事行动，在设计时就带有很强的地缘色彩，被命名为“利塔尼行动”。

所谓“利塔尼”指的就是利塔尼河了。这条河我们在前面分析黎巴嫩的地缘结构时，已经提到过了，可以说是黎巴嫩的核心河流。它和阿西河一南一北的，贯穿了整条贝卡谷地。并在黎巴嫩山脉与加利利山脉之间，转向地中海方向出海。

从地理结构上看，利塔尼河下游河谷就是加利利山脉和黎巴嫩山脉的分割线。如果以色列把控制线推进到下利塔尼河谷的话，也就等于把全部加利利山脉拿到手了。当然，为了绝对的安全，这条控制线的东端是必须连到黑门山的。

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想通过战争手段达到“利塔尼行动”的军事目的，是轻而易举的。问题的难点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任何时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并实际占有土地，都是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即使在幕后支持自己的大国，也很难在台面上，支持这种用武力改变边界的做法。毕竟现代国家的边界划分，基本上都是多方博弈而形成的平衡结果，有着合法的出生证的。也正因为如此，埃及和约旦才认为有机会从谈判桌上要回被以色列占据的领土。而叙利亚和国际社会也同样认为，戈兰高地的主权是没有任何争议。正是由于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色列在占领黎南山区3个月后，很快就退了回来。

第三节 以色列撤军后黎巴嫩局势重新恢复回之前状态

从战术层面上来看，以色列这次行动的战术目的已经达到了。即通过一次拉网式的越境打击，将巴勒斯坦武装藏身于黎巴嫩南部山地中的据点一一拔除。而巴勒斯坦武装也被迫向黎巴嫩中、北部转移了。为了稳定这个结果，以色列在接受国际调解的时候，也一如他们在戈兰高地、西奈半岛做出让步时一样，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入驻。

如果联合国维和部队真的能让黎巴嫩南部地区非军事化，或者说军事隔离穆斯林武装和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北部的安全也算得到了保证。问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看，这一点根本无法做到。因为所谓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作用，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军力比交战双方强，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地位能够得到国际认可和双方尊重。也就是说，如果双方政府都接受和平方案，并能够有效管理自己武装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能的话，问题就大了。

现在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约束包括巴勒斯坦武装在内的地方武装。作为政令不出基督教区的马龙派来说，他们倒是想联合国能够帮助黎巴嫩恢复和平，并绝无意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而将黎巴嫩政府的管理权视若无物的巴勒斯坦武装，同样也不会把联合国维和部队真的放在眼里的。在以色列人撤退之后，巴勒斯坦武装很快就恢复了在黎南山区的活动，并继续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

有权利有意愿约束巴勒斯坦武装的黎巴嫩政府没能力做到这点；而有能力做到的叙利亚军队，却又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放任巴勒斯坦武装在黎巴嫩南

部坐大。叙利亚这种看似超然事外，实则掌控黎巴嫩局势的做法，让以色列人感到必须把叙利亚的势力赶出黎巴嫩，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北部获得真正的安全。而同样对此深感不安的还有马龙派。把叙利亚人请进来，非但没有为黎巴嫩带来和平，重建有控制力的中央政府，反而让黎巴嫩成为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不但原有的矛盾没有解决，大部分的国土还被叙利亚、巴勒斯坦两家“外国人”控制了。当然，那些希望乱中取利的穆斯林教派，倒是很乐意看到有这么多阿拉伯兄弟来支援自己的。

有人说了，马龙派把叙利亚人请进来实际上是“引狼入室”，应该倒向以色列，请以色列人来帮忙的。只是这种想法，我们开始也说了，政治风险太大了。等于直接把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推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些认可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温和穆斯林，也一定会视其为敌人，内战的性质也就不可避免的向“圣战”转变了。所以，即使看到了以色列和自己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马龙派也是不能公开谋求和犹太人结盟的。

其实也用不着马龙派向以色列抛出橄榄枝，为了自身的安全，以色列也一定会把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赶出黎巴嫩作为战略目标的。而在这两点都做到之后，在黎巴嫩扶植一个亲以（最起码不给以色列添乱）的政府，也是必然的。到了那一天的话，除了马龙派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第四节 以色列对黎巴嫩入侵时需关注的外部干涉势力

显而易见的是，1978年那次越境清剿巴解组织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帮助以色列解决北方的安全问题。为此，以色列方面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就开始准备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了，以期彻底将巴勒斯坦武装赶出黎巴嫩。除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外，以色列人在政治上还必须作出三点预判：即黎巴嫩方面的态度；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军事介入；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是否会干涉。

对于第一点，以色列人并不担心。黎巴嫩境内的穆斯林武装虽然一定不会希望犹太人越境，但以色列人有信心在基督教派中找到同盟者。其实黎巴嫩内部有没有第五纵队，并不重要。即使黎巴嫩倾全国之力和巴勒斯坦人并肩作战，也不可能是以色列的对手的。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态度。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无论主动发起攻击，还是被动防御，都要考虑两线甚至三线作战。不过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和约旦已经明显开始以本国利益为重，不再愿意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荣誉而战了。尤其是在1978年9月，埃、以双方在美国的调解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为双方的

和谈确定了基本原则。次年，埃及又成为了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国家。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以色列等于以交还西奈半岛的条件，换得了南线的战略安全。解决了埃及这个带头大哥，以色列如果想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来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基本不用担心会在阿盟当中引发连锁反应了。最起码，早就患得患失的约旦，绝不会主动与以色列为敌的。唯一要注意的是，叙利亚是否会直接介入。从战略角度看，没有埃及这个军事盟友，叙利亚应该是无力支撑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的。不过基于双方的地缘矛盾，战事一开，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是很难预料的。因此在以色列的作战计划中，叙利亚军队，尤其是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是一定要密切关注，并做足准备的。

同样难以预料的，还有西方国家的态度。前一次越境打击之所以在三个月后退了回去，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美、法等国居中调解。基于黎巴嫩的特殊地缘结构，西方国家其实并不愿意看到，它搅到阿、犹两族的恩怨中，被打成一个烂摊子的。虽然现在巴勒斯坦人已经事实上，把黎巴嫩南部变成反攻基地了，但犹太人如果介入黎巴嫩政局过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当然，以犹太人的作风，即使完全得不到西方的支持，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可能发起突然袭击，以先发制人的态度保障自己安全的（虽然这种做法，经常会让自己的战略盟友感到不满）。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以色列人还是希望在开启战端时，不要有太多的外部干涉。

有一种情况，倒是可以降低西方国家对以、巴开战的关注度，并无暇干涉。那就是有一件比以色列重开战端更重大的事件发生，分散了大国们的注意力。以当时的冷战格局来看，理论上最有可能的大事件，应该是事关美、苏直接对抗的事件了。比如 1962 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地对地导弹，所引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类大事件。与这次有引发核战争危险的事件相比，阿、以之间那点事，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历史给予以色列的窗口事件，并没有这么多。毕竟美、苏两国擦枪走火的风险太大，要是天天发生，地球上的居民估计人均寿命都要减少几年了。

第五节 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第五次中东战争

让国际舆论觉得，比以色列越境打击巴勒斯坦武装还要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 1982 年 4 月 2 日——6 月 14 日的英、阿“马岛战争”。这是由美国最忠实盟友“英国”，在美国后院进行的一场战争。因此，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美国政治、外交层所最为关注的事件。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以色列于同年 6 月 6 日发动

了以黎巴嫩境内的巴、叙武装为作战目标的军事行动，史称“第五次中东战争”。

与前一次的“利塔尼行动”相比，这次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有着明显的地缘诉求。控制加利利山脉，使其不再为巴解武装所用，是以色列的基本战略目标。为此，这次军事行动也被以色列方面命名为“加利利和平行动”。从地缘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之为“加利利山脉之战”（以最关键性的地缘因素来为五次中东战争命名的话，第一次中东战争：独立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海权之战；第三次中东战争：水资源之战；第四次中东战争：石油之战；第五次中东战争：加利利山脉之战）。

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在战术上向来准备充分的以色列军队，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结束战争。事实也是如此，仅仅在一周之后，也就是6月13日，以色列便占领了曾被巴解控制的黎南山区，并在和叙利亚军队的交战中取得了胜利。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为了取得黎巴嫩的制空权，以色列空军在战争开始三天后，进行了一场战争史上非常著名，也非常成功的空战——贝卡谷地空战。仅仅六分钟时间，叙利亚在贝卡谷地苦心经营的防空导演阵地，就被以色列空军摧毁。而在随后的空战当中，叙利亚境内前来增援的60余架飞机也被以色列空军击落。而叙利亚方面也彻底丧失了将战争进行下去的想法。

到此，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看，以色列都不用再担心这次军事行动，会演变成和叙利亚的全面战争了。非常“巧合”的是，仅仅是在第二天，马岛上的阿根廷军队也放下武器向英军投降，马岛战争结束。其实马岛战争打得怎么样，都不会影响以色列人的决心。对于以色列的军事家来说，军事上完胜巴解组织，以及压制住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都是预料之中的。比较头疼的，是以色列的政治家。即是否要进一步控制黎巴嫩政府，并把叙利亚军队彻底赶出黎巴嫩。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以色列想在黎巴嫩看到一个有控制力，并亲以（最起码保持中立）的政府，在叙利亚军队还控制着黎巴嫩大片国土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政治重建黎巴嫩，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后就能马上有结果的。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巴解组织完全赶出黎巴嫩，并压制住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力量。想把巴解组织赶出黎巴嫩，除了清除掉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山区的据点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需要解决掉设立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西区的巴解总部。从“帮助”黎巴嫩的基督教派重新掌控政府并控制黎巴嫩的局势来说，这点也非常重要。对于以色列来说，完全控制黎巴嫩，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国，亦或把北加利利山脉并入以色列国土都是不现实的。不过犹太人却还是很愿意看到马龙派所领导的联合政府，重新在黎巴嫩取得控制权的。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回复到从前的状况，黎巴嫩是绝对不会

去主动招惹以色列的。

第六节 以色列迫使巴解组织退出黎巴嫩

在巴解组织丧失了南部山区所有的据点，被压缩到贝鲁特西南部时，以色列方面并没有要求巴解组织向自己投降，而是要求巴解组织向黎巴嫩政府缴械，然后尽数撤出黎巴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既向世人表明了，自己非常尊重黎巴嫩的主权，无意于真正“入侵”黎巴嫩，又卖了一个好给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政府。而从巴解组织的角度看，撤出黎巴嫩并不意味着无处可去，至少北非和其他不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出于民族感情也会接纳他们的。

问题是，那样也就意味着你丧失了和以色列人正面交战，并显示自己存在的基地了。长此以往，巴解组织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小。当然，如果真的不能从以色列周边国家反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话，巴解组织还可以选择从以色列控制区中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如约旦河西岸发动武装“起义”，以显示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后来的巴解组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只是那样的话，以色列人清剿起来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虽然巴勒斯坦武装非常不愿意失去黎巴嫩这个基地，但事情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的。在退无可退的境地中，巴解组织甚至提出了能不能在黎巴嫩政府和军队中，象征性的保留巴解组织建制的谈判条件，以期为自己日后重返黎巴嫩埋下伏笔。只是以色列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把巴解组织从黎巴嫩连根拔起了，自然是不会给巴解组织留余地的。唯一有可能直接对巴解组织提供帮助的，就是叙利亚了。而为了帮助巴解组织，以及控制黎巴嫩政局，叙利亚也在贝鲁特西区驻扎了两万多人的军队。

不过，在贝卡谷地空战之后，遭受重大损失的叙利亚，为巴解组织强出头的战术可能性也没有了。为了完全切断叙利亚有可能对巴解组织和驻贝鲁特叙军补给，以色列把军事控制线一直推进到了连接贝鲁特——大马士革的公路北侧。如果叙利亚想支持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继续缠斗下去的话，就必须借道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武装控制区。只是一直就想“送瘟神”的黎巴嫩基督教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在西方国家的调停（主要是美、法），以及派军“保护”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于1982年8月底之前从海路撤出了贝鲁特。次年底，准备在黎波里继续战斗下去的巴解组织总部和阿拉法特，在多方压力之下，被迫在法国人的“保护”之下，完全撤离了黎巴嫩。

在以色列的战略计划中，将巴解组织赶出黎巴嫩只能算取得阶段性胜利。因为谁都看得出，叙利亚才是左右黎巴嫩政局的幕后推手。虽然叙利亚军队在巴解组织退出贝鲁特时，也撤回了贝卡谷地，但叙利亚军队一天不退出黎巴嫩，以色列就一天不会感到安全。当然，以色列可以一鼓作气，把叙利亚军队完全赶出黎巴嫩。只是在这样做之后，以色列人接下来还能再怎么做呢？虽然以色列之前也通过战争从埃、叙、约三国攻占了几块地，并试图把占领状态延续下去。

不过这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把从加利利山到贝卡谷地一线，尽数布满以色列军队的话，黎巴嫩跟亡国了也差不多了。这种状况，即使是一向战略支撑以色列的美国，也是不会接受的。因此让黎巴嫩重新恢复到“人畜无害”状况，也就是在黎巴嫩重建由马龙派主导的，能够恢复控制权的政府，才是合适的选择。其实这点，也是出来打圆场的美、法等国愿意看到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黎巴嫩成为远离阿、以仇恨的“中东瑞士”，都有利于包括黎巴嫩人在内的各方利益。

第七节 以色列军队退出贝鲁特后驻军黎巴嫩南部

为了实现在黎巴嫩重建秩序的目的，在巴、叙武装撤离贝鲁特的同时，黎巴嫩政府也选出了新的总统。不出意料的是，这位叫作“贝希尔·杰马耶勒”的马龙派总统，是一个试图将所有外国势力赶出黎巴嫩的强硬派（当然主要针对叙利亚了）。而一个强有力的马龙派所主导的政府出现，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或者说，和巴、叙武装同时撤离黎巴嫩，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按照正常的走向，在巴解组织退出黎巴嫩，而黎巴嫩又重建强势政府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在国际社会调解之下，协商以、叙两国撤军的事宜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仅仅是在巴解武装撤出贝鲁特之后半个月，这位刚刚有望重建黎巴嫩的新总统，就遇刺身亡了（1982年9月14日）。至于谁是幕后主导者，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的说法。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方都会把这个责任推到自己的主要对手身上。比如以色列方面就认定，这是不愿意看到黎巴嫩恢复强力政府的叙利亚所为（这也是普遍观点）；同样，也有观点认为，这是黎巴嫩境内不满马龙派掌权的穆斯林教派做的。

不过对于马龙派来说，认定是黎巴嫩境内的穆斯林教派所为，只会激化现有的教派矛盾，让黎巴嫩的局势乱上加乱；而挖出叙利亚这只幕后黑手也无济于事，因为你并没有实力向叙利亚“复仇”，只会为日后的谈判工作制造新的障碍。不过，自己的政治领袖倒下，总是要有一个发泄对象的。很不幸的是，失去了自己武装力量保护的巴勒斯坦难民，就成为了牺牲品。在总统遇刺后的

第三天，也就是9月16日，马龙派的民兵武装——基督教长枪党，就对贝鲁特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展开了一场报复性屠杀，史称“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关于“贝鲁特屠杀”，究竟有多少巴勒斯坦难民遇难，到现在还是个迷。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实际数字做加减法，从400到30000，你可以从不同的渠道听到各种数字。而同样的，对于这场报复性屠杀，无论是谁主导的，怎么说也同样是“屁股决定脑袋”。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尽管攻击难民营的是马龙派民兵，但他们更愿意相信并提供证据，证明这其实是以色列人主导并指使、参与的屠杀。

虽然我个人看不出，以色列人一定要搞出这样一场屠杀来，有什么政治、军事上的意义，但巴勒斯坦人也有理由将这件事跟以色列人扯上关系。因为按照之前的调解结果，巴、叙武装撤出贝鲁特西区之后，以色列军队也不进去。换句话说，大家都表面认同黎巴嫩人有权在独立状态下组建自己的政府，并重掌黎巴嫩的政治主动权。然而在黎巴嫩总统遇刺之后，以色列方面认为有必要亲自进入贝鲁特，以肃清巴解、叙利亚残留的武装人员，“帮助”黎巴嫩政府恢复秩序（虽然有联合军队帮助监督，但谁都知道这并不可靠）。所以在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开始行动时，贝鲁特已经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之下了。在这种情况下，贝鲁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色列也都算是脱不了干系了。

其实我们前面也分析了，以色列对于控制黎巴嫩并没有想法，它要的只是一个能管束境内各教派的强势政府，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军队很快退出了贝鲁特。毕竟占领一个国家的首都，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不过要想让以色列军队从黎南山区退出，就没那么容易了。在叙利亚军队仍然控制贝卡谷地，黎巴嫩政府无法掌握国内局势的情况下，黎南山区仍然有很大可能，成为袭扰以色列的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能够生根，只是因为他们对叙利亚有价值。并试图依靠攻击以色列，而获得政治利益。即使没有巴解组织，也可以有其他武装填补空间。

为了制衡叙利亚人，也为了让自己的北部地区有一个战略缓冲区，以色列决定在黎巴嫩南部划定一个安全区，并直接驻军。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设想，在国际社会和黎巴嫩政府都有强烈意愿恢复黎巴嫩和平的背景下，最终的调解结果应当是以、叙两国同时撤出黎巴嫩，黎巴嫩政府重建秩序，从而为以色列的北部安全获得战略保证。然后事情的发展，却远非那么顺利。后来在黎巴嫩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使得以色列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还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十五章 以色列驻军黎巴嫩南部引发的影响

第一节 黎巴嫩南部什叶派借反以色列建立武装力量

在巴解组织被“请”出黎巴嫩之后，黎巴嫩重建秩序的先决条件也就具备了。因为即使是那些激进的穆斯林武装也不会把战争作为最终目的，为的无非是重新分割政治权力罢了。没有了巴解组织这个催化剂把政治矛盾上升为宗教矛盾，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并非是不能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的趋势是，黎巴嫩各派的民兵武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没有理由再保留甚至壮大自己的武装了。换句话说，在黎巴嫩政府重建的过程中，将武装力量收归中央政府管理，应该成为一个谁也不能明确提出反对的方案了。不过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做法，却让事态更加复杂化了。

对于缺乏战略纵深的以色列来说，把缓冲区建立在邻国土地上，可以说是一贯的做法，也是把战术胜利变现为地缘利益的好办法。通过前几次中东战争，所得到的西奈半岛、戈兰高地，都在承担这样的战略任务。所以，犹太人这一次在黎南山区建立安全区，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只不过这块以安全区的名义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在用处上和前面二块土地还是有区别的。事实上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黎巴嫩成为一个像后来的约旦那样“中立”国家，而不是冒着巨大的外交压力占得一片山地。虽然以色列军队对外声称的理由，是为了防范巴解组织死灰复燃，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再次构成威胁。

但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安全区建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对冲叙利亚。应该说这种想法，在战略上并没有问题。只是却没考虑到黎南山区居民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对黎巴嫩地缘政治格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解读过，之前被巴解组织所经营的这片山区，在当时已经是什叶派为主的区域了。对于这些原住民来说，巴勒斯坦人算是请进来的兄弟，而以色列人，则只能当作是以侵略者和异教徒的身份控制并呆在这里了。这种情况虽然让安全区内的什叶派非常不爽，却在客观上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那就是以反抗以色列侵略的名义，做大自己的武装和政治影响力。

在黎巴嫩的内部格局中，南部山区一直是相对较不发达地区，政治话语权也相对较小。现在有了反抗以色列侵略者这个由头，他们却有机会吸引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世界的目光。而这，也最终将转化成为分割黎巴嫩内部政治权力的资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什叶派，在和以色列占领军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即后来经常出现在中

东政治新闻中的“黎巴嫩真主党”。不过，这些代替了巴解组织，与以色列战斗在第一线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非是唯一变坏事为好事，看到了这其中的政治机会的。远在伊朗高原的波斯人，也同样在这其中看到了机会。

作为中东穆斯林世界三大势力之一的波斯人，一直想凭借自己什叶派国家的身份，渗透阿拉伯世界，进而取得中东局势的主导权。这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在阿拉伯国家中寻找什叶派盟友了。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伊朗的战略盟友，也正是借助于这种大的宗教背景。不过仅仅依靠拉拢阿拉伯人中的什叶派，并不足以支撑伊朗主导中东局势的想法。因为过于强调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差别，只会把阿拉伯人中的多数派——逊尼派，推到伊朗的对立面。所以对于伊朗人来说，除了寻找什叶派盟友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以外，他们还必须为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才有可能把旗树起来。

到底做什么事情，能够让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满意的呢？很显然，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圣战”。或者说，无论是谁想在中东穆斯林世界当盟主，都不可避免的要把以色列当成假想敌，并付诸于实际行动。这一点，之前的埃及，后来的伊拉克，以及蠢蠢欲动的土耳其人，也都看得很清楚。而政治和军事上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就成为了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扩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包括一定要研究核武器，并用之来挑衅以色列，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诉求）。

第二节 以色列军队的入驻对黎巴嫩地缘格局的影响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占领，以什叶派身份在阿拉伯世界做大，是非常让大多数的阿拉伯政治家所忌讳的，更何况这之后还有波斯人的影子。不过，作为唯一有机会、有理由对以色列开火的政治派别，你又不能质疑黎巴嫩真主党的合法身份，并制约它的发展（甚至还要支持）。

对于自己的占领行动反而促成了一支新的反以武装力量的诞生，是以色列所始料不及的。虽然以色列在正面战场上，以及定点军事行动中的能力非常出众，但任何军事力量在面对拥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战时，都没有更好的办法（华北战场的日本军队应该最有感触）。特别是进行游击战的一方，有结构复杂的山地作掩护时。为了应对穆斯林武装的反击，以及在自己撤离之后，黎南山区不至于马上成为反以基地，以色列在建立安全区的同时，还扶植了一支以基督教民兵为主的“南黎巴嫩军”，以达到“以黎制黎”的目的。

以色列人这种做法，也是占领军最常使用的方式了。按照中国式的命名方式，“南黎巴嫩军”就是黎巴嫩的“伪军”了。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支数千人的军队，并非完全是由基督教武装所组成的。包括“德鲁兹人”和“什叶派”，

都有营一级的建制武装在这支军队里。这其实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奇怪，虽然通常情况下，我们按照大的背景把各种矛盾划分层级，只从理论上分析出矛盾小的各方应该结盟共同对付矛盾更深的一方；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往往直接影响到自己利益的矛盾，才是最大的矛盾。为了在以什叶派为主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得到更大的空间，有部分德鲁兹人和逊尼派，选择投靠以色列也是一种选择了。

当以色列还在煞费苦心的经营安全区时，黎巴嫩的土地上依然存在“以色列侵略者”的现状，也让黎巴嫩政府的重建工作蒙上了阴影。尽管以色列方面的打算，是对冲叙利亚对贝卡谷地的占领，目的是为了逼迫叙利亚同时退出黎巴嫩。不过和被黎巴嫩政府“请”进来的叙利亚军队相比，不请自来的以色列的身份显然要更尴尬。虽然大家现在都认为，是应该把叙利亚军队和以色列人都请出去的时候了，但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却是可以归类为阿拉伯内部事务。并不应当和以色列军队的存在，等同视之。也就是说，在黎巴嫩穆斯林教派和叙利亚看来，以色列军队只要在黎巴嫩一天，叙利亚军队就有理由作为“阿拉伯稳定部队”存在于黎巴嫩。而黎巴嫩的基督教派，虽然认为叙、以军队都是外来者，但在阿拉伯“民族大义”面前，也只可能选择把矛头对准以色列。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如何破局成为了以色列方面颇感头痛的事。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的黎巴嫩地缘格局，可以从大的方面归纳为“三国四派”。所谓“三国”，一是指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政府，控制区为黎巴嫩山脉大部及沿海平原；二是指叙利亚，主要控制区为贝卡谷地及谷地两侧高地；三就是以色列了，基本接收了巴解组织在黎南山区的基地。而四派，则指的是犹太人、叙利亚人、黎巴嫩基督教派，以及穆斯林教派。其实这种格局和内战初启时的格局基本一致，只不过以色列取代了巴解组织，成为了三分天下中的派别罢了。不过，也正是以色列人的介入，才让黎巴嫩有了恢复之前地缘格局的可能性。因为当巴解组织在的时候，四派当中的基督教派算是在孤军作战。如果没有外力干涉，黎巴嫩的地缘政治走向，及政治格局，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现在有了以色列人在，不管马龙派和犹太人结盟与否，战略目标的一致就足以让黎巴嫩的力量对比，恢复平衡了。

虽然以色列人的介入，客观上让黎巴嫩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恢复了平衡。但如果想要政治和解的话，还必须有力量和话语权都超出四派的政治力量，居中调解，才有可能早日达成和解。否则，在力量均势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出现的是无尽的消耗和摩擦。至于谁来担当这个调解角色，并不难猜。作为视中东为自己核心利益的美国，以及黎、叙两国的前宗主国法国，当仁不让的承担了这个裁判的角色。

第三节 美国和法国调解以叙撤军黎巴嫩的失败

从美、法两国的角度来看，叙、以两国同时撤出黎巴嫩，黎巴嫩恢复以马龙派为主导，基督教派政治权力略多的政治格局（6：5），当然是最好的。而这自然也符合马龙派和以色列的利益。让基督徒和犹太人满意的方案，自然就不会让叙利亚人和穆斯林教派满意了。真要那样的话，等于说大家白忙一场了。所以，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议订撤军协议（1983年5月），并约定在以色列撤军的同时，叙、巴武装也必须完全撤出黎巴嫩时，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又爆发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1983年黎、以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以色列撤军前后，所爆发的武装冲突中，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开始把矛头指向他们认定的犹太人的靠山——西方。1983年4月，先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被炸，死亡50余人；10月23日美、法两国入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司令部相继被炸，美军死239人，法军死58人。在选票政治的体制下，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不可避免的在两国国内引发政治地震，并快速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决策。很快，美、法军队便撤出了黎巴嫩。而失去了军事存在的政治斡旋也注定要更为艰难。

不过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黎巴嫩人民。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在内战的混乱中继续煎熬更多的时日。事实上，“贝鲁特大爆炸”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黎巴嫩的和平进程，更让那些仇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看到了西方在制度上的软肋。那就是，他们虽然绝对无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权进行常规战争，但却可以通过不对称的“恐怖战争”，以杀伤对方人员为手段，逼迫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作出让步。1988年，由沙特恐怖大亨拉登所创立的“基地组织”，就是这一战术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践行者。

不过，虽然拉登为阿拉伯人创造了“911”那样的“经典之作”，但通过一次性大量杀伤美国的有生力量，以迫使美国作出重大政治调整的最成功之作，却是由非洲之角“索马里”黑皮肤穆斯林所书写的。1993年的摩加迪沙之战，在一天之内被击落两架黑鹰直升机（还伤了三架），阵亡19人，被俘1人，伤70余人的美军，被迫撤出索马里，并放任这个国家继续动荡下去。这也就是著名的“黑鹰坠落”事件。不过那些重创了美军特种部队的索马里民兵，应该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却间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大国前往印度洋“远足”的伏笔。

阿拉伯人从黎巴嫩内战中学到了什么，都是后话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显然又一次的成为了焦点。缺少美、法两国强有力的干涉，想让叙利亚军队愿意和自己一起撤出以色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继续控制安全区的话，

自己又被千夫所指。不仅阿拉伯世界会仇恨自己，国际舆论也只会把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定性为“侵略”行为。

当然，以色列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联合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把叙利亚人赶出去，并压制住穆斯林教派。不过这也不可能成为选项。因为马龙派和基督教武装当然愿意看到自己从以色列的“入侵”行动中获利，但却万万不敢和以色列结盟，并与整个穆斯林世界为敌的。至于当初被“请”进来叙利亚人，倒是可以冷眼旁观以色列陷入尴尬境地，并在与基督教强硬派的武装冲突中，向西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帮助穆斯林武装做大。很明显，局势的发展已经与以色列当初的预想背道而驰了。不仅逼迫叙利亚退出黎巴嫩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给了黎巴嫩进一步内乱下去，并给了叙利亚和穆斯林武装存在的理由。

问题是，让一贯强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完全退出黎巴嫩，放任叙利亚控制黎巴嫩却又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纠结和内部争论当中，以色列仍然以武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保持了军事存在，并扶植“南黎巴嫩军”，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种表面“以黎制黎”的方式，才能让占领行为看上去合法）。直到新的千年到来，以色列的政治家才终于下定决心，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

第四节 黎巴嫩各教派的和解及以色列的单边撤军

以色列人花了 18 年的时间，才算想明白他们应该在黎巴嫩怎么做（至于怎么做，我们后面再说），但黎巴嫩人可等不了这么久了。在以色列在黎南山区正式建立安全区（1985 年），叙利亚人又咄咄逼人的经营贝卡谷地时，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中的温和派也明白了，黎巴嫩其实已经成为了叙、以两国地缘博弈的战场。如果黎巴嫩各派在内部不能团结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黎巴嫩自己。而黎巴嫩各派和解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分割问题了。

要是继续保持基督教派 / 穆斯林教派 6: 5 的政治权力分割方案，显然穆斯林教派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如果完全按照现有的人口比例，逼迫基督教派出控制权，基督教派和战略支持他们的西方国家也不会答应。所谓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既然谁也制服不了对方，又实在是打累了，不想再被人当枪使了。那么各让一步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最终在 1989 年，在看不下去的阿拉伯国家的居中政治调解下，两派中的主和派，签订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塔伊夫协议”，将两派的政权权力调整为对等的 5: 5 比例。

而马龙派的政治主导权，也做了一定调整。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的权力和任期都做了一定的让步（这两个职位，都归属于马龙派）。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既扩大了穆斯林教派政治权力，又让基督教派不至于成为少数派方案，是

唯一可以让大多数黎巴嫩人接受，并实现和平的方案了。当然，双方武装中的强硬派，同样也有理由不满意己方作出了让步。不过在民心思安的背景下，这样不满以及引发的武装冲突被很快平息了。1990年，大部分的民兵武装都交出了自己的武器。黎巴嫩内战宣告结束。

虽然黎巴嫩各派表面上已经达成了和解，并重新组建了联合政府，但有叙、以两国军队在，黎巴嫩仍然随时处在战争的边缘。尤其是以色列军队的存在，让黎南山区的“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有正当理由发展自己的武装，并以“反以斗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不服从政府的号令。而由于叙利亚是代表阿拉伯国家维和的，所以叙利亚控制区中的民兵武装，就没理由不交枪了（是不是全交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对于叙利亚人来说，他们倒是很愿意看到以色列对黎南山区的占领，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有理由继续呆在黎巴嫩，并坐视以色列在真主党的袭扰下焦头烂额。而以色列人则发现，安全区的设立既不能让自己得到战术上的安全——（更有群众基础的真主党取代了巴解组织，成了北部安全的威胁）；也不能得到战略上的安全（反而让叙利亚有理由呆在黎巴嫩了）。于是，在经过无数次内部讨论后，以色列在2000年第一次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让步”——单边从安全区撤军。

这个决定是如此的突然，以至于一直“帮助”以色列维持安全区治安的“南黎巴嫩军”，也仅仅是在行动开始时才被告知的，他们在跟着退入以色列境内时，甚至无法收拾和处理自己在黎巴嫩的财产。不过，这些被黎巴嫩人视为“叛徒”的南黎巴嫩军，并不是唯一感到尴尬的。黎巴嫩政府和叙利亚人更是被以色列人的这次“主动让步”，搞了个措手不及。而以退为进，完全把军队撤出黎巴嫩的以色列人，这一次倒是可以用轻松的态度，笑看黎、叙两国政府如何处理被凸显出来的矛盾了。

第五节 以色列撤军后的黎巴嫩南部权力真空问题

如果以色列人不撤军，那么黎巴嫩政治不稳的罪名就永远要让犹太人承担了。而如果以色列撤军了的话，这个黑锅显而易见的就得是叙利亚人来顶了。然而在以色列突然作出撤军决定，并马上付诸实施后，黎巴嫩政府还来不及去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和叙利亚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补以色列人撤军后，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政治空间。

这似乎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既然以色列人主动撤退了，作为一直致力于恢复主权的黎巴嫩政府，很自然的应该向黎南山区派驻军、政治机构，

并开始庆祝“胜利”的，只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以色列经营“安全区”的这18年期间，活跃于以色列占领区的“黎巴嫩真主党”，俨然已经壮大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了。按照真主党的话说，那就是：每个人都清楚，犹太人是被谁赶走的。要是黎巴嫩政府就这样“下山摘果子”的话，真主党和他们所代表的南部山区什叶派，是肯定不会交权的。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就再所难免了。

有人说了，以色列方面应该最晚在1990年，也就是在黎巴嫩内部达成和解并重新组成联合政府时，就应该顺水推舟的退出黎巴嫩。那个时候，以黎巴嫩政府和什叶派的力量对比，黎巴嫩政府应该还能掌控局势。事实也的确如此，以色列在黎南山区的这18年时间，对黎巴嫩内部地缘格局的最大影响，就是让真主党武装有机会“合理、合法”的壮大。并在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之后，有实力和黎巴嫩政府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从小接受革命教育的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在华北地区八年时间的敌后根据地建设。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军事实力，是不可能在1946年壮大到可以谈判平分政治权力的地步的。

既然马上在黎南山区恢复政治权力，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那么好不容易盼来和平的黎巴嫩联合政府，当然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了。因此在以色列人闪电般的撤军后，出现了政治史上非常奇特的一幕——黎巴嫩政府义愤填膺的表示，坚决不去接收安全区。理由就是不会去给以色列人做保安。虽然黎巴嫩政府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不过却也说出了实话。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撤出来，不再坚持要和叙利亚军队同时退出黎巴嫩，很大程度是因为真主党的游击战，让以色列有点疲于应付。

无论从战术、还是战略的角度看，再在黎南山区耗费人力物力，已经很不上算了。问题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以色列退了回去，就不再和黎巴嫩真主党有冲突了。相反，为了自己能“合法、合理”的生存下去。即使以色列人不去主动招惹真主党，真主党也一定会不断的去和以色列战斗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巴嫩政府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在前安全区恢复中央政府的管理的话，都有义务约束真主党不再与以色列为敌。这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麻烦。

第六节 黎巴嫩真主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份额

为什么说，以色列在完全撤军后，真主党依旧要继续和以色列作对呢？要知道，2000年的阿拉伯世界，除了还有戈兰高地问题的叙利亚以外，其他国家

早已在国家层面和以色列达成政治和解了。而叙利亚，现在也基本不会试图和以色列用武力的方式解决戈兰高地问题。更多的是依靠国际社会施压，以迫使以色列践行“土地换和平”的方案。不过对于真主党来说，能够把以色列军队“赶出”黎巴嫩，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战果。而失去了以色列这个敌人，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接下来的话，等待他们的命运，应该是和十年前的其他民兵武装一样，将权力和武装上交给黎巴嫩政府。

这种将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的结果，黎巴嫩真主党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最低限度，作为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政治代表，“真主党”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派别。并且应该在黎巴嫩政府中，享有单独且重要的政治权力。换句话说，之前那种以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三派为大框架，三分政治权力，然后各大教派再依据各自内部的派系划分，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分割的方案，已经不能满足做大的真主党的胃口了。无论从地盘，还是实力的角度看，真主党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和传统三强平起平坐的一级政治力量。

经过前面这么多的解读，相信大家已经对黎巴嫩地缘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外部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力，有了相当的了解。仅仅从时间和结果来看，为了把基督教派和穆斯林的政治权力比例，从6:5调整到5:5，黎巴嫩就已经付出了16年的战争代价。再想作进一步的调整，不仅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派很难接受，其他穆斯林派系也同样不愿接受。甚至可以说，穆斯林教派对此的意见还会更大。因为在和基督教派对半分享权力的大框架难以调整的情况下，真主党如果想在黎巴嫩政府扩大权力份额，就只能压缩其他伊斯兰派别的政治空间了。

如何把尾大不掉的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是古往今来无数政治家所要面对的问题。不论结果和方法如何，这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暂时不去接收黎巴嫩南部山区的政权，让真主党维持一个自治的局面，也算一个明智之举。既不至于马上和真主党激化矛盾，又不需要为真主党的那些对以色列武装袭击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说到底，黎巴嫩真主党能够做大，也是以色列人自己种下的果。

对于真主党来说，他们心里当然也清楚，只有不断的和以色列人战斗下去，才能让其在阿拉伯世界争取舆论支持。并迫使黎巴嫩政府无法收权，以最终在黎巴嫩政权中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应该说，真主党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还是相当成功的。在以色列周边国家都基本和其达成和解的背景下，一直在给以色列找麻烦的真主党，无疑成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穆斯林世界，反抗犹太人的旗手。以至于虽然真主党那明显的什叶派背景，让大部分阿拉伯的政治家感到不太舒服，却又必须在政治上表示支持真主党的存在。这一点，甚至在美

国高举反恐大旗，宣布真主党为恐怖组织后，也没有大的改变。换句话说，只要真主党一直不放弃和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和黎巴嫩就有合法的生存空间。

第七节 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以扩大在中东政治影响力

由于真主党的存在和做大，在以色列撤军之后，黎巴嫩的内部主要矛盾，其实已经不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如何处理尾大不掉的真主党的问题了。因为在以色列人撤走之后，叙利亚就已经没有理由再以“阿拉伯稳定部队”的名义，在黎巴嫩部署军队了。在所有人的目光都从以色列转移到自己身上后，叙利亚人撤走是迟早的事。2005年，在各方压力之下，叙利亚军队也终于从黎巴嫩撤军。当然，由于叙、黎两国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关系，以及叙利亚这么多年在黎巴嫩的经营，叙利亚仍然对黎巴嫩有着相当或者说最重要的影响力。

回到真主党的问题上来。真主党的这种生存和扩张政治空间的模式，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黎巴嫩内部的政治结构。由于他们的什叶派背景，波斯人也被卷了进来，并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伊朗的幕后支持，真主党也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而伊朗之所以要全力支持真主党，目的其实也和真主党一样，就是谋求政治空间。只不过真主党从本质上说，是为了获取在黎巴嫩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伊朗所图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了。

如果伊朗只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寻找什叶派结盟的话，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只会让占据多数的逊尼派对伊朗产生反感。但如果伊朗能够通过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打击（谁都知道，真主党的后台是伊朗），并依靠发展核武器来威胁以色列，以及藐视幕后的支持者——美国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意支持度就要大得多了。就好像根据非官方的调查统计，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使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也有6成以上是认为这也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力量标志一样。

这样看来，无论是出于自身，还是后台的政治需要，真主党都会和以色列战斗下去了。而撤军后的以色列，也只能吞下自己种出来的苦果，不断的要面对真主党的恐怖袭击（时不时放几颗火箭弹，或者过去绑个人回来）。为了应对这个不稳定因素，以色列在撤军之后，仍然进行过多次越境打击，甚至动过重建安全区的念头。当然，从以色列的整体安全上来看，真主党并不为患，或者说称不上大病，但这种小打小闹，也足以影响黎、以两国的政治关系了。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挖地道俘获以色列士兵“沙利特”

的事件了。这次袭击活动，不仅引发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更创造了一个纪录。

在各种手段使尽，国际斡旋失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在去年达成协议，用1207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了这名被囚五年之久的以色列士兵。对于以色列用1000多人换一个士兵的做法，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了真主党这个麻烦制造者在北部活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真主党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存力，除了地形复杂，难以清剿干净，以及黎巴嫩政府不够强势，并且对真主党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眼以外；还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幕后支持有关。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伊朗和叙利亚都乐于见到真主党给以色列制造麻烦。

不过这当中，伊朗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出于成为中东局势主导者的目的，波斯人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什叶派联盟领袖”，并仅仅把结盟和支持的目标，锁定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真主党这样有什叶派背景的政治力量上。既然已经主动挑起了为穆斯林世界对抗犹太人这杆大旗，那么所有愿意和以色列战斗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成为伊朗积极支持的对象。而伊朗的这种做法，不仅使得黎巴嫩目前事实上仍处在分裂状态，也影响到了巴勒斯坦内部权力统一。

第三十六章 巴勒斯坦对以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派别

第一节 伊朗支持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以扩大其影响力

伊朗如果想在中东称霸的话，如何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是关键，而始终把矛头对准以色列，就是打开阿拉伯之门的钥匙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想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作为的政治强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还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亦或那个在地缘基础上完全没有机会的狂人卡扎菲，都无一例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伊朗除了凭借什叶派的背景与真主党结成紧密联盟以外，还需要在阿拉伯内部寻找其他的反以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如果说谁和以色列有矛盾，就能成为伊朗的盟友的话，那么叙利亚肯定是跑不掉的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即使阿萨德政权没有什叶派背景的话，伊朗也一定会乐于成为叙利亚的战略盟友的。不过叙利亚虽然和以色列之间，有戈兰高地这个难以化解的地缘矛盾，但却不是和以色列矛盾最深的。到底谁和以色列有更深的矛盾呢？答案似乎并不难猜。当然是那个至今无法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巴勒斯坦国”了。

巴勒斯坦到底能不能称“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初以色列人是接受阿、以分治方案，并正式宣布建国了的。而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根本就不承认这个方案是合理的，想的只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人当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按照分治方案建国。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在以色列的强大攻势下，失去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就根本不具备建国的条件了。一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巴勒斯坦人曾经单方面宣布过建国，并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但没有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国家”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最多只能算是以色列统治之下的一个“政权”罢了。

既然巴勒斯坦人至今没有放弃独立建国的梦想，那么他们当然也会成为包括伊朗在内的试图依靠挑逗以色列，而争取阿拉伯世界民意的地区大国的争取对象了。不过在有野心的地区大国们试图和巴勒斯坦人结盟时，他们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谁才是他们的结盟对象。对于大多数正常国家来说，这本身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谁在台上执政，自然就是沟通的对象了。当然，你如果无法和合法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话，也可以选择支持反对派。不过不管怎么说，你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能够代表国家的政权，建立直接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地缘位置、战略价值才是最需要考虑的。

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那完全被以色列所控制的“未来国土”，

还没有机会显示出地缘价值来。能够吸引伊朗人的，主要是他们能给以色列人制造麻烦。并由此而间接帮助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点区别，它将直接影响到伊朗到底和谁合作。基于伊朗的诉求，对于他们来说，谁是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亦或谁更有可能执掌巴勒斯坦的政权并不重要，谁是麻烦制造者（针对以色列）才是吸引伊朗的目光。

第二节 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在我们的印象中，被以色列人逼迫得无处建国的巴勒斯坦人，应该都是伊朗或者反以势力的天然盟友。但事实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会有派系。也都会依照立场的强硬与否，分化成左、中、右阵营的。在初期，当阿拉伯国家万众一心，准备把以色列人赶下海时，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无论分多少派系，绝大多数人还都是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的。不过在埃及转向和以色列和解，以及反以的阿拉伯联盟瓦解后，巴勒斯坦人当中也终于有人意识到，再幻想通过武装斗争从以色列手中夺回“被占领土”，已经不现实了。准备依靠外交途径，通过和以色列谈判取得巴勒斯坦合法地位的想法，逐渐占据了上风。

代表巴勒斯坦人实现这个转变的，正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曾经最坚定的主战派——阿拉法特。第五次战争后被驱逐出黎巴嫩的现实，让这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和整个巴解组织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所需要的结果。这种认识，在巴解组织已经被迫把总部迁到北非突尼斯，其后总部又一次被以色列空军所轰炸后（1985年），变得更加深刻了。

在巴解组织从坚持武装斗争，到被迫面对现实，准备以谈判的方式争取“权力”的同时，犹太人当中对纯粹依靠军事打击，来压制巴勒斯坦人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现实的考虑是，以色列在经过几次中东战争之后，虽然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压缩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两部分，并且再进一步通过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蚕食这两块区域，但你很难再进一步完全把这两块区域消化掉了。那些生活在这两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去处，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都让以色列必须思考，是不是要留块地给巴勒斯坦人“建国”了。

与由鹰派转变为鸽派的阿拉法特一样，以色列方面主导巴、以和平进程的总统“拉宾”也曾经是战争当中的英雄。正是由于双方都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才让他们明白，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续，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绝大多数时候，战争的实际作用，只是让大家在战后的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而不是把对方完全消灭。从这点来看，军事上完全占据优势的以色列，显然拥有更多的筹码。至于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早已放弃把以色列人赶下海，这不切

实际的目标。而把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谈判的目标了。

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作出这样的转变，也实属无奈。因为时间是站在以色列人那边。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正在一步步的蚕食这两块巴勒斯坦人最后的土地。一旦这些渗透进来的定居点连成具备几何外形的片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国未来的空间，就只会更少了。

第三节 法塔赫在巴解组织的主流地位

有鸽派就一定会有鹰派，以色列方面如此，巴勒斯坦人方面也如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时间似乎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并没有必要跟巴勒斯坦人践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持这种观点的犹太极端分子，甚至在1995年刺杀了两年前，刚刚与巴解组织签订和平协议的总统“拉宾”。在这份被称之为“奥斯陆协议”的标志性文件中，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则被允许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进行有限自治。

当然，从协议内容来看，这份协议并不能让双方，尤其是谋求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满意。不过谁都承认，这是一个好开始。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开始，在以色列方面的强硬派开始反弹时，巴勒斯坦人这边的强硬派也同样有抢班夺权的迹象。一个组织内部分成不同派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巴勒斯坦的情况比较特殊，被以色列完全分割成二块的“国土”，让这种政治之争更加有机会带上强裂的地缘分裂色彩。

比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两块巴勒斯坦“国土”，约旦河西岸显然是核心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约旦河西岸的面积更大，更是因为耶路撒冷在此。因此最终获取回到巴勒斯坦开启和平进程的巴解组织，也将政治中心设立在了约旦河西岸。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巴解组织”做一个说明。这个1964年，由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人政治代表，在耶路撒冷成立的组织，基本可以视为“巴勒斯坦国”的政府。

当然，它和真正的“政府”还是有区别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巴勒斯坦人是以现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全境建国，还是像现在这样退而求其次的，谋求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国，他们的国土都是在以色列的侵略之下的。也正因为如此，代表巴勒斯坦人行使政治权力的组织，名称中才会有“解放”二字。虽然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已经是国际共识了。但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处在进行时当中的，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组织，本身就很难做到权力集中。其内部也会存在许多渊源不同，政治诉求不同的派别。

而最终决定谁能够执掌巴解大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谁拥有的武装力量最强。在这当中，成立于1959年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算是巴解组织的主流派别。当巴解组织将与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作为活动主线时，法塔赫和其他派系一样，带有浓烈的军事色彩。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标签时，通常都更容易感觉，它是一个军事组织。而当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启和平谈判进程以后，法塔赫也就开始显现它的政治属性，并以政党的形式，开始主导巴勒斯坦的政务了。

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演化过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就好像黎巴嫩真主党，一开始作为一个反以的武装组织的面目出现，现在也开始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试着参与黎巴嫩的政务活动了。说到巴解组织和法塔赫，就不能不提到“阿拉法特”了。这个一直披着双色头巾的巴勒斯坦人，曾经数十年如一日的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直到2004年他去世为止。作为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拉法特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支巴解组织内力量最强的武装力量，才能够一直以巴解组织的领袖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不过，在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启和谈之后，法塔赫在巴解组织的核心地位也开始出现动摇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原因并不复杂。既然是和谈，就意味着双方都要作出妥协。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承认巴勒斯坦人自治，并在今后拥有独立建国的可能，算是在“以土地换和平”；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即使不极端的要求把犹太人尽数赶走，按照1947年阿、犹分治方案建国，也算是于法有据的（仅此而已）。

第四节 哈马斯的出现并对以色列和巴解内部的影响

如果巴、以的地缘关系是那么容易切割的话，和平还是有机会降临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只不过，任何一个看过地图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巴、以之间如果按照现有的格局建立两个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在和平进程开启后，双方依旧摩擦不断。在以色列方面，认为对巴勒斯坦人让步过多的意见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在巴勒斯坦方面，认为阿拉法特的和谈不仅明确放弃了巴勒斯坦人可能争取的合法权力，把国土局限在两块根本无法立国的土地上。更是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上，没有实质进展。因为以色列人虽然给予了巴勒斯坦人一定自治权，但并没有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

在政治机制成熟的以色列，鹰派们可以通过政治制度挟民意组建强硬政府，并调整巴以和谈进程。而内部结构还处在磨合当中的巴解组织，内部冲突的解决方案就没那么和谐了。既然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当初能够凭借最大的反以武装

的面目，执掌巴解大权；那么其他派别也同样可以通过和以色列人的战斗，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而窥伺巴解组织的主控权。

最终成为法塔赫挑战者的派别就是“哈马斯”。与法塔赫世俗化政治组织的形象不同，全称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哈马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像类似哈马斯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组织，在中东可以说比比皆是。当穆斯林对于以世俗政权形式对抗西方世界的入侵，不再抱有希望时，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并试图用宗教的力量来反抗异教徒的入侵，就会成为很自然的选择。毕竟，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形式，在历史上曾经让伊斯兰世界迅速扩张，并抵御甚至反攻过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一点，在阿拉伯国家中最后一个有机会以世俗政权之力，反抗西方入侵的政权——萨达姆政权崩溃后，显得更为明显。在此之后，活跃着的反以、反西方力量，无不带有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也包括唯一以国家形式对抗美、以的伊朗）。

哈马斯的创立时间，正是在巴解组织被第五次中东战争逼出黎巴嫩之后。战略上在周边再也看不到强力支撑的巴勒斯坦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发动起义了。而宗教在这时候，就成为了凝聚巴勒斯坦人的核心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7年哈马斯创立，并在幕后推动巴被占领土上的第一次大起义。这次没有外部武装力量直接介入的巴勒斯坦人的武装反抗，从战略上来看，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不过，却也足以对以色列制造压力。毕竟，这个算是生活在以色列包围之中的巴勒斯坦人乱起来，对以色列的安全影响并不亚于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而这，也对1991年正式开启的和平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五节 哈马斯和法塔赫各据东西部领土形成分裂格局

尽管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始终作为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主导巴、以和平进程，并回到了约旦河西岸。但和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哈马斯也通过领导武装斗争，在巴勒斯坦人当中获得了很高的民意。这一点，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而在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认识上，哈马斯也和黎巴嫩真主党一样，清楚的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存在，并拥有支持度，是因为自己能够一直代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以及它背后的美国）一直战斗。一旦它不再战斗下去了，也就失去了价值，更不可能从合法政府中平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一样，出现了政治上的分裂。代表中央合法政府的法塔赫（以及其他愿意和谈的派别）、黎巴嫩政府，愿意和以色列和平共处，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双方的矛盾；而代表阿拉伯人当中的反抗力量的真

主党和哈马斯，则成为了对内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对外不时对以色列发动武装挑衅的“极端组织”。由于大家在生存方式上如此的相似，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不结成战略同盟，反倒会让人感到奇怪了。而出于在阿拉伯世界中树立威信的原因，伊朗当然也不会放过哈马斯这颗棋子了。

任何一个想和中央政府对抗的组织，都必须有一块地缘上相对独立的根基之地。黎巴嫩真主党的根基之地，就是那块被巴解组织、以色列交替控制过的黎南山区了。相比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内部地缘结构上，更具有分裂的潜质。因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本身就是被以色列分割成两块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以法塔赫为首的主和派，占据核心板块“约旦河西岸”后，土地面积更小，人口密度更大的加沙地带，则成为了哈马斯重点经营的根据地。

当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初步和解，并成立自治政府之后，下一步就是进行正常的政府运作了。一个合法的政府运作，除了在所辖土地上建立各级政治机构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之前分属各派的武装力量合并成为统一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军队。这个进程，在内战之后的黎巴嫩就已经开启过了。只是相比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战斗下的理由显得更为充分。加沙地带相比黎南山区，也要更为独立。黎巴嫩政府收不了真主党的枪，巴解组织也同样收不了哈马斯的枪。在经过一系列内部博弈，甚至武装冲突后，试图在加沙地带收权的法塔赫被赶出了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的内部派系之争，正式演变成了带有地缘分裂色彩的博弈了。事实上，由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分裂状态，即使没有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的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也会有其他形态的政治力量，以此为基地不接受约旦河西岸的管束的。换句话说，除非两地地缘力量对比悬殊，否则这种地理上的分裂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无论有没有哈马斯，客观上都不应该看好巴勒斯坦能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国土，建立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巴勒斯坦人舍弃掉加沙地带（比如交给埃及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巴、以双方还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耶路撒冷。而在这个死结当中，还有一个死结当中的死结——“阿克萨清真寺”。

第三十七章 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犹太王国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并营建圣殿

作为中东部分的结束篇，中东问题真正的暴风眼也即将登场了。解读中东的话，怎么可能不说到圣城“耶路撒冷”呢？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解读，就是因为这座圣城的归属问题，是中东最难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暴风中心。

如果没有得到耶路撒冷，那么即使犹太人占据了除此之外的所有“迦南”之地，甚至把戈兰高地、西奈半岛、北加利利山脉、外约旦高原这些外围缓冲之地统统握在手中，以色列也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或者说没有真正完成复国之梦；而如果让犹太人完全占据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也同样无法接受。因为作为伊斯兰教位列第三的圣城，耶路撒冷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地位和象征意义。当然，对这座圣城感兴趣的，远不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皈依基督教的欧洲人，就曾经多次发动史称“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以夺回圣城为名向富庶的亚洲进军。

不过，问题之所以变得这么复杂，归根溯源还是因犹太人而起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神圣光环，最早就是犹太人所赋予的。关于犹太教的创立，以及“迦南”之地的地缘条件，我们之前已经作过解读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置居中 又有高度的中央高原无疑是迦南的核心板块。无论是谁控制了迦南之地，正常情况下都会在中央高原选择一个合适的点营建政治中心的。这个点，就是耶路撒冷了。

并不能说，就是犹太人最先开发了耶路撒冷。因为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带，新月沃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在犹太人到来之前，耶路撒冷及迦南之地，就已经成为很多民族的居住之地了。不过耶路撒冷能够成为迦南（或说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中心，犹太王国的建立是有开创之功的。三千年前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在把“以色列王国”的影响力扩张到顶峰时，他决定在政治中心——耶路撒冷营建一座“圣殿”，以作为犹太人的精神象征。对于犹太人来说，圣殿的营建不仅代表了他们的信仰，也代表了他们那段辉煌的历史。

其实，对于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来说，总是需要一个符号来凝聚文化向心力的。一般情况下，前人所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会比较容易胜任这个任务。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用“长城”来作这个符号一样。“圣殿”之于犹太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和长城多次重建一样，历史上犹太圣殿也被重建过一次。这就

是所谓“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犹太人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灾难，是在第一圣殿建成约 400 年后。这段历史始于所罗门王死后（公元前 930 年），终于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并焚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为止（公元前 584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虽然犹太人在所罗门王之后，就陷入了分裂（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耶路撒冷仍是南方“犹太王国”的首都，以及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并不断遭受外敌入侵。但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还是始终生活在迦南之地的。

第二节 犹太人历史上沦为巴比伦之囚

事实上，政权的更迭并不总是会带来社会面地缘结构的改变的。因为大多数时候，征服者只是满足于对被征服者的政治统治，并从中获利。并不一定要改变当地的民族构成、生产方式。除非在这种征服之后，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或者迁移，才有可能造成地缘结构的重大变化。就好像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更迭频繁，民族入侵也很多，但从文明、民族的角度看，却并没有出现过断层一样。风险最大的一次，算是蒙古人的入侵了。不过由于华夏农耕族的基数太过强大，蒙古人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上所作出的那些改变，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相比一直独立在东亚发展的华夏文明，犹太人的文明就很脆弱了。迦南之地固然是一个几乎具备各种地貌特征，位置优越的板块；但本身的纵深太小，不足以支撑犹太人繁衍出让别人无法清洗他们的足够人口基数。也就是说，一旦遇到足够强大的对手，对犹太人完全有可能用种族清洗的方式，改变迦南之地的民族结构。而这，也正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前，阿拉伯人认为能够把犹太人完全赶走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是在今天，关于以色列的长期生存问题，一直都被很多人所怀疑。无他，地方太小了。

虽然阿拉伯人现在很想把犹太人给清洗出去，但当年把犹太人从迦南之地赶走的，可不是他们。最早做这件事情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巴比伦王国。2500 多年前，兴起于两河下游平原的巴比伦王国，最终攻占了迦南之地。最初他们只是把犹太人的王室和贵族们带走，并没有试图完全改变迦南之地的民族构成。不过犹太人随之而来的反抗，让巴比伦人决定釜底抽薪，彻底把犹太人从迦南之地抹去。在攻陷了反抗的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的圣城被毁，大批犹太人也带到了巴比伦控制起来。这也就是犹太人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这种种族清洗的方式来控制一片土地的。毕竟这种方式，本身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高。清洗原有民族和移入新的民族都需要成

本。相比之下，通过控制土著居民的上层阶级，来获得政治、经济利益，能让帝国迅速扩张。在犹太人被带到巴比伦半个世纪后，崛起的波斯帝国就给了犹太人这样一个机会。在他们攻灭巴比伦王国之后，犹太人被获准回到迦南之地，替帝国经营这片土地。而为了让犹太人更加忠于帝国，犹太人也获准重新建造精神中心——圣殿。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圣殿”。

在犹太人回到迦南之地，并在第一圣殿的遗址上兴建第二圣殿后的几个世纪中，虽然包括迦南之地在内的新月沃地，一直城头变换大王旗；但犹太人和迦南之地、耶路撒冷的地缘关系，却始终没有再被割裂过。继波斯人之后而来的马其顿人、罗马人，也都还是采取依托犹太贵族自治方式，来行使帝国的管理权。不过，在强大的外来入侵者面前，像犹太人这样的弱小民族面临类似巴比伦之囚的种族清洗风险，却总是存在的。而这一天，也终于在公元一世纪变成了现实。

第三节 耶稣传教对犹太人和罗马人关系造成的影响

最终为犹太人引火烧身的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他们的宗教。罗马帝国对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的处理，不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关于这点，其实我们在宗教部分就已经作过解读了。基督和他的信徒们把犹太教义向外族扩散的过程，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最初，犹太人和罗马人对于这点都十分不满。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始终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如此“先进”的宗教，只能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犹太族群内部传播；而对于罗马人和其他统治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容忍犹太人一直呆在原地，并且保持自己文化的完整性，也正是看到了他们的宗教本身不具备侵略性。

如果犹太人本来不影响帝国的其他臣民，又有足够的忠心为帝国创造财富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从技术角度来看，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非偶像崇拜的宗教理念，无疑是先进的。特别是对比罗马人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多神偶像崇拜而言，更具有在不同民族、文化中传播的可行性。所以，当出身于犹太人的耶稣向外族传播教义时，犹太人的灾难也就到来了。帝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意识形态的入侵。而对于耶稣的处置，却又让耶路撒冷蒙上了新的神圣光环。因为被犹太人和罗马帝国所不容的耶稣，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迦南的政治中心，被审判并钉上十字架的。当然，基督徒也同样认为，三天之后耶稣是在这里复活的。

作为基督教的传播起点，耶路撒冷本来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就应该占有

重要的地位。而耶稣受难及复活的事件，无疑又让耶路撒冷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宗教光环（对于基督教来说）。当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已经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后，纪念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也在耶路撒冷修建而成。到此，有了“圣墓”这个精神标志的耶路撒冷，无可置疑也成为了基督教的第一圣地。由于基督教直接继承、发展自犹太教（简单点说，就是向外“普世”的犹太教），所以即使没有圣墓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在基督教中，显示出它的神圣地位来的。当然，有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刑、复活这个过程，圣城的地位更是无从动摇了。

尽管犹太贵族通过向罗马人告发耶稣，而进行了切割；但对于罗马人和当时的人们来说，基督教还没有独立成型。也就是说，一神教义在帝国内部持续发酵扩散的帐，还是要算到犹太人身上的。其实即使到了后来，基督教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宗教，也还是承认自己和犹太教的继承关系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旧约》了。所以说，罗马人如果认为，不能再任由犹太人宗教自治也是正常的。

第四节 犹太人武装反抗罗马失败后被清除出迦南

当罗马人查觉到犹太人的宗教对帝国的稳定有致命影响后，他们插手犹太人内部事务，并由此激化双方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三十年后，这些矛盾终于累积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对抗。不满足罗马人统治方式的犹太人，在迦南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面对比巴比伦人更为强大的罗马人，这种反抗的结果可想而知，在经历过四年的战争之后（公元66年——70年）。罗马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和其他反抗的城镇，并又一次的毁灭了圣殿。而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伴随着一次次残酷的武装冲突，迦南之地所剩余的犹太居民，彻底被清除出了耶路撒冷和迦南之地。只不过，这一次等待他们的，就不是一次巴比伦之囚了。罗马帝国广袤的国土，让犹太人有了更为广泛的扩散空间（虽然这种扩散是被动的，并且很多人是被以奴隶的形式流散他处的）。

鉴于圣殿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它的遗址很自然的成为了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也成为了凝聚犹太民族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倒是要“感谢”一下罗马人。因为他们在拆毁犹太第二圣殿时，做得还不够彻底，留下了一段护墙（犹太人当时也做了修复工作）。作为圣殿的一部分，这段高20米，宽50米的护墙，自然也成为了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圣地了。无论是在历史上，犹太人获准可以定期回到耶路撒冷朝圣；还是历经千难万苦建国之后的以色列，无不把这堵被他们称之为“哭墙”的遗址，视作犹太人的精神中心。

当然，在犹太人心目中，完整的重建犹太“第三圣殿”，才是犹太民族又

一次回到“上帝应许之地”的真正标志。只是这一次，事情变得尤其复杂。让问题变得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基督教也把耶路撒冷当成了圣地，并在耶稣受难之处兴建了“圣墓教堂”。鉴于犹太人和基督教世界现在这种共生的地缘关系，犹太人和以色列并不会介意对基督徒完全开放耶路撒冷。真正让问题变得复杂的，是另一位创教圣人在 1400 多年前多年前的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让今天中东问题的根本解决变得遥遥无期。至于这个选择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今日中东地缘稳定的，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哭墙

第三十八章 伊斯兰教的创立传播及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第一节 穆罕默德创教后在麦地那与麦加贵族的斗争

与耶稣“被选择”的在耶路撒冷完成神迹不同，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神圣地位的树立，就显得非常有针对性了。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的一个山洞中，思索出伊斯兰教的教义后，麦加就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之地。由此，麦加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城。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他所创立的宗教自然必须先覆盖阿拉伯人，然后才能想着向外族传播了。只是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和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一样，都是多神、偶像传播。而作为阿拉伯人的政治、宗教中心，阿拉伯贵族们并不愿意有人来通过传播一个新的宗教，来影响他们的利益结构。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穆罕默德和他最初的追随者们被迫于公元622年离开了麦加，在塞拉特山脉当中找到了“麦地那”，以此作为伊斯兰教初期的传播中心，以及与麦加旧阿拉伯势力对抗的基地。其实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以麦加为代表的阿拉伯旧贵族势力，以及以麦地那为代表的试图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新兴阿拉伯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后来导致伊斯兰教内部分裂成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阿里”之争，也是源自于这两股势力的缠斗。

出于调和这两股势力的原因，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们选择让麦加和麦地那都披上神圣的光环，一起成为了伊斯兰教两大圣城。可以说这也是统一阿拉伯人意识形态的需要。为此，麦加城内阿拉伯人旧的信仰中心“天房”和天房内的圣物“黑石”，也被披上了伊斯兰教圣物的光环，并成为每年穆斯林朝觐的中心。而为了让麦地那坐实政治地位，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选择了将圣自己的陵墓修筑于此。这种为实现阿拉伯内部和解，而做的地缘政治上的布局。让麦地那成为了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并享有和麦加一样神圣的地位（去麦加朝觐者，一般都会去麦地那“谒陵”）。

在穆罕默德和他的支持者被迫出走麦地那之前，应该说，这位创教先知还做了很多工作，试图让麦加的阿拉伯人改变他们的多神信仰。作为从犹太教、基督教中吸收教义的新兴宗教，伊斯兰教的创立之路也突出了“天启”二字。即创教者通过与神的直接沟通，获得授权向人间传教。所以这三教也被统称为“天启宗教”。当信徒和被传播的对象信念不足时，通过先知们所传达的“神”的旨意，就成为了强化宗教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了。

在麦加的和平传教被打压到极限之时，穆罕默德就显示了这类“神迹”。

在一个夜晚，在天使的接引之下“登宵”与伊斯兰教所认可的古代先知们沟通，以印证伊斯兰教的确受到了神的庇护。出于对宗教的尊重，这类“神迹”的出现，是否真实存在并不是我们所需要讨论的。只能说，无论是出于神的需要还是人的需要，这类“神迹”都不会无端出现的。

当然，具体到现实世界里，无论是一个宗教的建立、传播，还是一股政治力量的兴起，都不可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这类“神迹”身上的（只能是辅助手段）。就好像穆罕默德宣称登宵与神沟通后，信者固然是更坚定了他们的信仰，不信者依然是冷眼旁观。一年半之后（公元 622 年），麦加城中的穆斯林还是被迫迁移到了麦地那，并在做强实力后，通过以宗教凝聚起来的强大军力“光复麦加”（公元 630 年），才算在阿拉伯人当中统一了意识形态。

第二节 穆罕默德将伊斯兰教设计成普世宗教

既然伊斯兰教的创立时间是三大天启宗教中最晚的，那么穆罕默德的创教过程就有“后发优势”了。即从犹太、基督两教的做法和教义中学习，以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很显然，如果从生存空间的角度看，基督教那种不将宗教与血缘关系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要更为先进，也更易于教义的扩张。这一点，在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中，也得到了验证。

在耶稣受难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并没有因此而中止，反而由于加入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早期支持者）传教过程的记录，而进化成为了 2.0 版的（相对犹太教而言）自成体系的宗教。无论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有多么崇高的理念，他们都逃脱不了被现实的政治所利用的命运。开始和犹太教进行切割的基督教，也不例外。认识到基督教强大扩张力的罗马人，很快就顺水推舟的接受了基督教义。并将罗马的两大政治中心——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基督教的两大宗教中心。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认为这是宗教的胜利；而从现实世界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选择了一个能更好为自己服务的意识形态罢了。作为一个比基督教晚创立 600 年的，又一个站在犹太教肩膀上的“天启宗教”，穆罕默德有足够的历史空间来洞悉基督教的兴起之路。很显然，无论你是真的想普世，还是想创立一个帝国，像犹太人那样将宗教与血缘关系捆扎在一起，把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限定在阿拉伯人当中，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教义中，把伊斯兰教设计成为一个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的普世宗教，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在伊斯兰教创立之时，基督教已经发展了 600 多年，伊斯兰教的传播必须直面基督教的压力。此时阿拉伯半岛上最有价值的新月沃地中的一半，也就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西亚裂谷带，仍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

下（这时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了）。虽然这个时期，基督教内部暂时还没有因为帝国的分裂而分裂（公元 1054 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天主、东正两教）。不过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以及罗马帝国的领地，地中海沿岸的这片沃地自然也被基督教徒所覆盖了。

虽然以地中海为地缘联系纽带的罗马人，对阿拉伯半岛的兴趣仅限于沿地中海的那片西亚裂谷带。即使是对新月沃地的另一半，两河中下游地区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当时是波斯帝国所控制）。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如果想有所作为的话，却必须控制新月沃地。这倒是和东亚大陆的情况很类似，中原政权虽然对蒙古高原上的那些游牧之地没兴趣。也自认为以自己的生产方式来说，并无力长期占据。但那些游牧部落，却对中原这片富庶之地抱有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出于人性中贪婪的本能；还是想有更大的格局，希望同样建立起强大的帝国的需要，都会把目光投向长城以南。

有鉴于此，无论是为日后的政治扩张做准备，还是仅仅出于宗教竞争的目的，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们都会觉得有必要，在已经被犹太、基督两教奉为圣地的耶路撒冷找到宗教支撑点。也就是说，这座天启宗教当之无愧的圣城，绝不能仅仅披上犹太、基督两教的光环。

第三节 耶路撒冷被预设与伊斯兰教产生联系

当一个地点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必须成为宗教圣地的话，寻找（也可以说是设计）“神迹”反而是件容易的事了。如果说犹太人通过在自己的政治中心“耶路撒冷”兴建圣殿，反过来强化了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而欧洲的基督徒们又有夺回耶稣受难地，这个天然的神圣理由来服务于他们地缘扩张的政治企图时；那么创教之初的伊斯兰教就需要设计出个理由，来证明耶路撒冷对穆斯林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样的话，阿拉伯人在内部整合完毕之后，也能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圣战”完成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比较困难的是，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当时还没有机会在耶路撒冷显示他们的存在。甚至说，还没有机会被东罗马帝国视为威胁，受到和耶稣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如果穆罕默德希望日后阿拉伯人有机会在宗教和政治上扩张到耶路撒冷的话，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没有实际活动的情况下（耶路撒冷），将伊斯兰教的影响力预设到耶路撒冷。从战略角度看，这种设计无疑是有必要的。那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战术手段来实现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把方法说出来了。在穆罕默德希望用“登宵”的神迹，来扩大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当中的影响力时，耶路撒冷未来在伊斯兰教中的神

圣地位，也被预设了进去。在这次神迹当中，穆罕默德被天使引领到了耶路撒冷，并由那里正式“登宵”夜游。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还无法在耶路撒冷发挥影响力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已经因为这次“神迹”，成为了未来阿拉伯人势在必得的圣地了。为了强化这个目标，在穆罕默德被迫迁居麦地那之后，穆斯林们在最初的十几年间，甚至是以耶路撒冷为礼拜的方向（后来及现在，则是麦加了）。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有了基督教创教传播经验作参考的阿拉伯人，在进化出 3.0 版的“天启宗教”后，效率之高令人咋舌。仅仅是在穆罕默德重返麦加，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 8 年后（公元 638 年），穆斯林大军就攻陷了耶路撒冷。此后，一个横跨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也被迅速建立了起来。相信在把耶路撒冷预设进伊斯兰教宗教中心体系中时，穆罕默德应该还没有想到，将来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耶路撒冷打上伊斯兰教的标签。

虽然作为天启宗教终极进化的 3.0 版，伊斯兰教教义中对于偶像崇拜的禁令，要比 2.0 版严格得多，所展现出来的宗教控制力也要强大得多。但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即使不赞成偶像化神和先知，也需要某种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景观，以让信众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仰目标。这就像我们参加百米赛跑，不是说跟选手说你只要跑够一百米就行了，还需要在目标处拉上一根绳子，以把目标形象化一样。

虽然在穆斯林攻占耶路撒冷之前 6 年，穆罕默德就已经在麦地那离世。他应该还没有机会去思考，如何通过耶路撒冷选择和兴建一处标志性建筑，来物化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的宗教地位。但他的继任者们却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并实现这点。在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这项宗教工程被迅速的实施了。而这项宗教工程的具体名称，就是“阿克萨清真寺”。

第四节 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如果说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巴、以问题的焦点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阿克萨清真寺”就是焦点中的焦点了。可以说，只要阿克萨清真寺问题存在一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整个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化解。而中东也很难迎来真正的和平。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座神奇的寺院，能够引发如此之深的矛盾呢？

前面我们也解读过了，由于耶路撒冷在宗教当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又是阿拉伯人是否能够统一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标志。于是穆罕默德在创教之初，就有意识的选择了从耶路撒冷“登宵”遨游七重天。当然，先知是否真的有能力一夜之间由麦加行至耶路撒冷，然后再登天，就不是我们所能解释的了。所谓

“信则灵，不信则无”。不管是否真有其事，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的神圣地位，算是树立起来了。而这座犹太、基督两教的圣城，也随之成为了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城。

有时候想想，要是当年“拜上帝”的洪天王若是成了事，在东亚发展出个 4.0 版本的天启宗教来，是不是也会想个法子，在耶路撒冷显圣呢？可惜的是，即使他成了事，也这样做了，却也很难有能力把政治影响力渗透到耶路撒冷，并打造出一处属于 4.0 版本的宗教圣所来。洪天王可能遇到的问题，对于阿伯人来说就不存在了。基于地理关系的原因，阿拉伯人在拥有了自己的宗教后，很快就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人。虽然这时候穆罕默德已经离世，但他的继任者却有能力在耶路撒冷寻找到穆圣“登宵”之处，并兴建属于穆斯林的神圣建筑了。

在穆斯林大军进入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已经被基督徒经营了数百年。这座面积仅一平方公里的城市，也遍布基督教的宗教场所了。虽然现在大家看伊斯兰教好像和基督教水火不容似的，但从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来看，却是和基督教、犹太教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在创教先知看来，这种继承关系并不是说伊斯兰教应该在犹太教、基督教之下，而是作为后发的宗教，应该拥有更大的“先进性”和包容性。犹太教中的摩西、基督教中的耶稣两位创教之人，也同样是穆斯林的先知。他们和穆罕默德一样，都是真主（上帝）挑选的先知。只不过，穆圣是上帝所挑选的最后一位先知，拥有对上帝意志最终的解释权罢了。

既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很多教义、事件都被吸收了进来，那么穆斯林对待这两教的信徒，就不能简单的认定为敌人了。在他们看来，这两教更像是因为没有理解透上帝意思，而误入歧途者。就好像当年基督教也是在全面继承犹太教教义的基础上创建的，因此并不会简单的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一样。只是，虽然每一个新的天启宗教版本，都试图用有后发优势的教义来吸收掉之前的版本；但这三个已经成型的宗教，最终还是在不同的地缘环境中，发展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宗教。并且因为现实的地缘矛盾，而变身成为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

不过不管后世的穆斯林如何解读教义并和基督教徒血战到底，耶稣在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却也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在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并和来自欧洲基督教国家战争不断时，纪念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却并没有受到破坏。当然，耶路撒冷城内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基督教宗教场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岁月和政治博弈所侵蚀掉了。

第三十九章 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矛盾

第一节 阿克萨清真寺的修建及其结构

如果耶路撒冷有一座纪念“摩西”的建筑留存，也应该能够享有和圣墓教堂同等的宗教地位，并被三教共同保护下来。至于说犹太人所最为看中的“圣殿”，就没那么大的把握了。因为修建它的所罗门王，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并不享有宗教地位。不过穆斯林们并不用去头疼，到底要不要把这座建筑抹去，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500多年前，尚把基督教视为异端的罗马人已经把犹太人复建的“第二圣殿”给拆除了。

即使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可以想象得到，能够让犹太人兴建“圣殿”的地方，肯定是耶路撒冷城内地势最好，“风水”最佳的位置了。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一犹太圣殿所处的位置要比周围高（神圣的地方，自然要建在高处）。犹太人因此也称这块高地为“圣殿山”。如果想在耶路撒冷寻找一块风水宝地来标示伊斯兰教的存在，没有比圣殿山更好的了。因此圣殿山上的一块大石也就成为了穆圣“登宵”之处。

这块石头是不是当日犹太圣殿留下的遗迹，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义已经将之定为圣物，并围绕它兴建了一系列宗教建筑。这些建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克萨清真寺”。说到这里，我们要



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犹太圣殿山示意图

先解释一下，到底谁才是“阿克萨清真寺”。谁是阿克萨清真寺，看起来好像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它的确成为了一个问题，并且存在诸多误解。而这



岩石圆顶屋



阿克萨清真寺礼拜大殿

其中的区别，甚至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阿、以矛盾的解决。

一处标志性建筑的兴建，往往是经过很多代人的不断维护、补充而成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宫，也是经由明清两代数百年的时间扩建而成的。阿克萨清真寺也不例外，在历史上，长期占据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曾经多次对这座建筑进行过修饰和扩建。由于穆圣登宵处的那块长 17.7 米、宽 13.5 米的淡蓝色巨石，是如此的神圣。最开始的宗教建筑自然是围绕着这块石头而建。及

至今日，这座建筑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处有着金色圆顶的八角形建筑了。

由于这座定型于公元 691 年，拱卫圣物的建筑后来又被加上了伊斯兰建筑标志性的圆顶，并在圆顶贴金，非常光华炫目，因此也被称之为“金顶清真寺”或“圆顶清真寺”（最近一次覆金，是 1994 年约旦国王所捐）。由于“金顶清真寺”是那么的显眼，座落的圣殿山地势又高，以至于每一个进入耶路撒冷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它吸引。每每提到“阿克萨清真寺”时，往往使用的都是金顶清真寺的照片。但事实上，很多时候“阿克萨清真寺”之名，却被特指金顶清真寺南面一座面积更大的建筑。

虽然最开始，围绕“登宵”处所营建的八角形建筑是那么的漂亮，但这座每边只有十米，周长 80 米的建筑，显然无法满足日益争多的朝圣的穆斯林的

需求。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在这座圆顶清真寺的南面又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5000人同时做礼拜的礼拜堂（也有标志性的圆顶，不过是黑色的）。由于这座礼拜堂，事实上承担了主要的礼拜功能，因此很多时候，“阿克萨清真寺”也被指向这座建筑了。而金顶清真寺，在功能成则主要成为了供奉登宵圣地之处，被称作“岩石圆顶屋”，或“登宵圆顶亭”。

其实关于这两处建筑，还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怎么叫倒也无所谓了，我们知道这两处建筑之间的关系和传承就行了。虽然现在面积更大的礼拜堂，很多时候顶了“阿克萨清真寺”之名。登宵处的八角屋反倒成了附属建筑，但从宗教价值来看，“岩石圆顶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上，岩石圆顶屋和礼拜堂并非圣殿山上的唯一建筑。经过一千多年的扩充，两座建筑之间又增添了门廊、宣礼塔、从山下通往寺内的地道等辅助性建筑，并且在周围建筑了一圈长方形的围墙。因此，也可以把这围墙围就的整片建筑群，统称为“阿克萨清真寺”。

第二节 阿克萨清真寺的存在对以色列重修圣殿的影响

以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经营时间，以及在中东庞大的群众基础，以登宵石为起点，持续扩充“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就像一个国家的扩张有一个地缘边界一样，阿克萨清真寺的扩充，也有它的地理边界。当清真寺扩充到它的地理边界时，整个建筑群的格局也就定型了。

阿克萨清真寺的边界，其实也差不多相当于圣殿山的地理边界。并不确定这片高地是不是当年犹太人有意垫高，或者依地势修整过。但它长480米，宽300米的矩形轮廓，确实让穆斯林在扩充阿克萨清真寺时，有了天然的边界。只是这条边界，很有可能也是犹太圣殿的边界。

能够让犹太人坚信整个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就是建筑在自己圣殿基础上的，还有那段在礼拜堂西南角，被称之为“西墙”的圣殿遗址。在阿拉伯人最终用护墙把整片高地包裹起来，作为阿克萨清真寺的边界时，这段墙体并没有被推倒重修，而是被当成了整个护墙的一部分。说起来，这倒也不是为了降低工程造价，而是特意留给犹太人的一个念想，犹太人也一直被允许进入耶路撒冷，在西墙下面哀悼（因此也被称之为“哭墙”）。

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伊斯兰教创立的本意，实际上是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宗教的。或者说，认为自己的教义有能力把其他宗教包容进来，并让这些“误入迷途”的异教徒自然转化过来。不过，如果当初占据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知道犹太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成为整个穆斯林群体的敌人，想来一定会后悔没有把这段护墙给毁掉的。

如果犹太人没有回到迦南之地建国，而还是像从前那样流落在世界各地，他们应当还是会很感激穆斯林们能够为他们留下这段圣殿遗址的。并让他们千百年来，可以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朝圣。然而在犹太人终于重新站在耶路撒冷的土地，并通过战争和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对阿拉伯人取得压倒性优势后，犹太人当中的民族主义者，就不再满足于在圣殿“西墙”下面哭了。

对于犹太人来说，在第一、第二圣殿的基础上，重建第三圣殿，才是犹太民族重新崛起，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犹太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和基督教世界通过宗教改革而赢得了世界不同，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散世界 2000 年后，还能够保持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可以说就是拜犹太教之功。所以长久以来，具有民族、宗教双重象征的圣殿，在犹太人心目中的份量就可想而知了。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耶路撒冷和圣墓的重要性，并不如在十字军东征时期。

当时相对阿拉伯世界，文明和实力属于弱势一方欧洲基督徒们，需要以夺回圣城、圣墓为目标，凝聚整个欧洲基督教的力量进行扩张。而对于始终没有安全感的犹太人，却在什么时候都需要用宗教来武装自己，以使自己作为一个族群存在于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重修圣殿的想法是不可能消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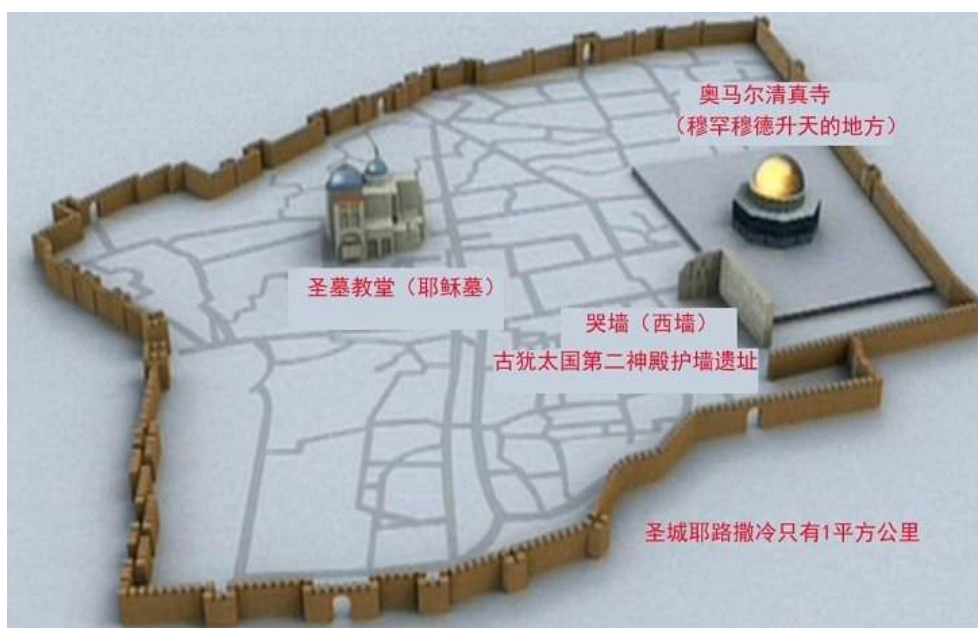
第三节 犹太人不放弃在阿克萨清真寺区域重建圣殿的想法

也许有人说了，既然耶路撒冷现在是三教圣地，那么索性一分为三，大家各拜各的神好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事实上，耶路撒冷老城的确也被分成了四个区，有基督教、穆斯林、犹太三个居住区，另外还有一个“亚美尼亚”区。也就是说，由于三教圣地都聚集于此，三教的信徒已经在耶路撒冷形成自然边界了。如果一定要分割的话，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在巴、以和平谈判当中，也的确有分割耶路撒冷老城的提法。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你无法阻止犹太人在完全掌控局势的情况下，放弃重修圣殿的想法。而如果想完成这个目标的话，又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阿克萨清真寺”的存在。

应该说，如果想完全把“阿克萨清真寺”毁掉，再重建圣殿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会引发无穷无尽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能阻止犹太人当中的极端主义者去做些什么。1969 后，就曾经有犹太极端分子放火焚毁了清真寺建筑群内的部分建筑。虽然并不能认定，这是以色列方面的政府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犹太人心目中，阿克萨清真寺的建筑每消失一分，他们重建圣殿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分。而对于以色列政治家来说，不断的让犹太人觉得他们没有放弃重建圣殿的努力，也是争取民意的重要手段（不光是以色



岩石圆顶屋



耶路撒冷三教圣地示意图

列的犹太人，也包括全世界范围的犹太人了）。

对于犹太人当中的温和派来说，他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是不在巴以和谈中放弃耶路撒冷和圣殿山所在的区域了；而对于强硬派来说，则需要一些更主动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2000年，强硬派的代表——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带人强行参观了阿克萨清真寺。而在此之前，阿克萨清真寺作为穆斯林禁地，是禁止向异教徒开放的。

沙龙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实是

为了给选他上台的犹太人一个交待，证明以色列政府不会放弃重建圣殿的想法。只是，以色列虽然已经完全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技术上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甚至于拆掉阿克萨清真寺。但那样的话，不仅仅会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震动，也无法争取到同盟者。这种政治后果，也不是以色列和犹太人所能承受的。

其实仅仅是沙龙强行闯入阿克萨清真寺一事，就已经直接引发了巴勒斯坦的政治地震，并影响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缘政治格局了。一方面，以色列的这种强硬表态，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情绪，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

而代表巴勒斯坦强硬派的哈马斯，也因此民意上逆转了巴解组织主流派别——法塔赫。2006年，哈马斯甚至在巴勒斯坦的政治选举中击败了法塔赫，赢得了巴自治政府的组阁权。无论以色列方面希望用何种手段解决巴、以之间的问题，对面出现一个强硬派政府，显然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事实上，这次沙龙硬闯阿克萨清真寺（当然，他会认为这是登上犹太人的“圣殿山”）所引发的政治地震，并不仅仅是让哈马斯有机会把触角从加沙伸到西岸，更让本来以温和派示人的“法塔赫”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作为巴解组织内部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自治领土的法塔赫，在出现如此重大的冲突时，当然不能让哈马斯独自以反击以色列的领导者自居了。为此，法塔赫内部不满阿拉法特绥靖态度的成员（主要是年轻人），也分化出了一支新的以武装对抗以色列，作为建国手段的军事化政治派系——阿克萨烈士旅。并频频因恐怖袭击而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只不过和哈马斯的原教旨主义不同，阿克萨烈士旅并不是一支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派别，而是一支世俗化的民族解放组织（并且还是承认属于法塔赫）。

第四节 以色列以考古挖掘为名蚕食阿克萨清真寺

现在看来，以色列方面对阿克萨清真寺的试探性行为，已经引发了巴勒斯坦方面的政治地震。并让鹰、鸽两派分治加沙、约旦河西岸的地缘格局出现了变化。如果再有进一步的强硬做法，很难想象会不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震动，并引起新的战争。这不仅仅是巴、以当中的温和派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东局势的主导者——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以色列方面在此之后，似乎也无法对阿克萨清真寺采取政治行动了。最起码，再次硬闯禁地就不是一个好办法了。尤其是阿克萨清真寺，现在还顶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授予的“世界遗产”名头。任何针对清真寺的行为，都可以被放大为站在全世界人民的对面。

虽然阿克萨清真寺由于其宗教、文化上的重要性，有机会吸引足够的国际关注。但却并不代表以色列就没有办法，继续向他们的目标靠拢了。既然阿拉伯人可以以保护文化遗产之名，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以色列人的行为，那么以色列人同样可以以文化之名，暗渡陈仓。从2004年开始，以色列开始在从圣殿山下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地道，进行考古发掘。这其中的逻辑就是，我并没有去试图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的建筑格局，只是在地下考古罢了。只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去挖一座建筑的地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以色列人是真心想在他们所认定的“圣殿山”中，找到证明圣殿存在的证据。不过要是因此而引发地上建筑坍塌的话，也是一件

好事。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圣殿可以有地方重建了。就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人的“考古”工作，已经引发了阿克萨清真寺周边的部分道路坍塌了。为此，巴勒斯坦人也曾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声称阿克萨清真寺即将塌陷。至于事情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还很难说。只能说，在以色列完全控制耶路撒冷的情况下，这种蚕食、渗透行动是不会停止的。也许以色列人也清楚，完全把阿克萨清真寺拆除是不可能做到的。最起码，作为伊斯兰教圣物所在的“岩石圆顶屋”，是基本没可能动的。

但如果建筑群内的其他建筑因某种原因而消失，犹太人并非不存在重新登上圣殿山的可能。就好像他们已经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让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正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承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现在仅仅要求，在剩下的约旦西岸和加沙两块土地上建国了）一样。也许通过“天灾人祸”，让圣殿山上的伊斯兰教建筑腾出些地方并重建“圣殿”，是一件漫长且困难重重的事情。其间一定需要经历许多政治、军事博弈，流上许多血。但对于已经等了二千年，并受尽磨难的犹太人来说，现在已经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他们，是不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不要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助穆斯林和犹太人出个方案，来解决阿克萨清真寺和圣殿山的地缘矛盾，因为我也没有答案。同样的，如果你问我中东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一片和平之地，也一样没有答案。这件事情估计只有上帝知道，既然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信仰的“上帝”，其实应该为同一个神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天，上帝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